



未来市长



莫斯科市长
卢日科夫
亲身感言

必读

ПОСОБИЕ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МЭРА
РАЗВИТИЕ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вЪ РОССИИ 100 ЛЕТ СПУСТЯ

[俄] 尤·米·卢日科夫 著
孙越 许文鸿 胡谷明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ПОСОБИЕ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МЭРА

卢日科夫精彩话语：

我这一辈的人在政界屈指可数，而且不仅仅在政界……实际上是从积极的生活中被推出去了，被开除出去了。依我看，国家和改革因此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

首要考虑的是年轻人的建议，然后才是“有丰富阅历和经验的人”的建议。

俄罗斯的问题历来就在于，我们总是把“国家”与中央等同起来，与克里姆林宫、冬宫和老广场等同起来，而在“下面”，“国家”也总是被官吏、警察和检查员们私有化了。

官僚们的另一特点就在于：他们习惯于为主人服务，而不习惯，也不会为社会服务。

（城市的）外来移民应该有，但外来移民也应当有所区分，毫无疑问，也应当受到监督。移居者应该用劳动取得成为这个城市长期侨民的权利。否则，在保护移居者的权利时，有可能非常严重地侵害本地居民的权利。

莫斯科市长
卢日科夫
亲身感言



未来市长 必读

ПОСОБИЕ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МЭРА
РАЗВИТИЕ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вЪ РОССИИ 100 ЛЕТ СПУСТЯ

[俄] 尤·米·卢日科夫 著
孙越 许文鸿 胡谷明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未来市长必读/[俄]卢日科夫著;孙越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2

ISBN 7-5004-5360-4

I. 未… II. ①卢… ②孙… III. ①经济发展—研究—俄罗斯②社会发展—研究—俄罗斯 IV. F15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6827 号

《未来市长必读》根据莫斯科教材与制图出版社 2003 年版译出,
《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 100 年以后》根据莫斯科教材与制图出版社 2005 年版译出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5-6516

责任编辑 耿华军
责任校对 刘 波
责任印制 王树国
封面设计 李莹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assp.cn>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华冠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16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辑部联系电话: 010-64041536

目 录

尤·米·卢日科夫简介	1	—————
尤·米·卢日科夫致中国读者	1	—————

第 1 部

未来市长必读

图书馆里的 12 次谈话

致读者	3
01 权力公式不存在吗? ……	5
02 怎样和为什么要改革政权?	20
03 国家在何处结束?	42
04 福利从何处来?	66
05 论全球化时代的民族自决权	98
06 反文明的野蛮行为	121
07 什么是安全?	148
08 新的全球等级制度	173
09 俄罗斯的“收缩”外交方针	196
10 莫斯科的定位	224
11 莫斯科面临的一系列难题	256
12 我对俄罗斯的生存能力充满信心	281

目 录

第 2 部

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 100 年以后

同政府就社会政策的一次辩论

- | | | |
|----|--|-----|
| 01 | 一个幽灵在俄罗斯徘徊 | 303 |
| 02 | 国家走向富裕 社会趋于贫困
“苏联模式福利”:使命已经完成
“大转折”之年
人权货币化 | 308 |
| 03 | 反人民的宏观经济学者的理论错误
财富积累理念
稳定基金还是发展基金
联邦主义的钟摆 | 326 |
| 04 | 资本主义的演化
马克思未实现的预言
大多数人的资本主义
人际关系的变革 | 336 |
| 05 | 俄国资本主义未来的九个步骤 | 350 |

尤·米·卢日科夫简介

卢日科夫，尤里·米哈伊洛维奇，1936年9月21日生于苏联莫斯科市，俄罗斯族，大学文化，1958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古博金石油学院。毕业后，卢日科夫曾经在国家化学工业部门的机关和企业担任领导职务。

1987年，卢日科夫当选为莫斯科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后兼任莫斯科市工农委员会主席，1990年当选为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1991年卢日科夫被选为莫斯科副市长并被任命为莫斯科市政府首席部长。1992年6月根据俄罗斯总统令，卢日科夫被任命为莫斯科市长。在1996年6月和1999年12月俄罗斯的两次莫斯科市长选举中，卢日科夫均以压倒多数获选。

1998年年底，卢日科夫当选为全俄政治社会团体“祖国党”主席，目前出任全俄政治党派“统一俄罗斯”高层委员会联合主席。

卢日科夫目前受聘出任俄罗斯国家科学院、莫斯科大学、劳动与社会关系科学院及一系列俄罗斯及国外高等院

校和科学院的荣誉教授。卢日科夫曾经公开发表和出版超过 200 篇文章和若干探讨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的书籍。卢日科夫还拥有 50 个科学发明项目。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提议，莫斯科市曾经获得 1998 - 1999 年国际“争取和平的城市”奖。

此外，卢日科夫还曾经获得列宁勋章、劳动红旗勋章、二级祖国功勋勋章、三级祖国功勋勋章、军人功勋勋章、荣誉勋章、自由俄罗斯捍卫者奖章、加强战斗友谊奖章、莫斯科 850 周年纪念奖章、圣彼得堡 300 周年纪念奖章以及三次总统嘉奖。卢日科夫还是苏联国家奖金和俄罗斯联邦奖金获得者。他还获得“俄罗斯联邦功勋化学家”、“俄罗斯联邦功勋建筑家”、“铁路运输功勋工作者”称号。

卢日科夫家庭幸福，育有四个孩子。他热爱运动，喜欢的项目有：足球、排球、高山滑雪和骑马，他还有养殖蜜蜂的嗜好。

(本文系孙越根据卢日科夫特别授权译出)

尤·米·卢日科夫致中国读者

我对你们伟大的国家和人民，对你们古老的文化深怀好感，因此，当我这两本书的中文版问世的时候，心情格外激动。

衷心感谢出版者给了我向中国读者介绍我作品的可能，这些作品包含了分析世界文明的迫切问题和提出有效解决方法的尝试。

已经到来的 21 世纪提出了新的挑战，并表现出新的危险。今天所探讨的未来的问题，实际就是世界文明和行星地球是否还有未来的问题，世界已经处于其新发展的过渡时刻。今天历史发展的紧张进程与这种急剧性相关。世界在变化，所以，我们对此都应该有所准备。

我在自己的书里自然主要关注我国的发展问题，以及它在这个全新的、变化着的世界上的地位问题。但是，顺便说一句，现在亚洲和欧洲，如同俄罗斯一样，也在寻找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

我并非仅凭一己之力来追求真理，而是努力唤起读者

对全球化、国家和民主的进化、信息化等问题进行深刻和实质性的辩论。

我高度评价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我曾不止一次去过你们的国家，到过许多地方。你们的人民十分友好和勤劳，这并非道听途说，而是我亲眼所见。

我们两国的首都为合作、互助、真诚友好的牢固纽带所维系。人道主义、智慧和美——是我们建设我们生活的基础，也是更加美好的未来的可靠保证。

如果高尚的中国读者在读了我的书之后，产生了访问莫斯科和参观名胜古迹的愿望，我将不胜欣喜。莫斯科人将向你们展示其传统的殷切好客之风情。

衷心祝愿友好的中国人民幸福和繁荣，在建设新生活中取得巨大成就。

谨致以衷心和深切的敬意！



(莫斯科市长尤·米·卢日科夫签名)

(本文系孙越根据卢日科夫特别授权译出)

第 1 部

未来市长必读

图书馆里的 12 次谈话
2003

未
来
市
长
必
读

WEILAI SHIZHANG BIDU

致 读 者

作为莫斯科市长，他的日常事务（一些正式的接待、会议和管理问题）中，有时会有一些没有列入工作计划的会谈。这时候的谈话就往往谈及戏剧或建筑艺术，谈及家乡的面貌或最新的政治新闻。有的会谈者会提出一些问题，也有的人带来一些书，既有自己写的，也有别人写的。

这些会晤常常激发他产生新的视觉，产生特维尔街13号办公室之外的那个时代的新形象。也许，正是在这些时刻，一些新思想产生了。有时是产生一些新的经济项目，有时是一些新书。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交谈者都完全同意他这个办公室主人的观点。我们大家都是有自己的观点的人，市长也绝不总是同意交谈者的意见。

市长在特维尔大街的办公室收到了来自全俄罗斯、全世界的非常多的书。今天这已经是整整一个图书馆——市长的工作图书馆。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常常下楼来到这里，为的是离开一会儿那些响个不停的电话，摆脱会议和

批阅文件，与那些不是等待他在例行方案上签署意见，而是期待与一个最有趣的俄罗斯人交往的人们谈谈话。

图书馆里放着一些大牧首赠送的《圣经》、哲学论文和一些俄罗斯历史方面的书籍。正是在这里，几年前对联邦管辖区的方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还讨论了关于重建教堂的报告。也会就一些迫切的现实问题举行一些座谈会，有时是从谈论孩子问题开始的。《历史的更新》一书出版后产生了不少的争论。有人急于分享自己的想法，曾经有过一些实质性的会谈。有些问题至今仍没有答案……

所有这些与市长的会晤最终形成了您手头上的这本书。会谈不是有规律进行的。有时从百忙之中挤出15分钟，有时抽出有分量的两个小时。录音带一圈接一圈地旋转。莫斯科市长给我们展现了他自己对城市面临的、国家面临的和全世界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的理解。正是这些理解最有意思。这些理解通常留在“镜头以外”，被一些命令和指示的干巴巴的措辞所掩盖。对问题，市长常常没有现成的答案，而是停顿一下简单地表达出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和态度。

书中没有（几乎没有）现成的处方。它具有提出问题的性质。在此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思考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的一些问题。

亨里希·博罗维克

梅洛尔·斯图鲁阿

○ 1 权力公式不存在吗？……

问：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是否存在着关于某种“权力公式”的概念？人们在了解这种公式后，就能明白以何种方式可以攀登到权力的顶峰，并让他们保持住权柄。如果说这种公式真正存在的话，那么您一定知道它……

什么是“权力公式”？如果有一套正式的规则与标准，是为了当选或被任命到一些高级职位（如市长、总统、部长、党魁、社团主席）而制定的，那么，这套规则和标准应是众所周知的，是可以达到的。您只要翻开宪法、法律、公司章程或党章，那里什么都说了。别无他途，或者说，其他道路违法。

然而，“权力公式”也可以理解为个人通往权力的道路。为什么人们选择了卢日科夫，而不是伊万诺夫、彼得罗夫或者西多罗夫，他们也是一些当之无愧的人，也许甚

至比卢日科夫更适合这一职务。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设计这样的“权力公式”。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不很成功，有的人完全没有成功，而有的人根本就不需要这个。

我记得，我童年的时候，在我们院子里住着一个名叫佩佳的孩子。他的奶奶喜欢向所有的邻居唠叨：“一个大苏维埃行政首脑正在成长，他长大以后，我们要把他送到普列汉诺夫学院去学习。”而佩佳当时正在一个沙箱里带领一些小孩子玩耍。他做事的确深思熟虑，非常认真地解释要建什么、建在哪里、怎样建。我的年龄要大一些，也没有条理一些，一心想踢足球，想当飞行员、海军、边防军、工程师……我能记住这些，也许是因为“行政首脑”这个词是如此不平常。后来，佩佳和他的奶奶不知去了什么地方，我失去了他的消息。但是，我承认，我一生在看电视新闻，或者在看报纸的时候都在等待，想听到他的名字。瞧，一个人能够描绘出自己“向上”的人生道路（或者是自己，或者是根据亲近的人的提示）并沿着这条道走下去吗？我没有听到有关佩佳的任何消息。

要想“步入政坛”，需要机遇，也需要跨越数个关键时刻，而且时间非常漫长，准确而言是一生的时间。这种“步入”必须在一定目标的指引下完成。他应该服从于某个集体的需求：国家的、城市的、党的、社会运动的、社团的。必须善于与人建立关系，要让大家都知道你，珍视你的优点，把你当作一个有能力做事的人来尊敬你。大家喜欢你吗？如果没有的话，是会碍事的。让人们把你当作工作人员来珍惜。领导也是工作人员，只不过他劳动的成果

是高质量的决策和组织这些决策的实施。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去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内在动力。这种对社会的强烈欲望，也就是力求“表现自己”，力求不比别人坏，而是比别人好，力求做成某件具体的事情并在社会上占据相应的位置。人们到底会把这种动力使向何处，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事件在起作用。尤其是在人登上权力高峰的过程中，有很多偶然的因素。特别是在社会突变时期，而我们已经有大约 15 年的时间没能从这种社会突变中走出来。

成功的关键在于这一成功的上限是什么和最远的界限在哪里。我的经验告诉我，成功仍旧取决于你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自己爬得更高、坐得更久、统治的时间更长，还是为了人民大众，为了事业。我能提出可行的决定并组织该决定的实施。我努力做到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为了共同的利益，我通常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我喜欢这份工作，我能够把这份工作做好，而不会在人们面前感到羞耻。

这就是我的权力公式。

有一个人曾经向我承认：“从中小学开始我就一直想当经理……”他早就当了经理。我不想说什么不中听的和模棱两可的话。我明白这样的状况，生活中也多次遇到过这样的状况。有的人追求社会地位，有的人追求金钱，有的人追求权力，有的人追求所有这一切。

有的人急切地想做事，实现自己的价值，展示自己所有的才能。他获得的越多，就越想做更多的事情，着手某

件新事情，在不同的事务中和环境中尝试自己。我就属于这一类。这样是好是坏，不由我来判断，再说这样的判断也只是空谈。我就是这样的人，遗传、学识、教育、环境和生活经验把我变成了这样的人。66岁的人，改变不了自己啦。

东方有这样的说法：“统治者的处境犹如骑虎难下。”如果他没有抓住，摔下来了，老虎就会第一个把他咬死。总的说来，这当然是一条正确的谚语。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

权力帮助做事，能使人变得有名，提供实现自我价值的附加机会。权力越大，隐藏在它里面的机会就越多。当然权力也使人肩负着责任。但是，如果你善于而且能够做事，责任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反而会使你遵守纪律，帮助你动员起来。

权力——这就意味着你身处人流、物流和思想流之中，每时每刻都必须做出积极的决定。而正是在这些源源不断的流动中，能寻找到执行这些积极决定的资源。应该把这一切做好，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坦白地说，如果不使用一些技巧，人会疲于应付的。这些技巧非常简单。它们大概主要有两种，我把它们表述为“乐队指挥的艺术”和“抓住所有接触现实的机会”。

第一种最为重要。有人认为某位领导能够一个人解决自己的问题，像我们这样的谈话一文不值。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管理体系都必须以授权为前提，其他的方法人类暂时还没有想出来。团队是最重要的。对于我来

说，工作人员拥有高超的职业技能、诚实、关心城市利益、关心城市居民的利益——这一切是对团队成员绝对必需的要求。团队应该由这样一些被安排在各级职位上的人所组成，他们未必赞同我的观点，也并非我卢日科夫的裙带关系。我更倾向于把这点比作乐队、一个类似于交响乐队的大乐队，在那里每一个成员履行自己的角色并使用不同的乐器：从小提琴到架子鼓。同时大家都能彼此听得见，并看着指挥。指挥定出速度和节奏，设计出乐队的整体音响效果。在这个乐队里，乐器是不同的，但他们都是必需的并且按照规则发音，因此才奏出了交响乐。

第二种技巧就是与现实接触。一级一级授权的权力金字塔能够使被授以权力的人脱离民众生活。如果一个领导人只得到那些通过金字塔不同级别上的几个“过滤器”后才传来的脉冲，那他就会活在幻觉之中。这一幻觉是由某些支离破碎的信息编织而成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有人能够有意让他迷失方向，而且还因为在通过许多通讯渠道时，这些脉冲减弱了，被自然的噪音盖过。因此，尤其重要的是，不要丧失积极的联系，我不仅指与现实的联系，更是指与人的联系。定期巡视城市，与莫斯科市民会晤：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加强型”的（通过电台直播），没有这一点，我很难想象自己的工作。

人走向权力的目的决定了通往权力的道路，决定了在这条道路上手段的选择，决定了权力的内容和权力的使用（当你真正得到它时）。你如何使用你第一次得到的微小权力将教会你很多东西，增加或减少你下次晋升的机会。在

每一个级别上都是这样。市长和总统不是马上就能当成的。不要白白地浪费时间和精力，不要怕任何问题，要勤思考和拼命地干活；要不断地给自己提高目标要求。这不是从担任的职位的意义来说的，而是按你所投身的事业的复杂性和责任的大小来说的。

也许，这一公式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但对我很合适。如同足球运动一样：规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踢法。自己的球队也是由性格比较接近的人组成的。好的球员不是随便在什么队都能踢球。

问：普天之下的皇帝在即位时都给自己选择座右铭，其中有这样几条：“光明大道”、“发扬传统”、“天赐繁荣”。这个传统对俄罗斯来说也不陌生。每一位沙皇、每一位总书记和每一位总统在位的时候，在官方的说法中都有一些词语与口号，这些词语与口号以浓缩形式表达他们执掌政权的特点，表达他与前任的区别以及他的执政方针。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座右铭？您的动机是什么？

我不是皇帝，不是王位的拥有者。

莫斯科的遗产是巨大的，但也是复杂的，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很辉煌。上天不知为什么不急于“白白地”赐予城市和我任何东西。我也没有帝王的宝座，谢天谢地！我不执掌政权。我履行选举我的莫斯科市民委托给我的义务。我努力尽可能好地为城市服务，为人民服务。

请相信，对我来说，这不是多余的话，这是我在莫斯科市长这个职位，这个由人民托付的、经选举产生的、民主的职位上的管理哲学。再加上我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所说的，这种哲学就是我的动机。

座右铭应当表达行动的意义和方向。以便在这一职务的最后期限，我可以不昧良心地说：“理想没有达到。但我承诺的，我所追求的，我都努力地去做了。到今天为止，结果就是这些，你们判断吧，评价吧。”我有我这个职位上的座右铭：“为了莫斯科和俄罗斯的繁荣昌盛！”

你们知道吗，我自己也经常给自己提类似的问题。其中不仅是关于自己的，也是关于整个人类生活的一些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赐予极贵重的礼物——生命。生命就如同一次机会。这次机会在不同的人那里大小会有不同。但如果把生命与没有生命相比，那么这次机会几乎是无限大的。这一切过于自然，以至于人们没有发现，没有明白，他拥有这一礼物。这就好比空气，只有当人感觉到空气不够时，才会开始想到它。生命也是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越来越多地感觉到它的有限。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你就是这样支配自己生命的吗？你还有多少剩余的时间？是否还能来得及做点什么？如果做的话，又能做什么呢？

我开始注意自己的身后事，越来越多地思考在我身后会有什么能留下来。我是市长，城市的组织者，这就是我的生活。我当然可以幻想有人给我立碑，上面的署名是“感激尤里·卢日科夫的莫斯科人敬立”，那里还有我的青

铜像，而且一定要带鸭舌帽，还有，我用一只手指向远方。

但是，我在想着另外一件事情，要让莫斯科本身成为关于我的记忆，要让人们记得，这是在“卢日科夫在位时”做成的。正如现在莫斯科的公职人员，把工资的市政补贴部分叫做“卢日科夫补贴”，虽然很明显，这只是把莫斯科人自己挣的钱返还给他们。为了让将来的莫斯科人记得，甚至连卢日尼吉体育馆也是按照我的姓取名的。当然也会找到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说：“这个体育馆是在卢日科夫在位时‘堆砌’的。”

为此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让莫斯科不断地更新，让她总是那么年轻、充满活力。这也是我们的共同任务，因为没有俄罗斯，就不可能有充满活力的、年轻的和快乐的莫斯科，就如同没有躯体，心脏就不可能成活一样。

问：有一位著名人物曾经断言：“70岁是一个政治家的黄金时期。”看着66岁的莫斯科市长，很难不同意这样的断言。但是如果扫视一下俄罗斯的政治天空，就会发现，您这一辈的星宿已经为数不多。大部分人都可以做您的儿子，有些甚至可以做您的孙子。

您是怎样看待这一情况的？您与这些“政治青年”交往时感到舒服吗？在政治领域里两代人的差别重要吗？他们碍事吗？你们之间会互相帮助吗？

70岁对于任何身体健康的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年龄。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从事过什么工作。有经验，有见识，有多年来与人建立的工作关系，还有工作的愿望和工作的能力，有了解新事物和学习的能力。当然，这个年龄的人在体力上不像20-30岁之间的人那样结实和坚韧，虽然在这里要看具体的情况。但最主要的是，70岁的人具有十分珍贵的生活经验。

我这不是夸奖自己。我得讲讲我们多少年来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变得更加尖锐、更加棘手的一些问题。你们看看：成千上万的老人实际上被从生活中活活地“开除”出去，并且是在体力最旺盛的时候。问题甚至不在于退休金的多少，尽管对于一个把长辈们搜刮得一干二净的国家来说，退休金的额度很有些丢脸。莫斯科在这个问题上尽可能地帮助退休人员、老战士和其他一些老人。但是，我们先不谈莫斯科。

你们随便拿一份报纸，读一读上面的招聘广告，看需要什么人：需要20至35岁的人，少数情况需要40至55岁的人，再老一点的就是十分罕见的事啦，而且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机制正在生效：把到退休年龄的人从工作岗位上挤出去。在某些领域，针对一些职位都有成文的正式规定：“不能大于多少岁。”比如说，在部队、在科学领域、在国家管理机关就是这样。也有的地方只是有不成文的潜规则。

当然，雇主自己有权决定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年轻人对于某些事情和工作也许更合适，年龄的限制也有一定

根据，甚至是必需的。比如飞行员、芭蕾舞女演员、特工机构的工作人员，但除了这些特殊的工作，还会有什么工作（不适合老年人）呢？我说不出来。您说得对，我这一辈的人在政界屈指可数，而且不仅仅在政界。最近15-20年以来，50、60和70岁的几代人实际上是从积极的生活中被推出去了，被开除出去了。依我看，国家的改革也因此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改革不应当由红卫兵来进行，这不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

青年来到这个世界，他们不知道，也没见过从前发生过什么，更谈不上亲身体会过去。他们不管遇到什么，就把它作为某种自然而然的事物来接受，作为理所当然的秩序来接受。至于这一秩序可能在几十年前才产生，对他们并不重要。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他所遇到的事情，不管是好还是坏，还是“什么也不是”，都是起跑线。生活从这里开始，也从这里继续往前走，思想上、事业上、感情上、所有的方方面面。

老一辈知道以前是什么样子，知道生活中什么东西变好了，什么东西没有变好，甚至变坏了。老一辈是继承性的载体，是生活中保守因素和道德准则的载体。道德，是过去生活的总结，为此我们必须从源头体验它。我们把老一辈从我们的事业中，从社会生活中赶出去，就等于把传统从社会生活中清除出去，其中包括数世纪以来形成的道德传统。在许多领域，本来可以以已经得到的东西为基础继续前进时，我们却从零或几乎从零开始，而且要付出十分昂贵的代价。

这就是激进变化的惨剧，是对几代人的惩罚。也许，在中小学、在幼儿园、在院子里人们就发现过，小孩会有多残酷，这不是因为凶狠而残酷，而是年龄的缘故。怎么，难道我们年轻的改革者没有展示过恶劣的残酷性吗？而且是完全没必要的残酷，这无论如何也不是目的、条件和变化进程所要求的。类似的批评和对改革的不信任，都是由我们年轻的改革者引起的，难道不是吗？！是这些改革让社会产生了有意识不问政治的新浪潮。我们还要为此付出一切，付出漫长的几十年。

这也许需要几代人才能解决，虽然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国家都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但是，当政治局里只有唯一的一个“年轻”成员超过了50岁，这是不正常的。当只把年龄在51岁以下的人作为通讯院士选进科学院，这是不正常的。当政治领导和国家管理机关中，六十多岁的人屈指可数时，这也是不正常的。这也是社会的不健康倾向，只倾斜到了另一方。

这是全世界的问题，不只是俄罗斯的问题。在很多发达国家有这样一条规则：人一到退休年龄就必须退休，否则将终身失去享受国家养老金的权利。

类似的规则得以实行，我认为，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

其中一个原因是人道。当看到一个上年纪的人，在为一个力所不及的工作感到苦恼时，我们就感到很难受，我们给他退休金……但首先，他靠退休金生活应当活得像个人；其次是，如果他在工作上不感到苦恼呢？如果工作是

他力所能及的并且很高兴去做的呢？如果他正好是因为没有工作才感到苦恼呢？在我一生中，我看见过很多强壮的上了年纪的人（把他们叫做“老头”实在说不上出口）被强迫退了休，过一两年之后，偶尔也有不到半年时间的，一个在退休前健康的人就死了，因为无事可做，或因为意识到自己没有用了，没有人需要了。

另一个原因是劳动岗位缺乏。资本主义把生产效率，也就是利润摆在第一位。在这里，多余的雇佣工人是累赘。社会主义时期摆在第一位的是社会保障，但生产就遭殃了，整个经济遭殃。经济变得没有效率，它要养活很大数量的、实际上是没有工作的“工作人员”。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里都是这样的景象。如果仅仅是倾向于社会保障，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给经济刹车，丧失动力。或者倾向于自由主义，其缺点是，大规模地把老人挤到一边，挤出生活。

然而，还有第三个原因，依我看，在很大程度上是典型的俄罗斯的原因。谁造就了1917年的革命？是30-40岁的人，他们有足够的精力和攻击性，往后的生活前景很开阔，因此对他们来说就有冒险和努力的意义。谁最支持苏联的解体并伺机利用与之同时展现出来的个人才能？也是这个年龄段的人，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请问，如果一个人得到了一些东西，赢得了某种高度、位置，他们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自愿走到旁边，给新的一辈人腾出位子吗？未必会。于是我们就只能冒险再次实施在俄罗斯历史上已经有过不止一次的东西——革命。高

龄的和无活动能力的领导把国家引上绝路，其结果就是例行的激进变革。

下面是我对第二部分问题——与“政治青年”交往我是感到舒适还是不舒适——的回答。我感到舒适，不管是跟政治青年，还是跟任何其他青年交往都是这样。要知道，年轻，是一种心态。这就是当一个人知道他没有耗尽自己，一切还在前进，他什么都能做时的心态。他能够理解其他年轻人，能够与他们共事，察觉不到与他们的某些年龄差别，并且信任他们。

如果人忙于事业，年龄便退到次要位置。我不仅感到舒适，而且如果没有年轻人，我就感到寂寞。归根到底，我们大家工作不是为了孩子们，又是为了什么？为了谁呢？当孩子们成长时，这异常的有意思。无论两岁，或是12岁，无论22岁还是42岁，这都是在不断地增加力量、感情、生活的紧张度，补充着你想要的一切。

上述观点有一个条件：老一辈不觉得自己是不走运的人。但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人已经上了年纪，但在回答全部或大部分类似的问题时，不得不总是回答说：“不，我不同意”，那他与年轻人在一起就会感到不舒适。

两代人之间的差别是有的，这种差别在很多方面都能感觉到：知识方面、经验方面和处理事情的方法上。但这种差别是正常的，也是应该有的。假如孩子们与父亲和爷爷没有什么区别，那人类会至今还处在一种原始的状态。这种差别有时可能碍事，有时可能起到帮助的作用，一切都取决于人。

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在过去也常有。想想屠格涅夫笔下的巴扎罗夫，他不是被描写成被架空了吗？在文学作品中描写过许多的事例，如吝啬的商人直到最后也要把自己的事业牢牢地把住不放，不让儿子们接近它，可后来儿子们要么是没有能力管理事业，要么是对事业不感兴趣，要么只是简单地把全部家产挥霍掉。我有时想，类似的情景是不是会在社会任一个层次上重复呢……但也有另外一些事例，比如，父亲把孩子们带人到事业中，并且根据他们所取得的成绩的程度自己逐步地退到一边。

我没有处方，但我本人对最后一个事例感到更亲切一些。长辈应当尊重晚辈，可在我们这里通常强调晚辈尊重长辈。然而，如果你不尊重孩子们，比这更糟的是，如果他们不值得尊重，那这就是对长辈的惩罚。你把他们养育成这样，把他们培养成这样。如果长辈做了他应做的一切，那么两代人之间的尊重问题，相互关心的问题和冲突问题根本就不可能产生。

至于谈到团队，那您知道，在团队里，尤其是在顾问层面上，有很多年轻人。我老实承认，我还有一个“技巧”：首要考虑的是年轻人的建议，然后才考虑“有丰富阅历和经验的人”的建议。

问：看一看题有“卢日科夫”的图书馆的书架，我们在上面找不到回忆录。也许可以有些牵强地把很多年前出版的书——《莫斯科，我们是你的孩子！》归入这一体裁。但这本书更像是总结，而不是自传。实际上您所写的东西都

是一些观察和处方，对生活的观察和治疗各种社会混乱的处方。关于《通往有效国家的道路》这本书，有人这样写道：“这是卢日科夫博士的处方。”

从另一方面来讲，今天已经很明显，在莫斯科的历史中将有这样一章——“卢日科夫时代”。尤里·卢日科夫的回忆录什么时候问世呢？

我不打算写回忆录。甚至没有时间去想这个。我是这样的性格：当有能力、有机会工作的时候，就必须工作。如果我产生回忆的需求，用于回忆的时间会照常到来的。

回忆录必须写成大部头的科学著作，摆脱一切之后，埋头于过去，去寻找文件、回忆、感受并进行分析。与此同时任何别的事情就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了。不管怎样，我所读过的优秀回忆录都是这样产生的。

当然，我有值得回忆的东西，有值得说的东西。但我暂时还胜任并愿意工作，我认为做些实际工作比较好。回忆录……这个词源自法语单词 *memoire*，表示“记忆”的意思。我的回忆录，我的记忆，这是工作之后的事，是当我离开事业的时候的事。

○ 2 怎样和为什么要改革政权？

问：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您同时是改革者和改革的批评者。“改革”这个词本身在您正式场合的讲话中并不常见。如果心里想象自己在大约 12 年前重新开始，但已经具有今天的丰富知识，那您会试图在俄罗斯现代史上改变什么，预防什么？

这是个难回答的问题。12 年以前，1991 年，当时已经来不及预防，我们已经被从山上刮了下来，你只来得及转过身来，愤怒地挥动手中已经不起作用的权杖。如果要预防改革的发生，就必须在 1982 - 1983 年的时候着手。更严格一点要求的话，应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如果根据德国当时的情况，那就不能晚于 1905 年。

为了预防改革的发生，首先，必须最大限度地诚实和完整地讲清楚当时的情况。我们在 1985 - 1986 年，在开

始改革的时候是怎样提出任务的？当时，一方面非常明显，如果没有最快和最深刻的变革，国家就会陷入虚脱状态；而从另一方面看，实际的变革还没有开始，变革的战略目标、长期的战略和战术还可以选择，还可以利用充分的经验、智慧和科学来自发地做这件事。

您可以回忆一下，当时官方说了什么？“多一些社会主义。”即使百分之一千地同意这一口号，那么是什么东西应该变得多一些？拖拉机、火箭、红领巾，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要知道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发展的质量，而不是发展的数量。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应该变得“多一些”？是“列宁式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是“没有被歪曲的社会主义”——把我们吸引到那时候曾经去过的地方的那个社会主义？我明白，在这一妄谈中有不少不得已的政治阴谋。但光靠阴谋是建立不了战略目标的。

当时总书记的助手切尔尼亚霍夫似乎这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改革方法论仍然是彻头彻尾的布尔什维克的东西，就像在这之前的革命方法论、集体化方法论等等。这些是实话。只是以前‘上层’很清楚地知道，阿尔汉格尔斯克郊区的玉米应该什么时候播种，而现在也同样清楚地知道，应该怎样改变体制。结果，又是一场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这次是反共产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反苏维埃的革命。”

所有这些“反……”并不使我感到害怕，可怕的是“革命”，一个世纪里的第四次。革命是由革命者按照拿破仑式的方法来进行的：先进入战争状态，再看实际情

况……并且，这是在那一个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刻，顺便说一下，在那个世纪里，整个发达的世界都崇信进化的、改良主义的发展道路的巨大优势。

我们最终所得到的东西不能说是错误，也不是失误。这是我们所使用的那些方法的必然结果。使用那种方法不可能有其他的结果。我根本就不相信，在政治领域可以说“错误”。错误，这是当早就知道正确的答案，可以把实际的结果与之进行比较的时候才说的。在政治领域，甚至整个生活中，只有在十分特殊的情况下才会事先知道答案。多数都会有所创新，在创新中需要十分清楚，你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而做。

我们到底想预防什么？是今天我们无疑已经接受下来的某些“失误”？如今出现了新的条件，在新的条件里当时的决定已经不是最好的决定。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提前解决它，未雨绸缪地解决它。在事件开始向我们发出最后通牒前很多年，甚至几十年前就应该做这样的准备。预防1990年初的错误决定应该提早10年，决不能更晚进行。

我们到底想预防什么？最复杂、也是最难的，我们想预防任何类型的极端情况和局势的出现。极端情况，这不仅仅是紧急情况、灾难、社会动荡、革命。几十年来不断增强的黑色经济和贪污受贿，这不也是极端情况吗？！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的领导人陷入了越来越深的腐化中，不愿看到所发生的事情，成为了即使不为国家，哪怕为自己也不想去考虑后果的领导人——这难道不是极端情况吗？！

“改革”是个好词。原则上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但是，如果改革势在必行，也就意味着，做某事的时间被错过了。错过的机会应该加速弥补，尽快弥补。况且在任何情况下时间是一去不复返的。理想的情况是，不要搞定期的改革，而要赶在问题和不愉快事件出现之前就改革，以便长期稳定地发展。

可我们这里的情况怎样呢？人们开始谈论改革，仅仅是谈论，他们胆怯、模棱两可，准备马上“改革完”就返回去，这时大部分的改革时间已经极其残酷地失去了。空谈许多年，空讲了几十年。关于取消农奴制谈论了多少年？认真地算起来，是在叶卡捷琳娜时期起，直到1861年才做出决定，20世纪初才得以实施。在这之后怎么能不发生革命呢？不仅对于农奴和他们的拥有者来说，而且对于小市民，对于商人们，对于其他阶层，对于国家本身来说，这些问题都被积攒起来了。

那么对计划经济的改革呢？这种经济与其说是计划的，不如说是高度集中的，达到了埃及木乃伊状态的经济，是命令式的、无主的和不负责的经济。20世纪60年代初大家明白这一点吗？当然。任何厂长、任何农庄主席、任何供应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明白其中的弊端。有人说过，但很胆怯，声音也不大。当权者堵住了他们的嘴，拖延了时间。改革并非大公无私；改革不需要向任何人做任何汇报，就会夺去他们的资源、影响、管理的机会。有多少领导干部后来遭受迫害，住进了医院，变成残废，或者关进了监狱？1959-1961，1965，1979年所发生的想改变

一些现状的企图——这是不是改革？这是对改革思想本身权威的破坏和对更严重社会动荡的坐以待毙。最终，它们终于来了。

很多人把改革作为盼望很久的改革来迎接。起初对它寄予了不少的希望。但有谁准备过这一改革吗？事先对它做过什么科学研究和科学实验吗？有没有哪怕是最笼统的即使不是纲要，而只是改革的明确概念、目的、进行改革的阶段、逻辑？关于这一切我至今一无所知。

但还有另一件主要的事件。1991~1992年我们这儿发生了革命。这里我完全同意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的意见，他在最近的回忆录中，最终用了一个忠实的词来命名这次变革：革命。或者，如果把它与1917年十月革命相比，就是反革命。但尽管是“反革命”，可仍然是“革命”。那么必须始终如一，不去讨论改革，而讨论革命后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制度。政治制度似乎弄明白了：不是改革苏维埃，而是建立新的国家——俄罗斯联邦，总统制共和国。我们不是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宪法，用于发生了根本变化的环境，而是颁布了新宪法。有人开始谈论构建公民社会——这是根据以前的理论从没有听到过的现象。而眼下的经济“改革”也一直在持续。

您可以查一查任何一部详解词典：“改革”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改革——这就是对某种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在保留其基础的情况下进行修改。也就是说，第一，保全基础；第二，不是改变结构，而是进行完

善；第三，结构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具有理性的、秩序的和目的性很强的性质。

我们的“改革”符合其中的条件吗？我们其实是扔掉了基础，进行了例行的“革命”，而不是改革。这本身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对普通人的犯罪。如果说不是牺牲，那也会给他带来痛苦和损失。牺牲品也有好几十个，在前苏联的范围里有几十万个。

我们能说，这次革命的过程是理性的和有明确目的的吗？说什么都可以，但其中的目的性只有一个：抓住更多的东西，藏得更可靠一些。最好是把它运到国外去。这样的过程能够“完善”什么吗？有没有把“完善结构”作为自己的目标和任务？或者说白了，它完全是在为另一些利益服务。

为什么我们隐藏反苏维埃、反共产主义、反民主的“革命”这个事实呢？为什么关于这一点只有叶利钦说过一些话和写过一些东西呢？我认为，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非常爱好变革。我们多次被这事弄得焦头烂额。我们知道身后的这一错误并为此感到羞愧。但如果我们不承认发生过革命，那就意味着，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准备着下一次革命。

这里问题不仅在于承不承认事实，而更在于从中得出的结论。如果是革命，那么革命后的社会应当建立在与被推翻的、垮台的社会体系不同的一些原则上；应该按其他规则来生活。以18世纪的美国来说：他们完成自己的革命之后，就马上确切简练地说出，他们的新国家和新社会

将与欧洲的君主立宪国有什么区别，并开始行动。也就是说，在那里言语与行动之间协调一致。这种协调一致在1917年后的布尔什维克那里也具备。

可我们，在完成“革命”之后却说它是“改革”，实质上我们在愚弄自己。为什么？只是为了不辜负反国家的和反人民的、发放私股证券的私有化及其结果？我看不出有其他的理由。要知道，我们这里的资本主义暂时还不像西方一样是人民的，而是寡头政治的。怎么，现在还想搞另外一次革命吗？顺便说一下，不排除。因为最近15年来我们这里形成的社会关系最像欧洲的封建主义。而且暂时还是早期的、经验尚不丰富的封建主义。它会像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一样以流血事件结束。

我不怀念旧体制，不怀念苏联时期的经济模式。但愿命运不会让我们再处于类似的状态。在21世纪初被称为文明的社会也没有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律来建造——谁的胆子大，谁就能吃掉一切，其余的人就让他们尽可能地从废墟中爬出来。

我赞成变革，但是要为了人民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变革。要把我们这里曾经称作“改革”的最近10-12年继续称作“改革”的话，在现实中，我本人感到很为难。如果在一个国家有好几百个家庭从自然财富中得到地租，而其他所有的家庭无缘涉及，那么这就不是改革。或者说，不是俄罗斯人所需要的那种改革。在当今世界首先必须具有竞争能力。石油、天然气对于起点来说，对于“启动”市场经济是好的，也是重要的，但这替代不了全部的

经济。

最近 10 年主要的和无可置疑的“改革”是私有化。这是应该预防的，不是预防私有化本身，而是它的布尔什维克性质和实现私有化的方法。实际上目前已经进行的私有化有三个结果：

第一，削弱了国家，一个新的、刚刚得到发展的、刚刚进入残酷的全球竞争的国家；使国家失去了稳定的经济资源和自然资源，没有这些资源就不可能保证居民的权利，保证民主，甚至民族的安全。

第二，灾难性地使居民贫困化，这就导致了人们没有能力作为独立的经济活动主体进入市场。人们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忙碌。这不是那个能够导致经济快速向前发展的市场，过去的这些年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形成了十分狭窄的、不超过数十人的寡头层，他们成了绝大部分国家财产的支配者，而且不受任何人监督，不向任何人汇报工作情况。

您认为，这一切都强有力地推动俄罗斯前进了吗？有人认为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变革结果，事实上巩固了我们从伊万雷帝时期以来就存在的发展模式。这种看法对吗？革命的实质在于把思想的、经济的、政治的选择强加于社会。这永远是强暴，包括身体的或经济上的。

现在我们从道德方面来谈一谈问题。按最保守的计算，国家的四分之一人口扑通一声掉进了贫困之中，掉进了生存的边缘。1992 年盖达尔说过，只保证人的“生理需求”。生理需求，这不是饿死，不是集中营的标准。我

记得，我和列辛在1992年2月一起参加政府的会议。我们找到盖达尔，告诉他，莫斯科有26个退休老人因为吃不饱饿死了，有人说他们是死于营养不良。这些人事实上是死于饥饿啊！我说过，必须解决社会问题，不能让人们听其自然、丝毫不予帮助。而盖达尔反问道：那里发生了什么，退休人员死了？嗯，一部分人死去，那就让其余的人进入市场吧。我对他说，我们必须修建学校。可他回答说，我没有钱做这件事，让大家自己交学费学习吧。我说，怎么，难道我们要解散整个莫斯科的建筑工人队伍，停止建学校吗？盖达尔说，停止吧，有一部分还将需要学习，其余的让他们去找工作……这一切在速记记录里都有，这是为未来的历史学家准备的。

这是改革吗？难道这是不可避免的吗？如果居民失去所有的积蓄和所有对有可能补偿的希望，如果他被逐出参加私有化的资格，那么国家和社会之间不友好、不和谐的关系不知要持续多长时间？

以法律和资金所允许的程度，我们在莫斯科创办社会援助机构，这一机构减轻了几百万人的负担，使向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变得更加人道。我们支持和发展大批中小型企业：实际上全俄罗斯中小型企业的四分之一在莫斯科。我们力求把城市的所有资源和能力都用来服务于莫斯科人——雇佣劳动人员、企业家、联邦公务员和退休人员。在莫斯科创建经周密考虑过的管理系统和自我管理系统，努力为这种系统奠定可靠的、长期的财政和资源基础。今后还打算继续这样做。

这是一个对社会负责的国家的正常实践，而莫斯科就居民人数和经济潜能来说比许多欧洲国家都要大。当有人企图限制莫斯科，使她失去某些法定的资源时，这不是对市长的打击，而是对几百万俄罗斯公民的打击。不仅涉及莫斯科人，而且涉及所有那些依附于莫斯科以及莫斯科的顺利和稳定的人。这是对俄罗斯民主革命目标的打击——这次革命将来有一天会被称作“伟大的革命”，但只是当她导致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一个跃进，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有一个跃进的时候。

因此我赞成变革。我早就在做这件事情。莫斯科的长远改革规划已经有了。也许，不是最理想的，毋庸置疑，不是所有的地区都机械式地合适，但还是有一定效用的。只不过我们在莫斯科不是进行改革，我们是在根据我们的能力致力于保障所实施的革命的当之无愧的结果。顺便提一下，革命的中心也是在这里，在莫斯科。幸亏莫斯科人，由于他们的忍耐和生活智慧才没有发生大的流血，没有发生国内战争就解决了问题。

我们赢得了在苏联后的俄罗斯中自己进行革命/改革的权力，而且是以和平的方式赢得的这一权力。我们也不打算放弃它。相反，打算真正地 and 理智地来履行这一权力。要让哪怕是四次俄罗斯革命中的一次能真正给人民带来利益，给所有的人带来好处，不管他是什么社会属性、什么职业、什么年龄和什么职务。

不知道，我是否回答了你们提出的问题。依我看，已经回答了。

问：我们再回顾一下往事。过去人们常说：“最好不要知道香肠是由什么做的。”这一人民的智慧完全适用于政治，适用于国家管理。因为有时候你会感到惊奇，是谁，在什么情况下，基于什么样的想法做出决定。尤里·米哈伊洛维奇，为什么我们大家至今没有倒下？难道整个事态处在历史惯性中：很难使大船沉没，即使它的船队是由凶恶的、只得两分的差学生组成的？

什么叫“没有倒下”？对于俄罗斯，我不是很明白这一点。没有完全分裂成7个、15个、30个公国？如果说这是成绩，那么说，我们是按照最坏的，而非最好的标准评价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生活的。这样说来，我和您没有变成酒鬼，没有成为流浪汉也是成绩。虽然理论上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沿着斜坡往下滚，要比往上攀登轻松得多，简单得多。

在船员具备应有的“注意力”、“本领”和“努力”（所有这一切都放在引号内）的情况下，也可能在几分钟内就把大船弄沉没。我们回忆一下“泰坦尼克”号和“纳希莫夫将军”号。“俄罗斯”这条船也可以弄沉没，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必须清楚这一点。我们曾经唱过“牢不可破的苏联……”，而苏联在经济上和人口上比俄罗斯大一倍，在疆域方面也大许多。因此依赖我们的庞大就高枕无忧，这是无聊而又危险的事情。

其次，难道我们没有“倒下”吗？如果我们要到

2020年才能达到1990年的消费水平，那是进步吗？今天俄罗斯的民族安全靠什么支撑，靠我们的强大力量，还是靠没有严重的外部威胁？我们在所有的社会经济指标中，向坏的方向成倍地超过了1929-1932年世界经济危机时期的指标。如果明天在世界上发生新的危机，我们往下跌到何处去呢？回到自然经济吗？

因此，我们“倒下”了，彻底而长久地“倒下”了，从任何方面说都是如此。欺瞒自己是最坏的事情。让我们回忆一下，在苏联解体，甚至是改革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所有社会动力机制是怎样一个接着一个不起作用的。钞票停止了作用，用它越来越难买到什么东西。道德刺激也不好使了，生活损害了它的名誉。平均主义鼓励游手好闲的人和懒汉，损害了诚实和认真负责的人的利益。

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有点不习惯说起它，但必须说。民主在某些方面的特性与彩票相近。如果您买了一张彩票，就有可能走运，摘得头奖。可能性不大，但也有可能。要是您买了几千、几万张彩票，您就接近了彩票中所设置的中奖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平衡。买的彩票越多，就越接近和越有可能接近这一比例。如果这个比例是以买彩票者得奖为目的的，您就会赢。如果是彩票发行者得到利润为目的的，您就会输。

民主也是这样。如果只选举一个人（理论上可以找到一个寻求的方案）的话，那么就选举一个拥有智慧、为人正派、具备奉献精神和其他优秀品质的最佳人选。但是选到政权机关和自治机关的人越多，选举的结果就越接近现

实，就会在更大程度上成为社会的一面镜子。他们（被选举的人）也会具有所有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的平常弱点、不足，甚至恶习。也就是说，必须要有这样的思想：要让普通人，我和您的同行、邻居来做出各个层面上的决定。

出路很简单，而且它早就打通了：必须设计和调整好人们在其中行动和做出决定的体制，使它能弥补常见的人类恶习和不足。要使这个体制从一开始就受到保护，使它免受“傻瓜”的侵害，防止任何滥用的可能。要使这一体制激励，甚至迫使（如果需要的话）人们认真负责地工作，遵纪守法。要使它能够最快地按照它的原则，暴露那些不愿意工作的人，并且开除他们。

没有其他出路。我们要是能建立这样的体制，那我们就不会继续“倒下”。我们将继续指望创造奇迹的英雄们，到那时，那些相信可以把任何最糟糕的局势变得比它的本来面貌还要坏得多的乐观主义者也会是对的。

问：您提交给总统的关于优化联邦执政机关的建议已经家喻户晓，这些建议出了单行本。一些爱搬弄是非的人说，您提出的从总统的编制开始进行政权改革的建议白提了。因为，严格说来，没有对我们克里姆林宫中拜占庭式的立法形式感兴趣的力量。既然是这样，那么总统本人在这场改革中也没有人可以依靠。也许，真的可以像有些人建议的那样，必须从政府开始，准确些说，从政府和集中总统权力的行政机关开始？

必须从系统的角度开始。必须看到整个政权系统，而不是这个系统的个别成分。必须准确地确定，这个系统为什么目的和在什么条件下为谁服务。当时有一个情况使我感到很高兴，总统实际上在选举结束之后，马上就提出了分析执政机关状况的任务。他很快就意识到，正是在这里一切都建得歪歪斜斜。国家元首的委托，我们十分认真负责地完成了。工作组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内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对当代俄罗斯管理状况的分析表明，这一机制不是按照国家职能建成的，而是根据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建成的。这些利益在任意支配着整个机制。我们相信，系统没有以社会利益为目标。

我为什么建议从总统职位的设置开始进行政权改革？让我们回忆一下，这个设置是怎样产生的。起初，是在各地区局势恶化和中央越来越无能为力情况下才设置的。稍晚些时候，又受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个人竞争的影响。后来出现了最关键的因素：赞成保留社会主义和苏联体制的人与支持摆脱社会主义和苏联体制的人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差点以国内战争来结束。

难以置信，但苏联和俄罗斯的总统在1990~1993年间充当了西班牙在法兰西体制倾覆之后的国王政权的类似角色。我们国家的总统制是一项基本的原则。幸运的是，在前苏联和新俄罗斯担任总统职务的人能够最终控制住冲突，防止国内战争。要做到这一点，总统应当在某种程度上与所有的人——对手，甚至自己的追随者——对立；他应当成为最高的仲裁者，要超然于众。他履行帝王的职

能，为此，他本人也应当部分地成为帝王。我相信，这样做的实际并非是要不惜代价追求个人权力，而是按照当时的政治逻辑，将一场随时都有可能血流成河的革命，转化成没有流血的变革。

这一总统制在1993年的宪法中被固定下来。与其他任何制度一样，它既有自己强有力的一面，也有为此要付出的相应代价。

一个简单的问题：有些机构是在当时最尖锐的政治斗争环境下，在革命时期和摧毁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过渡时期的极端条件下建立的，那么在新世界中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公民社会和正常生活时，这些机构是否依然合适呢？它的创建是为了这些任务，还是为了其他一些任务？

对这些机构进行改革的时间是否已经到来？这个问题应谨慎考虑。我理解普京总统，他十分小心地对待修改现行宪法的问题。美国人在国家存在的230年间只对宪法做出了30处的修改，平均八年修改一处。不是因为宪法无须改动，而是由于修宪需要极其谨慎小心的思考，思考怎样从革命时期的、用来巩固革命成果的政权体系向建设性的政权体系过渡，向不断发展和正常生活的体系过渡。我们现在就必须思考这个问题，寻找并提出解决的办法。我在《通向有效国家的道路》中也讲了这个问题。

从根本上讲，培养自己不断思考的习惯是很有益的。当年IBM公司送给我一个纪念品——一个题有“思考吧！”的小牌子。我起初对它没有加以注意。摆在桌子上

就忘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注意到，这个精巧的工艺品有点影响我做出决定。它立在这里，好像不显眼，但不知为什么总在打搅你。你会把已经签署好的公文收回，开始继续思考，寻找更好的方案。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

至于谈到谁有可能感兴趣，这要看在哪方面。在“拜占庭式的形式化”方面，正如您所说的，这种拜占庭的参加者不可能感兴趣。法律上的认定就意味着任何拜占庭的结束。因为它是一套非正式的联系和关系，是被传统神圣化了的“充满概念”的生活。我没有写过，也没有说过关于“拜占庭式的形式化”的问题，俄罗斯不需要这样的形式化。

俄罗斯需要的是另外一种东西：能使俄罗斯进入经济发达和具有竞争能力的大国行列，并把这一地位巩固下来的国家制度和有效的管理体系。我想，不论是国家、地区政府、实业界，还是总统都会对此感兴趣。总统本人也已经十分清楚地认识到，现行的体系对实现上述任务，对保证有效的军事改革，对解决许多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其他问题而言都不合适。现行的体系虽然仍在运作，在努力前进，但任何结构都有自己的限度。

现在回到我们谈话的开始——为什么我建议进行国家政权的改革要从总统职位的设置开始？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现在如果发生了某件处于停滞状态的重要事情，那就只有利用权力和执行者的坚韧，甚至靠总统施压才能继续推进，这就是我们的国家政权的现状。目前政权机关的

改革就处于这样的状态。行政机关事实上是在空转。不管我们喜欢与否，但现状就是如此。当然我们也可以继续在这样的现状下行政，只不过我们不得不服从它的内部逻辑。但长期来看，在 21 世纪，这样的现状注定这个国家会失灵，会垮台，会失败。因此一定要改变它，我对此有着坚定的信念。但必须依靠政权本身来进行改变，没有其他路可走。

问：在政权机构的各个层次和各设制之间，连续分配权限和职能的论题是您向总统提出的报告的主要内容之一。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应当有明确规定的职责和权力范围。但是，在中央和联邦主体之间划分责任的尝试表明，想完成这一任务不是没有成本的。有没有可能，对这一任务的表述根本就不太正确？一般说来，如果政权机构在原地停滞不前，还有没有必要拘泥细节地要求政权机构的连续性、协调性和透明性？如果我的大半生是在软沙发椅里度过，我鞋子上有怎样的鞋楦又有什么差别？也许，提出有关国家方针的内容比国家建立得好不好的问题更迫切？什么是第一位的：政权机构还是政权机构的内容？

这是机械的方法，对不起，也是庸俗历史唯物主义的作风：什么是第一性的，什么是第二性的。没有什么绝对第一性和绝对第二性的东西，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早就写过。一切事物都是由不同方面所组成的整体。因此，政权

机构和它的内容不能分开来看，而必须看做一个整体。

也许，很多人认为，国家的职能就像一只带葡萄干的白面包，我们把葡萄干从面包里剔出来吃掉后，其余的就不吃了。在我们这里像这样剔东西的人不少：财政部、文化部、国家建设与建筑委员会，还有其他一些部门里都有。有人这样对待文物，他们说，把这个给出去吧，把那个独立住宅租出去，从租金的意义上来讲它们具有很高的价值……

如是说，机构不是目的本身，它是在有一定内容的情况下建立的。没有内容的机构，是被一些团体利益所侵占、霸占和私有化的国家；没有机构的内容，是马尼洛夫习气、幻想或理想，这些幻想或理想没有资金和实现它们的机制做保证。

我们很难从一个机构不完善的政权那里期待和要求明确的战略方针。而如果没有这样的战略方针，政权本身就不会按照更合理、更透明和更有效的形式进行机构完善。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窘境，怎样才能摆脱这一窘境呢？

我的回答是：通过在政权的不同层次和不同设制之间进行只能和与之等同的权力的连续再分配。不仅是在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而且要在行政权的内部——在总统办公厅、安全委员会和政府之间，在各区的内部。而且要依靠莫斯科政府，因为这里面有莫斯科领导人的许多建议。也要依靠联邦区，它们的法律地位需要宪法来增强——关于联邦区，我认为，过两三年后仍然应该回到建立联邦区的问题上来，这在原则上很重要。比如

说，今天情况十分清楚，联邦区的划分是不合理的。“7”当然是个幸运数，但必须划分得更多一些。我在2000年5月提交给总统的“建设联邦区”的方案中建议组建12-15个区。后来，我在给政府的报告中（该报告现在已经出版了单行本）这个数目又被增加到19个。我认为，这样能保证各级政府的管理达到最佳的管理标准。

联邦区的历史最能说明问题。历史向我们证明，职能的再分配不应当脱离实际，不应当是机械的。首先要提出明确的任务：改革机构，然后，依靠改革后的机构提出更加复杂的任务。就这样长期地（渐进地），而不是搞运动式地做这件事情。我们还不会马上坐上软沙发椅。

我认为改革的主要标准就是，建立新的政权体系并保证它在俄罗斯国内外的生活和活动环境中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仍具有较高的效率。效率的标准是：国家及其设制和政权的分支机构能够真正履行宪法赋予给它们的职能和义务，保证国家不断向前发展，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并且在实现这些目的的同时能够使俄罗斯参与全球化的进程。

显而易见，如果我们不研究制定国家的发展战略，所有这些任务不仅不可能有效地完成，而且实际上连任务也不可能提出来。

在国家的发展战略里应确定远景目标、发展方针和道路。确定之后，国家不仅应当把这一战略付诸实现，而且，还要长期地依靠独立的研究机构，跟踪战略实现的社会贡献和各地区生活质量的变化。其目的是，最终走向政

权体系的优化，尤其是要建立一个长期支持这种优化的系统，走向那种“完美的和谐”。

换句话说，政权的优化应当成为长期的和不间断的过程。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实现国家及其机构的稳定高效。

问：当您在批评联邦政权和鼓吹“莫斯科经验”的时候，您当然比其他人更了解“莫斯科经验”在全俄罗斯范围里有多大的适应性。那么，在这里，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是什么？哪些经验具有全俄罗斯的意义？如果有什么经验适用于俄罗斯的话，那这些经验适用于伦敦或上海吗？

一个有数百万人口的城市在三方面是独一无二的。第一，它们是一种与它们周围不够都市化的环境有着明显差别的现象；第二，它们中的每一个又有自己的独特性；关于第三点我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后时刻再讲。

任何一个百万人的城市都有值得其他城市学习的东西。上海向莫斯科学习，莫斯科向上海学习或向伦敦学习。但不能机械地移植经验，把一个城市的决策移植到另一个城市。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气候、自己的人口状况和人口政策、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土地价格、自己的经济、自己的基础设施，等等。当然也有一些共同的问题，但差异是主要的，因此，甚至同样的问题解决起来仍然会有所不同。

把莫斯科市的决策照搬到莫斯科州的其他城市也并非总是适合。以莫斯科为范例来建设全俄罗斯的模式毫无意义。可以应用的不是具体决策本身，而是寻找这些决策和组织它们实施的方法。

例如，莫斯科鼓励和支持中小型企业，并通过提供其他服务从这些中小型企业那里，从租金那里提取税收，得到的收益金额相当于整个城市收入的一半。

其他地方可以这样做吗？可以，只要当地政权不追求凌驾于公民之上，不把当地政权变成新农奴制的政权，只要能有效防范由于利益或由于习惯不知不觉做类似事情的官僚们，就可以这样做。

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此。各级政权机构是服务于自己，服务于狭窄的地方寡头或联邦寡头圈，还是服务于整个社会？整个社会是指一个包含所有层次的实业世界，这里有全部的居民层，有政权本身（政权也是社会的一部分）。

现在我来讲留在最后的第三点，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世界性大都市，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世界性大都市通常最容易被全球化波及。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在这里高度集中了金融、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科学和文化、信息资源和行政管理资源。

由此就产生了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世界性大都市的新功能。它们充当了连接全球化进程和国内进程中心的角色。不管莫斯科是否愿意，它都客观地充当了俄罗斯参与全球化和全球化影响俄罗斯国内生活的渠道。莫斯科本身应当

考虑到这一特点，这一新的性质。莫斯科会努力这样做，联邦政权也应该这样做。

与今日莫斯科的关系就是俄罗斯与全球化和全球化与俄罗斯的关系。不管谁坐到莫斯科市长的位子上，这种关系都会如此，只有关系的内容和性质可能发生变化。

○ 3 国家在何处结束？

问：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您在自己的出版物中和在自己的口头讲话中，都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了“国家”这个术语。当您在描述莫斯科与联邦中央的关系时，“国家”通常所指的就是联邦政权。而在谈到地方自治问题时，您抱怨宪法的第12条，从这一条得出的结论是，比如说，区的行政机关是国家管理机关，而本质上与它相似的地区行政机关却不是国家管理机关。这种矛盾很奇怪。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卢日科夫在讲到“国家”时，在有些场合不是用“我们”，而是用“他们”。这样一来，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按照您的说法，什么是国家？它在何处结束？

国家根本就不应当“结束”，至少是在它的疆域范围内不会结束。如果真的有国家的话，如果它不仅仅是地图

上的名称和官僚机构的总称，而是指为人民和各地区的利益工作的有作为的机制，那么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它都应当出现。

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不同的层次上。在联邦政府这个层次，它是直接地、通过立法权的决策来体现，通过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签订条约和开展合作来体现。在区政府这个层次，它是通过对全国性的纲领和地方的一些创举的贯彻，通过联邦政府对地方的支持来体现的，通过监督来体现。这种监督当然不是吹毛求疵的、官僚主义的监督，而是那种能够真正帮助人们在法律范围内有效地生活和工作的监督。

在地方政府这一层次上，国家应当特别有效并永久地出现。这首先要通过法律来体现。地方这一层次是直接与人打交道的层次，如果没有法律，也就意味着没有国家，也就是说国家的存在是有名无实的，即使上层和国际事务中“国家”仍然存在，可对于普通人来说，它实际上不存在。这种状况会产生出各种不同的后果。

人只生活在地方这一级别上。比如说，某人需要技术情报局给他开证明，需要开介绍信，对他来说，这就是国家机关；他需要保障自己的权利、安全、荣誉和人格尊严，因此警察局、法院、检察院也就成为了国家的机关；征召子弟参军入伍，这也是“国家”；给予延期应征入伍，这也是“国家”。当法律不起作用，或者对所有人不一致的时候，当向“所需要的人”行贿后就可以绕过法律或者打电话走后门的时候，“国家”事实上就快结束了。人开

始寻找他需要的或有用的关系，这说明他不仅仅是对“国家”失去了兴趣，而且是有意识地计划怎么样才能绕过法律。这种关系从一件个人的事（可能是很小的事）以后迁移到其余所有方面，从而成为人的生活规则。

有人给我讲过一件发生在苏联早期的故事，当时还是20世纪60年代末，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讲述人的身上。他说，一个外国演员来到莫斯科，是谁来了，这并不重要，但对我的交谈者来说却很有意思，他很想去看这次音乐会。有多少人被这事弄得紧张不安，关于这一点可以写一本书。但是，我的交谈者找关系后，被许诺给一张免费进入柴可夫斯基音乐厅的入场券，而且他真的拿到了。可当他来到音乐会时，售票处居然还有票。当时一张票的价格还没有贵到1000美元，买张票对这个人来说不成问题，他只是没有想到先去售票处打听打听。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真是“没有想到”。此事很有典型意义。

如果人与国家的关系开始和结束都体现在支付税收上，那么，要么是这样的人在生活方面一切都很正常，要么这样的人不能从国家和它的代表者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他也认为去找他们的本身就是白白地浪费时间。而这对国家，对这个人本身来说，迟早都会为出现这样的情况付出代价。

俄罗斯的问题历来就在于，我们总是把“国家”与中央等同起来，与克里姆林宫、冬宫和老广场等同起来，而在“下面”，“国家”也总是被官吏、警察和检查员们私有化了。过去是这样，现在很多地方仍然还是这样。我们

在“国家”里首先看到的是它的垂直系统。“国家”是必需的，这无可争议，但它不只是应当存在，还要工作。“国家”应当学会在自己垂直系统的最底层按照自己的法律工作。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不尊重国家的法律，就会很难要求公民尊重法律。

国家管理上的多层次让问题变得很复杂。在地方和联邦管理层之间有一个区域性管理层——“区”。它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做什么？干吗需要这一管理层？

它源于新奇古怪的结构、错综复杂的历史和官僚制度。莫斯科建立的时间比罗斯稍微晚一些。如果谈到俄罗斯国家的话，那它是从莫斯科开始的。在我们土地上还有其他的历史区域。某些疆域被按照“分而治之”的原则切割开来，有的地方是按照根本就不知道的和不可理解的想法划分的。就人口而言，莫斯科有一千多万，而其他地区（我不想触及任何人，更不想得罪任何人，只是想举例说明一下问题）的面积有几个欧洲大，可人口只相当于莫斯科两个辖区的人口。

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不断地寻找那种既能考虑到疆域的大小，又能考虑到人口数量、基础设施的饱和度和和其他一些因素的“区”这一建制的合理公式。下面是关于“区”的一些问题：区和它的首脑为谁服务？为国家？为区本身？我们暂且这样认为，我们这里没有“国家”，或者说，它很弱，没有效率。

国家（我们的国家非常庞大）和生活在具体地方的人之间的联系环节，就是“区”。因此，这种相互作用是一

个统一的整体。

从另一方面讲，国家的利益、法律和行政法规，都应当转换成被管理层和自我管理层的语言。通俗地讲，它们应当被理解与接受，并以适当的方式执行。这是最复杂的相互关系啊！必须有长期的相互监督机制：什么事政府已经做了，什么事还没有做，为什么……应当设计好国家和每一个人之间不断进行交流的体制，该体制应该保障这种交流能顺利通过“政权垂直系统”的所有层次。

在某些国内和国际问题上，国家和每一个人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可能会更多地倾向于国家，在其他问题上则更倾向于居民和区。但是，相互作用总是应当调整到理想的效果。想要各地区绝对服从不是问题，但必须保障选民的利益。在这些区的领导人中，有良心和尊严的人，具有责任感的人不会站在选民对立面，站到对立面的只是一些暂时得势的人。

在区领导的位置上有一个无法排除的矛盾。选民选出的这个人将对谁负责，他以什么为工作目标？理想情况是，以区为工作目标。那么他就要为区的利益而斗争，有时真的要用牙齿去咬破规定好的东西，这很可能导致与联邦中央的关系恶化，该州长将来也很难指望得到更高的职务。虽然在与联邦的博弈中，区暂时赢了，但以后它本身会经常开始抱怨：比如会说“头”破坏了与莫斯科的关系，而区跟着吃苦受累。然而，如果从理论上进行探讨的话，还可能有另外一种方式。如果对个人来说最主要的是不惜任何代价追求个人功名的话，那么对他来说，摆在

第一位的正是他在中央的个人关系，而区里的利益将靠边站，甚至可以牺牲区里的利益。

这当然是两个极端，在生活中很少见。必须善于平衡各方利益。正因为如此，人们认为政治是艺术。

这个问题也有很实际的一面。什么叫做“区”，我们怎样给它下定义？众所周知，俄罗斯的联邦主体有89个，实在太多了，中央根本不能定期地管理它们，不能够给每个区以长期的和必要的关注。我们知道，许多国家的军队是按照十大军区的原则进行建设的，这并非偶然。10个可指挥的单元是最适宜的，12、15，甚至20就很难管理了，但即使效率不怎么高，还是有可能的。89，实际上是已经不可能指挥了。中央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今天对它来说最重要的几个上面，其余的就无暇顾及了。

然而，在俄罗斯，经济区只有11个，再加上加里宁格勒州。它们的界限比较明确地由经济因素决定。这就是我总是坚持必须建立主要任务为管理地区发展和管理经济发展的联邦区的原因。我们建议成立12~15个联邦区，最后划分了7个，这当然比89个要好。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因此，在我们这里“国家”才真正地刚刚开始。这也就是“卢日科夫所说的国家”。

问：现在让我们再往下一层来谈谈地方自治的问题。您在《通向有效政府的道路》一书中确认，由于1993年宪法作者的理论偏好，地方政权机关被认为与地区性社会自治相

等。宪法把实际上只能发生在街道、居民楼和居民小区层面上的自治原则绝对化了，把这些原则推广到地方自治上了。如果不启动对宪法进行修改的复杂机制，您认为有可能克服上述问题吗？

也许必须进行修改，但首先必须清楚地知道，我们修改什么，为了什么而修改。我把这一任务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昨天”就应当解决的最刻不容缓和最直接的任务，就是保留、更新和发展所有的公共基础设施。为此，政权机关应当对人民负责，应当有行为能力，应当有自己的资金。当紧急情况部长飞抵每一个严重事故的现场时，很多（但不是所有的）有权人和权力机构就认为，由中央去消灭严重事故比他们自己去预防重大事故的发生更重要、更有力。

第二部分是更加长久的任务，但不是可以永远放到一边不管的任务。那就是使人们成为自己房子、院子和他们居住的街道的真正主人。我们常常发现，有很多地方把居民公用事业的费用摊派到本来就不富裕的居民身上。这样做是不应该的。在莫斯科，我们反对这种做法。目前联邦政权不断施压，缩减城市的能力。但莫斯科拥有很好的积极性、与政府对话和准备合作的能力、认真负责的警察、廉洁的政府官员和许多其他东西。虽然很艰难，但我们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

第三部分，是远期任务，但早就应该开始了。当人们认为不必与地方政权机构进行接触，对地方政权的机制不

了解时，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将仍然是有名无实的。如果我们不启动相互承担义务和责任的机制，那么贪污受贿的现象就会增加，很可能导致人们普遍失去对国家的信心，这是最严重的社会后果。

于是，政治社会就会介入到事件中去。是谁，又是怎样任命或选举出各个层次的领导人？如果是选举的，那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应对选民负责。尽管在我们这里这种选举实践才刚刚开始，尽管在这里很多东西与理想、与规范还相距甚远，但民主监督的前提已经有了。而且这不仅仅是监督官员本人，而且也为他们以适当方式捍卫自己管辖区的利益提供一定的民意支持。当选人等于有了依靠的基础，他在必要时可以说：“我表达的不是自己的利益，而是我身后的选民的。”这不是空话，这是现实，必须巩固和发展这一现实，因为莫斯科不是一天建成的。

与“选举”领导人相比，“任命”领导人的方式也有自己的优点，但这种做法不总是为了居民的利益。你们看一看，我们这里有多少人是拥护“任命”州长。为什么？因为任命有可能是暗地里进行的。找到一个与更高一级的首长相互理解的人，比找到与成千上万的选民之间相互理解的人要容易得多。

首先，自治是必要的，这毋庸置疑。但是，只有当它拥有必要的物质资源并关注公民的利益时，才是真正的“自治”。今天人们的真正利益在哪里呢？就在居民小区里，像住房问题、物业管理问题。要知道，这可是自己每天都要出进的房子啊！

资源，在每个人那里都不一样。也就是说，难免会有这样的情况：一些房子、城镇、居民小区有自己进行管理的愿望和能力，而且实际已经实现了自己管理；另一些则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去接受别人的管理。这里就产生了这两种情况的协调问题。这些问题在自治层面上解决不了或很难解决。

第二，不管我们选择什么体系，如果存在自治的话，那么在某个层面上它会与国家管理发生相互关系（接受国家管理）。在哪个层面上呢？在联邦层面上不行，事实上也不可能，人手和电脑都不够。在区的层面上也很复杂。也就是说，应该在地方层面上。在地方层面上“国家”应当获得和长期表现出我上面说到的那些品质，否则就会在自治和地方官吏之间出现拔河。拔河是怎样进行的，我们是知道的：如果自治苍白无力，官吏就会肆意妄为；自治繁荣兴盛，贪污受贿就会盛行。

第三，当起草 1993 年宪法时，我们还没有新环境下的生活经验和工作经验。我们遵循了一般的思想和某些国外实践，同时把有些东西理想化了，绝对化了。这点必须得承认。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经验。我们必须利用这些经验作为起点，作为出发点。如果需要的话，原则上可以通过一些修正案。但是，在没有弄明白我们想要什么，在没有计算好成功的机会时，不要启动修宪的程序。

虽然名义上我们是联邦，但实际上我们无法选择在什么样的国家里生活：是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每一种类型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但我们必须决定，而且

要下定决心。如果在联邦制的国家里，那么自治与国家管理的“衔接”也许应当在后者的所有层面（从地方层面到联邦层面）上实现。怎样实现，这是单独的问题，但应当有体制，而且是灵活的、机动的和发展的体制。当我们想出这种机制并进行试验之后，应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将它固定下来。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往上”发展有可能要花费5~7年，不会更少。理想的情况是，应当让这一过程成为永久性的过程，因为社会不是停滞不前的。

必须保护社会被一些冒险主义者、犯罪分子、病态和喜怒无常的人篡夺自治权。这样的危险是客观存在的。在莫斯科的普列斯纳区就有过一名这样的冒险分子，他企图利用地方自治的制度来确立自己地区性“土皇帝”的角色。他向自己“世袭领土”上的“农奴”宣布，他是这个区完全的主人。无须多说，城市和区的居民都因此受尽了磨难！

我们也可以回想一下苏维埃政权头几年十分重要的经验。当时出于美好的动机，所有层次的苏维埃不仅被宣布为自治机关，而且被宣布为自己管辖地域内的最高权力机关。既然它们都是最高的和独立的政权，没有哪一个机关去服从任何另外一个机关，因此俄罗斯就像用碎布头拼成的被子一样开始解体。为了遏制这一势头，保全国家，恢复可控制性，就需要采取一些残暴手段和方法。

首都，这是一个与其他地区相比面积相对较小的地区，在这里集中了许多潜在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地方

自治和国家管理之间没有很好衔接。必须尽快结束关于发展地方自治的空谈。如果居民在经济上不独立，那么谈自治就毫无意义。如果城市和村镇几乎普遍地拿国家补贴，而领导们都是经选举产生的，他们不明白要对什么负责，那么除了一团糟之外，不会有什么好的局面出现。到头来的结果是，俄罗斯“国家”在区和州的层面结束，而往下就会开始出现某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在持续的财政贫困环境下宣布自治，在居民眼里只会破坏地方自治思想的权威性。我们应当去除法律中各种善意的幻想，它们对于我们来说实在太昂贵了。要么国家应当给自治市政府留下一些经费，要么它应当把这些自治市政府变成国家的，并对它们进行财政拨款。所有国家的经验都说明，在政权垂直系统的所有层面上，应当有一种统一的政权模式，有一种基本的政权类型。

俄罗斯的面积广阔，我们必须重视这一点。在自治能够解决人们日常生活问题的地方，自治是有可能的，而且也是必需的。但是，从上到下应当贯穿一条国家存在的主线，以保持作为统一整体的国家。也许，目前这种体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还将继续有效。俄罗斯不是瑞士，甚至也不是德国，虽然它们都是联邦国家。

自治和国家，国家的管理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无论它们在哪里，在哪个层次上相遇，这个过程都是持续不断的、“永恒的”。必须把它们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生活在继续向前发展，我们还得经常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问：在持续的财政贫困环境中，市政机关的自治在居民眼里只会被认为是在破坏地方自治的思想。地方政权辜负了公民的期望，这不仅导致地方和区政权的威信下跌，而且还导致联邦政权的威信下跌。为什么县级市，比如说滨海边疆区赫赫有名的阿尔乔姆市的市民不就消灭自治和把国家机构设到“最底层”的问题举行全市的全民公决呢？您认为自治市政府的预算前景如何？从什么地方拿钱？

苏联曾经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当时，如同您所说的，国家政权到达了“最底层”。可是结果又怎样呢？滨海边疆区阿尔乔姆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吗？几十万个村、镇，甚至很多莫斯科的居民小区和城区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了吗？没有，这种体系是不合适的，是幻想，是可怕的乌托邦。自治是必需的，而且也是有可能的，但只有在人们想自治，有能力和有实际条件自己管理解决他们日常生活问题的地方才有可能。

归根结底，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自治的基础组织。他自己决定，他将做什么，怎样开始劳动，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可以暂缓一下。这种“个人主义”向怎样的广度扩展呢？只延伸到家庭，还是延伸到自己的房子、院子、街道？是延伸到农村、城镇去，还是延伸至全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管理大的地域单位比管理一个家庭或多套住宅的楼房更容易。先召开立法会议，表决之后就把手续“下发给”各执行人员，说，你们去办吧。而在自己家里，院

子里一切（决定和执行）都得自己亲自去做。

我们现在的财政经费不足和贫困虽然很重要，但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还有其他一些方面。首先，我们没有克服（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加强了）那种在苏联后期使我们感到十分气愤的坐享其成的作风。这种作风发生在谁身上（克里姆林宫、莫斯科、地方首脑）并不重要。他们都具有一个特点：希望，甚至是要求某人来为民众做原则上他们自己能够做而且应该做的事情。而这位“某人”往往正好是不应该做，事实上是不能够做这件事的，但常常被迫去做，而且这样做往往没有什么好结果。

我不是讲那些没有旁人的帮助就实在办不成事的情况（比如发生紧急事件、自然灾害时），我讲的是墨守成规，讲的是日常事务。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应时刻准备在法律的框架内自觉行动。在心理上必须摒弃坐享其成的思想。但要想让一个人成为地方自治的积极参与者，光有这一点还是不够的。为了积极参与地方自治，必须有自己的动机。当有了动机，就必须学会有效地、依法地，在不破坏其他人的权力和利益的前提下捍卫自己的利益。这一切都需要时间。

财政经费，其来源是众所周知的：地方税收、自愿交纳、捐款和合作社，把人们自己的资金联合起来。您会说，人民今天还不富裕，一半的国民还很贫穷。我同意您的看法。出路就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经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刺激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建立和发展市场（不仅仅是独立于国家计划和国家行政管理之外的

自由市场，而且是综合需求的市场)。这一点我们政府不知是真不明白，还是不想明白。只要我们暂时还没有市场，居民没有支付能力，无论是想发展经济，还是自治在我们这里都不可能。

这个过程需要几年或者几十年。必须现在就开始。自治，这就是公民的社会，但它才刚刚“开始”。在管理实践中不能完全脱离现实，想入非非。

问：这是典型的莫斯科问题。2001年初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看样子，还处在不久前结束的发生在联邦中央和首都之间的冲突的影响之下），通过了一项对宪法做出解释的决定。最高法院宣布，从现在起莫斯科无权在全市范围层次上进行地方自治，只允许区一级自治。尤里·米哈伊洛维奇，为什么您至今还没有向宪法法院提起上诉？如果您在当时使用向宪法法院上诉的权利，就不需要把参议院分成两半，多此一举，自找麻烦。

也许，当时应该去法院。但如果与法院“搞过分”了，那么市里面的事情就没有时间去办了。而且我不想去挑拨最高法院与宪法法院之间就它们的权力问题发生冲突，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和任务。让它们自己去确定和保卫自己的权力。其实，现在宪法法院做出了决定，禁止普通管辖范围的法院评价地区章程和宪法的问题。我们还将仔细地分析研究，看我们到底要不要对上次最高法院的决定

提出异议。

自治不是绝对独立存在的东西；在村、居民小区的层次上有，再往上走半步，它就没有了，消失了，被禁止了。自治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在部队，从将军到士兵所有的人都必须执行命令。国家管理必须以法律为前提，它也要考虑被管理者的利益平衡。如果由中央发布命令，而地方只是执行命令的话，那结果将是苏联时期那种最无生气的指挥系统，而这种系统是我们正在努力摆脱掉的。

可以形式主义地对待这个问题。实行某些准则，在这些准则的基础上确定和遵守某一层次的“自治”。也可以寻找另外一些方法，实行与地方的经济规模和地域大小相适应的，与它的内部特征、人口数量和其他标准相适应的某种特别的“自治”。

莫斯科的一个区有10万以上的人口。莫斯科州这一联邦主体有自己的州中心、有区和区中心、有单独的居民点。但莫斯科州的人口可能要比莫斯科市的人口少4-5倍。

我相信，像莫斯科、圣彼得堡这样的城市应当有权独立解决建立地方自治机构体系的问题。我本人现在在工作中就是以此为出发点的。我们的城市，作为同时是联邦主体和联邦意义上的城市，应当拥有自己的市政管理机制。而且很多的市政功能只有在全市范围的层面上才能得到实现。正因为如此，联邦意义上的城市机关，虽然是国家政权的机关，但也不可避免地履行某些地方自治的职能。

对于那些坚决不想理解显而易见的东西的人，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同时是自治市政府和国家政权机关。前者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后者是宪法赋予我们的。

问：看来，所有超大型城市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地区性管理组织的问题在其他特大城市是怎样解决的？

您说得对。这的确是所有国家的所有超大型城市的问题。任何人也没有理想的解决办法。

我甚至想说，这是 21 世纪的问题，也是全球性的问题。也许在理想中，“自治—管理”这一综合体应当在街道、村庄、居民小区的层面上开始，在全球的层面上结束，中间经历区（县、郡）、州（邦、省）、国家和一体化联盟等层次。

在我们俄罗斯流行这样的做法：用来自“文明国家”实践中的例子去论证一些完美合理的原则。比如说，在对地方自治机制进行改革时，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发生一些地区行政单位的合并扩大。因为一些不大的地方性集团往往最缺乏用于维持现代化公共服务和其他服务的足够基础。

关于在发达民主国家的一个机关里并存着国家和市政权力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一些来。如，维也纳同时是奥地利联邦的首都、联邦的土地和城市。谁也不会质疑，这会不会破坏地方自治的“主权”。在德国，联邦主体和地方自治的权力是通过诸如柏林、汉堡、布莱梅这样一些特

大城市的全市机关来实现的。

与此同时，在大城市里通常有两个层次的自治。市政管理的中心位于全市的层面上。区机关解决区一级的的问题，管理幼儿园、托儿所和位于它们管辖地的文化休闲设施，在市政府面前表达和捍卫本区居民的利益。

我不止一次去过伦敦，非常熟悉那里的行政管理改革的现代史。比如说，伦敦是唯一一座具有在区一级实行城市自治的长久经验的世界级城市。从1986年到2000年伦敦被分成32个区，其中每一个区都由区理事会管理。而大伦敦理事会被保守党政府根据自己的政治动机废除，而在那里传统上是工党党员占主要地位。这一步骤导致了城市管理效率的急剧下降。大伦敦理事会的部分权力被转给了区理事会，而对警察局的管理、消防安全的管理、公共交通的管理转给了各种专门的机构。这样一来，在这一时期伦敦有70~80个不同的（事实上没有向居民汇报工作情况的）管理组织在办公。谁也不能协调一致他们的活动。最后根据工党政府的倡议，于1999年通过了关于管理大伦敦的法律，该法律规定不仅直接选举全市理事会，而且还直接选举市长。我举这些例子，还是想再次预先声明，世界级城市的问题是相似的，但不完全相同。莫斯科有自己的特点，这一特点是任何一个可比的其它城市所没有的。

首先是莫斯科在俄罗斯的作用，在经济、文化和科学生活中的作用，在国家历史中的作用。俄罗斯是从莫斯科开始的，并是在莫斯科周围建立起来的。这样好，还是不

好，今天我们喜不喜欢这样——这都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做任何改变了。这并非给予莫斯科某些特权的理由。但是我们必须小心地对待莫斯科，否则就有可能无意中给俄罗斯以打击。莫斯科在俄罗斯的作用完全不取决于由谁来当莫斯科的市长，是卢日科夫，还是别的什么人。而且这种作用只有几十年，几个世纪才有可能发生改变，但绝不是明天。

莫斯科的另一个特点是，最近 15 年来莫斯科市的地区组织的问题不是独立解决的，而是在过渡时期的环境下解决的。我们在某些方面已经过渡了，在某些方面还在继续从苏联向俄罗斯联邦过渡，从单一制国家向联邦制国家过渡，从“全民所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等等。在所有的这些变化和改革中，莫斯科（不是因为她想这样，而是因为她在俄罗斯的地位和作用是这样）不可避免地处于事件的中心，处于政治冲突的中心，常常处于贪财图利斗争的中心。当规则是在游戏的进程中直接写出来的时候，这些规则就一定会影响游戏的结果，也就是说，客观上莫斯科在“配合俄罗斯演出”。

莫斯科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的复杂性就在这里。在世界的超大型城市中，城市问题和各种政权权力集团（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之间关系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但解决这些问题的环境（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环境）是稳定的。其中的规则早已确定，规则的执行也没有问题。当然我们要分清楚是在说北京、纽约、巴黎，还是在讲伦敦，这很重要，十分重要。

问：尤里·米哈伊洛维奇，让我们以思考官僚制度的本质来结束这次谈话吧。什么是官僚主义？俄罗斯的官僚制度有什么特点？莫斯科的官僚制度有没有自己的特点？法国式的地域名称和职务名称有没有重要意义？您当年几乎是从零开始在莫斯科建立新的管理体系。机关本身能不能对自己进行改革？或者说，这是由公民选出来的领导人的任务吗？据说，您给官僚主义者以挣钱的机会，这是真的吗？

揪住头发能把自己从沼泽地里拽出来，这只是一个神话。

关于挣钱的事是真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并不影响工作的条件下，当然可以。但必须是在上面这些条件下。

很遗憾，“官僚制度”这个词在我们这儿早就成了负面的词语了。其理由是众所周知的，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早就进行过描写。虽然“官僚制度”，这只不过是一种管理体系。但只要社会对它依然有负面看法，那就相当于，在所有世纪里的工作中它的确表现得太“官僚”了。

我们开始称这一系统为“官僚制度”的时间，相对说来，还是在不久之前，接受这一个（在时髦和超级时髦的外来词中）对我们来说远不是新的单词。“官僚主义”的概念在我们这里作为任何机构活动的典型形象，首先生根下来。这种形象是迟缓的，不敏捷的，对人对事都无所谓

的，经常被贿赂的形象。

“Бюро”这个词在所有的欧洲语言中都表示“部门”、“局”、“处”，也有“命令”的意思。就是针对每一种活动领域都成立一个机构，其使命是管理这一活动或对此一活动进行一些调节。官僚制度最深的根源在于劳动分工。历史上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和当今世界就建立在劳动分工上。如果劳动从一开始就被划分成不同的种类，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只完成工作的某一部分，那么就有人应当去协调很多人的劳动和努力，使它们合并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无论是在公司、区的范围内，还是在国家的范围内。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一般理论。这种认识源于用事实回答这种官僚主义管理机构在做些什么的问题：是管理、调整，还是在以命令主义作风管理。乍一看，这些词是同义词，而实际上在它们背后隐藏着有原则上不同的现象和过程。

管理，是为了达到严格确定的、通常在已知和可预知的环境中可以准确衡量的结果。我们在足够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法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按照一定的价格在莫斯科建立若干套住房（它们现在正在被兴建），这就是管理。如果目标完全达到，按期达到，就是好的管理；如果同时还降低了费用，那就是出色的管理；如果某些或所有这些条件都没有完成，那就是不好的管理。但不管怎样，这都是管理。

调整，是当目标提得十分模糊（比如说，“解决住房

问题”)的时候,当指标不严格或者经常变化,环境多变、不稳定,管理的资金明显不足或根本就没有的时候,才使用的一个词。什么叫做“解决住房问题”?是保证每一个家庭都有单独的套间,还是明显提高人均平方居住面积?今天莫斯科的主要需求是一居室和两居室的套间,而过5年、10年、15年,人们的收入会增长,或者会改变人口形势,或者还有其他方面发生变化,即使没有什么危机,需求也一定会发生变化。我的脑海里已经这样想过,甚至不止一次这样想过。

以命令式作风管理,这是当有法律或上级政权意志,并且必须使它们得到贯彻的时候而言。俄罗斯很多个世纪都是沙皇的意志决定一切,我们的第一批机构和部门被称作“衙门”不是偶然的。在这里,最主要的是使上级意志得到实现,而结果只居于次要地位或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

俄罗斯、苏联和后苏联时期官僚制度的特点是,在很多世纪里迫使官僚们执行意志,他们也习惯于执行意志,以命令式作风进行管理。管理在官僚们的活动中总是占从属地位,而调整的功能也许根本就缺乏。调整与发号施令的管理从来就是不相容的。此外,专制独裁者的无限权力,为官吏们在最高政权的掩护下能够从容面对社会而干自己的事情创造了条件。

祖国的官僚们的第二个特点就在于:他们习惯于为主人服务,而不习惯,也不会为社会服务。没有人教过他们这样做,也没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相反,常常有人把官

僚们当成与社会民众作对的政权工具。有相当多的人喜欢那种虚幻的有无限统治权的感受和虚幻的特殊等级的感觉。其所以说是虚幻的，是因为实际上官吏阶层是十分脆弱的。

还有第三个特点：政权看待官吏们就像看待仆人一样，而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没有人会慷慨地支付给仆人报酬。统治者认为，官僚自己会去补足的，会去琢磨怎样补足。公务员们过着穷苦日子，而“尽可能地”补足生活所需。大部分公务员在俄罗斯得到的工资总是比平均水平要低。你们再重温一下俄罗斯的古典文学：其中过穷日子的官吏形象是主要形象之一。就总体而言，这种状况一直保留至今。有小部分，数量很少的领导人报酬很高。而一大批各个级别的公务员，他们的工资水平在社会中没有人会羡慕。

我们这里只是在最近 10 年才形成把国家公务员、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看做一种职业，而且是复杂的和责任重大的职业的观点。只是在不久前才组建国家公职人员培训管理中心。而在发达国家，早在 19 世纪就开始形成了把官僚制度作为一种管理制度来对待的习惯。

应当说，作为管理制度的官僚制度的毛病在全世界都一样，它们广为人知，而且对它们做了很好的研究，进行了理论阐述。那些熟悉国外实际情况的人常说，我们的官僚制度与世界最发达的国家相比远不是最坏的。与官僚制度的毛病做斗争的有效方法也已经清楚。

现在我们在管理方法的转变过程中，提出了官僚们对

社会负责的问题。在指挥系统中，主要的责任在意志的来源那里，也就是在最高政权那里，因为所有的动力和行为的动机只能来自那里。而在管理系统中，另外一种类型的责任会到来，那就是对为其利益而实行管理的那些人负责。在民主国家这不仅是政权或某些社会团体，而且首先是全体人民。除此之外，当开始对一个官员进行评价的时候，不是根据上级领导对他的好感，而是根据客观的职务适应性进行评价的时候，这个官员本身也很关心他工作的业绩。

您所问的莫斯科的特点是：我们致力于把城市官僚制度朝着“调整”和“管理”的方向发展，远离发号施令的作风。不是所有的事情我都能轻松地做到，但方向一旦选定，我们就不会偏离这个方向，这就是莫斯科管理系统中最主要的新内容。

关于法国式的名称。市长、省的名称我们都用的法语词，这些词今天已经牢牢地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谁也不会去注意它们是外来词。但当时在这一点上是有其深刻意义的。首先，法国管理大城市的体系，包含了许多对我们来说有趣和有益的东西；其次，我们必须马上坚决脱离过去的人民代表苏维埃的执委会。条件不同了，国家不同了，管理的任务也不一样了——所有这一切，毫无例外，都与过去不同。我们必须让每一个在管理系统中工作的人马上明白这一点，并作为领导人付诸行动中。名称的更替有助于完成这一任务，因为当时很快就产生了问题：“什么是 мэрия（市政府）和 муниципалитет（自治市政府）？”

它们与过去的执委会会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着重点马上自动落到新意上，这也是当时的要求。

莫斯科的经验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机构本身不可能改革自己，也不应当改革自己。不是因为它不好、非内行、有恶意或其他类似原因，绝对不是。机械地缩编（缩减1/4、1/3、18.791%）不起作用。如果想使用各种各样的小技巧，那缩编就会改变方向，反而会使编制更加庞大。或者停止某些职能，那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会比这更糟的了。这两种方案都会使机构纪律涣散，会使机构腐化。

我们需要面向现实的管理任务。这些任务在市里由市长和首都的议会提出，在国家由总统、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提出。有的时候也需要扩大编制。如果这种扩编是由现实的任务所要求的，那么这种扩编就是好事，是必需的。拒绝它就会导致损失。我再重复一遍，关键是要准确地表达管理的任务，其次才是组织和执行的方法。

城市自己知道，它需要什么，它想要什么，这就是莫斯科主要的和最重要的特点。

○ 4 福利从何处来？

问：今天我想谈谈政治经济学。它从某个时候起就不再是我们这里的显学了，它受到管理学的排挤。现在提出贫穷和富裕产生的根源的问题成了不合时宜的事情。这意味着，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说，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人们的注意力被转移到优化任务的执行上，被转移到管理上。

早就应该谈谈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事，尤其是发达的世界也从来没有忘记过它。没有必要把政治经济学与管理科学对立起来，两者都是我们需要的。在西方社会，管理是最重要的，因为在那里从来就没有产生过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关于管理与执行的问题，执行什么呢，政治经济学也对它提出这样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是介于政治、经济和发展之间的“边缘”

学科，是关于前两者在实际中是怎样相互作用的科学，是关于它们的这种交织怎样反映在国家和世界发展中的科学。这正是当今俄罗斯最先需要的科学。如果对它没有需求，如果人们不教它和不学习它，如果在报刊上不提及它，那也就是说，没有多少人在真正地思考发展问题。太多的人只关心来源于我国改革和私有化的一个问题：“什么地方能弄到一块更肥的，把它藏到什么地方更可靠一些？”

在俄罗斯，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从革命向正常发展回归的政治学的规律是什么？或者说因为革命太久、太深刻，已经产生了某种新的发展类型？我们现在是否在自己的行为巩固这一类型？有些情况迫使我们这样想。历史上，财富有可能不是通过最壮丽的途径产生。可只有通过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这种财富才转变成资本。当资本主义发展物质生产和提供服务时，这就扩大了把人吸引到社会生产中去的时机，带来了员工福利的增长。资本主义就保全了人的创造潜能。按照早在 15~20 年前的话来讲，这就是“先进”。载入历史史册的那些资本家的名字与他们活动的范围紧密相连。当讲到福特、杜邦、洛克菲勒、盖茨的名字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能有把握地说出，他们中的每一位是做什么的。

当衡量的标准不是生产具体的商品，而是用虚拟的金融投机“生产钱”，这就已经证明了，那种忽视保证人们就业的问题，忽视他们的现实状况问题，忽视整体上发展自己的国家和世界的问题的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

走向了灭亡。

经济发展的宗教代替了生活的实证主义。反对经济增长是很困难的，也没有必要反对。经济增长的评价是根据人们对所需商品和服务的现实消费指标来进行的，但那种合理的消费有自己的界限。以使利润极限化为目标的经济不可能纳入这一范围，其结果是不断形成一些新的人造需求，虚假经济的劳动岗位数量越来越增加。这些虚假经济的劳动岗位是指从表面看似乎“在生产”，而实际上被以满足这些人造需求为目标的劳动所占领的岗位。

人们有可能说：让它去吧，消费者自愿支付类似的需求，与他人无关。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那么简单。亚历山大·谢尔盖维奇·普希金在描述自己看到亚当·斯密时提到过的“简单产品”，或者说是最初的、绝对必需的产品，最后也没有了消费者。现在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公司和生产某种东西的工作人员，这种加速的通货膨胀将最终破坏地球的环境。

我们这里的情况不一样。过去的“全民所有制”实际上被私人占有者闪电般地瓜分了。他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他们靠什么，是怎样赢得权利和机会，在眨眼之间就成了亿万富翁？不仅广大的观众不清楚，有时就连政府也不知道。我不作道德说教。我只是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情况不影响社会道德吗？不影响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吗？不影响国家的发展前途吗？如果不影响的话，如果我们真的走向正常发展的道路的话，我将只会感到幸福。

产生此怀疑的重要依据是：国家仍然在靠“石油管道”生活，而且依赖石油管道的程度比过去苏联时期还要大。这样生活是可以的，但是几十个国家依靠出口一两种原料或农产品生活，那么发展的可能性就会很小：最终的产品总是比原料和用于原料生产的能源要贵，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在理论上没有谁去争论这一点，但在经济实践中却违背了这一常识。

当现在人们谈论财富与贫穷的时候，首先是指通过什么途径（合法的和违法的）获得财富。当然不要忘记法律。但政治经济学促使人们去思考财富完成什么样的功能：是作为珍宝躺着，还是在经济中流通。如果财富是珍宝或只是单纯投机的对象，那么在一个国家里与少数人富裕的同时贫穷会不断地增长。当财富投入到具体的产业部门，它就会增加工作岗位，保证工资发放和减少失业与贫穷。

贫穷和财富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古代人如果感觉很好，那多半是当他有食物的时候。后来在某一时间分界线上开始分化成阶层：一些人总是有食物，另一些人没有食物，但不总是有，而且食物的质量也要次一些。

然而，贫穷与财富真正地分开是在一些人开始在宫殿里生活，而另一些人仍然留在那些我们远古时的祖先居住过的茅舍里生活的时候。与此同时，“新的穷人”是否开始过比他们过去的生活还要糟糕的生活呢？不知道，我想，应该不会。但是，就在他们旁边出现了奢侈，在这样

的背景下他们开始感觉到自己贫穷。最开始出现贫穷和财富的对比是什么时候呢？您读读《圣经》，在那里它们被描写得十分清楚。

后来是贫穷和财富的几百年、几千年的对立。富人应有尽有，穷人一无所有。富人夺走了穷人的所有东西，因此，穷人就变穷了。不光是不同时代的穷人这样想，今天很多人也这样想。由此得出看上去很简单的“回答”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把富人的财富夺过来分给穷人。大家都将感到满意和幸福。历史上有多少次人们试图实现这一处方！

我绝不保护富人，因为他们十分经常地表现出人性最坏的本质。但穷人也不是天使。美国人有一个俗语：“有钱使人变坏，但没钱更能使人变坏。”

富人在历史上完成了非常重要的任务：他们使文明的产生和初步发展成为可能。当某个古代埃及法老用壁画、瓷砖、金银器皿来装饰自己的宫殿，将珠宝赠送给自己的妻妾时，他们同时无意地促进了艺术和手工艺的出现、集中和发展。当人们思考生活的不完美和不公平时，就产生了宗教、哲学、文学、科学。

毫无疑问，我简化了很多，但文明形成的总体进程大概就是这样。假如这一切没有发生，那我们至今有可能生活在平等中，只不过是在几千年前的平等中。像野兽生活的那样，生活在自然面前的平等中，但生活得十分简陋。你们看一看：在苏联时期，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那种被机械理解的平等的理想，但没有富人。我们得到什么

了？我们把几千万人送回到自己的自留地里耕种，他们就靠这些土地来维持生活。

财富已不再是单纯的财富和奢侈。当由于几千年的进化结果文明已经达到出现生产和工业的阶段时，财富便成为了资本。资本仍然是财富，但这种新财富的功能是显而易见的。现在，为了让资本产生一些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结果（不仅仅是改善人们生活的纯商品，还有基础设施、知识——所有今天包含在“生活质量”概念中的东西），只需要几十年，而不是几千年。

我不打算准确地说出，这发生在什么时候，但到20世纪末，有可能还早一些，工业经济获得了新的品质。这一品质为我们构成了“后工业化”的概念，虽然我不喜欢这一术语本身。

在今天，没有发达的市场，就不可能有发达的经济。您想想这种变革，想想这一历史性革命的意义！这是一种共生现象，其中一个离了另一个就不可能存在！为什么资本很乐意来莫斯科，而不太乐意去俄罗斯的其他地区呢？同一个国家，同一种政治体制，同一个政权，同样一些法律，似乎各地的条件原则上应当是一样的？！而实际上却不是。莫斯科已经有了重要的具有支付能力的市场，而在其他地方这一市场或者还很弱，或者根本就不存在。

“让我们再一次呼唤亚当·斯密的灵魂吧”，这是普希金通过文字发出的声音，我们大部分的同胞都知道他。在工业化时代的初期，通过生产商品，“简单的商品”（不是金子、珍宝，而是用于出售的商品），“国家富裕了”。

今天，如果这一商品有买的人，如果商品的生产与销售能引发一长串的社会和经济的效应，比如有保证的经营服务、培训、各种附加服务，等等，国家会变得越来越富。

俄罗斯经历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所有阶段了吗？依我看，才刚刚开始。我们有些过分简单地把一切都归入市场。只要有市场，我们就已经处在西方模式的经济中……可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市场只是前提条件，只是许多所需条件中的一个，还需要所有其余的条件。

古典政治经济学建立了理论体系（我不追求术语的科学性，我将按照我所理解的来说），这个理论是原始的自然资本主义的理论。自然资本主义是指好像是自然而然就产生的资本主义，但它是在最典型的环境中产生的。超出常规的是，起初资本主义只在荷兰和英国出现，虽然市场在当时到处都存在。那时还没有谁想到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想到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

现在在俄罗斯问题不一样。我们需要自己的“追赶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理论。这种资本主义不是自己出现的，而是人们创造的。同时它应当推动我们快速前进，其速度要比最先开辟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还要快，因为如果我们将与他们一样以同样的步伐前进，那我们将永远落后。并且，我认为，速度虽然是重要的东西，但不是唯一的东西，还必须有发展的质量。

企业的经理们能否胜任所有这一切？不能，他们有自己的企业的任务，重要的、必需的，但也是自己的、社会的、经济的。因此，把政治经济学与管理学对立起来根本

就不对，它们应当协同合作。

但在您的问题中还有一个潜台词，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现在提出贫穷和富裕产生的根源的问题成了不合时宜的事情”，为什么不合时宜？我个人在这里没看出有什么不合时宜的地方。

什么东西有可能成为贫穷的原因？人本身。他不积极、懒惰、没有专长等。这是最艰难的事情，在这里旁人几乎帮不上忙。如果一个人自己帮助不了自己，那上帝也未必能帮助他，他的运气也就会更糟。

贫穷还有更常见的一些原因。人在生活中的起点条件：一些人充满爱意的家庭、住房、家里很富足；另一些人要么缺其中的一些东西，要么干脆什么都没有。在这里，社会、国家能够，也应当均衡一下起点条件，但不是去抢夺富人的财产，而是提供助学金、无偿培训的形式和各种资助。在具有自由经济的所有发达国家里都是这样做的。

贫穷是各种社会问题的结果。优化经济结构、关闭一些老化过时的生产企业和部门、人口问题……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会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出现在社会中。它们都容易在危机到来之前若干年或几十年被现代科技手段所忽视。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家及其经济和社会政策。在今天，之所以需要“国家”，不是为了“占有”社会，而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国家必须为了解决社会发展的问题和矛盾而工作。为此，国家应当向社会通报工作情况，而不是相反。

贫穷有可能是不幸事故的结果。人生病了，遭了灾，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这里不仅需要国家保险公司的配合，也需要人自己关心自己：小心谨慎一些，给自己办理人身财产保险，积攒一些钱准备在生活困难时用……对此，国家还应当建立可以帮助他的体制。

还有一种贫穷的原因。假定，有一个人生活得不阔气，但也很不错，有房子，房子里富足。没有很多财富，但也不奢华，就是富足。当家里人人都健康，能工作的人都工作，正常挣钱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劳动家庭，是个好家庭。而就在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人为了显示自己，故意引人注目地炫耀自己的财富。其实他的财富并不怎么样，应该说，距离寡头们还得在个人财产上添上很多个零。但根据第一个家庭的衡量标准，这已经是奢华、财富，于是第一个家庭会认为自己是穷人。我讲这些，是为了让所谓的社会精英们无愧于自己的地位。个人的财富拓宽了人的能力，但它要求在使用这些能力的时候需要更大的责任感。在发达国家，“老的”社会精英们非常清楚这一点。暴发户们不会明白这一点，他们给社会稳定造成了威胁，严重破坏资本的信誉（不是财富，不是奢华，就是运转的资本的信誉）。

现在我们来谈一下财富的源头。我们以近两三年的社会民意调查为例：所有这些调查都表明，大部分民众正常理性地对待富人。在他们身上人们看不出在苏联时期教科书上描写富人阶层的那种世人皆知的“凶恶”。人们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了解到资本是经济的推动力，只不过是当

这个资本有主人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本身就成为了主人，即使是小主人，可也是主人。这也很好。

但财富的合法性问题仍然存在。以前在俄国帝制时期历史形成的认识使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充分。而今天在俄罗斯，这一问题的根源与以前是不同的。我不讲那些从今日新俄罗斯的法律立场来看，是通过合法的途径获得的财富的情况。顺便说一下，我完全不赞成这样的“理论”：认为资本最初总是应当靠偷窃或抢劫来积累，而当抢劫到足够多的数量时才扔掉这种刑事犯罪的手艺去转变成商人。如果他们去当商人，那么也是去当经济犯罪的商人，只有依靠犯罪的经济才能建成犯罪的国家。

我也不去讲那些从小事做起开创自己的事业，不惜力量地努力工作，结果干出了一番事业的人。不论大事业、中等事业，还是小事业，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自己创造了这一事业。周围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也知道这一点。这里一切也都很清楚。他有能力做事，且没有违反法律。不管他怎样去继续指挥自己的事业，他的财富都是合法的，无论从国家法律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人间道德的立场来看，都是这样。

然而，当代俄罗斯经济的主要部分是在过渡时期的特殊情况中形成的，它是私有化的结果。在私有化进程中，过去由全体人民劳动所创造的，从这一意义上说，的确是全民的，不加任何引号的“全民所有制”被重新进行了分配，它成了少数人的财富。

打完架后不要再挥拳头，现在来检查修正私有化的结

果，就等于给俄罗斯现有的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失。但在俄罗斯进行的那场私有化，根据形式、手段、方法和结果来看，都是十分不道德的。不能否定这一点。为了使这场私有化多少具有一些人性，我们在莫斯科付出了巨大而昂贵的努力。这不是偶然的。即使私有化没有违反过渡时期的法律（必须说，这不是最后的法律），但它依然作为最不公平的行为留在人民的心中。也就是说，他们的合法性还将很长时间地受到人们的质疑。人们也会不信任地斜视富人，有些人还会指责和不友好地看待富人。

很遗憾，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贪财心占据了理智的上风，占据了经验的上风和合理看法的上风。这一切对国家的发展起不到帮助的作用。

问：当年弗·切尔诺梅尔金总理喜欢说：“我赞成市场，但不赞成集市。”而现在我们国家有市场吗，还是我们依然更加接近于“集市经济”？从根本上来讲，市场到底是什么？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有什么不同？

好的集市是很好的和受人尊敬的事情。它是各种健康经济和正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我们这里过去被很多人称为，现在继续称为“集市”的东西是过渡时期的特点，这一特点由两种现象构成。第一，是一种纯粹的过渡。当过去的体制被摧毁时，它就已经不存在了，新的体制刚刚建立，还没有调整好，

因此，不能以我们满意的方式发挥作用。第二，这是在这种“浑水摸鱼”的环境下对一切现象的综合，从简单的、不负责任和马虎了事的作风到贪污、氏族的利益、黑色经济和有组织犯罪。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就产生了“集市”的效果，即自然发生的、没有管理的、冒险的，甚至潜藏着恐怖的“集市”的效果。他们有可能“诈骗钱财”、“杀人抢劫”，什么都有可能，最好只相信自己。

在最近10-12年间莫斯科政府做了一些努力，想要“市场”离开首都。最容易的是对付民间的背口袋的买卖。现在很多人已经记不得20世纪90年代初的主要街道和广场是什么样子。但是，集市离开了广场，却没有从经济中消失，没有从社会生活中消失。这样的集市可怕的是，它使社会分化，使社会分解成内部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氏族公社和小集团，他们贿赂国家，这在将来不可能不导致产生长期尖锐的公民冲突。就本质而言，“集市”正是早期封建社会的物质和社会政治的基础。如果不阻止这一趋势，我们在未来7-10年最多只能得到带有它所有“优点”的完全“繁荣的”封建主义。问题是怎样阻止，到底要阻止什么。在当代高度发达的经济组织的刻度盘上有两极：

一个是前苏联曾经有过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其思想很吸引人：绝对地考虑和计划一切，把一切都置于中央集权的管理之下，生活起来不知有经济危机和经济震荡，不知有失业和通货膨胀，不知有社会经济的分化，等等。问题不在于，前苏联曾经有过的意识形态给人产生非常痛苦的影响。关键是这种思想在历史发展的当代水平上

是没有效率的。全世界还没有任何地方完全实现这样的经济。如果有可能实现的话，那么也应以每个人拥有完美的知识和能力为前提条件。但这种思想暂时还是幻想，是一个神话或智力测试题。

另外一极是完全的“自由”市场，所有想来的人都来到这里，彼此之间展开相互竞争，他们既不会遇到来自国家的障碍，也不会遇到犯罪和来自其他方面的障碍。这样的市场任何地方都没有，我怀疑，任何时候也没有过。

世界上的主要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在有力地调整自己的市场。同时它们追求不同的目的，以不同的方式做这件事情。但它们都在调整。目的通常是，保持财政和经济的平衡，保持社会稳定，保护国有企业，推动某些经济行业和部门的发展，推动国家各地区的发展，等等。方法多种多样：直接的法律和国家的决定、经济调控、规划、财政政策，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实质上维系秩序的措施和世界经济组织的一些建议、国际条约的规定。也就是说，调控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对经济而言要求无条件执行。但就它的基础而言，要实用，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与最发达国家经济调整之间的差别的本质就在于此。

当然，如果拒绝对市场做任何人为调整，那最终将形成极端的“自由市场”，这就是与中央集权的计划对立的一极。如果计划以自己的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和准备把理想的当作现实的来看待，妨碍了正常的经济生活，那么拒绝客观所必需的调整也会妨碍经济生活。它致

力于瓦解所有组织，建立和发展反社会和反国家的经济生活形式的前提和条件。它们会不可避免地在政治和法律领域产生一些类似的突变体。“黑色经济”也是这样，当它积累到极限，无法控制的时候，总是会随后带来“黑色政治”和“黑色法律”。

我们的自由主义者在祈求什么，我不知道。如果祈求西方的国家经济调控体系，那么就应当建立它，我在这里举双手“赞成”。只是不要机械地搬过来，而要有选择地进行借鉴：明确每一个子系统的功能，根据我们的条件来完善它。如果自由主义者祈求上述有关极端“自由市场”的神话，那么他们简直是对社会有危险的人。

问：我国所有的政治力量在自己的竞选纲领中，在任何政治行为中都郑重地声明自己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并宣布“社会国家”的原则。在后工业化和全球化时代什么是“社会国家”？

严格地说，20世纪末所有政治力量都基本同意以下陈述：

第一，重要和有功效不是就其本身而言的，而是指它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于人民的利益，服务于全社会的利益，服务于它们的发展目标和任务；

第二，为了社会某些集团、某些部分的利益来发展经济的时候，不应当以侵害他人的利益或以导致这种侵害为

代价来达到；

第三，在现代复杂的多边社会中，只有国家能够平衡和协调好社会团体彼此之间的利益。顺便说一下，国家也是保持这种平衡的工具。

上面所列举的几条在某种程度上把现在全世界所有传统型的党派区分成左派和右派。达到这些目的的途径在人们的想象中也各不相同。人们也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根据意识形态的立场和对自己国家国情的看法来强调自己优先发展的和重点发展的项目。不用说，每个党都有自己的纲领。但原则的本身，依我看，包括社会生活、经营管理和政治的基本原则，被确立下来，且确立得很公平，这些原则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是党纲的基础。

问题是，怎样做到合理地实施这些原则。总的说来，可以这样来表达这种非此即彼的抉择：一方面在残酷的全球性经济竞争环境中常常要求国家具有某种品质和能力，具有推动国家发展的成分，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可以有条件地把国家称为“国家公司”，实际上是某种按照经济法规、商业法规和以最大限度的经济效益运作的超级公司。由此可以要求缩减国家开支（作为非生产的费用），减轻税收负担，甚至要减少国家的社会责任。

但是，新时代也是最晚的工业型时代，人力资本在这里起到了关键作用。也就是说，在国家政策中，正是人力资本带来了经济的增长。因此，国家政策优先考虑的应当是人的健康、知识的生产、社会品质的“生产”，后工业化时代的成功与否就取决于社会的品质。然而，这种国家

进化的逻辑与第一学说——国家“经济学”相矛盾。问题正好就在于怎样把全球竞争的这种模式、按商业理解的、国家的有效性模式与那种被称为“人力资本”的经济彼此融合在一起。

在现代经济中，社会组成也许表达得最有力。它的意义何在？国家，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是一只当主人睡觉时守护主人财产的看家狗，但看家狗从不管主人的闲事，这是古典形式的自由主义经济。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国家成了市场和经济的调节者。目的是为了缓和，而理论上说，国家就是规避那些灾难性危机的调节者。而这些灾难性危机在国家起作用之前始终是由市场的自然力量（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是自由主义的市场）和古典的自由主义政治造成的。

这种调节已经在把国家变成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特殊的主体。国家不仅制定市场的游戏规则，而且它越来越多地自己参加市场上的游戏，而且也不总是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在全球化环境下，它主要遵守世界市场的规则，国际协定的规范和标准，国际组织施加的压力。为了保持国家的稳定，国家不得不既考虑经济发展，还要考虑社会的意愿和利益。在理论上这经常被强烈地否定，但实践中早已如此。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平衡比起纯经济来是更大的社会政治问题。

20世纪末国家面临新的问题和任务。除中国以外，现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发展速度、方向和水平在决定性程度上不是由国内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国外因素决定的，是由国

家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中的作用与地位决定的。国家真的应当具有竞争能力，而且不只是在纯经济的指标方面。

但毕竟国家不是公司，它的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的评价标准，不是定额和大量的利润。它应当在吸引外国投资方面具有竞争能力，而这要求劳动力的质量，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包括法律的和社会的）、高效的法院和仲裁法庭，国家和社会机构的协调性。它的发展战略应具有竞争能力。它应当在合法性和国民对国家的信任度上具有竞争力。在以上列举的内容中有一些是经济因素，但它们与其他非经济的因素是不可分割的。而且正是最后的几种非经济因素最终决定了国家作为那种维持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机制和形式的社会竞争能力。

现代化的国家越来越积极地并在更加广泛的范围里作为经济生活的主体在发挥作用，包括在世界上和在自己的国土上。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应当这样来安排自己的经济发展：必须在特别长的时间内使经济发展保持很强的竞争力，这个时间距离不是用几年，而是用几十年来衡量的。因此，国家应当对自己的经济部门进行管理，并且要求管理得具有经济效益。国家应当制定和实现长远的规划，这些规划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它们的潜在效益超出了一代人的生命界限（宇宙空间的研究、贝加尔—阿穆尔的铁路干线工程、跨大陆的石油输送管道、开发世界海洋等）。

不能按照衡量公司，哪怕是庞大的跨国公司的效益的那些标准和规则来衡量国家的效率。我们在按照公司的标

准要求国家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因此残酷地将它固定在全球性的政治失灵上。公司的效益不是由生产车间的指标衡量的，而是由这一公司整体上的最终工作结果衡量的。按照类推法，国家的效率将不取决于它支出的规模或支出的结构，而取决于国家在相当长的，但是是明确的、历史上不模糊的距离内全部活动的结果。

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的效率怎样？也许，大部分人会认同，他们的效率很高。为什么？因为这些行动向美国人的理解（美国人认为应该有全球性的和平秩序）方向迈出了重要的、创先例的一步。在经济上所有行动都是纯支出。然而，对于美国经济来说是小支出……

今天很流行的在某些经济和行政的领域要求缩减国家支出的观点要么是意识形态的教条，要么是贪财图利。这两种情况都是可怕的，就其本质来说是反国家的。必须要有国家支出的理论性和有效性，要求它们与达到所提出的社会目标和其他一些目标有明确的联系，否则我们的国家在不同的利益氏族和利益集团面前将始终是低效率的、弱小的和易受损伤的。

问：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关于全球化，人们谈论得很多，一些人认为它具有创造奇迹的效果，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具有破坏性效果。在这里它是否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东西呢？

当然是的。全球化使国家面临新问题，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丧失国家机制本身在世界和国家关系中的特殊的、“神圣的”地位。国家主权马上被很多因素沿着许多方向弄得模糊起来。我只列举最重要的因素，这就是，出现了在经济实力方面超过几十个国家的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不久前只属于国家的电力部门私有化了；国际组织的新作用；已经形成的从外部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实践。

在全球和平的环境中，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国家的经济政策越来越取决于外部因素。外国投资是否会来，将资金投到什么地方，在什么条件下进行投资？世界所依存的（正因为如此才把它们叫做“世界的”）世界货币有多大的稳定性？这一切都超出了控制的范围，甚至超出了影响单个国家的范围。但这一切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形势和未来。

全球化也改变了像“竞争”这类现象。在当今世界里为什么会有竞争？只是为了像以前那样争夺销售市场，争夺利润？或者还为了在社会经济和“人类”发展的指标中争个第一，争个适当的位置？即使只拿严格按传统意义理解的经济为标准，谁，什么样的国家在这里具有优势？是一个拥有高素质和自由度的居民的国家，还是一个拥有愚昧无知和缺乏自由的居民的国家？是一个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居民富足的国家，还是一个市场狭小、居民贫困的国家？

这些都是修辞性问句。我们以人口学这样的问题为例。在俄罗斯，居民数量和居民结构的形式可以用一个词

语来表达：灾难。人口在老化和减少。我们莫斯科的退休人员几乎有半个城市之多。在这种人口状况下，俄罗斯的空间不但不能开发，就连维持住都很艰难。国家应当研究解决这一问题吗？我不是说，怎样解决，我暂时只是问，应当还是不应当？俄罗斯的前途，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她的竞争能力（甚至是纯经济的）取决于人口学的因素吗？依我看，回答这个问题不可能有两个答案。

有人口，有青年，只有在那时才能够在“人力资本经济”的领域里开始游戏，因为支付上年纪的人的退休金和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这是必需的，这是人道主义和人类文明的体现。但这还不是“人力资本”经济。经济始于人们投入一卢布指望得到效益，而这一卢布有可能提供效益的时候。“人力资本”，这是知识、健康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它们应当回归于社会和人类本身，与其说是以产品的附加量，倒不如说是以所产生的思想和服务的质量来回归社会和人类本身。用付出体力的代价多生产一吨煤，多采伐一立方的树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可以。而要发明快速完成计划的工艺就需要“人力资本”。

不久前我在报刊上，记不清在什么地方了，偶然看到这样一个报道：美国专家们计算出，如果把人拆分成“备用零件”和器官，他的价格将有4500万美金左右。作为笑谈，这非常有趣。要是真的开始拆，那会怎样呢？

如果说人是商品，那么很快就会有人向我们提出：学习什么，有多少重量，吃什么，爱谁……“商品人”的公式在现代化条件的世界里有可能成为极权政治最强有力的

基础和推动力。比过去的任何意识形态都要强大得多。没有人去问“商品人”，他想要什么。人们把商品运到想要运去的地方，并把它卖掉。

人成为商品的经济是可怕的。经济应当服务于人，而不应把人作为一种与石油或泥炭一样的资源来使用。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仍然不是商品和服务，甚至也不是它们背后的公司，而是创立这些公司的人，研发和生产商品、提供服务的人。

如果是这样，那么国家花费在“生产人力资本”上面的资金是非生产的附加费用，还是长期投资？在缩减国家花在教育、社会领域等方面的费用时，我们究竟是在缩减什么？把钱任意挥霍或滥用，那才是非常糟糕的，这样的费用必须彻底停止，而不仅是缩减。但如果我们减少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随之国家的竞争力也会降低。而且不仅仅是在政治、商品和服务的世界市场上竞争，而且甚至在把已有的“人力资本”保留在自己的国家方面进行竞争。

最具竞争能力的是合理发展自己“人力资本”的人。为此必须认真仔细地研究国家的效率，努力提高国家的效率。国家绝不会消亡。的确，它的主权受到限制，但在当今世界也应当这样。同时，国家的国内功能的规模和范围在扩大。当国家不能有效地履行这些功能时，国家才会变成一个对自己本身，往往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威胁，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会发生内部冲突，出现能导致没有外来干涉就对付不了的不稳定局面。

问：尤里·米哈伊洛维奇，什么是首都相对顺利发展的基础？也许，这个问题就像首都经济一样复杂……

首先，与其他某些不是最强盛的地区相比，这种顺利是相对的。

如果从莫斯科本身所需要的东西出发，从莫斯科能够使俄罗斯复兴的事实出发，那么，现在城市的顺利发展是“最低的要求”，再也不能低了。

今天这种局势的基础主要有三个因素：

第一，莫斯科是俄罗斯的金融中心和经济中心，她的资源和机会比其他任何一个联邦主体多得多。我知道，这一情况使很多人激动。很多人也想使莫斯科知道自量，把它逼压得更厉害一些。正如部队里所说的，“不要让公职变成蜜糖”。但莫斯科的公职不是蜜糖，我向您保证。就像全俄罗斯一样，很多基础设施早就超过了使用期限。我提醒一下：莫斯科没有掠夺任何人，它的特殊经济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仅在苏联时期，而且是在苏联时期以前几百年间形成的。

对待莫斯科的态度，就是用来检查联邦政权方针实质的试纸。非此即彼的抉择很简单：削弱莫斯科还是振兴和发展俄罗斯的其余地区。削弱莫斯科当然要简单得多。但是，俄罗斯凭一个弱小的莫斯科是不可能振兴的。

我说这一点不是因为我是莫斯科的热爱者，虽然我是热爱莫斯科的人，而且我总是强调这一点。我出生在这

里，在这里长大，这是我的城市。不可能削弱主要经济环节中的一环，同时还希望整体向前和向上跃进。这种事没有过，也不可能有，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人那里都不可能。

第二，作为超级城市的莫斯科的规模：这既是问题，也是工作岗位、机会、经济发展的空间和城市各种收入的源头。

第三，莫斯科的私有化。它进行得不理想，但却不像整个俄罗斯那样不像样子的掠夺性私有化。联邦管理机关试图把自己的方法加强于莫斯科，使城市受到了不少的损害。现在他们还准备以比最合理价格还要便宜十倍的价格依次出售莫斯科的土地。但我们对此进行了抵制，以后还将尽最大的努力进行斗争。

还有一个因素，我好像提及过。如果卢日科夫今天不考虑城市，而在为自己谋求政治利益，那么明天，市政预算上就会有明显的体现。城市也就会生活得更加艰难。莫斯科市民也会马上看到这一点，很多人会亲身感受到这一点。莫斯科对管理错误的反应顶多在半年到一年的范围内，有的时候用几星期甚至是几天就可以计算。莫斯科政府也马上就会亲身感受到莫斯科市民的不满情绪，听得见他们所思考的一切。

对于整个俄罗斯来说，这一过程要慢得多，而且十分模糊。由于国家十分庞大，错误决定的后果有时要一年之后才能体现出来。这时往往已经找不到具体的责任人了，因为他们往往在坏的结果出现之前就被撤换了。

为了共同的公民行为，人们组织起来和协调起来要比在单个的城市里复杂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莫斯科要更加负责地对待自己的资源和机会。问题不是在人，人原则上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问题在于体制，在于数量，在于启动的速度，在于反馈联系的效率。在莫斯科这种联系的密度比整个俄罗斯要高得多，它们也更快，更可靠地发挥作用。

讲完这些后，我在想：也许，最后一个因素最重要。因为关键不是你有什么资源，而是你怎样去支配这些资源。

问：不仅莫斯科富有宝贵的土地资源，而且上帝也没有少分给俄罗斯各种自然资源。近来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强调国家忽视了属于它的自然地租，而把这些地租作为零钱留给了“石油工人”、“天然气工人”、“铝业工人”和其他寡头们的收款处。您对这一问题是什么立场？您怎样看待有关在俄罗斯广泛运用开采地下资源的租赁合同的建议？您是否同意，在发放开采矿藏许可证时必须放弃“两把钥匙”的原则？

国家的经济行为是非理性的。它压制了中小型企业，使它们不可能处于良好的法制环境和物质环境，但却给寡头们以及享有特权的行业和公司带来了一些慷慨的和莫名其妙的礼物。它把一些越来越新的功能转移到地方自治机

构身上，同时也动摇了地方自治的财政基础。

问题甚至不在于，租赁合同的机制对于俄罗斯是否合适，或者怎样使用自然地租，这一切都是派生的。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谁，为了什么目的，将怎样来管理和使用这些机制。与此同时，社会、国家建设性监控的条件将是怎样的（不是官僚主义的暮山，而是那些我已经说过的有效的反馈联系机制）。

必须坚信，任何这类体制都必须经过实实在在、认认真真的计算得出来，它的执行也应受到严格的监控，所得的收入应用于具有社会意义的需求和目的。我们现在扪心自问，能够保证这一切吗？

发放开采矿藏许可证的“两把钥匙”问题也是同样的情况。原则本身很难引起争议。在发放和分配租赁合同的问题上联邦政权应当说了算。而且地区也应当说了算。在有分歧的情况下，需要协调利益的程序和机制，而不是由其中的一方来操纵。拒绝“两把钥匙”就意味着，所有关于使用矿藏的决定将只能通过中央做出。我不认为中央的贪污腐败水平就比各地区的低一些。

在“两把钥匙”的情况下，地区不仅为了自己的份额而斗争，还充当监督的机构，充当对地方机构，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联邦机构的平衡杠杆。如果在民主国家我们以利益平衡为基础建设生活，那么地区是这种利益体系中的一种，而且很特殊，它联结了各部门和各地域之间的利益，中央和地方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全俄罗斯和具体的人之间的利益。地区不是政权垂直系统上的一

颗小螺丝和小齿轮，而是中间环节，没有它，垂直系统就会散落下来。因此，削弱地区的实力或把它们转入不动脑筋的小齿轮状态就意味着从整体上彻底失去体制的效率和行为能力。

除此之外，关于租用某一矿藏的决定将赋予地区一定的责任和义务，给它带来一些附加的问题。这是生意，而不是保卫国家的问题。有的人将会挣到钱，而地区将会因此而蒙受损失，它必须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必须要让利用自然资源的有效制度为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服务。我在这里强调两个关键词：“制度”和“有效的”。但仅是“钥匙”并不能保证这二者。也必须建立有效的反馈联系。“钥匙”只是那些应该有的几十种联系中的一种。还必须对建立这种制度的问题进行辩论。只对“钥匙”进行争论会使我们偏离问题的本质。

问：财富，平安总是与贫穷为邻。莫斯科当然不是墨西哥城，这里没有那种可怕的两极分化，没有那种非常吓人的贫穷。但在莫斯科，也和其他超级城市一样，正在进行地域分化的过程，在日常生活中已经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词：“富人区”、“穷人区”。为什么在我们这里，与其他国家不同，大部分富人就在不久前还在坐地铁上班，而很多穷人怎么也不习惯自己的这种新地位。您是怎么看待这点的？您为此做了什么事情？在莫斯科当穷人意味着什么？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一个主人公说过：“贫非罪，赤贫才是罪！”在现代化的莫斯科贫穷与赤贫之间的界限在哪

里？能否避免财富与赤贫的过分集中？能否把社会救助变成鼓励积极性的因素？

我们不会骗自己。地域分化的过程已经在莫斯科进行，如同在世界上所有大城市里一样。而且这一过程在莫斯科才刚刚开始，这一过程的主要阶段、结果、问题和矛盾——所有这一切在我们这里大部分还在后头。

在这种分化中，不管说得多么离奇，也有合理的起因。有财产的富人在穷人区自己感觉不到舒适和安全，他会引起周围人的极端不友好。相反，穷人在富人区，相比之下会显得更加贫穷，更加一贫如洗。

但我本人和莫斯科政府不会去帮助或促进这一过程的发展。我自己是一个具有旧思想的人，脑子明白，但良心不允许我把社会的种族隔离作为不可避免的现象来对待。必须看到问题和意识到问题的最初根源。

在我们这里，包括在莫斯科和整个俄罗斯，问题就在于缺乏中产阶级。或者说中产阶级这一阶层十分单薄，以至于社会感觉不到这一阶层的社会影响。富人的比例也非常小，但对于他们来说在我们这个社会，和大多数居民相比，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应有尽有。而正是这大多数的居民，他们相对的机会仍然非常少，在某些方面正变得越来越少。

在经济方面，城市不能只靠富人来支撑。富人实在太少了。他们正在离开或即将离开这座城市。城市总是要依靠自己绝大部分居民而存在。我们的这个绝大部分在很大

程度上是穷人和上了年纪的人。老实说，两者之间相互关联。在长远的将来我们面临解决莫斯科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的经济基础问题，解决莫斯科的发展问题。

的确，就在前不久我们还一起乘坐一辆地铁。只要愿意，现在也可以一起乘坐；地铁不仅仍然是莫斯科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莫斯科最安全的领地之一。没关系，我们会如同习惯其他许多车辆一样习惯新的形势。我们会习惯，人们将把车停在郊区地铁站旁，乘地铁去市中心。这一过程已经开始了。莫斯科将鼓励和发展这一过程。

随着社会分化的不断增强，城市的主要任务将是把城市预算的收入保持在能够支持基础设施运转、继续发展城市地域，同时有针对性地给予那些需要社会支持的地方以社会支持的水平。

根据其他一些超大城市的经验，我知道，首先是中小学教育和医疗事业需要这种支持，那些哪怕是部分补偿贫穷的社会机构也需要这种支持。我们现在在城市范围内对中小学教育和卫生保健给予了不小的支持。我们援助退休人员、年轻家庭，帮助刚生完小孩的夫妇。莫斯科人知道这一点，事实和统计数字体现了这一点。您问问任何一个退休人员，市里给他“补助”多少，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马上回答上来。我不能说，在我们这里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这不是那么回事。但我们在尽力地做，而且做了不少，做了莫斯科的条件能允许做的那么多。当穷人意味着什么？我想，关键不在于收入的数字。贫穷和财富是一对相对的概念。我会这样来给贫穷下定义：这是这样一种收

入水平，在这种收入水平下，人不能使用文化的、教育的和其他该地区所具有的、带有社会意义的条件；而且明显不能解决长期的家庭问题，如买或租面积足够的和适当的住房，保证小孩的教育和家里人每年的休假。数字在不同的城市也是不一样的。赤贫是指当一个人很难保证自己最简单的和很少的食物、衣服和住所的状况。

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社会救助本身并不激励人的积极性。它只是帮助人在航行中保持好的状态，顶多这样。一帆风顺的人很积极。问题是怎样帮助他达到积极的水平上，同时不让他变成一个完全的受人抚养者。现在还没有答案。苏联几乎帮助过所有的人，也因此受了内伤。但如果我们不去帮助任何人的话，就意味着社会的结束。

问：经典作家断言：“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形容工业化社会、信息化社会实质的十分现代的一个句子。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应当怎样做，才能让人变得比石油更有利？难道所有的问题就在于“干部”不是理想的干部吗？

干部是国家、社会、地方自治所要求的哪些人？归根结底，是每一个去参加或不参加投票的人所要求的干部。

当然，干部决定一切，在任何时代都是这样。但您所引用的“经典作家”还说过另一句话：“没有不可替代的，只有没有被替代的。”甚至当我们被某些机器人所替代时，也会这样。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干部才会开始解

决一切——这当然是开玩笑。

我不想把人与石油相比。石油是大规模的产品，要开采几亿吨。几百万人才能变得“比石油有利”。这是社会和政治文化的问题，是经济类型的问题和发展的问題。这里，俄罗斯复兴和变化的目标，不是很快就能实现的。干部总是以“个”来论的商品。

我会把问题分成三部分：选民需要谁，然后是选举机构需要什么样的干部，在这种条件下什么样的干部才是社会所客观需要的。

我们不去评判选民。人民总是对的，因为他在错了的时候，自己要为这个错误完全付出代价，付出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代价，付出自己小孩前途的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不管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民主的本质就是这样。我们回忆一下，希特勒是怎样十分民主地开始执政的。《我的奋斗》这本书在那时候已经写成有十年了。但由于受到情绪和幻想的支配，结果是付出了代价。德国人本身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关于我们和其他民族我就不说了，大家都很清楚）。

你还记得关于“政权公式”的谈话吗？政权始于对某类干部的需求，为完成什么样的任务才需要干部呢？

如果是为完成某种“肮脏的”工作，然后可以把人抛弃，把完成工作的本身的全部责任，把对失败和错误的全部责任都强加于他们身上？这是一种类型的干部。

或者从我认识的人中间，和我一起工作的人中间挑选干部。这是第二种类型。

或者是为了完成向选民许下的诺言诚实地和以最大投入地和我在一个团队里工作，才需要这些干部。这是第三种类型。

我要补充下面的内容：任一层次的领导都努力引导“自己的”团队。因为任何事情，任何政策总是由具体一些人来做的，由具体的人来贯彻执行的。那些在前任团队里忠诚工作的人有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没能积极参与到新领导提出的任务和方针中去。

当然总是会有一种自发的“投机的”人群，这些人为了进入到某些机构，进入到某一管理层、政权层，充分利用偶然得到的机会和条件，尤其是在发生剧烈震荡的时期，深刻变革和革命的时期，这一人群特别强大。

从1990年以来，什么样的“模式”在我们这里占重要地位？首先的和主要的是：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没有，也不可能有诞生未来领袖和培养从事国家管理干部的稳定的政治机构或其他机构。这通常是党的任务，但在俄罗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党派在完成这一任务，这些党派本身还处在萌芽状态。

选拔干部曾经是特殊的个人事情，是在被确定为“一号”任务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很怀疑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干部曾是“一次性使用的”。否则，用什么来解释，除了极少数情况外，几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在国家管理机关继续担任职务。有的人通过各种手段赢得地位之后就退到一边去了。有的人干脆沉入了勒忒河，消失得无影无踪。仍然留下来引人注目的

人寥寥无几。成为大政治人物的更是屈指可数。

哪种类型的人同意去干一次性的工作呢？或者他明白，他在冒险，指望能胜过别人，那么这就是赌棍，是危险分子。或者对他来说主要的是找个靠山，而其余的事情都不重要。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型号”的干部都很难称得上是对社会和对政治负责的干部。

这样选拔干部能产生培养干部的体制和传统吗？

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这一模式被另一种“拜占庭”模式所取代。相互争吵、打斗成了管理的手段。这样的例子还清楚地记在脑海中：所谓的“克制与均衡”的体制（切尔诺梅尔金与索斯科维茨，丘拜斯与科尔扎科夫等）。顺便说一下，您从这个角度比较一下莫斯科的干部政策和联邦中央的干部政策。不管谁，也不管他如何对待莫斯科和卢日科夫，但还没有人指责莫斯科政府不够资格。我的团队早就在协调一致地工作。

现在需要根据业务素质来挑选干部，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应当建立起允许这些业务素质表现和对它们进行客观评价的国家责任体制，每个官员的责任体制。需要能够培育和锻炼干部的政党，这是到今天为止在俄罗斯所有想留在选民视野中的党派的头等任务。否则进入党内的只是那些除了空谈之外，干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合适的人。那么，到那时候俄罗斯的民主就会结束，不是因为变革的缘故，而是因为没有了有行为能力的主体。

○ 5 论全球化时代的民族自决权

问：好像，在最近越来越少地听到这样的句子：“莫斯科是多民族的城市。”的确，十分准确的是，类似的陈述失去了高傲的、洋洋得意的语调。莫斯科的各大报纸越来越多地提出关于城市发生的“不良变化”的问题。莫斯科在逐渐改变自己的面貌，它变得，这么说吧，越来越像“南方的”城市。您怎样看待这一点？

我对这一问题深表忧虑。这里的问题越来越多，不是因为“南方人”的数量在增长。问题的增多，首先是因为今天，在大量移民的世纪，我们国家还没有健康的、法律上有责任能力的移民政策。要知道，“对外控制和不允许进来”，这不是政策。

当然，莫斯科是俄罗斯人的城市，开放的俄罗斯城市，它只能作为一个开放的都市，作为俄罗斯的首都存

在。在这里很多世纪以来接待过许多外国大使。现在，顺便说一下，使馆的数量变得更多了。很多世纪以来，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在莫斯科定居。他们的活动痕迹留在了城市地图上：格鲁吉亚街道、霍赫洛夫胡同、德国街区、亚美尼亚胡同……现在，莫斯科仍然是一个“世界级的、全球性的”都市，在这里生活着不同民族的人们。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与多伦多和纽约这样的超级大城市差距还很大。但莫斯科在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在城市面貌的多样性方面，在发展的规模方面都在向前发展。

所有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的结果。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选择：我们是参与全球化进程，还是与全球化进程隔绝。后者不会成功，也不会给俄罗斯带来好处。换一种问法：怎样更多利用全球化的优势，而减少（实际上是排除）全球化的负面后果？怎样才不会使我们的城市变成一个人来人往的穿堂院，变成一个不宜居住，两次换乘之间兜圈的国际火车站？怎样才能使莫斯科仍然是“莫斯科的”呢？

许多人指责莫斯科，因为我们不愿废除户籍制度！说我们保全了“苏联体制的残余”，“我们限制着居民的权利和自由”……是的，我们努力地进行相当残酷的户口登记措施。让我们思考一下，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取消对城市移民的所有监控形式，莫斯科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这对神经衰弱的人而言是灾难性的。犯罪率也会增加，还会增添许多新问题。

当然，户籍登记无法阻止所有的犯罪分子。它只是众多屏障中的一种。重要的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组织注册的

程序，使守法的公民不要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这件事情上。但取消进行登记的话题谈都不要谈，移民的手续将只会得到加强，我们应当把握住问题的关键。

第一，莫斯科不是一个低消费的城市。购买住房，甚至租房的花费都不少。必须要有个房子住，莫斯科的气候不是南方的气候，硬纸房的贫民区是对付不过去的。目前，凡是能住人的地方都已经住了进去：被遗弃的危房、没有使用的生产厂房、没有完工的建筑工地、车库、仓库、顶层阁楼、地下室。我们这里已经发生了不少在类似的一些地方发生火灾时死了很多人的事例。但在将来这种事例的数量将急速增长很多倍。

第二，有很多有钱人到莫斯科来。现在大约有一半的新住房不是莫斯科本地人购买的。一方面，这是一部分有行为能力的积极居民购买的，这非常好，也是必需的。但同时这部分人把住房的价格抬高了，使莫斯科人越来越买不起住房。逐渐地，市场就开始把莫斯科的本地人挤到城郊区和更远的地方。

第三，随着以上形势的发展，就很有可能导致首都局势的不稳定。如果莫斯科发起疟疾来，俄罗斯也就会发起疟疾来。尽管警钟在不断地响起，莫斯科市暂时还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各民族间的冲突。我不是在吓唬人，也不是在恐吓，我是在沉思，我们可能与什么发生冲突。

莫斯科人和莫斯科政府完全不能让形势向这样的方向发展。我想用一个问题来回答那些对自由迁移入迷、对自由选择居住地入迷的人：我们是为了人的本身的利益而保

卫人的权利，还是为权利而权利，就像为了改革者而改革呢？应该怎样对待那些已经居住在莫斯科或俄罗斯任何一座其他城市的人的权利呢？

最近我很满意地发现，我们的法庭体系正在脱离对侵犯权利问题的单边解释。2003年夏天俄罗斯最高法院认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对俄罗斯公民制定移民限额的法律与联邦法律不矛盾。显然，无论是俄罗斯宪法，还是联邦法律从整体上来讲都不允许在实现一部分人的权利时侵害另一部分人的权利。我认为，斯塔夫罗波尔的立法者没有做到足够的始终如一。在与地方检察机关长期的辩论过程中，立法者从法律文件中去除了有关企业主应对与没有登记注册的移民签订劳动协议承担责任的重要条款。

我坚信，莫斯科和每一个大都市都应当像发达国家对待这些问题一样对待外来移民的问题。外来移民应该有，但外来移民也应当有所区分，毫无疑问，也应当受到监督。移居者应该用劳动获得成为这个城市长期居民的权利。否则，在保护移居者的权利时，有可能非常严重地侵害本地居民的权利。这里需要非常好的平衡。

问：移民对莫斯科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例如，不怀善意的人经常说，没有移民，莫斯科就不可能生存下来，因为莫斯科人不愿意从事很多种类的工作；没有“移民灰姑娘”，莫斯科就不能生活，莫斯科会变成一个“消费群体”、“不愿干累活脏活的群体”，是否存在这样的威胁？

有管理的、有指导的移民（包括移进和移出），这是好事，是必需的。毫无秩序的、没有监督的、依靠贪污受贿和滋生贪污受贿的移民绝对是坏事，而且是非常严重的坏事。

但我绝对不同意这些说法：莫斯科人是嫌弃粗活、脏活的人，是在躲避于“粗活”的人，而移居者都是能干粗活、脏活的“灰姑娘”。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这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侮辱。当话题涉及稳定的和大规模的移民时，我们不是要讨论谁的功绩或错误，而是在讨论社会发展规律。

有人不想从事很多种类的身体上很脏、体力上很重、不够体面的劳动，即使当这种劳动能获得很好的报酬时，他也不打算去做。这完全是正常的。这不是莫斯科人的“罪过”。人都有一种正常的追求，尽量去干一些不很繁重，但报酬多一些，更加体面的工作。莫斯科人在这方面与所有其他的人是“一律平等的”。

从根本上讲，这是任何稳定的和发达社会的本质。一个人来到莫斯科是为了寻找理想中的运气、功名、前途。为了不理想的事情他是不会来的。

人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生活得比自己好，希望他们走得更远、更成功、更幸福。

如果人为地把城市“封闭起来”，就像把具有极易爆炸的东西封闭在瓶子里一样，然后用命令的口吻说：“以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对付吧！”他即使能对付过去，但社会的活力将会枯竭，而开始形成一些特定阶层。如果把类

似的实验延续无限长的时间，实验的结果多半就是：社会瓦解成彼此孤立的、相互敌视的特定阶层和群体。这种社会就会变成木乃伊一样：它以失去发展机会的代价获得稳定。过去就是这样，我希望，在我们的未来不会这样。

顺便说一下，全欧洲都碰到了同样一些问题：有许多不体面的岗位、对劳动报酬加以限制、在居民机构中安置退休人员和其他一些问题。要知道，那里也并不接纳大规模的来自生活条件优越地区的移居者和外来移民。移民都是被迫接收的。相应地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情绪也像在莫斯科一样爆发出来。准确些说，在莫斯科如同在那里一样：我们毕竟在这一过程中落后于欧洲很多年，但在莫斯科还出现了自己的问题……

我们已经连续好几年获得了经济增长：在建筑业中，在服务行业中，在工业领域。这就导致了莫斯科劳动力的不足。当人们讨论向莫斯科移民的经济原因时，常常忘记，城市居民不仅在选择工作时很挑剔，他们自身也在逐渐老化。因此，今天在莫斯科没有足够数量的劳动力，而且在今后10年，莫斯科还会是这种状况，因为出生率不够。即使出生率会增加，明天出生的小孩也要在20年之后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而我们现在就需要工作人员，现在就需要给退休人员支付退休金，现在就需要保障市政府预算的其他支出费用。这应该怎么办呢？

年复一年越来越多的资金花费在支付退休金上面——联邦的主要部分和莫斯科增加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新的劳动力，以便一方面保证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供

给退休金支出。退休金储备制度还不会马上见成效。当某一位老奶奶说“高加索和中亚的居民陆续来莫斯科的太多了”，她大概没有想到，在她的退休金里面有这些塔吉克人、莫尔多瓦人的贡献，他们工作在莫斯科的土地上，开辟公园和街心花园等等。

顺便提一下，他们是与俄罗斯族的莫斯科人一道齐心协力地做这些工作的。没有必要举出统计资料，您一走进街心花园和建筑工地，移民中的“南方人”就会映入眼帘。在莫斯科有很多的劳动力来自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达维亚。

在社会经济方面，这样的临时工人、“外国工人”，对于城市来说是“有利的”，但只有当他们在这儿合法工作的时候。他们临时来到这里，住集体宿舍，没有带家属。他们给社会领域（医疗服务，对母亲和儿童进行保护、教育等）的压力是最小的。

另一个问题是，许多公司，不光是建筑公司，它们努力把自己对劳动力的支付费用降低到最低限度，然而，雇佣外国工人的法律途径是复杂的，而便宜一些的往往是非法的。我国与独联体国家的边境不够严实，非法移民经常自己就能过来。如果公司被揭发使用了非法外来移民的劳动，那它就会自动破产。情况暂时就是这样。

要说，临时移民，甚至是完全合法的移民状况非常好，那是不正确的。他们的素质常常不会让人去希望有更好的结果：在某些独联体国家经济简直在崩溃，结果工程师们承包建筑维修工程，电子学教师和会计去摆摊做生

意，而那些根本就没有任何专业的人去从事犯罪的生意：卖淫、偷窃、有组织的乞讨。在有一个地方（我不便说出是什么具体地方）男人们有时相互说：“喂，我们上莫斯科顺钱包去。”

还有一个与临时移民有关的问题，那就是另外一种文化的问题。不是说移民的文化落后，而是相对于莫斯科的文化，他们是不同的、非莫斯科的文化。最近一段时间这种文化的冲突让事件复杂起来。想想吧，在亚洲或高加索的某个村庄经过许多世纪而形成某种地方传统，怎么也不可能适合欧洲的都市，因而不可能被这些城市所接受。比如，在莫斯科的地铁站药品售货亭里坐着一位妇女，她是一位售货员，穿着白大褂，嗑着瓜子，瓜子壳就吐到手掌里。当一个顾客走近时，她用白大褂擦干净手，然后把药递给顾客。这不是我想出来的，莫斯科本地人经常碰到类似的事情。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临时移民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地位，变成常住居民，甚至发展起同乡会。中国人、越南人给我们充分地展示了这一点。而且其他民族也在努力地做到不落后于他们。在美国很多城市和州里都建立了这样的同乡会：由中欧来的移民在美国东海岸建立了同乡会，来自亚洲的移民在西海岸建立了同乡会。那里甚至用相应的语言为他们播放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这好还是不好，我不知道。这只是现有的问题，这一问题将会加剧。我们必须思考，在莫斯科，在俄罗斯应该怎样解决它。

移民应当是有理性的、有秩序的和合法的。问题的关

键就在于如何实现上述这些品质。莫斯科本身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而且也不应当由莫斯科独立完成。在缺乏联邦规范的情况下莫斯科可以做出，也正在做出自己的决定，但要完全减轻城市的移民压力，使这种压力进入调控的轨道光有莫斯科本身是不可能的。

“南方人”（按您的取名）的问题，在莫斯科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从遥远的国外（中国、越南、“第三世界”国家）来的外来移民；另一个是从俄罗斯的南方和独联体国家来的移民。这在经济上、法律上和政治上是不同的过程和现象，而且从高加索地区来的移民有许多特殊的理由。例如，早在苏联时期这种趋势就已经形成，从那时起，由于不取决于莫斯科的原因，这种移民倾向得到进一步加强。

这一切应当由联邦中央在统一的政策基础上，考虑到俄罗斯与相应国家的关系来进行调控。没有这种调控莫斯科就会窒息死亡。在联邦法律里面应当准确规定外来移民进入俄罗斯的准则，获得俄罗斯国籍的标准，制定出这两者的机制。应当向全世界清楚而诚实地说明，俄罗斯期待和欢迎什么样的人，对什么人俄罗斯不怎么感兴趣，什么人在什么条件下俄罗斯绝对不接收。

当然，这并不保证没有问题。美国的外来移民法和移民限额要比俄罗斯清楚得多和透明得多，然而那里非法外来移民仍然相当多。但那里有准确的、明白易懂的关于外来移民的法律，关于国籍的法律。我们必须引进这一系统的方法。

关键是，不能拖延。现在已经签订了第一个关于强行遣返非法移民的协议。这样的协议还应该有几个，这必须有联邦政权明确而坚决的立场支持。否则，莫斯科想做点什么（我们有自己的经验），有人就会指责我们贪图好处，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和践踏了人权。这样做太不正派了，而更主要的是，严重打击了全俄罗斯。

问：尤里·米哈伊洛维奇，要知道，来我们莫斯科的不仅是一些“冒险的团体”，不仅是从国外——苏联解体前的国外和解体后的国外而来。莫斯科总是吸引一些富有创造力的人，吸引文化的精华、知识分子和想取得成就、想飞黄腾达的年轻人。莫斯科总是能从俄罗斯的这些“精华”中吸取营养，能得到俄罗斯最优秀的、最富有活力的人的支持和帮助。在这里面总是蕴涵着莫斯科发展的源泉。为什么莫斯科能吸引人？只是因为它是首都，还是另有其他原因？从根本上来讲，什么叫做成为“莫斯科人”？怎样才能成为“莫斯科人”？能不能成为“莫斯科人”？

当然，莫斯科吸引着来自全俄罗斯的富有创造力的、积极的、天才的、精神饱满的人们，以前是从全苏联吸引这些人才。许多世纪以来这里形成了自我实现、发展和升迁的环境。我甚至不用说高等学校和博物馆、图书馆和剧院、音乐厅和体育场，虽然，这些当然也很重要。依我看，关键在于莫斯科所创造的崇高的精神文明的氛围。

这个氛围不仅是由本地的莫斯科人，而且还由外来人创造和再现的。也许，在这里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我的朋友、莫斯科大学的校长维克多·安东诺维奇·萨多夫尼奇。他出生在乌克兰，也在那儿生活过。完全还是个小孩的时候他就在顿巴斯的煤矿干过活。1958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就把自己的整个一生献给了莫斯科大学。我想指出的是，维克多·安东诺维奇把有才华的来自整个前苏联的青年男女录取到莫斯科大学。如果他们将留在莫斯科，就一定会推动俄罗斯的科学向前发展，那样我们将只会感到高兴。

大城市总是具有吸引力，这不仅仅因为是首都。怎么，难道州的中心城市我们这里没人去吗？有人去，不可能不去，只不过在莫斯科我们关于这一点听到的少一些，了解的也少一些。

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大城市那样多的工作岗位和教育机会、实现自我的机会。当一个人已经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取得了一些成绩，而且得到了社会承认后，那么他就开始看，他在哪里生活得更舒适一些。如果工作的性质和收入的额度允许的话，他常常会从大城市搬到郊区，搬到小城市，搬到乡村地区。尤其是在那些距离不远，道路很好，出行方便的地方。

但这样的人已经是新的身份离开城市的，不是以当时来到这座城市时的身份。如果还是以刚来时的那种身份，那这就是失败，是意外的灾难。也就是说，他什么也没能够做成，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而

如果他能够做些事情，哪怕是最少的事情，那也是个人的胜利。

这个“能够做事”也是移民的重要推动力。钱不只是在莫斯科可以挣到。在这里事实上钱总是很难挣，难怪人们说：“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而要在其他州却很容易，但要想得到承认，要想只给自己证明一下，你能做些什么，最好到首都莫斯科来做。这是对全人类都适合的规则。

什么叫“成为莫斯科人”？可以在形式上成为莫斯科人：办理户口登记手续，得到工作，置备随便什么样的住房，你就是“莫斯科人”了。从实质上、从精神上成为莫斯科人就要复杂得多，当然，首先要有这个想法。

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掌握在莫斯科所讲的俄语，虽然这点没有在莫斯科的法律里固定下来，没有写进莫斯科的法律。在这里，问题不仅仅在于如果不懂俄语，会使外来人员和那些与他一起生活的莫斯科人感到困难。问题还在于了解俄语的所有丰富特点，能够使人熟悉在莫斯科形成的文化氛围，这会给他提供做出自己贡献的机会。他利不利用这一机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现在已经去世的布拉特·沙尔沃维奇·奥库扎夫，他的纪念碑竖立在一个“最莫斯科”的地方——阿尔巴特街上。他是一个格鲁吉亚人，但又是一个在俄罗斯文学中，在我和你们的语言中、在俄罗斯的语言中留下自己印迹的格鲁吉亚人。

我作为莫斯科人感到不满的是，某些民族同乡会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生活，完全与人隔离，就像在异国他乡

降落下来休息一会儿的“候鸟”一样，当时间到来时又腾空飞走，在自己身后留下一些脱落的羽毛。令我感到不快的还有抽象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口号。他们说，异国的各种文化独自过自己独立的生活，它们肩并肩地生活在一起，互不干扰，这是多么的好啊！但莫斯科仍然是一座统一的、融入其他文化的俄罗斯文化的城市，它应当是这样的城市。

莫斯科的吸引力也有自己的弱点。在我们俄罗斯，有一个我本人不很喜欢的特点，而且在5年、10年、20年内不可能克服这一特点。许多世纪以来我们的国家被严格地中央集权化，并追求个人威望。首都总是把过多的活动能力强和有才干的人拉到自己这边，在这个意义上削弱了俄罗斯的其余部分。莫斯科和曾经是首都的圣彼得堡，无论是在伊万雷帝时期、彼得大帝时期，还是在苏联时期，都是如此。

这是不正常的，这对俄罗斯不好，对它的首都也不好。住在国内不同地方的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失败者。由此产生生活的紧张，自我评价也降低了。我们必须做到，要让人们在莫斯科之外的地方也能信心十足地得到职业的认可和社会的认可。近年来好像开始看到这种趋势，但只是刚刚出现，还远远不够。

莫斯科吸引了许多人，但她也付出了很多。有多少俄罗斯人在莫斯科的高校学习过啊！莫斯科应当让俄罗斯的“优秀分子”来补充营养，而不应当完全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一边来。为了不发生这样的人才被吸引走，国家的其

他地区应当生活得比现在富裕些，应当生活在民主的环境中。没有资金和表现的自由，人们就得不到相应的承认。

我还想说一件事情。也许，该考虑随着时间的流逝莫斯科是否会失去自己的吸引力？莫斯科市里没东西可学，没什么人可教的时期是否会到来？来莫斯科要花多少钱，居住在里面又要花多少钱？要知道，很多科学家离开了，还有人在继续离开。在俄罗斯不同的地区形成了自己的大学和科学中心。有去国外学习的机会。潜在的大学生们将反复地思考，值不值得去莫斯科。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教育领域，而且还发生在其他领域。如果这些趋势得到加强的话，就会发生灾难。

在俄罗斯人的眼里莫斯科今天与其说是与俄罗斯的各省、州竞争，不如说是在与外国竞争。如果费用大致相同，而其他因素外国占优势，那么外省就会做出不利于莫斯科的选择。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降低“横杆”，降低标准。莫斯科应当努力保持住世界水平，如果不是在所有领域的话，哪怕是在许多领域也好。说实话，否则这就不是莫斯科了。

问：作为最有经验的领导人，您在人事管理方面当然不止一次地考虑过民族的因素。在这里您有没有自己的“绝技”，有没有自己的“技术秘密”？从另一方面讲，在政权机关，尤其是在生意场上民族的同一性有利用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不管在莫斯科，还是在其他超大城市，在某些商业领域都发生过民族

集团的专业化。显然，这一切使全体公民的团结受到阻碍，它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并使之根深蒂固。能不能管理这一过程，将它们控制住？

嗯，应该怎么理解你的话呢……什么叫“控制”？叫他们排成几列横队并发出口令“立正！”，这当然不行，在任何历史上都没有成功过。可以把他们临时管束起来，但这种稳定的代价将非常非常昂贵。而且，关键是，接下来会怎样？爆炸、动荡、巨大的牺牲？因此，没什么可“控制”的。

但如果您指的是维护法制和秩序，那么在这里的回答绝对是“是”。但这时候就不是约束，这是依法的生活。法律应该存在于人心里，在他的意识里。这不是从外面来威胁他的“木棍”。19世纪有一个在彼得堡工作过的外国外交官，把当时的俄罗斯和德国进行比较。他说，在德国法律最少，而且这些法律也不很严厉，但德国国内人的纪律非常强，而俄罗斯有很多最残酷的法律，可人完全没有纪律、无秩序。

大量涌入的移民使得今天这一切变得更加繁杂了，他们经常“不在乎”我们的法律……对俄罗斯的法律持无所谓的态度。同时自然地划分了各民族的活动领域，例如：中国人和越南人主要买卖日用必需品；阿塞拜疆人主要从事水果、蔬菜和鲜花的贸易。这种划分是由客观原因形成的，它的萌芽在以前就有了。我们回忆一下，在过去，乌兹别克人就控制着水果市场贸易。

然而，我不会把这些划分绝对化。原则上生意是国际化的。有竞争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菜场被某一集团占领，而另外一个集团也想在这个场地上做生意，那么就有可能产生利益冲突。这里集团同一性的因素当然起很大的作用，我同意您的意见，它加深了不同集团之间的差别。当在这块土地上发生不正当竞争，或者甚至发生犯罪的“暴力摆平”时，我完全不认为这就是“民族之间的冲突”。

问：在莫斯科有几十个民族文化自治机构在活动。莫斯科市市长和首都政府的其他领导人与它们紧密合作。您认为，这种合作的价值，合作的结果是什么？依您看，提出“为什么莫斯科没有俄罗斯族的民族文化自治机构”的问题是否合适？

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今天看来是完全不合适的。自治权是整体中相对独立的、划分出来的一个部分。如果有一天俄罗斯人在莫斯科变成了少数，那么这将不是莫斯科，很可能，不是俄罗斯，到那时就会提出俄罗斯族的民族文化自治权的问题。

莫斯科的俄罗斯族和俄罗斯文化，正是莫斯科文化的本质。这是所有居住在莫斯科的人的共有的精神港湾。在这个港湾里有单独的教育，相对于这个港湾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自治权的。我换种说法，这好比一栋楼房和楼房里面的房间。楼房不可能成为自己房间中的一间，但

房间是相对独立的，每一间房间都有可能按照居住者的兴趣陈设家具。（如果有人想把我关于房间的话理解得过于直接，那我就给他作专门的解释：在莫斯科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任何地域的自治权。）

与民族文化自治机构的合作价值正是合作的事实本身。一方面，莫斯科政府为居住在莫斯科的各民族做了所需要的一切。必须指出，这项工作是这样完成的，既没有用本民族语言教学的问题，没有庆祝民族节日和宗教节日的问题，也没有其他方面的问题。莫斯科是一座保证每个人权利的城市，不管他属于哪个民族。从另一方面讲，与民族文化自治机构的合作有可能更好地把各民族和各种文化的代表联合到莫斯科共同的文化空间中。

也许，在这里万能的处方是没有的。我认为，外来人员应当亲身承受相当显著的压力，包括莫斯科文化的压力、城市习惯的压力，还有法律和法制的压力。一个人在自己家里，在自己的房子里有权自作主张地生活，但与此同时他不能破坏邻居的平静、安全和权利。而在其他的、对你来说陌生的城市里，在异国他乡就得按照他们的法律，按照他们的规则来生活……要么就请回家去。基本的道德规范要求这样做。正是这些法律、这些规则，遵守这些法律和规则使得陌生的“房子”在移民者的眼中十分有吸引力。如果在陌生的“房子”里开始产生危害，那么人们就会毫不客气地把这样的“客人”赶出门外。而在这里与人权完全没有关系。

但也可能有另外一种情况。“自己的”房子成了反对

周围法律和法制环境（这个法制环境还不是理想的，不是没有缺陷的）的堡垒。这里会被居民看做和用作充满非法活动的地域。然后可以在民族自决权、主权、民族习惯等口号的保护下躲避风头。

我重复一遍，必须与这种侵略意向做彻底的斗争。我们法律的压力，我们文化的作用今天还很不够。为什么？不仅仅是因为贪污腐化。我们的社会还没有感觉到自己是社会。几十年来受尽摧残，筋疲力尽，刚刚开始苏醒过来，开始抬起头来。

问：近 100 - 150 年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在为民族自决权的斗争中，在为了宣布每一地域是自己的，并且，自己要去决定这一地域未来命运的斗争中，几乎血流成河。这种斗争至今仍然在世界上继续。的确，现在这种斗争通常是在宗教的旗帜下，说委婉点，是在对该地区独立感到无关紧要的武装力量的监督下进行的。也许，是取消民族自治权的时候了？今天在国际法中，民族自决权与国家主权原则有着同等的重要性。

在您的问题中关键词也许不是“自决权”，而是“地域”。自决权最终归结为什么？归结为人民、民族对某一部分陆地、海洋、矿产资源、空域的控制。这个原则乍一看很清楚、很公平。但当它实施起来的时候，就往往产生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一方面，不可能准确界定人

民或民族，也就是在空间上在民族之间划定界限，把一个民族与另一民族区分开。更简单一些说，在什么地方，沿着哪条线划定某一民族的边界。比如说，俄罗斯人在什么地方消失；“非俄罗斯人”（暂且这么说）在什么地方开始出现？在北哈萨克斯坦，在克里米亚，在第聂伯河左岸的乌克兰？我且不说通婚生下的小孩，因为，也许，除了地球上人类最不能到达的地方之外，在任何地域内这样的小孩都很多。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情况都是这样。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大家都能听到“自古以来就居住的地域”的问题。我虽然不是民族学家，但我想，除了日本之外，世世代代只居住一个民族的明确划定的“民族”“地域”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战争、移民、流行病、文化交流都导致了不同的民族定居在同一个地域。

在这一众所周知的原则下，民族和地域从来没有准确地结合在一起。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场合下，实现民族的自决权不仅过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现在和将来也会导致两件事情的发生：第一，导致民族“清洗”，其目的是要清洗民族的“肌体”，实际上就是保护自己的领地和资源免受“外人”的使用；第二，导致沿着这一“民族”“地域”的周围发生冲突和战争，因为必须确定“正确的”边境。

您瞧瞧，苏联解体之后发生了什么。在我国，其使命似乎是为了恢复公平的“关于恢复被镇压民族的地域”的法律，产生了多少新的不公平，以至于简直令人感到惊

奇！当立法者在本来就被冲突布满了地雷的俄罗斯南部地区又安装一个地雷的时候，他们不知在想什么？也许，他们正是在思考民族自决权的问题。

但我们和你们不是小孩。今天和 100 年前一样，剥夺了民族的自决权，也正是从这些民族那里剥夺的。别尔佳耶夫说过，民族是一个动物学的概念，它本身不能确定自己，因此，它的这一权力最后总是被代表人民说话的人篡夺。通常，他们既没有增加过多的教育负担，也没有被经常的心理平衡添麻烦。有人把这些“高度积极的人”叫做“精英”，有的人把他们叫做“假精英”。

当然，人民能够在民主组织进行的全民公决中表达和提出自己的利益，并且考虑到生活在这一地域的其他民族和人民的意见和利益。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生活与理想相距甚远。十分常见的是，代表人民和民族说话的是人数相当少的集团。这些人对自己集团的利益非常理解和熟悉，而且知道怎样去实现这些利益。对于他们来说，这种众所周知的自决权就如大旱之望云霓。他们，这些“高度积极的人”，公正地认为，成立哪怕是小的，但是自己的国家后，他们可以达到更高的地位。

在独立的俄罗斯，我们回忆一下车臣，在突然取得伊奇克里的名称的车臣，被宣告独立于俄罗斯。那里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我们回忆一下车臣的“车臣化”，加速用本地居民代表来组织行政管理机关和权力机构。他们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一些事物，实际上在那里进行了民族的“大清洗”，直到对俄罗斯人和所有的非车臣人进行种族灭绝。

同时在俄罗斯其余领土上的车臣人，不言而喻，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权利，他们可以自由地从海参崴迁移到加里宁格勒，或只是生活在梁赞州的某个地方。俄罗斯的政权面临什么样的选择？把所有的车臣人看成是外国人并剥夺他们的俄罗斯国籍？把他们驱逐出境回到“民族的策源地”，回到“民族领地”？

联邦中央走的另一条道路，那就是在俄罗斯领土的这一块地方恢复宪法秩序。在作为我们这个主题的附录，“宪法秩序”意味着什么？主要意味着，在车臣的和在俄罗斯其他地方的车臣人与所有不同民族的其他公民之间不存在界限。而且车臣人在全俄罗斯境内享有完全的权利与自由，而任何非车臣人在作为俄罗斯联邦一部分的车臣境内拥有完全的权利与自由……

因此，这种自决权早就应该按新的方式来理解其意义。权利的拥有者和主体应该是个人。个人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应当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平等的，而且应当逐渐地在国际范围内达到平等。不仅要写在宪章和宣言里，而且要在实践中得到实现。

当我们给某些大的社会集团（民族的、宗教的集团）提供特殊权利的时候，总是具有为了保护一些人的权利而牺牲其他人的权利的巨大风险。在这里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当我们偏重于任何少数人时，同时在损害大多数人的权利和利益。在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一个人的民族、宗教属性是他个人的事情。对国家来说，他是公民，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是带有作为一个公民的所有

不可避免的后果的公民。人们常常忘记，在法制社会权利与义务是不可分的。人承担他应有的一份义务（从纳税到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也就是说，他享有他所有应当享有的权利。他逃避，或者更糟，放肆无礼地拒绝自己的公民义务和社会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转入到与国家的另一种相互关系的体系之中。

当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向所有公民打开了克里姆林宫的大门。现在需要俄罗斯和整个文明世界，用符拉基米尔·维索茨基的话来表达，“像打开克里姆林宫的大门一样，打开所有的边境”。人员、思想、货物、信息的自由流动是必需的。也应该像克里姆林宫一样，流动的安全性应该得到可靠的保证。

这是不是奇谈怪论，但总的来说，为了实现这一社会制度的自由主义模式，需要拥有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国家制度和国家机器应该保证每一个人的正常生活，包括健康的居住环境、安全的生存条件、得到适当报酬的工作、正常的饮食医疗服务，失去劳动能力时的救助，能够得到有关所发生事件的正确信息，能够选择居住地，能够在国家领土上以及在国外自由地移动、能够创建协会，能够给政权机关以积极的影响，等等。

如果国家的制度只实现一个民族或一个民族的人民的权利，那么这将是一个民族主义类型的国家，这个国家最终一定会变成独裁。而独裁会以保护民族或人民为借口，毁灭每一个单独的人。通常，当国家很弱，不强大，当人们对这个国家失去了希望的时候，一个人才会去向同部族

的人，向同一信仰者寻求帮助和支持，这从根本上讲，就是社会发育不全的特征，甚至是倒退的特征。这就意味着，社会与当代生活之间“不协调”，它还没有融入进去，它在明天也就没有存在的余地。

○ 6 反文明的野蛮行为

问：亚历山大·勃洛克在著名的诗篇《粗鲁人》中面向整个欧洲，向欧洲人惊叹道：“啊，旧世界！当你在还没有消亡的时候，当你受苦辣酸甜的生活折磨的时候，极有智慧地停下来吧……”在《历史的更新》一书中，您有系统地、彻底地批评了西方世界，并用论据证明。似乎应该每隔10~20页就有一个“批判”，而紧随“批判”之后是一个按照“现实政治”的规律提出的反西方的建议，或像当年勃洛克所做的那样，宣布“粗野不文明的中立”。但这两种情况书里都没有。为什么？您认为，俄罗斯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吗？

我们从勃洛克开始谈吧，可以与他进行一番辩论。我觉得，他完全徒劳地过分强调了我们的野蛮，这种野蛮至今还令某些欧洲人害怕。我们来看一看，在书架上

放着勃洛克的作品。瞧（停顿），您告诉我，他干吗要画这种恶毒的讽刺漫画？

是的，我们是粗鲁人！是的，我们是不文明的人，我们有一双外斜视和贪婪的眼睛！

他威胁道：

我们沿着荒凉偏远的地方和森林
在美丽的欧洲面前
让出很宽的道路！我们把自己野蛮的脸
向您转了过去！

您知道吗，当希特勒开始“远征东方”的时候，他的宣传鼓动队用“亚洲汗国”吓唬欧洲居民。要知道，法西斯德国的军队好像曾经保护过“美丽的欧洲”免遭他们（指“亚洲汗国”）的入侵。米哈伊尔·罗姆在《平凡的法西斯》一书中发现，希特勒的电影摄影师在苏联俘虏中摄下了“具有外斜视的和贪婪眼睛的不文明人”。也许，这些翻译成欧洲语言的诗在一段时期里阻止了反希特勒同盟的形成？

我们往下读：

大家往前走，走向乌拉尔！
给含有科技进步成分的钢铁战车腾出位子，

让它们去与野蛮的蒙古汗国进行战斗！

据说，应该以毒攻毒。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在图书馆里寻找任何东西。因为半个世纪之后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回答了这些“粗鲁人”：

我们从边境开始把地球往回转动——

起初是个难事。

但我们的炮兵连长用脚一蹬离开了乌拉尔，

开始将地球反转起来。

最后终于有人给我们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夺回我们的每一寸土地和残羹剩饭，

但我们记得，太阳是如何向后出发

差点降落在东方。

……现在太阳在天空中正常行走，

因为我们急切地想去西方！

现在我们谈谈西方的文明与俄罗斯。

让我们不简化那些远不是最坏的人类智慧绞尽脑汁的最复杂的问题。

俄罗斯不应当机械地在两个极端之间做选择：或者“赞成”，那我们与西方在所有方面都是无条件的同盟军；或者“反对”，那我们不仅不是同盟军，而且在每一点上

都是敌人。这是极简单的判断。依我看，“西方文明”只有在与“非西方”文明的对立中才作为某种显而易见的东西而被接受。

如果我们看得更仔细些，那么西方文明的内部也是多种多样的。是什么东西把它联合在一起？经济体制的共同性、生活水平和由此产生出的共同利益。但生活方式、民族精神、文化不仅在美洲和欧洲，而且在欧洲内部都是不相同的。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大不列颠，如果不是独立文明的话，那至少也是一些非常独特的文化。

它们联合成欧盟，但只是在几十年前才联合的。而且这种联合起初是经济方面的，只是到现在才变成了政治同盟。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反对美国压力的对策——美国大众文化的压力、政治优势的压力和经济霸权的压力。

美国和欧洲有许多共同的宝贵东西，他们对人权的理解是相同的，他们有相似的政治制度原则。但这一切能把他们变成统一的文明吗？

现在我们来谈谈日本。这是怎样的一种文明？如果按经济类型和政治制度类型来评判，那这种文明是西方的，尽管这里在细节上，在细微之处有很多差别。如果按文化、语言、民族精神、历史来评判，那这种文明是独一无二的，很难找到类似的文明。

那斯拉夫人呢？他们绝对进入了“白人世界”。他们向往什么样的文明？请注意，我说的是“向往”，不是“属于”。答案是不同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相对的——文明、西方、粗鲁人。在艺术上，各有各的任务、规则和自我表现的手段；在实际的政策上，具有完全另外一种任务、规则和自我表现的手段；科学具有第三种任务、规则和自我表现的手段。每一个人都有可说的东西。

我是作为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来发表看法的。我强调，不是作为政治家，而是作为一个有时有机会不是在理论上，不是在哲学意义上，也不是在历史的时间范围里，而是极其实际地，“在这里和在此时”摆脱这些问题的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来谈论这个问题。

“粗野不文明的中立”听起来漂亮。但我担心，在这里第一个词会成为主要的词。然后要问，在谁之间或在什么事情之间的中立？如果是野蛮和文明之间的选择，那么有意识地 and 自愿地选择前者将是很奇怪的。但我想，真正的选择要复杂得多。

人类通史是各种文明形态的竞争。只有那种能够保卫自己的文明才有价值。这种文明延续的时间长，有不同的形式：和平的和军事的形式。最后这种文明的结局不是由列举谁发现和发明来决定的，而是由在历史长河中的这一时刻什么样的文明在保全，而且有可能是完善居住环境的同时以最佳的方式保证人的需求，既有一般的、身体的，也有高尚的、精神的需求来决定的。目前，在西方历史上形成的文明是取得胜利的文明。它在各地的普遍传播被用“全球化”这个词语来表示。与此同时，接受“西方文明”规范和范式的非西方社会在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时

都取得了成绩。“西方”很明显地向东方移位了——向包括日本和中国这些“亚洲虎”的东南亚移位了。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这是对我们暂且称之为西方文明的“简要描述”。

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差别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差别在于文化层次上的巨大的不可遏止的根本差距。这种差距至少从三个方面明显地表现出来。第一是差距事实的本身和它的规模。一些人想出来了，做了，掌握了，发展了那些在其出现之前另一些人还在慢慢摸索的东西。第二是大部分居民掌握所达到的水平的程度，即重要的是不仅有字母课本，有计算机或手机，而且大部分居民掌握了它们，或在必要时有机会而且能够很快地掌握它们。

从所有这一切得出第三点：这种差别令“野蛮人”那里产生一些感情，从嫉妒到仇恨，对那些富有这一切的人的仇恨。而“文明”的载体有这样的感觉：“野蛮人”是“不健全的人”，原则上他们不能达到文明人的高度，既然如此，把他们作为一个完全的健康人进行交往就毫无意义，他们也明白不了。可以教会狗熊骑摩托车，但只能是在马戏团，在街上它走不了多远，甚至是沿着毫无一人的街道它也走不了多远。如果“野蛮人”引起了哪怕是最小的一点威胁，那么“文明人”就可以、应该，有时是必须镇压他们，不管这事有多么令人不愉快。但这从来也不是我们的哲学。

人类，尤其是“白人”的特有经验积累形成了这些历史的和心理学的套语。美国是从消灭土著居民开始的。当

出现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时，他们就开始从非洲运进奴隶。

美国的经济和民主是由小集团——民族的、宗教的和社会的集团建立的。美国的宪法最初只在当时4%的美国居民中起作用，其余96%的居民由于各种资格和条件不受宪法的作用。只是到20世纪，特别是从60年代开始，美国才变成我们知道的这种民主国家。因此，顺便说一下，就产生了美国很多书所描述的“白人的罪过群体”，同时还有黑人的“优势群体”的说法。在欧洲也有自己的罪过群体。

我说这一点是为了强调文明的形成过程是何等复杂，它要占住多么巨大的时间段，要在这个过程中划出某些硬性的分水岭是多么艰难。当然，还要从“一堆乱七八糟的垃圾里”发展出我们今天的文明成就，也就是作为文明的绝对特征来接受的东西。

我们可以争论，在当今世界谁是野蛮人，谁是文明人，但我认为，有两点是不可争论的。

第一点是必须符合道德要求和实际：不能再次允许“启动”“种族灭绝”机制。不管这种机制用什么和怎样来证明自己有理，不管它是针对谁来进行的，我们都不能允许。要想宣布当前的这些“野蛮人”为“十足的不健康人”有很多诱惑，很多政治的，甚至生活的辩护理由，而且欧洲殖民主义者在对待印第安人方面有经验。谢天谢地，欧洲后来完全以另外一种方式处理了发生暴动的美洲殖民地。

另一点是，普遍以为，似乎文明是在野蛮人的进攻和

人侵下消亡的，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无稽之谈，是错误认识。不应过度缩小“野蛮人入侵”的威胁，但也不值得夸大这种威胁。

更常见的是，文明的瓦解是由于自己的问题和矛盾造成的，在这种时候野蛮人走了过来并占了上风。但与此同时，非常有意思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文明作为一种现象并没有消失！它发生了改变，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获得再生，并以另外一种面貌出现。古罗马先是以欧洲的面貌然后是以美国的面貌得到复兴，古罗马曾经在野蛮人的威逼下陷落过。但要知道罗马本身也是“野蛮的”古希腊人。东斯拉夫民族的独立性在摧毁金帐汗国之后也这样复兴了，已经是以另一种身份，作为强大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振兴起来。

1917年在莫斯科有近150万居民，我不知道，他们中有多少人牺牲在国内战争年代，在镇压的年代，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但我认为，有很多。莫斯科的人口出生率，在整个20世纪处于俄罗斯的平均水平或稍低一些。今天在莫斯科有1000万人。也就是说，今日莫斯科人的主要部分是外来人员，或者他们的父母和祖辈是外来人员，如果您同意的话，他们也进入了莫斯科的文明。

任何一个成年的莫斯科本地人都会对你们说，他记得城市文化急剧衰落的时候。街道的清洁卫生、礼貌、和蔼可亲的态度，迎面走来的人能够告诉您所要去街道地址，所有这一切在没有明显原因的情况下往下滑。后来，过了15~20年又慢慢开始往上走。今天那些在20世纪

20-30年代来莫斯科的人的儿女和孙子们本身早已成为了莫斯科本地人，他们回到莫斯科文明的昔日水平。显然，存在某种不能丧失的、产生于传统和民族土壤中的东西。

看来，这就是巩固和传承文明的机制。获得文明成果的民主化进程最初会导致总体平均水平的堕落，这对于处于受特别客观优待地位或处于最好地位的社会阶层来说是很明显的。然后，平均水平会重新开始增长。

可以把自己的“我不想”与这一机制的作用相对立，那么，除了“野蛮人”的种族灭绝之外，没有其他的答案。但可以试图把历史发展的机制“文明化”，这样说，依我看，将会更加符合时代的精神和道德标准。

“西方文明”有没有缺点？毫无疑问，有，而且有很多。可以且必须对它进行批评，主要应当批评它没有达到那些有可能实现的目标。

西方世界有很多消极的方面。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今天决定我们生活，决定世界面貌的一切，是从什么地方来到我们生活中的？科学、技术、机器、经济体制、生活设施、大众文化——从绞肉机到电脑和人权的一切东西？当然还有一些火枪、火炮、机关枪、导弹、原子弹等等。俄罗斯思想和发明，除了极少数例外之外，都以最佳的方式在西方世界得到实现。在最近几个世纪里，包括俄罗斯在内，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和文明，创造出了超过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式。

但不要以此得出结论说，好像西方世界比其他文明“更高”或“更好”。西方世界没有“建立”自己的历史、

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从我们不久前赋予“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意义来讲的。历史的自然把它带入到一个其结果在今天非常吸引人的发展方向。从进化的角度讲，西方世界简直“走运”，而且不是一两次走运，实际上是它在整个历史的长河中走运。

仍然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能不能在其他文化和文明中再现这种发展方式，为此需要什么条件。我们相信，也想相信，这是可能的。但只有时间能证明是否真的如此。

因此，与西方世界做斗争，加入另外一种文明，加入某种非西方的“力量”，对俄罗斯来说就等于自杀。相对于西方方案来说是没有更现实的抉择的。也许存在着多种乌托邦的文明方案。我把它们分为未来主义的和假历史主义的。第一种方案明白易懂，我们自己曾经试图实现它。乌托邦方案的优点是什么？它们描绘了没有缺点的文明。当然，具有缺点的和工作中出现疏漏的现在与乌托邦的理想进行比较时就非常失败。你们哪怕回想一下关于不惹人厌烦的“苏联服务”的笑话……

但也有假历史主义的方案。有一些人努力证明，他们的文明在过去是非常好的……我想问一问：这些文明为什么遭到破产？

没有“中国模式的”或“日本模式的”方案，他们也是不断实现的、有意识仿效西方模式的规划。目前与西方文明对立的乌托邦方案只有一两个了。然而，想实现这种方案的企图一定会以全面的暴力和经济的萎缩结束。

如果我们想明天生活在更完美的世界，那首要的条件是保持和增加现在拥有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即所有西方世界的成就，也许是那些使它们成为可能的东西：经济和社会关系。但要尽可能地避免那些也产生于西方历史中曾经是西方发展的“不好的方面”的内容、缺点和毛病。

西方世界不是“本性固有毛病”——“本性固有毛病”的观念是在东正教与天主教之间斗争的影响下产生的，并得到许多世纪的宗教互不接受这一状况的巩固。20世纪，在这一基础上又增添了两种体制（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矛盾。它也是一种特殊的宗教战争。所有这些遗产还遗留在我们的脑海里，而且很深，在下意识里。

对于作为行政管理机关工作人员的我来说，西方世界是很有意思的发展类型。也许可以把它称为到今天为止取得巨大成功的公司。首先，我想知道，这个公司是怎样构造的，是如何运转的，它是怎样，而且为什么能取得现有的成绩。我想在弄清楚他们取得成功的秘诀之后，在自己家里来重复这一成绩，不是机械地将它搬过来（只有那些没弄明白，不能够，也不想做成这件事的人才会这样做）。我们必须不重复，而是要把教训和理解应用到今日俄罗斯。为了弄清楚，不仅必须最大限度地清楚和诚实地看到“西方公司”的成就和强盛的方面，同时也必须看到它的不足之处，首先是体制上的弱点。

我批评的意图正在于此。努力吸取正面的和宝贵的东西，而不是把什么都拿过来，尤其是不要把这儿经常

出现的最坏的方面拿过来。

坦白地说，我越来越坚定地认为，为了保障自己成功的进化，俄罗斯必须加入文明，它包括欧洲、美国和加拿大等等。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具有历史前景的、地区经济的、地缘战略的和全球化的方案。

……简直成一个讲座了。

问：尤里·米哈伊洛维奇，现在最流行的词组是“文明世界”。人们经常将它作为“西方世界”、“西方文明”的同义词来使用。您是否同意将它们视为同一？要知道还有一个关于“黄金十亿”（世界上富有的十亿人口）的观念。按您的理解，什么是“文明世界”，“文明国家”？俄罗斯是文明国家吗？您认为，文明世界的领导人（指的不是国家，而是指领袖们，指人）应当符合什么样的标准？

我绝对不同意把它们视为同一。根据最严格的要求，文明世界暂时根本就没有，我们大家都面临着去建设它。我们都有业已开始并需继续做下去的工作，需要做“施工现场的准备”。我不同意，还因为我习惯于思考所用词语的意思。

我不追求给文明下一个自己的定义。我想，从上面所说的应该看得出，我讲的文明是指历史形成的民族、领土、信仰和精神、文化、生活方式、历史和社会经验的统一。指的正是历史形成的，即不是产生于昨天，不是根据

战争的结局，不是根据政治决定和政治命令产生的。西方的国家和民族经过很多世纪获得了相对的统一。俄罗斯也有这样的统一，但我们不会忘记自己的、在另一基础上形成的，不仅形成于与莫斯科汗国的斗争中，而且形成于与欧洲、亚洲或强国的斗争中，形成于最艰难的国内斗争中的统一。

“西方世界”是一个政治概念，是指由对自己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对人权、对组织世界秩序的途径、对作为整体的全世界的进一步发展的共同看法联合起来的国家。但马上就开始有意见分歧。如果把所有赞成那些原则和方法的国家都归为这样理解的“西方世界”，但它就不是什么“西方的”。属于它的还应该有日本、印度、俄罗斯、拉丁美洲国家和许多亚洲的、非洲的国家。

如果在“西方的”概念下只理解为用政治的和军事的同盟组成自己的统一体的世界的那部分国家，那么这就是欧洲大西洋共同体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众所周知，俄罗斯没有加入这个共同体和北约组织。它发展与这些组织的伙伴关系，越来越多地开展合作，但没有加入。这种伙伴关系和合作的事实本身就强调了，我们的关系正在密切起来，与“冷战”时期相比，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已经非常近，但还没有融合到像今天西欧和美国的那种程度。很可能，这在将来会发生，但很明显，不是在明天。

现在来谈谈“黄金十亿”。不必过于夸大这一概念的意义。“黄金十亿”，这不是术语，这是不同的人赋予不同内容的形象，没有共同的准则。根据什么样的特征把一些

国家和民族列入那里？如果按照收入和人均生产总值，那么进入“黄金十亿”的不仅有那些由于总体发展水平的缘故这些指标很高的国家，而且还有一些开采很多石油（尽管在那里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发展）的，甚至大量种植加工毒品的小国家。最后的这种情况，正如常言所说的，一点文明的气息都没有。如果我们把联合国的，考虑到教育的平均水平、生命的寿命和一系列其他社会参数的“人类发展指数”作为基础，那么情况将是另外一个样子。

我没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更喜欢哪一种情况。我只是想阐明这样的思想：“西方世界”、“西方文明”、“黄金十亿”、“文明世界”是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交叉，但在本质上又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们绝对不是同义词。

在这里俄罗斯的位置在哪里？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在近一年半里她处在150个国家中介于第56和第71位之间的某个地方。也就是位于上三分之一和中间之间。“黄金十亿”是指最上面的30个国家。而我们处在60-70的位置。这说明了一切问题。但这是对社会经济的评价，虽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评价。

把俄罗斯叫做“不文明国家”有些说不出口。20世纪初在德国出版了福·利斯特的书《系统阐述国际法》，该书成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对这一问题看法的反映。1912年这本书被译成俄语并在德尔普特出版。在这本书里，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被分成文明的国家、半文明的国家 and 不文明的国家。文明的国家是指在文明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应当排除使用武力（我提醒一下：此时离第一次世界

大战只剩下几年)；半文明的国家是指如果其他措施对它们不起作用就可以使用武力来对待它们；不文明的、野蛮的国家是对于它们使用任何影响的手段只受到基督教教义和普通人道主义的限制。按照这一体系当时的俄罗斯应当归入“半文明的”国家。

我坚信，完全意义上的“文明世界”仍面临着建设。只有当文明停止使用不同的标准（对自己是一种，对“别人”、对“不文明人”是另外一种）的时候，文明世界才可能产生。这个任务是整个21世纪的任务，如果不是更长时间的话。这样的世界应当建立在国际法的基础上。它应当从承认人权和实实在在保障人权的立场出发。它应当实行民主自治。但最主要的是，它的出现应当是所有相关国家和民族共同创作的结果。我们通过自己的悲剧经验了解到，用强制手段、棍棒底下是不能使人得到幸福的，类似的企图只会以大规模的流血、痛苦和极难看的场面结束。

苏联的经验不仅是对于俄罗斯，而且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教训。不应当把它作为某种特别的东西来理解与接受：他们说，俄罗斯强烈地感受到极权政治带来的痛苦，它不会威胁其他人。还要怎样威胁呢！极权政治与任何“文明世界”都不能并存，因此建立这样的世界是最艰难的任务。

未来文明世界的领导人应当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我想，他们应忌用所谓的“超凡绝俗的能力”。顺便说一下，“超凡绝俗的领袖”也是对他所“领导”的人的评

价。如果人们有“超凡脱俗的能力”，那文明在这里又何干呢？我想，未来的领导人没有什么“超凡性”。我们需要诚实的、职业政治家，懂行的专家。需要善于寻找，且能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的人，能够证明自己正确、把民主通过的决议付诸实现的人。他们应当是全民族水平的管理者；不是远离意识形态的糊涂，不把自己的无能管理国家归咎于历史的“阴谋诡计”或国际政治局势。如果谈及“黄金十亿”，那么那些尽力使某一领袖所代表的人民留在“黄金十亿”或加入“黄金十亿”的人都可以成为未来文明世界的领导人。

问：最令人吃惊的是，对于像1999年和2002年阴暗的秋夜发生在莫斯科和2001年9月11日火红的早晨发生在纽约的事件，居然还存在着对这些罪恶行径辩护的逻辑。按照恐怖分子的观点，那些牺牲的人不完全是人。这些恐怖分子到底认为我们是什么人？什么东西使他们完全相反地看待那些在莫斯科、纽约和其他几十座城市牺牲和遭难的人们的痛苦和忧伤？使用您在《历史的更新》一书中的表达，当“一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全球的”“世界的”战争，尤其是认为战争是福利的民族和文明进入世界历史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怎么办？

让我们来区分一下：一方面是民族和文明，另一方面是具体的恐怖分子。的确，很多民族，甚至文明不知道世

界大战。这种无知本身不是什么罪过。

而那些认为战争是福利的人，我们未必能够把他们重新教育过来，我们可能来不及，他们早就对我们和我们的人道主义恨之人骨，想把我们和我们的人道主义消灭掉。我们对于他们这些恐怖分子是什么人？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曾经说：“我们对他们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灰尘。”例如，某些作为瓦哈比派信徒的恐怖分子从圣书中扯出某些单独的短语，这些短语是论说“异教徒的”，论说基督教徒的（基督教徒“如同畜生”，他们是“真主学说中最差的人”）。也就是说比蟑螂、苍蝇和蝎子还要坏。可以，而且应当炸死他们，杀死他们……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恐怖主义获得某种新的性质。这一点莫斯科、纽约、遥远的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当然，还有车臣都感觉到了……以前恐怖主义是实用的、讲求实际的。也就是说，每个具体的恐怖行为都追求一种具体的政治目的或军事政治目标：消灭政治活动家、要求完成一些条件或要求（如：从监狱里释放某一派别的战斗队员），最后就是简单地展示一下自己行动的质量。现在越来越多地发生一些不公开声明，不提出要求和日宣布恐怖制造者的恐怖行为。

致力于成为文明人的全人类，包括一些“西方化的”穆斯林，在这些恐怖分子的眼中是集体错误的载体。也许是因为十字军远征，也许是因为殖民主义战争，也许是因为不愿意按中世纪的法律生活。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不想让原教旨主义统领全球？……我们成了血腥报复的对

象——表现与人类个人责任文明原则相对立的极简单的野蛮习俗，这种个人责任在每一具体场合都必须被确定和证明。很典型的是，恐怖分子在出庭受审时马上就会想到个人权利，想到人权和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您记得吗，关于在关塔那摩美军基地关押塔利班俘虏的事流了多少眼泪！这里谈的不是关于臆造的“文明冲突”，而是关于文明与野蛮的真正冲突。

这些野蛮人相信，自己在“圣战”中与“异教徒”一起牺牲的话，他马上就会进入天堂——这是瓦哈比教派传教士违反伊斯兰教传统教义灌输给他的。顺便说一下，美利坚合众国在正在进行的世界反恐战争的过程中始终不渝地在一个“战线”上进攻，即他们要求从沙特阿拉伯（不只是那里）的中小学和大学教科书中清除所有涉及“异教徒”、“圣战”和给领导“圣战”的人以“天堂的奖励”等内容。

这种新的野蛮行为威胁着文明的存在与和平本身。如果核武器落到恐怖分子的手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国际恐怖主义把战争强加于人类——人们已经把这一战争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一战争会在世界的不同地方进行。

要知道，重要的不是他们怎样看我们，重要的是我们怎样理解他们，评价他们，通过什么途径寻找出路、寻找解决问题的手段。从根本上来讲，思考一下许多习惯性认识、感情方法的另一面是没有好处的。我们在把全世界分成“文明”与“野蛮”的时候，我们应当把某些人归为

“野蛮人”。但是，在指出那些根据我们的理解处在文明界线之外的人时，我们也在为把同一种方法用于我们自己本身创造道德上的和政治上的先例，而且不仅仅是从“野蛮人”的方面。我们回想一下纳粹，它认为斯拉夫人是“劣种”人，应当消灭。我们是否相信，类似事件的重复是不可能发生的呢？

依我看，在“文明”的内部有两种野蛮行为。第一种是单干者，他们拿起刀、手枪、炸弹就去杀人，为了什么目的无关紧要。这些人的社会危险性极大，他们中的一些人患了严重的心理疾病。必须把他们与社会分隔开。即使这种“野蛮人”才刚刚准备，还没有来得及实施犯罪或者没有成功。如果悲剧发生了，那么等待这些人的是终身隔离监禁，个别情况处以死刑。这就是有关单干者的情况。

但还有另一种野蛮行为：当人们沿着经济的科学和技术的梯子走得相当远的时候，他们往往为自己的极端残忍找到宗教的、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的，甚至是道德的辩解理由。当文明本身在自己存在的某一阶段分裂成文明和“文明的野蛮行为”，在历史上这往往是结束的开始。为什么我们或西方世界深信，我们“在文明方面是永垂不朽的”？

恐怖主义是社会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是复杂的、职业化的、要求高度组织性的和花费很高的活动领域。如果要认真地与它做斗争，那么这种斗争的目标首先应当是产生恐怖主义的社会现象、社会机构和社会机制。

有人可能会反对：那些绝望的、失去孩子和亲人、在

自己身上缠上炸药去炸公共汽车的人们有什么样的职业技能？我的回答是：甚至也有人培训他们干这种事情，从心理上和实际操作上进行培训。必须会做这种事情。那些把殉教者派往在图希诺举行的聚集了几万年轻人的摇滚音乐节的人考虑的不是这些女人，而是使全国大选前夕的莫斯科局势不稳定。在这种不稳定局势的背景下能够解决各种政治问题，甚至经济问题。

但事情还在于另一方面：为了让这样的女人和她的牺牲品走向死亡，有人应当去购买或偷窃炸药，有人应当把炸药运到需要的地方并将它准备好，有人应当搜集必要的情报，有人应当培训这名妇女，最后还得有人为整个行动筹措资金。所列举的一切可以用一个词语来形容：组织。

不仅要与实际操作的恐怖分子做斗争，而且首先要与创建类似组织、支持和投资这些组织，为它们培养骨干的人做斗争。这一任务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不去进行这样的斗争而去猛烈地抨击某些民族，那些恐怖分子的赞助商只会感到非常幸运。我们的强力部门会大批地开始把注意力分散到完成一些昂贵的与事情无关的任务中去。对人民的镇压会增添很多恐怖分子，会给他们在社会上建立支持和可依靠的力量。我还可以继续讲……

相反，应当全力以赴地、千方百计地培养人民、宗教与以他们名义活动的恐怖分子之间的疏远。只有保证人们的安全和保护他们的权利，才能使人民转而反对恐怖分子，从而达到与恐怖主义这种现象做斗争的更大效率。

也许，应当更加严肃认真地对待为各种特种部队培养

干部的工作。我不想伤及或得罪任何人，不想探究这种非常专业的问题。但，依我看，在某一阶段发生过大量需求这样的骨干的情况。究其原因，一部分是“冷战”，一部分是很多国家国内发生的事件，其他因素也起了作用。但无论哪种情况，在很多国家这些事件都导致了选择原则和选择标准的下降，因为经费不足，经验不够。而恐怖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变得越来越巧妙，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参加。

问：莫斯科已经不止一次地亲身体会到国际恐怖主义的进攻。您是市领导，是与现代化莫斯科的形象不可分开的人。每一次这样的打击就是对您心脏的打击。现在的卢日科夫与莫斯科遭受恐怖袭击之前的卢日科夫有什么区别？

幻想变得更少了。教训是沉重的、深刻的，无论是从恐怖分子那里，还是从那些后来想要城市对所发生的事件负责任（包括物质方面的责任）的人那里得到的教训。

第一，我弄明白了，恐怖主义是一种独立现象，它不取决于你对恐怖分子或表达他们利益的人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说得很复杂吗？我讲的是，与现代恐怖主义做斗争不能采取和解的政策，放任的政策。

第二，玩弄政治手腕的和解手段也几乎不能带来任何结果。恶事应该针锋相对，不是在事件发生之后，而是早在萌芽时期，当有人开始想到要实行暴力的时候就应该铲

除它。不管这种企图用什么来为自己辩解，包括利用对古兰经的原理接受得不好或理解不正确的借口。

第三，必须有经常在部门之间演练的机制，这种演练主要针对在恐怖活动和在恐怖袭击之后必须采用的综合回应措施。计划这样的事情很难，但不计划就是犯罪。我们不能阻止每一个“人体炸弹”。恐怖主义作为一种现象仍然存在，它的组织者病态的幻想仍然在起作用。城市、国家及其所有职能部门都应当不仅在心理上，而且在实践中做好应对任何意外事件的准备。我不能指责城市应急部门的任何东西，因为在过去的事件中它们从整体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不能，也不允许高枕无忧，吃老本。

从这里便产生出第四点，必须承认，我们进入了这样一段时期，在这里恐怖主义战争变成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现象，孤立的袭击能够攻击到随便哪个人身上。你不可能在每一米的地方安排一个警察或士兵，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首先是每一个领导人，不管他担任什么职务，都应当“替恐怖分子好好考虑”，在什么地方有可能发生什么事，他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把这类事件发生的几率降至最低限度，如果这种打击仍然发生了，他又应当做什么。

如果在战争中无忧无虑，就会受到死亡或失败的惩处。必须使这种思想深入到每一个人，引起同样的反应。不是说我们又一次处在被包围的要塞里（即使要塞里坐有恐怖分子），而是讲，在现代化的、发达的和舒适的社会里，生活要求你有技能、有责任和进行努力，就好比不能

把没有经过训练的人作为旅游者送到国际空间站去。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性城市”的所有居民也居住在宇宙空间站里，而他们的行为举止常常就像宗法制农村的居民，在那里最大的威胁是粗野的公牛。

最后一点，但几乎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现代生活中的主要威胁不是恐怖分子，甚至也不是缺乏专业知识的傻瓜，而是贪污腐化。它与现代生活所要求的责任（从管理国家到遵守公园里娱乐设施的安全操作说明）本性所固有地不相容。要么是我们战胜它，要么是这种铁锈腐蚀整个现代社会或使它变得没有生命力。

“诺德—奥斯特”事件之后的卢日科夫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在履行自己的直接责任时最诚挚的同情可以，而且应当与严格的要求相结合，与对自己、对同行、对邻居、对部下、对上司的严格要求相结合，不纵容，不对懒惰和良好关系打折扣，降低要求。

问：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您谈到了城市的物质责任的主体。因为一般的恐怖主义问题，尤其是国际恐怖主义无论在明天，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多半不会消失，依您看，谁，应该怎样赔偿恐怖行为对受害者造成的损失？他们应该向谁提出起诉，向谁求助，向谁索赔？在这里，城市的责任，联邦政权机关的责任和私人机构的责任之间的相互关系应该是怎样的？一般来说，提出任何一级政权机关都对恐怖行为带来的损失负有责任的问题是否合理？

合理，提出问题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必需的，但关键是怎样提出，为什么提出。

的确，恐怖主义在可预见到的未来不会消失。我大胆地预测一下，它甚至会采取更加多种多样的、破坏力更大的形式。也就是说，应当不仅仅按照特工机关这条线建立抵抗恐怖主义、消除恐怖主义后果的系统——这一点我将不涉及。

需要有国家对公民、对社会、对地区负实际责任的体系。没有这种责任，就不可能产生对国家、对国家的意图和行为、对国家代表者的权威性的信任，甚至在没有任何理由不信任它的时候都会如此。

在民主国家中，国家服务于人民，与人民处于所谓的“社会合同”的关系中，在这里所有的方面都有自己的义务。国家有自己的义务，人民有自己的义务，法人有自己的义务。违反其中一方的义务就会向法庭、向仲裁机构提出申诉，为向社会舆论提出呼吁建立基础，社会舆论往往成为公正、公平的最高衡量标准。

否则，这就已经不是法制国家，也不是民主国家。

如果犯罪分子成功实现预谋好的凶恶行为，也就意味着国家在某个地方没有完成自己对社会、对具体的、遭受罪恶行为灾难的人们所承担的义务。也许，要求国家辨别出和及时使每一个孤立的恐怖分子变得不具有危害性是不现实的。但如果说的是一个组织的活动（占领“诺德—奥斯特”的50个恐怖分子，这无可争议，是个组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整体的国家负有承担错误的责

任。我本人不会怀疑这一点。

但国家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另外一个其他城市或联邦主体都不能发现建立在相距它们很远的俄罗斯的一个地区或建立在国外的恐怖主义组织。它们甚至不能够只凭借自己管辖地域上的武装力量有效地与恐怖主义做斗争，因为这样的斗争需要全国范围内的机构协同作战。

同样，法律在明确划分国家管理不同级别的权利（从联邦的到城市的）之后，应当同样明确地指定它们中的每一个级别对不应该履行的义务负责的程序和界限。今天这样的条款在法律中太少了，而主要的是，甚至已经有的条款也很少有效地发挥作用。

“诺德—奥斯特”的悲剧，保安、剧院的工作人员不能真正地抵抗 50 个恐怖分子？提这个问题是狡辩。交通检查岗、警察能不能发现和阻止已在行进中的载有恐怖分子的公共汽车？从理论上讲，他们能够，也应当阻止，但实际上未必能做到。对有组织的恐怖主义应当有一个更具组织性的，分设有地方机构的和有效发挥作用的国家安全系统与之对抗。不仅有交警局的工作人员，而且还有早在刚开始出现的阶段就发现恐怖组织的安全机关系统。他们都应当去迎击匪徒。但遗憾的是，没有出现这种局面。而恐怖分子是怎样成功地潜入莫斯科，把枪支和炸药带到这里准备犯罪——这不仅是针对城市提出的问题。更准确些说，不单是针对它提出的问题。

令我本人感到惊讶的是，为什么针对所有震惊全国和

莫斯科的恐怖行为的结果没有任何人（即没有党派、社会力量和社会运动，也没有立法者、政府部门）做出努力，去研究建立我们共同责任的有效系统。

这种系统，不是像某些激进人士所说的，是为了“惩罚国家”才需要的。它的目的是另外一些：建立能够提高所有国家管理部门的责任感的反馈联系，并以此提高作为整体的系统和在系统的每一级别上（联邦的、联邦主体的和城市的）的责任感、控制性和有效性。而且为公民和国家本身建立独特的“保险”体系（用于这一概念的最广泛的含义），使他们免遭带来最大的精神和肉体损失的恐怖行为的后果影响。

不言而喻，必须仔细考虑好赔偿损失的原则。在民事赔偿案件中通常只赔偿得到证明的损失，错过的利益以及有根据的精神损失。

但是在国家责任的情况下，应当考虑到民事赔偿案件中没有出现的一些原则。首先，在向国家或各部门、机构提出起诉时，不允许提出能够从本质上削弱、动摇国家的地位或导致它们事实上垮台的要求。如果目的是想不惜任何代价最大限度地“惩罚国家”或它的具体机关、机构，“报复”它们，发泄愤怒，类似的情绪从感情上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作为做出决定的基础。更令人忧伤的是，当“对国家的诉讼过程”是由一些追求个人利益的人组织的时候，是当恐怖行为的牺牲者被用于政治目的或商业目的的时候。只有强大的国家才能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削弱和动摇国家，我们将使那些明天需

要帮助的人失去必要的帮助。

显然，国家对恐怖主义的后果和其他犯罪行为所负的责任不能，也不应当以牺牲社会义务来实现。遭受恐怖袭击的人有权，也应当得到帮助，但这种帮助不应当是靠退休人员、学校、幼儿园或医院来进行。否则所有沉重的后果，都将由这些今天在我们社会最没有保护的那些公民和组织来承受。当违背法律和常理向莫斯科提出数百万的赔偿时，也许他们暗指城市比较富足安康。的确，首都是很富裕。但如果我们给每一个受害者都支付几千万卢布，就像辩护律师要求的那样，那么明天交通就会开始运转不规律，就会拖延支付工资和退休金。他们这样提出问题，不但蓄意破坏了国家财政的稳定性，而且把注意力从那些组织恐怖行为的人身上，从那些帮助这种罪恶来到这个地球上的人身上转移开。因此，在建立国家的，也有可能是私营的保险基金时，必须考虑，还有一个补充基金的来源——与恐怖分子基础设施有关的一些组织和个人的资产。

我们暂时生活在远不是理想的社会。未来关于对恐怖主义所造成的损失负责的法律应当表述准确，要使图谋不轨的人不会产生企图、不产生操纵这一责任的可能性。至少必须诚实地和直接地把这一任务列入众多的任务之中。否则我们大家将只会在恐怖分子面前削弱自己。

○ 7 什么是安全？

问：您几乎就像联邦安全局局长一样谈论“安全”问题。在您的话语里，几乎都是一些关于安全体系和防御威胁所需措施的职业化的表达。但您是上千万人口城市的市长，看来，您应当以另外一种方式对待这个问题。对您来说，什么是莫斯科的安全？

用一句话确定不了。也许，关于这一主题必须写整整一本书，书名叫《超大城市的安全，莫斯科的经验》。“安全”是多方面的、内涵很广的一个概念。我作为首都的、世界性大城市的市长，首先应当系统地对待它。

首先，城市应当存在、成长、壮大。为此，城市的安全应当是可靠的。如果有必要时，如果条件和形势要求采取行动，那么安全就是珍贵的，但此时也必须是高效的。安全措施不应当把城市变成被包围的要塞，把莫斯科人变

成没有权利的和顺从的、如果不带护照上街去买面包或报纸就会有危险的人。安全措施不应当摧毁城市，不应当使城市失去发展前途和发展的动力。

安全有很多级别，这些级别不仅彼此相关联，而且在历史上和功能上分属不同部门。以为只有联邦安全局才负责安全事务，这是不对的。在这里内务部、紧急情况部、军队和许多其他非强力部门都有自己的安全功能。对于联邦的各部来说，活动范围是作为整体的全国，其中包括首都。对于莫斯科市长来说，一切都集中在首都，但一定要考虑到全俄罗斯的“背景”。就是在这极细微之处蕴涵着对这一问题理解的关键，即对市长而言安全问题是什么？

莫斯科是俄罗斯的首都。如果有想袭击全俄罗斯，削弱我们国家的力量，来威胁我们的人民，那么最经常发生的是他们会致力于打击莫斯科。在这里，这种打击将马上被发现，会传遍全世界。莫斯科局势的不稳定——这不仅是对莫斯科市的打击，犯罪分子多半不考虑莫斯科市本身，这是对全俄罗斯，对她的领导人的打击。如果您愿意接受的话，这是莫斯科在俄罗斯所处地位的代价，是对首都功能的一种独特体现。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生活在这样的地方。

我认为，人的安全总是应当摆在第一位。归根到底整个复杂的安全结构都是为此而建立的。如果人感到很平静、安定，也就是说，在城市里，根据最严格的要求，一切都很正常。

对于莫斯科人来说，安全就是一种信心，相信无论是

在家里、在单位，还是在公共场所，他和他亲近的人身上都不会发生任何悲剧。不会被打死，不会被致残，不会发生天然气爆炸，不会成为恐怖分子的或匪徒“械斗”的牺牲品。当然，我们都清醒地意识到，原则上没有绝对的安全。但在日常生活中必须有安全感。

对于市长来说，安全也具有同样的内容，只是增加了一千万莫斯科人和几百万外来人员，再加上其他的许多东西。所有城市基础设施应无事故运转（包括天然气管网、下水道、自来水供应、地铁和地下公共设施），这是莫斯科生产企业的技术安全。保证城市的安全，这是特工机关和执法机关每天的、看不见的和不引人注目的工作。安全，这是所有城市专门的机关（抢险救护、消防和医疗“急救”）的时刻准备和职业化。这是能源供应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没有它，其余的一切就会立刻停止；这是公共交通的稳定和可靠的运营，没有它，城市在两个小时内就会窒息而亡；这是城市的金融安全，是对形成预算来源的信心；是一种有把握规划未来，不是半年、一年，而是5-7年，甚至很长时间的可能性，否则就不可能有宏伟的城市发展方案；这是社会系统（卫生、教育、退休部门）的稳定工作；这是不断改善的健康的生态环境。

我想强调一下的是，所有这些部门在莫斯科都运行得相当准确和职业化，它们从整体上可靠地保证了城市的安全。

但这一切还不够。城市不应当只是简单地抵抗潜在的威胁和危险，而应当消灭悲剧的后果，如果悲剧发生的

话。这一切是必须做的。但这一点可以用一个词语来形容：生存下来。城市，尤其像莫斯科这样的城市，不应当只是生存下来，而应当往前走，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成为俄罗斯经济的发动机，成为我们整个生活的发动机。

因此，对莫斯科的安全要求是特殊的。我们应当对自己举行大型社会行动、活动的 ability 绝对充满信心：从举办露天音乐会、政治会议、联欢节、节日庆典到奥运会。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外国人（包括旅游者、大学生、公务人员）都不应当因担心自己的安全害怕来莫斯科。在这里外国投资者应当是安全的，包括他本人，他的权利和资本的安全。莫斯科市也参与履行俄罗斯相应的国际义务。

好像专家们把所有这些非强力的安全（财政经济的、生态环境的等）称为“软安全”。毫不夸张地说，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也没有发觉，他每分钟都要碰到这种安全。如果人没有发现“软安全”，不用去想它，那就表明这种安全实实在在地存在。我认为，城市和它的部门的决定性功劳就在于此。

我大脑作出这样的推断：即使莫斯科不是首都，莫斯科人的安全问题也会好得多。主要因为，这些问题的性质将会是另一种样子，将会更加容易地用城市自身的力量对抗这些问题。

但除了“软安全”以外，还有“硬安全”。这通常使我们感到最不安、最恐慌。恐怖主义与犯罪，尤其是有组织犯罪，在民族、宗教和其他基础上有预谋的大规模动荡，等等。议论危险的事情不是偏执狂。只要提醒一下发

生在纽约的事情就足够了，当时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塔楼被摧毁；或者在日本东京发生的事情，当时在地铁里实施了毒气弹破坏活动。莫斯科是一座开放城市，将来仍然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对莫斯科来说，人员的集中是自然的事情，而对恐怖分子来说是梦寐以求的目的。

近年来，莫斯科经历的事件——居民楼的爆炸、普希金广场地下通道的爆炸、占领“诺德—奥斯特”剧院和那里130名人质的死亡、图希诺摇滚音乐节的爆炸——所有这些都是“硬安全”。

老实说，城市本身为保证自身的安全，靠自己的力量能做的事情不是很多。莫斯科市没有自己的侦察机构，没有自己的强力部门。但有警察局，有能够更有效工作的地段督察体系，我们正在努力做到这一点。有警察局的特种部队，他们是在事件已经发生或几乎成为不可避免的时候介入事件。大概就是这样的状况。

在强力领域，莫斯科市还不能提前行动，尤其是不能提前很长时间行动。当然它不应当这样，这不是它的任务。在这方面我们完全取决于联邦强力部门。我们依赖于他们，而他们不依赖于我们。他们自己内部之间的协调，按全部情形来看，不是最好的。由此，结果显而易见。

我们已经在前面说过统一责任体系的必要性。不仅莫斯科市与联邦部门之间，而且安全部门之间需要工作上的相互配合。这种相互配合是人们安全舒适的生活，是我们全社会一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当然，现代城市的所有体系在建立之初就应当建成既

能抵抗恐怖主义，又能应对其他非常情况的体系。是的，很昂贵，但这种保卫不光适合抵御恐怖分子。为什么一个酒鬼或一个做事太马虎的人能够利用生活用天然气的爆炸摧毁整整一个单元，而城市应当为此直接和间接地付出代价，受到处罚？！顺便说一下，在莫斯科的新区已近30年拒绝使用生活天然气，因此急剧降低了这一问题的压力。

其次，当整顿基本秩序的措施给遵纪守法的人制造不便、麻烦和问题时，恐怖分子和其他坏蛋就会有干自己的罪恶勾当。在我们的整个体系中，有些东西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问题应当在完全不同类型的公民那里产生，而实际结果是，事情虽然简单，但非常可怕。犯罪分子不惜任何代价把枪支弄到手。犯罪分子绕过法律，设法获得证件和注册，去诈骗，去贪污，什么都干。奉公守法的、生活中遇到很多常见的困难和问题的公民，为了减少麻烦，被迫采取许多变通办法，结果是在秩序和违法行为之间形成一条“灰色地带”，在这个“灰色地带”里，感觉最好的是浑水摸鱼的人。

问：2001年9月11日在纽约发生的事件和2002年10月23-26日在莫斯科发生的事件，都表明世界性城市在反对恐怖主义破坏性进攻方面缺乏保护性。怎样在民主体制的环境下保证可以接受的安全水平？是否存在甚至为了保全人的生命都不能逾越的限制权利的界限？如果有的话，它在哪里？

您提及的悲剧性事件是纯粹的恐怖主义。犯罪分子的特别卑鄙在于，他们攻击没有保护的地方，攻击无辜群众集中的地方，这些群众与恐怖分子的真正委屈或虚假的委屈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没办法保护自己免遭打击。至于谈到那些有可能发生恐怖破坏活动的目标，在我们这里已经得到精心的保护。

关于安全措施与个人权利之间的界限问题我已经讲过了。当然，这种界限是有的。但这一界限在什么地方，从理论上指不出来。每一个人（从人质到最高领导人）在具体的情况下自己做出决定。

在莫斯科，安全部门、执法部门为了预警恐怖行为做了一切可能，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关于预防措施你们说得对，这是独特的城市环境。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也许是心理性质的问题。如，被预警的恐怖行为最终可能并没有发生——说有就有，说没有也就没有。可能有吗？唉，有可能还没有……有人说，它们是安全部门杜撰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工作。大概，这是对有关被预警的恐怖行为的报道做出的最广泛的反应，如果这些报道被民众接受的话。最常见的情况是，它们将写进警察局和联邦安全局的综合报告中。

另外一个情况是，但愿不要发生的时候，恐怖行为发生了。这里有强烈的社会反应，会大声地宣称，恐怖主义是真正的危险，必须与它做斗争。但斗争必须不是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后沿着他们的足迹去清理堆积物和掩埋死者，而是在警告有可能发生恐怖行为的同时进行。

为此人们有自己的方法论。有时候我们在遥远的南方国家工作的侦察员和外交官会得出结论说，在我们莫斯科不会有炸弹爆炸。但从另一方面讲，我们还是必须检查引起警察注意的过往行人的证件和在地铁里进行检查。这既激怒了被检查的人，也给被拦住的人和心理上给周围的人造成很多不便。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建议回忆一下我们过去在郊区电气列车站看到的口号：“宁等一分钟，不要后悔一辈子。”也许，警察此时此刻拦住了一个袋子里装着炸弹的人……

有时甚至能听到这样的消息，在莫斯科常常发生“排挤高加索民族的人”。但是，如果您想，而且又有时间，您就在地铁里站一会儿，看一看我们警察的工作。这是既不轻松，又很危险的工作，常常是既肮脏又吃力不讨好。

在这里很多事情取决于那些直接实现某种安全功能的人。取决于警察，取决于联邦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取决于城市的一些职能部门。怎样拦住一个人，叫他出示证件，怎样告诉他，他应当做什么或不应当做什么。什么样的信息，用什么样的口吻告知我们。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职业化和一般文化素养的问题。您知道吗，常常有这样的事发生。使一个人受委屈了，有时是因为一件事情伤害了他，在这以后他就根本不想与警察、与国家打交道，不相信任何信息，不相信任何人和任何事。这当然也是极端，只不过是対立的极端。

人权经常受到限制不是因为有必要，而是因为有人要掩盖粗鲁的错误，无效果和非内行的工作的时候，在这些

情况下的确顾不上考虑人权。

至于谈及政治权利与自由，那么在这里不要忘掉本质的东西。言论自由如果用来号召进行暴力活动（杀人、流放、限制别人的权利），那么它就应当受到限制。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不能推广到那些致力于建立犯罪集团的人那里，要弄清楚是在犯罪领域，还是在社会政治领域进行集会和结社。

经常能听到，说，仅仅是因为言论，而不是因为事情追究一个人或一些人的责任，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没有从言论转入到事情。好吧，他声称，必须对所有“异教徒”（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开展武装圣战。好吧，他号召在俄罗斯范围内只为“本地”居民建立“纯”民族的地域……这些可都只是一些言论！如果当他被抓时，手里拿着武器或爆炸装置——这才是行为！

您在这儿去审判他吧。这样的逻辑是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直接的和有意的辩白。

我们以处于内外政策交叉处的移民问题为例。全世界通行的共同原则是使移民的法律和移民的政策更加严格。

但要知道，移民不仅是被允许的，而且他们对于正常的社会生活是必需的。关于外来移民的权利（就算他们是“没有国籍的人”）也不能忽视。我又一次产生了令人不安的想法——这些军事的和半军事的措施会不会导致破坏人权和人的自由。

但法律毕竟是法律。它不仅限制破坏公共安全的人，而且严格规定强力部门的工作，这是国家使用的强力与犯

罪暴力之间的根本区别。国家和国家机关在法律范围内，在社会的监督下，并且在由这个社会决定的条件中使用强力。只有长期关注这种平衡才能确定限制的程度，或如果您愿意的话，相反，也要确定应当在开放的、日新月异的社会中存在的自由的程度。正是应当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那些为了得到一点暂时的安全而放弃基本自由的人不配享有自由和安全。”

当然，在这里应当体现政治意志。只有强大的国家才能建立和维持这种平衡：保证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同时为了保持安全，即保持这个社会存在的目的，限制这些权利和自由。我理解强大的国家不仅是指执行行政权的强力机构。没有表达人民意志的，在必要时能改变法律的强有力的立法权，强大的国家是不可能做到的。

问：依您看，贫穷起着什么作用？贫穷对城市的安全，对国家是否带来威胁？因为通常认为，贫穷、极端的贫困正是恐怖主义的根源。

是的，对国际恐怖主义有这样的解释。说“南方”的贫穷民族是这样来反对“北方”的富裕民族的。如果说得简单点，这是胡说八道。如果看一看国际恐怖主义的网络，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不是由于贫穷，这正好是因为富裕的原因：过多的石油美元冲昏了头脑。这是讲那些充满了盲目自高自大情绪的人。《古兰经》里说：“他

把钱收集起来，数了数，认为，钱能使他万古流芳。”如果回想一下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发生的恐怖行为，几乎所有恐怖行为的制造者都来自富裕的、富足的阿拉伯家庭。而且乌萨玛·本·拉登绝对不是东方的苦行僧，而是亿万富翁的家庭成员。

当然，贫穷并没有什么好的。但恐怖行为要求有大量金钱，要求有政治目的，要求有特别的知识和组织。所有这些穷人都没有。贫穷，说得更准确些，极端的贫困，这是一种环境，在这一环境里可寻找到必死无疑的恐怖实施者，寻找到“耗材”。

您从来没有思考过，建立强大的、几乎覆盖世界所有国家的国际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网络需要花多少钱？需要多少钱用于购买武器、装备、通讯设备、用于建立训练基地，用于招募走遍全世界的传教士，用于印刷出版，用于因特网，用于建立战斗队员休息和治病的非法和合法的场所，用于支付交通费用，用于发放津贴……

有一次，我看到了恐怖分子讲述瓦哈比教徒在沙特阿拉伯人哈塔布及其追随者巴萨耶夫的指挥下，于1999年向达吉斯坦进发的电影镜头。那里有一些巨大的黑色圆柱，上面挂有黑色的瓦哈比教派的旗帜。为山地战装备得很好的匪徒个个养得肥肥胖胖，保养得非常好，非常愉快，就像1941年赫贝利斯拍摄的新闻纪录片中的希特勒分子一样。您知道，当你看到这种场面，“神圣的战争”就开始在太阳穴跳动。所有这些败类在俄罗斯土地上做了些什么？！马上就变得清楚了。这部电影是阿拉伯“马扎

海德”为了报情一笔资金不小的开支而拍摄的。

当然，如果看一看战斗队员们，那么在那里可以找到各种不同的人，其中包括那些大概可以称得上贫穷的人。虽然给他们支付的报酬不错……即使经常用一些假美元支付，但在那个山区里又有谁能够将它们与真的美钞区分开呢？最主要的不是推动他参加恐怖行为的贫穷，主要是强有力的国际组织。该组织的建立和存在不依赖于某一个的车臣人或阿拉伯人或俄罗斯人的真正贫困，及这个人有没有解决他生活问题的方法。

这是一个具体的人的道德的选择，他自己提出问题：你是否准备去打死一个无辜的人？越来越多基督教圣徒发誓要消除贫穷，作为对世界挑战的回应，因为这个世界不是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建设得好……

关于“贫穷产生恐怖主义”的论题经常被挑拨者大肆宣扬，他们企图把恐怖主义作为一种现代世界客观的、正常的自然现象提出来。这种见解是对杀人和暴力犯罪的辩护，是诱惑人们去干些事情。

当然，贫穷、落后是对安全的威胁，但不应演化为恐怖主义或暴力行为。贫穷通过另外一些途径表现自己。贫穷的居民，也就是贫穷的城市，税收很少。贫穷的城市应实行积极政策，包括在安全领域实行最低限度的积极政策。贫穷是对人类健康的威胁，是对人格尊严的威胁，是导致民族精神退化的威胁，是引发社会崩溃的威胁，必须与这种威胁做斗争。贫穷是一种系统的因素，只有通过数年甚至几十年的劳动和发展才能缓解或克服它。

问：我们不止一次地观察到这样的情况：高层政治活动家遭遇悲剧性事件时无能为力，听命于匪徒及其雇主。这种情况发生在布琼诺夫斯克和哈萨维尤尔特。不管是什么样的具体原因和动机，存在一个政治精英们的忠诚问题，并不是说他们直接出卖灵魂，而是说他们应该把自己和自己的事业与自己的国家和国家的利益视为同一。怎样克服哈萨维尤尔特的综合症？怎样做才能使善于和这些问题对着干的人出来掌舵？

与什么对着干？与谁对着干？是与一些大家都不敢出头的懒惰潮流对着干？与无序性、退化、瓦解对着干？与社会精英们或全体居民的日常意识对着干？与领导的意见和指示对着干？与自己的命运对着干？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不同的事情，很容易将它们搞混淆。而主要的是，“对着干”的傲慢姿态很容易掩饰自己的强制、专横、刚愎自用，甚至懒惰和愚蠢。似乎说了“对着干”就已经是英雄了。

能“对着干”的人在我们这里总是有很多，但在与法律、良心和常理的协调一致中进行思考和办事的能力经常不够。

我们已经多次“对着干”了。在伊万雷帝的时候，在彼得大帝时期，在1917年以及后来的若干年和几十年。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都是“对着干”的。结果合乎规律：社会已经夺回了所有社会本能。人坐在自己的400-600

平方米的自留地（字面的意思和引申意思）里，不仅拒绝看见自留地之外的东西，而且拒绝看比自己篱笆更远的地方。可以理解他。他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制度下的主要任务都是生存下来和培养下一代。他从国家和社会那里盼来的不是帮助，而只是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因此“自己的衬衣总是更贴身”（人总是先想到自己的利益），还有亲戚、朋友、邻居、单位的同事、同行，他的目光和关系就不会再往前走了。这也不是愚钝、不是愚蠢、不是简单化的态度。

实际上，我们这里的人很机灵。但他的全部生活经验、家庭的历史、国家的全部历史迫使他这样看待生活。这也是正在运转的、用原子武器武装的、分裂的社会的真实的写照。

我们的政治精英不是从天而降的。进入精英层的也是这些人，也是来自这个社会。尤其是在三代人没有世袭精英的现代俄罗斯。如果使一个人养成了只考虑自己的习惯，那么把他提高到任何一个水平上，他也已经不能再换一种方式进行思维了。不会，而且往往是不想和缺乏这个能力。

怎么，在其他国家就没有过出卖灵魂的现象，没有贪污和背叛行为吗？要多少有多少！但有一些国家，无论是社会，还是政治精英都不能容忍类似的现象。在那里，某些道德不太纯洁的人很快就会遭到反击。也有另外类似于我们的一些国家，在那里社会还是得过且过，无所作为，实际上还没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在那些国家情况就像在

我们国家一样。

现在谈谈与恐怖分子的谈判。在劫持人质时，恐怖分子是在政权机关想保全匪徒手中人质的生命安全（心理伤害在当时不能考虑了）的情况下进行游戏的。身处这样的背景，原则上你做好了一切准备：要“讨价还价得到”遭遇劫持的人质，要为了了解救人质与不值得进行感化的歹徒进行谈话，与那些应当上绞刑架的败类们进行交往。当然，在这里不是什么都能成功。我不会谴责特工部的领导人或谴责那些对恐怖分子开始谈判时，或进行反恐行动时就意识到他不是个好与不好的摆脱困境的方法之间选择，而是在很不好和十分不好的方法之间选择的政治家。我讲的还是关于布琼诺夫斯克和杜布罗夫卡事件。

我们有早就用过的谈判的实际经验。谈判不应当由国家领导人，根本就不能由有权做出决定的政治家来主持。在“诺德—奥斯特”劫持人质期间，莫斯科市长，尤其是总统不能去与恐怖分子进行任何谈判。谈判是由反恐分局的军官，一名中层干部进行的。经过精心过滤的或虚假的信息从他那里传达到恐怖分子那里。这个人非常清楚：无论他发生什么，都不应当影响解救行动的进行。

“哈萨维尤尔特”这个词在我们这里成为了普通名词，并且表示整个国家做出向恐怖分子有损尊严的让步。我试图为自己解释当时发生的事情，除了一些政治实用主义的想法（有人非常想留在政权机关，因而努力向全世界和俄罗斯人表明，战争已经结束了）之外，我在所发生的事件中只看到一件事情。我们的政治家当时不明白，与恐怖分

子谈判是不妥的。后者从来就不会满足于“所取得的东西”。“给恐怖分子一根指头，他就会咬掉你的整个脑袋。”1999年，哈萨维尤尔特事件之后三个月，这就变得明白了，虽然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但哪怕是我们的一部分政治精英们明白也好。不要紧跟在欧洲的“车臣人民的自由”的保护者之后议论：哈萨维尤尔特的伊奇克尔的主要签字者是否下达过这次进攻的命令，他知不知道关于进攻的事情等。

这里的原则是这样的。在每一个具体的场合，如果有可能，哪怕是最小的可能救我们人的性命时，就可以而且必须进行谈判。同时任何政治的，我强调这个词，与恐怖分子的谈话都不可能。不能与恐怖分子谈妥任何事情，要排除对他们做出让步。这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问题。

然而，当人质被劫持的时候，首要的任务就是保全人质的生命，使人质得到解救。

在这里我不把布琼诺夫斯克和“诺德—奥斯特”与哈萨维尤尔特一样看待。据说，在解救“诺德—奥斯特”的时候根本就沒考虑有多少人质有可能牺牲，这是犯罪，比恐怖分子本身的犯罪更严重。但事实上，人们想过很多次，计算过很多次并得出结论说，有风险，但它是所有可能中结局最好的，当时这是艰难而勇敢的决定。我知道，这个决定的确是这样的。

我不能不顺便指出来，某些自认为自己是爱国主义的俄罗斯武装力量为这种危险十分担心，这种危险似乎是来自美国和整个西方，威胁着俄罗斯，他们准备与任何美国

的敌人，哪怕是与乌萨玛·本·拉登结盟。他们干脆直接声明，俄罗斯应当在世界舞台上，甚至在自己的领土上与伊斯兰教国际恐怖主义的共产国际联合起来，结为同盟，以便成功地与美国对抗。逻辑是这样的：我们把俄罗斯交给伊斯兰教的恐怖分子，以便不让美国人得到俄罗斯。

这种“爱国主义”迫使人们去思考在我们全俄罗斯范围的“盲目仇外”问题。某种政治体制的发育不全、宗派主义、各种民族宗教禁忌的沉重负担，关系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要决议采取的非公开性都对这一问题产生影响。但在所有这一切的后面不能不看到，年复一年在政治体制上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关注盲目仇外行为。因为关于俄罗斯爱国主义应当一定反对美国而亲伊斯兰世界的议论不是来自“民族背叛行为”或“出卖灵魂”的领域（虽然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来源的“石油美元”也许影响过某些“爱国主义者”）。不，这是政治上的“愚蠢”在起作用。提高“反对盲目排外”的水平就在于完善政治体制，包括更加开放、更加坦诚、政治分析问题的直接性、脱离民族宗教禁忌、摆脱被误解的“政治工作”方法等。

最后，我们再讲一讲“哈萨维尤尔特”，但不是从直接意义上讲，而是从转义和更广的意义上讲。所有改革的这些年，我国社会精华人数最多的部分（政治家、官员、私有者）思想最多只考虑超前两三个月。自己的利益（无论是私利，还是国家的利益）他大概也是用同样的视野进行限制。把它们“纳入”这一视野范围。也就是这种狭窄的、现时的、随时变化的利益无论是在国内事务中，还是

在国外事务中都刺激了“哈萨维尤尔特人”。这些“哈萨维尤尔特人”有自己的逻辑，但这只是尽力多赢50戈比，最多1卢布的市场小商小贩的逻辑。

要想让社会精英开始战略地思考和行动，开始不仅超前5至10年，而且超前30年、50年、100年思考问题，他们应当相应地对自己的地位充满信心（对他们的合法性、巩固性、系统性）。仅把自己与国家视为同一是不够的。（我向您保证，作者和所有“哈萨维尤尔特人”的执行者都认为，他们是在为国家做好事。）而且还必须把自己与国家在时间上，在战略表现上视为同一。在罗斯时期在这一点上总是有些问题，尤其是在不久前发生的革命和体制更替的时候。

问：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安全的威胁不仅来自所谓的激进分子，也不只是来源于腐败的社会精英代表。您在《历史的更新》这本书中指出，在技术领域发生了盲目排外，管理系统的盲目排外的问题十分尖锐地被提了出来。您指的是什么？您有没有使莫斯科避免重大技术灾难的秘密？您是怎样组织预防灾难的体系的？

我担心赞美反而引起不好的后果。我不准备谈论预防体系，但预防措施我们是采取了。希望在将来，在不很遥远的将来，这些措施会纳入体系。

在这里不要从字面上把盲目理解为“傻瓜”。俄罗斯

的灾难不在于傻瓜太多，而在于聪明人太少。要知道“傻瓜”的危险不是因为愚蠢，而是因为他的聪明。虽然头脑最简单的傻瓜，能够给人增添一些不是所有非常敏锐的头脑都能想到的麻烦，但受过教育的人，根本就不愚蠢，而且担任重要职务的人也经常充当“傻瓜”的角色。其原因是，看上去好像是某人愚蠢，其实大部分情况都是有意识地努力逃避责任。

你们回想一下，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失事，以及我们现在从美国源头了解的关于这次失事的所有情况。在起飞时刻脱落下来的一块隔热泡沫撞击了机翼。很遗憾，就如同所确认的那样，撞击能够带来最悲惨的后果。大家都看到了，摄像机记录下来，专家们很快就注意到这一点。尤其是当时还向航天飞机上的指挥员那里发去了警告，大意是：“记者们有可能问你们，发生的撞击危不危险。你们就这样对他们说，这是小事一桩，不可怕。”

太空飞船毁灭了，牺牲了七名优秀队员。“哥伦比亚号”在轨道上飞行了一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可不可以把机组人员从飞船上撤出来，或者哪怕是把他们暂时留在国际宇宙空间站（有些拥挤，但不会使人委屈），然后再每次两三个地将他们送回地面？我不知道，我不是专家，但对于作为管理人员的我来说，当时局势的逻辑十分清楚：“宇宙飞船的发射、跟踪和降落”系统没有考虑到预防意外的预案，而在这周内又没有人发去警报，一切就这样以灾难结束了。

城市也是最复杂的技术系统。虽然这个系统是在地面上，但在技术灾难中伤亡的人数可能成千上万。在印度的博帕尔市，当一家化工厂发生灾难时，当时的受害者几乎有20万人之多。这是我们永远应当记住的。

粗略地说，大概有五种主要的技术灾难原因。在这里我将不考虑恐怖主义。

第一种原因，从一开始就是不好的、有毛病的、残缺的结构研究的方法和设计方案。也就是说，未来的不愉快事件，包括灾难事故的可能性，还是在设计阶段就埋下了隐患。答案是征求所有主要的城市建设方案，对它们的质量进行认真仔细的监督，坚决不同意接受任何纵容的行为。而对于已经做了的、建成的、已经不能修正的或者修改需要花大量的资金和精力的，那就要毫不吝惜地拆除。这样还将便宜一些、安全一些。这是经过检验了的。

第二种原因是执行的质量。即设计方案，结构本身不错，甚至有可能是优秀的。可执行……毫不夸张地说，是城市最头痛的问题之一。尤其是在建筑领域。答案也是众所周知的：检查、经济监督和市场监督；公开招标；扩大作为主要监督“机关”的消费者的权利。当然，还有与莫斯科人的反馈联系。只有他们（作为城市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才是提供给他们产品的质量的主要“评判人”，是那些代表城市和国家监督产品质量的人的工作质量的主要“评判人”。我不认为这一切已经是理想的状态。但在这方面莫斯科仍在不断提高自己严格要求的水平。

第三种原因是经营的质量。在这里一切不言自明。进

行一些必要的预防工作，进行日常维修和高质量如期完成的大修，爱护地和内行地使用楼房、使用技术系统和机器，这样任何系统的服务时间就会更长，发生事故的几率就会更少。越是经常地和严重地违反规程，服务期限就越短，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就会越高，尤其是随着服务期限的理论寿命日益临近的时候。我们这里经营的情况怎样，每一个读者一定通过自己的经验和见闻都有所了解。要求目标，达到效果，监督进程，调查事故，惩罚失误。但这不光是公务纪律的问题，这是每个人的、每个城市的和整个社会的一般文化问题。

第四种原因是对工程和所有保证它的基础设施进行系统更新。一方面，人们还很少有遇事就进行系统思考的习惯，即能看到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在起作用的时候去理解这些相互联系。另一方面，工程与基础设施经常在不同的主管部门之间，不同的法人之间被分开，因此调整它们必要的相互关系不是简单的任务。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你们今年修了道路，或输油管道，或地铁支线，或多套住宅楼，总而言之，你们修了某种相当复杂的，时间相当长的，打算长期使用和强化使用的东西，那么原则上，事先就知道，在什么时候将需要多少资金用于它们的日常维护和大修，用于拆除和完全更换。计算这一切并不复杂。

很难找到资金和做到有目的地使用这些资金。既然在不同的年份资金的划拨，它们的使用、真正的利用、各种事故的发生都是不均衡的，因此系统从整体上就开始“微调”，有时是大的调整。这时候问题就会集中起来，就会

增加。其结果有时会产生令人惊奇的画面：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解决。我们也正在依靠挪用别的资金解决。

系统的更新，这是避免按照“拆东墙补西墙”的原则给城市经济打补丁的方法。就整体而言，在莫斯科范围内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在局部地区也不总是成功。我们把这样的计算放到一些新的设施和工程。也许二三十年之后会有人因此感谢我们的。复杂的是，莫斯科得到的技术遗产损耗得非常厉害，而且关于很多的机构甚至没有必要的文件资料。但传统的问题例是有，这个问题就是，最尖锐的、近年来在联邦政权实践的影响下急剧加强的资金短缺问题。我们暂时正在摆脱困境。

第五种原因是使退出使用的及时性和深度。如果我们拆除房屋，在它的位置上建筑新的超现代化的楼房，而把原来服务于它的自来水管道、下水道、电线和其他网络留下，那么我们因此就为将来有可能发生的不幸事件创造了前提。当建设一个新区时，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但当新的建筑物耸立在市中心，而且建立在30到50年前的各种网络线路上，就会出现危险的技术比例失调。当然，在每幢新楼下更换各种网络线路从经济上和技术上都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努力不让严重的大量的比例失调在城市里发生。

这样一来，“抵御非职业性行为的保护机制”既是独立的、理想的、自动体系的管理系统和被管理系统的功能，也是保护自己不做出非职业化的或恶意决定的能力。即理想中如果做出决定或采取行动，而这些决定和行动与

复杂技术系统的正常作用不相容，或导致对技术系统规程的违反，导致完全或部分破坏建筑物，对人们的健康和生命构成威胁，那么系统应当对这些命令做出拒绝执行的回应。

理论上很简单，但实际上非常复杂。不仅仅因为很难制定出相应的法律体系、技术规程和其他培训人员的条例体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系统的自主性，它的自我保护能力客观上限制了操纵它的那个人的自由，而这并不合乎每个人的性情。

一个实际的例子。在莫斯科近郊有一些护水的地带，在这些地方建了保护城市用水的围墙。当然，不仅必须保护水源地本身，而且还必须保护水源地上游的或位于离水源地有一定距离的河流的一部分，水库的一部分，否则各种肮脏物就有可能进入到饮用水里。

在护水地带禁止一切：建筑、工业、捕鱼业，甚至划船。有人感到不方便，不愉快，但毫无办法。成千上万人，有时千百万莫斯科人的健康和生命都取决于一个水源地。

以前所有这些规范和规则无条件地被遵守。莫斯科还从没发生过什么严重的问题。近年来护水地带的系统实际上被破坏了。各地政府部门以各种借口普遍开始允许在这些地带进行建筑。自然，是在岸边建一些别墅、房屋和宾馆，这样他们的拥有者感到有利可图，心情愉快。在水里开始出现垃圾、生活和工业废料、石油产品。对付这一数量的垃圾，净水站一年比一年感到为难。1000万莫斯科市

民和几百万莫斯科市区居民的健康受到直接威胁。大家都明白，但这种“犯罪”（我找不出其他词来代替）还在继续。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贪污腐败，虽然在每一个具体场合证明它很困难，有时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抵御非职业性行为的保护机制”应当怎样发挥作用呢？联邦水务局，发现在禁区进行建筑的事实之后，拆除了所有建筑物（不管该建筑物盖到什么样的程度，也不管它属于谁）从修建房屋的人那里追索拆除工程的价值和损失，并把修建房屋的人和所有违反法律给他签发建筑许可证的人送交法院惩治。同时按照法律，对他们进行刑事处罚。

要是我们有类似的制度，那么谁也不会去行贿。但你们自己也明白，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的。因为在那里建房子的不仅是些富人，而且有一些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人，这些人甚至认为自己是国务活动家。而对于莫斯科来说，问题逐渐变成一个具有潜在悲剧后果的最严重问题之一。转而使用纯净水暂时不是每个人都支付得起的，因为这种水也需要从某个地方获得。

或者再举另外一个例子：车上的“警灯”。根据已经形成的传统，几百名高官都有权在车顶上安装“警灯”到处行驶。大家都非常清楚，很多其他“有权力”的公民也使用“警灯”。为什么我现在想起这件事呢？因为我们在这里有“抵御政治上非职业性行为的保护机制”的问题。要知道“警灯”不是在路上快五分钟的问题，而是在向众人表示，我是怎么专横、多么有权势。好吧，他是显示

了，可几千、几万人留下了对国家不好的印象。赢得了什么呢？谁赢了呢？要是这只是莫斯科的交通问题就好了……

因此，在作总结的时候我想说：对莫斯科构成主要威胁的暂时仍然不是激进分子，也不是该死的恐怖分子，而是那些形形色色的在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的环境下，具有惊人生命力和快速繁殖能力的卑鄙家伙。我们必须将所有这一切作为一个问题来看待，而不是简单地作为一些不负责任的或不怀好意的个人的总和来看待。而且首先是安全的问题，莫斯科城市的安全和整个俄罗斯的安全问题。

○ 8 新的全球等级制度

问：在莫斯科、纽约和地球上的许多其他城市和地区发生的悲剧性事件挫伤了社会意识，挫伤了已经习惯于安全保护下的、处于简单明了的世界格局中的社会意识。您记得吗，1999年在莫斯科流传着多少古怪的关于房屋爆炸原因的各种说法？而在美国，悲剧发生后人们又想到了什么？是的，全是联邦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的错。这就是人们知道的原因。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您是一开始就号召不要急于“认定”罪人的人之一。您是直觉地不信任简单的答案吗？要知道，根据所有情况来判断，正是2001年的事件激发了您对全球问题的兴趣。当您谈论和描述有关当今世界布局的复杂性时，您具体是指什么？

我就是指的这一点，即不可思议的复杂性。我们很少思考我们周围世界的复杂性。但让我们拿一种非常习惯的、日常的、每个人都有的东西为例。比如说，电视机，我们明白，最好去找师傅修。有多少人发明了用于制造这些东西的零部件，又有多少人在忙于它们的生产！

现在您设想，难道最现代化的电器能与人类社会相比？你们生产出一台机器，它有可能会做得好一些或者差一些，但如果它有工作能力，那么它将实现制造它的意图。机器不会想到喝酒，不会去让所有的人滚蛋，或相反，用什么东西让所有的人感到愉快。而人就会经常、不断地想到所有这一切和很多其他东西。

地球上有 60 亿人口，这本身就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但他们还在被组织，联合到几十万和数百万个共同性组织中。被按照国家 and 民族、按照宗教和民族、按照职业和居住地、按照家庭和联系、按照教育和许多其他特征进行划分。他们被工作地点、家庭和联系、个人的关系、经常还被相互的不友好联合在一起。有些人被信仰、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见解、志向联合在一起。同时，每一个人能够选择，看见和努力使用非此即彼的抉择和多种机会，与某人进行游戏，对其他人施阴谋，与第三种人进行合作……

这里有多少个十亿之间的联系、利益和意志！而且它们的总量在不断地增长，变得越来越复杂。就像社会学家所说的那样，每一个人同时在生活中扮演很多角色，不是所有的这些角色都扮演得胸襟坦荡和真诚。任何一个行政

管理人员都会遇到这样的拼图玩具。

除了人与人之间、个人之间的关系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各种组织（社会的和国家的、商业的和政治的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其中的每一个组织都有自己的利益、观点、处世方法、行动方针。有自己的黑色经济、司法制度、政策。最后还有犯罪，包括有组织犯罪。有具有内外政策的国家，而且根据所有最重要的指标国家也大不相同，有国家联盟和一体化程度不同的经济集团。有很多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国际组织——从联合国到鸟类爱好协会。有把当今世界集中到一起的联系，同时也有用新的矛盾破坏这个世界的全球性过程。

在这之后，您还问我，世界的复杂性在哪里吗？您认为它的简单在什么地方呢？

当然，简单的回答往往会博得大家的好感，但也不是不动脑子的简单。顺便说一下，简单的答案不一定就不正确。相反，正确的答案总是简单的，简单得可以用一个指头来表示就可以向任何一个非专业的人士解释清楚。但这种简单是来自理解相互联系之间的全部深度和复杂性，来自善于看到动态中的相互联系的简单。还有另外一种简单，即刻板公式的简单。格式化的简单，没有思想的简单，只抓住现象或事情的表面现象，而不深入理解它们的本质。

美国中央情报局研究出对纽约摩天大楼的进攻就是这样一种表面的回答之一。但要知道，还有另一种回答（“阿尔—凯耶达”做的）暂时看上去要好一些。因为众

所周知，中央情报局是美国的国家工具。而“阿尔—凯耶达”是谁的工具呢？这是不是某种假设的名字呢？谁的呢？必须弄清楚，这些机构到底想要什么，是谁和什么东西在推动他们，什么决定着他们的生命力。如果有人更倾向于认为中央情报局操纵着美国是一个神话，那么这种现象也会以自己的方式变得十分复杂十分有趣；针对这种现象也应当提一些同样的问题。

问题在于，对于一个普通人中的大多数来说，简单的，更准确一些说，极简单的回答就是脱离答案本身和不去深入思考问题。我绝对不信任的是，简单回答的本身和那些准备在事件还没有结束时就急于瞬间给出答案的人。同时他们完全否认存在其他答案的可能性。在这里有下面两个原因：或者是早就计算好利益，或者是思维的教条主义或绝对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至于谈到我是在2001年9月之后开始关注和研究全球问题，您说得对。当然，我以前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但在那些日子变得很明显的是：世界不是逐渐进入，而是已经进入到一个原则上是全新的发展阶段。9月11日发生的事件迫使人们思考，有一种明显为反对正在形成的新世界而战斗的武装力量存在，也就是反对全球的内容特别纷繁的关系，反对准则和价值的新体系。建设这个新世界的规则十分多样，以至于有时候彼此矛盾，相互否定。但，正如我们的哲学所说过的，世界的辩证法就在于此。当一个体系复杂到十分严重的地步，它实际上要求内部的不同成分和竞争成分之间并存和相互作用。今天，力量之间的

简单对抗，力量的单调，力量的单一，无不与所有这些成分对立，难怪有些研究人员把“塔利班”的活动称作新的极权政治。

9月11日的恐怖行为，对我来说，是1999年和2000年莫斯科恐怖行为的继续。说的不是它们的形式上联系，据说，在这两个地方国际恐怖分子都在活动。我想要你们注意对“双子大楼”的恐怖袭击，和也是发生在2001年对另一些“双子大楼”的又一次袭击之间的联系。您记得塔利班毁灭了阿富汗的两尊佛像，他们也是“饶有兴趣地”使用了大炮和爆炸物。要知道，这也是那些恐怖分子干的。他们只有一个目的——使世界简单化，他们要消灭世界多样性的标志。消灭那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我们重新回到老话题：文明与野蛮，是多样性和复杂性为一方，与简单和粗俗为另一方的碰撞。在我们眼前出现的世界新秩序，是作为日新月异的、快速变化的和向前发展的体系出现的。这是一个复杂关系和多种不同关系的体系。

今天的全球化使很多人恐惧，因为他们觉得，正在出现一个“世界政府”，正在建设一个全面监控的体系。不必害怕幻影，世界新秩序不是建成信息监控体系，而是建成信息自由流通和不断交流的体系。建成不同复杂程度，不同能力和内容独一无二的自治信息子系统的分散管理的自由组合体系。因特网是这种世界秩序的雏形和一种“模型”。全球化是把世界复杂化，而不是将它简单化或统一化。

我们致力于把握这一体系进化的方向，为人类的振兴做出自己的贡献。而另外一些力量用破坏和毁灭与它相对抗。如果谈到某些智力高度发达的人，我还可以想起塔利班的荣耀，他们在阿富汗建立了稳定。稳定性是建立在墓地上的。国际恐怖主义今天要把世界拖回到中世纪去。这些世界前途的关怀者，致力于把世界的全部多样性简化为这样的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可以借助于像原木一样简单的中世纪准则统治世界。

当我在直播中看到“波音”飞机扎入世贸中心第二号“双子楼”时，完全感到所发生事情的非真实性。感觉到这一火红的龙卷风来自另外一个世界，来自另一星球。

到目前为止，历史是这样形成的：曾经有过富人和穷人，享受特权的人和没有权利的人，被赋予政权的人和完全失去政权的人，也就是有某种社会金字塔。在不同时代，在地球的不同地区，这一金字塔具有不同的轮廓。在“上层”和“底层”之间形成相当稠密的中间阶层的夹层。这一夹层在某一地方变得很细，因此，金字塔变成了柱子，甚至变成枯萎的、随时都有可能折断的麦秆。

但尽管有这种多样性，在过去的社会金字塔里也有某种共同的东西：他们没有超出一个国家的范围。尽管非常大，尽管是帝国，但它仍然是当时存在于地球上的很多国家中的一个。

从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问起，开始了从性质上和规模上都从未有过的新的过程。通常是讲信息技术，和在信息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全球金融体系、全球经济体

系，通常是讲国家丧失了它的历史功能。但所有这一切，据我理解，是全球化现象的外面一层，或多层，而更重要的是它的本质。

全球化的本质在于，历史上第一个社会金字塔在全世界范围里形成，并成为决定全世界的力量。

同时，它的形成非常有意思。人们越来越多地感觉到自己生活在统一的世界里。而且不是以弄清楚他们自己昨天生活得怎样为目标，而是以弄清楚同样职业，同一社会群体的人们在最顺利、最繁荣的国家里生活得怎样为目标。如果美国或联邦德国的司机、工程师、警察、教师领那么的工资，为什么在俄罗斯或非洲乍得的什么地方的同样工作的人领的工资要比他们少几十倍呢？

解释这个“为什么”不难，但人们已经不接受这些解释，尽管这些解释是正确的。这一现象取得了一个名称，叫做“期望的革命”，即人们的期望在全世界急剧而快速地增长了几十倍。可以理解的是，满足新的期望甚至在技术上都很困难，且不说满足这些期望有很多经济的和社会的障碍。这一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原则上已经不能在任何一个的国家范围内解决。越往后，它就越强烈地要求统一的全球战略。

我强调的是：依我看，人们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是对的。我们都生活在统一的全球化世界里。那么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地区人们生活得比其他地区要好几倍，甚至几十倍？类似的问题在俄罗斯也能听到：为什么在发放国家补贴的地区人们应当生活得比莫斯科差一些，有的时候

差得很多呢？

其实这不是问题，这是社会要求，正在增长的，并且越来越强有力的社会要求，只不过它暂时用问题表达出来。世界上没有人否认这一问题的存在。拿联合国的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世界银行的报告和—些国际组织的报告来说，在这些报告里，这一问题在最近30年里被诊断得深刻而清晰，但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清晰战略。帮助最贫穷的国家，即使把援助金额增加5~10倍（按现在的情况做出难以置信的推测），它本身也不能解决这一问题。

需要有针对性地从整体上发展落后的国家和世界。但首先，发展过程需要几十年时间，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没有的。其次，我个人有这种印象，大约从2000年开始，发展的重点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战略文件中，从世界银行，甚至联合国的文件中转移了。它的位置被意识形态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的东西占领：推动政治民主、自由经济、个体经济成分、缩减国家的作用。我有这么一种印象，就是发展的任务被取消了。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重点的转移”是十分短视的。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鸿沟现象”是永远存在的，并且在逐渐增长。但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对这种“鸿沟”现象的理解和接受与在一个被分割成若干彼此之间联系相当弱的世界里原则是不一样的。这是问题本身，而它的作用，它的爆发潜能我们未必能完全想象得到。

全球性的社会金字塔也在国家的层面上建了起来。20

世纪下半叶至 21 世纪初的政治上和法律上平等的主权国家，首先根据经济指标已经排了队。由此产生出“黄金十亿”这个标签，即十亿才能出众的人在全球金字塔的塔尖上，而在他们下面是“第三”“第四”“第五”，听说，甚至还有“第六”（完全没有希望的）世界。

自然“黄金十亿”受到最强有力的军事盾牌掩护，包括它的核武器组成部分。这一盾牌和“黄金十亿”都是非常特色的布局。盾牌由两大组成部分构成——北大西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许是历史上第一个军事政治同盟，现在没有真正的潜在对手；盾牌的另一组成部分就是美国，它不仅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强国，而且也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如果把它的军事和科技潜力从北约“拔出来”，那么北约除了发表声明之外实际上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啦。

这就意味着“黄金十亿”本身早就已经是体系了，而且是非常牢固的体系，尤其是在军事方面。这种牢固表明，这个体系不是最适合于社会改革，而最适合于采用专横的原则把全世界及其的政治组织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政治组织的进程就开始了，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一过程急剧加快了速度并改变了性质。尽管冒着巨大的风险，但仍然有某种正面的东西存在于前苏联与美国的对抗中……当时全球性的世界刚开始形成，这种对抗在某些方面像两党制，在这种体制的保护伞下，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在一点一点地进行。比如，以美国为中心的秩序取代以美苏为核心的体制。美国为中心的秩

序很强硬，对一切没有纳入规定范围的东西毫不手软。

于是就产生了具有全球性意义的问题。当年苏联共产党也试图做某种类似的东西（在一个单独国家的范围里）。它掐死了社会、经济和自然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把国家建造成一个定时炸弹，这枚定时炸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这不仅仅是假设：在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已经爆炸了。只是那里的爆炸“当量”无法与苏联相比。

总的来说，苏联的炸弹被成功地以最低的代价和平地拆除了。这是我们的巨大成功。全球化是不是在制造类似的，但威力更大的社会定时炸弹呢？谁又将怎样去拆除它？能否会成功地拆除？俄罗斯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如何？

我不能确认，趋势就是这样。但是有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说，现在来考虑这个问题是适当的。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说：“谢天谢地，我们的怀疑和担心没有被得到证实，那将是最好的。”

问：也许，“黄金十亿”的构思仍然不那么坏？也许，我们俄罗斯人以加入这一类地球居民为目的比较合适？归根结底我们的人数不是太多——1.45亿……

毫无疑问，确定方向是必需的。只是谈到……构思。没有什么构思，只有讨人喜欢的两面派术语。要知道“黄金十亿”是从联合国统计资料页边上的某个地方冒出来

的。有人对世界 30 个最发达国家做出结论时，结果得出一个 10 亿，即在我们这个行星上大约有那么多人在物质方面过着名副其实的生活。

如果俄罗斯达到相应的社会经济指标，从世界排名的 71 位上升到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第 30 位，那我们也进入“黄金”名单。问题正好就在于要做到这一切。

的确，还有另外一些对这一术语的阐释方法。有些人认为，全世界的最高层，比如说，有 10 亿富人都进入“黄金十亿”。但是……随便有多少人都可以把自己列为世界精英，用高高的围墙把自己与乞丐和穷人隔开。只不过在那个“黄金”世界里依然没有人会把你当作自己人。如果你不能把自己的国家带入正常的状态，那么，对不起，你对那个组织来说还是不合格的。

或者如果您愿意的话，“黄金十亿”概念的奥秘是它的真挚性在于不是根据个人财产的大小，而是根据居民人均指标而列入“黄金十亿”的。因此，严格地说，在“黄金十亿”里代表美国或西欧一些国家的人不仅有洛克菲勒家族和杜邦家族，而且还有纽约、伦敦的流浪者，巴黎的乞丐。这给我和您也指出了通往那里的道路，就是当俄罗斯的平均水平接近前 30 位的时候。

但是，给自己提出哪怕是接近“黄金十亿”的目标时，我们还得去为另一个类似的问题操心。世界上以作为民主支撑的“中产阶级”为主的国家并不多。不妨自己不要对这一朴素的状态感到害羞，而把它作为未来 10-15 年的民族战略目标。对于昨天的超级大国来说似乎有些朴

素，但对于俄罗斯，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非常实用。而且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更积极地支持国际组织针对建立这种“国家中产阶级”所采取的措施。不要为了这一目的而牺牲俄罗斯的利益和平安，但要在我国对外政策的其他目的中实实在在地、平稳地向这一目标靠近。

在您把我们的讨论向新的方向展开之前，我还想就“黄金十亿”的问题补充一些内容。有不少人完全投机地使用这一概念。我们的共产党员，在讨论“黄金十亿”时，把自己陈腐的阶级斗争思想挪到全球化过程中。他们想让所有人相信，把世界分成发达和落后的两部分是将世界财富做不公平划分的结果。像永垂不朽的沙里可夫所说，必须把一切拿来划分。幸运的是，国内左派的这些论断完全没有恶意。

更可怕的是，当那些没有进入“黄金十亿”的国家的统治阶层拿这个概念做投机买卖的时候。让我们更仔细地看一看这些“非黄金十亿”的几十亿人口。

普通的莫斯科人或者是普通的俄罗斯人，当向他讲述这些“非黄金十亿”的国家时，他就转过头来，看见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叙利亚、土耳其等国家。就拿那个在我们莫斯科和俄罗斯熟知的阿尔及利亚为例，因为成千上万的专家都经历过它。民族的精英能在20-30年里很容易地葬送一个国家。关于其余的非洲国家就用不着说了……

但民族的精英并没有忘记自己。经过更仔细的观察发

现，那里在“金子”方面（用于直义和转义）情况不是那么不好。可以用俄罗斯儿童嘲弄人的顺口溜来形容他们：“我是穷苦的孤儿，钻不进大门。”在“非黄金十亿”国家的区域，贪污腐化达到了无法形容的程度。非常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所谓的土库曼人的父亲。

在贫穷的“东方”或“南方”出现了“沙里科夫”制度，这种制度认为自己的目标只是强占，夺取，划分，当然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我们回忆一下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为了实现自己的“伊斯兰规划”，这一运动开展了八年。他们做了些什么？在这一时期没有建一座工厂，通信、煤气、供水、供热等公用管线也濒于崩溃，医疗服务体系，教育体系开始衰败。塔利班把阿富汗人民扣为人质，用饥饿和疾病折磨他们，以此向西方国家（向那些“黄金十亿”国家）勒索人道主义援助。与此同时，塔利班把国家的领土变成为了占领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训练强盗匪帮的军事行动基地。他们也威胁俄罗斯，与那些在俄罗斯南方地区活动的匪徒结为同盟。八年的结果完全没有能力为该国家的居民建立哪怕是稍微文明的生活环境。不仅是没有能力，而是完全没有这种愿望。

这种“沙里科夫性格”流传得比通常关于这事所说的还要广。西欧在日益增强的外来移民的压力下呻吟。这些外来移民中的许多人只把西方看做是用非法手段从中渔利、捞取好处的地方。民族精英们动员那些被他们抢劫过的游民和平民去对“黄金十亿”国家发起猛攻。说他们应当补偿几百年来的“罪孽”和“令他人受委屈”的损失。

好像“被抢劫的人”本身从来就没有进行过侵略战争，从来没进行过种族灭绝……

有了现在的民族精英和他们的生存方法，“全球的新划分”不会带来任何正面的结果。尽管在“东方”和“南方”有利用上帝赐予的自然财富和自己的智力潜能奋勇向前发展的国家，但结果是，最后的问题还在于在民族水平上的高水平管理上。

对于俄罗斯来说，有关“黄金十亿”的各种议论只意味着，我们必须忘记正常文明生活的前途。

问：可以经常地从一些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那里听到，他们说，俄罗斯经济以原料定位，这并非多么不好，这也是正常的。他们说，俄罗斯经济不管怎样，一直在出口机构中是以原料为主导。这是什么，是对自己自私自利的辩白，还是对我们的自我意识来说是一种残酷的现实？

两者兼有，而且加上不負責任的态度。

原料，尤其是能源资源差不多是唯一起作用的，真正有分量的出口项目。除了武器出口以外，甚至稍微能与它相比的东西都没有。放弃这种机会就是犯罪。但必须吸取前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教训。前苏联依靠石油挣了几千亿美元的，一部分任意挥霍了，一部分投入到与美国的核竞赛。而某些其他国家依靠这种途径挣的钱试图建立新的经济部门，打入国际市场。

例如加拿大，该国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与俄罗斯非常接近。它的经济建设不仅依靠与美国的接近，而且依靠使用丰富的和多种多样的自然资源。但能否认为，加拿大的经济就是以原料为主导？顺便提一下，加拿大还盛产粮食，那它是什么，难道是农业经济吗？这就是给你们举的一个可以最佳地将农业的、原料的和最现代化的经济部门相结合，同时进入世界最发达国家行列，进入那个“黄金十亿”排序的例子。可以叫出几十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名字，在这些国家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原料主导政策充当着独裁的经济基础。

下面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例子——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非常富有石油和石油美元，将巨大数量的资本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运出境外，投入大量的资金采购西方的技术和进行新的研究开发。但我们稍微想象一下，石油突然枯竭，就像它开始出现一样的突然。你们当然明白，我指的不是石油本身，而是指的对石油的需求。要知道，当年贫穷的阿拉伯族酋长，这么说吧，神话般地一觉醒来就变成了富人，因为他们沙漠里所内含的东西原来是西方需要的东西。但你们想象一下，碳氢化合物的需求会下降的。现在有一个问题是：过多长的时间间隔之后沙特阿拉伯才能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状况？有一个乐观主义者回答说，过一个月之后。但我认为，约两年之后……当然，如果国内能成功保持稳定的话……

正如您所理解的，我讲这个特例不是无缘无故的……
在短期、中期、甚至长期的前景中，俄罗斯有一个用

于国家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来源：原料和能源资源出口，这是其一；外国投资，这是其二；发展自己国内市场的规模，这是其三。需不需要长期证明，它们中的哪一些最受欢迎，为什么？

我这里重点说说国内市场的规模。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具有支付能力的市场。工业和服务，整个经济就不可能发展！谁将去购买呢？

古典资本主义当年遇到严重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这一问题。这种危机表明不是生产的限度（生产能够提供更多的商品），而是表明市场支付能力的限度。对这个问题给了两种答案。马克思给的答案是，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凯恩斯给的答案是培育有支付能力的市场。所有那些现在被称为高度发达的和列入“黄金十亿”的国家都开始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我们以莫斯科为例：假如没有具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能够在近年以每年14% - 18%的速度发展自己的经济吗？还需要其他注释吗？

低支付能力的市场不仅是低速度和低质量，还是封建政治体制的前提条件和培养基础。在一个民主和法制的国家中，公民社会只有在平安富足的居民基础上，在大规模市场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

原料出口应当“支付”在俄罗斯建设现代经济的费用。我现在不问，它本身是否这样做了，是怎样做的。但有相应的国家规划吗？有实现这一规划的战略吗？不管怎样，我不知道这样的规划。“原料企业”具体应当支付什

么？或者我们根本就拒绝在国家发展中的国家导向作用？市场该怎样就怎样，听天由命，就这样算了？

当然，有一些集团，甚至是社会阶层，他们从出口原料、石油和天然气那获得可观的收入。在市场经济中这是正常的，也应该这样。不正常的是另一种现象，即我们生活至今，没有思考过当大众可以享受的资源储备开始消耗殆尽的那个时候。我理解“大众可以享受的”不仅是指体力上能够开采某种东西，而且还指从事这件事情的经济合理性……这个时候离得不远了。无论如何，我们的孙子辈能碰上这件事。或者那些决定俄罗斯的这一切的人的孙子们已经被保证不出现任何意外，而所有其余的孙子们就让他们休息？……

但是，即使自然资源还将长时间地保持充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越是长时间地和越多地依赖资源的出口“价格剪刀差”，在对待俄罗斯方面就会更加厉害地发生作用。在任何情况下作为社会和国家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我们将会感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请注意：是起源于市场机制和世界经济，而不是起源于某人凶恶意志的双倍的市场限制。

如果接受这样的方案，即俄罗斯永远不是生产国，而是开采国，它只有资源出口或主要是资源出口，那么必须事先认可到21世纪末，有可能还要早一些，俄罗斯会牢固地处在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行列。我们准备安于这样的结局吗？我们是否准备使我们的孙子辈必定遭受这样的结局？

这就是为什么在有关俄罗斯“资源”前途的议论中有非常多的不负责任态度。

结论只有一个：资源的出口应当成为俄罗斯融入世界经济的起点。为发展成为现代化国家、作为全球经济的积极参加者的俄罗斯提供资金、经验和伙伴关系的合作联系。暂时没有发生任何类似的事情，而且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的错造成的。

问：融入全球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寻找自己的适当位置的任务意味着什么？什么样的位置是俄罗斯当之无愧的？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为此目的我们还缺少什么？

非常不简单的问题。因为全球化有几个组成部分，而其中的每一部分都各有不同。

金融全球化，在这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美元。在实力上真正能与它相比的其他世界性货币没有，估计也不会有。欧元以及其他别的货币都有局限性，暂时有局限性。但对于俄罗斯来说，主要的是，卢布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任何在金融全球化中占领显著位置的机会。也许，它将进行自由兑换，也许它在整体上固定下来，也许，变成与某些国家和国家集团公司关系中的结算货币。这一切本身很好，对俄罗斯也有利。但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世界人口的2.5%，同时提供世界产品总量的1.7%和不少于1%的科技发明、科技创新和研发，它的货币的位置和作用客观地

受到这一系列数字的限制。因此，在金融全球化中俄罗斯在可预见的将来只能有非常寒酸的位置。令人难受吗？非常令人难过。但现实就是这样。

在经济全球化中，情况更复杂一些。俄罗斯是世界上知名的原料和能源出口国之一。这里的生态潜能还很大：按照淡水和许多其他资源的储量我们在世界上都占显要地位。对这一切的需求将会增长。乍一看这很好。

但需求的增强，尤其是当它具有危急的性质时，有可能大大增加俄罗斯的政治负担。简单地说，会产生守住国家领土，保存国家财富的任务。并且不是保护免受来自外国的直接侵略（这一点不排除，但将太简单），而是就经济法律的要求和道德的要求而言的。而且在全球化环境下，以自己的主权为借口有可能是不够的，甚至起负面作用。我不想充当“卡珊德拉”但完全有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自己不能开发领土，不能合理支配它的财富，那就让别人来做。”在全球化环境下，这样的号召不当成侵略来接受，而是作为对理智，对经济合理性的要求来接受。你们比较一下对伊拉克事件的反应：一些人将它理解为侵略，而另一些人理解为合法清除危险制度，也就是说在对类似事情的理解与接受上世界已经分裂了。全球化正在形成一些观念，它们比不久前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更加复杂。

必须闯入工业品和服务的全球市场。没有人在那里等我们，竞争特别激烈，他们将非常顽强地反抗，我们的企业不得不学习很多东西，并为此也要支付学费。我不想说，我们不能够，但对这样激烈的竞争必须做好全方位的

准备。目前问题是另一种，即怎样保护国内的、本国的市场，而不至于把国内生产厂商完全挤出这个市场。

问题不仅仅在于我们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这些质量常常高于国外的，比我们习惯于考虑的还要经常得多。依我看，问题在于别的方面。

这是大部分国外的大公司无可比拟的更加强大的潜力，这些大公司在几十个国家有分公司，而且能够广泛调配资金。而且俄罗斯国家对待本国企业的立场……讲得好一些……有时很难认为它是无可争辩的爱国主义的立场。

然而在全球化经济中，如果不依靠国家，甚至最强大的本国公司日子也不会难过的。如果我们把“全球化取消国家的作用，把它的作用降低到以完成一系列技术和功能的程度”这样的议论当作真的，那么好吧，我们国家威望的丧失将客观地表明，在我国的领土上有另外一个在完成它的功能。功能是不会消失到什么地方去的。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政治全球化。全球化的世界秩序，与传统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相比，显然，在性质上完全不一样。全球化为把世界集结为一个整体，为装饰这个政治的和法制的整体奠定了基础。这暂时还是某种新体制的胚胎，但它已经有了。

19~20世纪的世界秩序（我们不必更深远地探寻历史）建立在几个大国的和睦关系上。突破战争之后的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体系和雅尔塔—波茨坦体系——所有这些都是依靠当时主要大国的协议和意志形成的。而且这些大国和它们的联盟在潜力方面大体都是可以

相提并论的。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美国甚至远远地超越了欧盟、日本。美国是唯一能马上在所有主要的活动领域起领导作用的国家，这些领域有经济、科学和军事领域。也就是说，美国的领袖地位有十分牢固的基础。现在是这样，100年之后将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也不想猜测。但这种状况把全球化世界秩序推向专横的组织。我和您已经说过，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了国家、民族的等级制度。

也就是说，一方面，有需要自己调整和向等级制度变迁的环境；另一方面，有这样的国家，它的客观局势和潜力允许它（不管我们是否喜欢这个国家）充当这种组织首领，充当“领导和引导力”。它做了这个，甚至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而不得不做。

但与我们习惯的秩序相比这完全是另一种世界秩序。俄罗斯的位置和作用在这一秩序中可以按不同的方式确定。在法律方面我们与美国是平等的。可在实际能力方面处在根本不同的重要范畴里。由此就能得出结论说，俄罗斯应当阿谀奉承地点头哈腰和“卑躬屈膝”。必须做到举止庄正尊严，但对自己的条件和任务有非常好的理解。比如说，在有关最伤脑筋的伊拉克问题上最近两年来俄罗斯的行动是非常适宜的。

与政治全球化紧密相连的是安全的全球化。曾经有个时候，国家自己保护自己或加入同盟来保护自己。后来找寻集体安全的时代到来了。现在这种寻找应当发展成某种完全新的东西。

如果我们把进入世界市场，进入民主国家的共同体作为自己的目标，把调整好与西方世界的伙伴关系和合作作为自己的目标，那么西方世界的安全就是我们的安全。可以不同意很多东西，可以争论，可以讨价还价，但全球的安全变得越来越统一，而且这不仅表现在军事衡量上和安全的力度上，而且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

民族安全应该建立在全球的安全中并在与全球安全统一中得到保证。在安全的问题里俄罗斯的能力暂时非常重要。但全球安全的建立应当考虑所有参加者的利益，否则，它的内部将是残缺的、不牢固的。遗憾的是，目前美国正在这么做，好像全球安全的目标是首先保卫美国或者只保护美国的利益。

美利坚合众国在试图将全球化“私有化”的过程中取得了成绩，尽管它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但他们在做蠢事。顺便说说，美国已经明显地开始筋疲力尽，而不得不向国际社会求助，不仅是为了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正式批准，而且就本质而言，是为了解决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国际犯罪、毒品扩散斗争中的现实问题，以及为了解决世界上某些地区社会政治问题 and 经济问题。

美国人在金字塔上面进行统治之后，没有成功地把人类按职位高低排好队。要是因为全球化过程的本身“按同一水平或等级”的原则将世界建成一个网络，而不是一个金字塔，那该多好。

近年来，反全球化分子的运动成了全球化必不可少的部分。我们必须仔细地看清楚它并且作认真细致的分析。

运动好像是反对其主导力量位于西方的全球化体系，但同时这一运动，根据所有情况判断，拥有不少的资金，拥有能使反全球化分子在全世界来往调动的大笔钱。

反全球化分子也不相同。有些人根本就反对任何的全球化，另一些人反对自然的全球化，而赞成服务于人类的“具有人性化的全球化”的各种方案。还有一些人只是反对西方世界，并看到在这里有多次声明自己立场的可能性。一部分社会民主派与反全球化分子有内在联系。总而言之，他们也是“全球化的”。我可以想象到，这一全球化运动与其说对事实本身产生怀疑，倒不如说是对全球化的方向和内容产生怀疑。

全球化最有可能导致的不是形成什么世界帝国、世界政府等等，而是导致一些地区更清晰的政治外形。

预测的全球化结果是十分艰巨的任务。我只告诉你们，没有这样的预测就未必能够确定俄罗斯的目标和位置。什么样的位置对俄罗斯最合适？……从根本上讲，当有人十分关心它占据的不是那个应有的位置的时候，这是不完全正常的。我觉得，尽管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在最近20年或20多年具有许多的复杂问题和困难（我们什么时候没有过困难呢）！俄罗斯也会用自己存在的事实本身来占住应有的位置。俄罗斯有保持这一位置的一切条件。

我的总的结论：俄罗斯会以不同的方式加入全球化，只是因为离开它没有任何实际的可能性。但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你想从它那里得到什么？

◎ 9 俄罗斯的“收缩”外交方针

问：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您在《历史的更新》一书中陈述说，在全球化环境下，国际政治问题和国内问题之间的界限会逐渐消失。最后的结果是不是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之间的界限也会消失？

可以用单音节词“是”来回答。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的划分“国内的”和“国外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会消失。但这样的回答当然还不够，因为在这里不同方向的过程结合得特别复杂，而且相互之间有矛盾。可问题不在于使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之间的界限消失。

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政治生活仍然主要限制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而经济生活则跨越国界。我指的不仅是跨国公司，而且从根本上讲是指整个活跃的全球经济——原料的流动、劳动力的流动、技术的流动、商品的

流动、思想的流动和资金的流动。政治任务的组成部分是，怎样组织好某一具体国家的公民在一定范围里的生活。而且当人们说“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时候，首先指的正好是政治领域。

但是，另一方面，全球化经济游戏参与者之间的竞争在国内经济活动中，也就是说，在政治生活中制造紧张气氛，制造一种爆炸的能量。这里的后果往往是，从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为争夺鲑鱼地盘的“鲑鱼战争”到一些最真实的战争都是由于石油或其他种类的原料引发的。为了保护经济利益，一些国际同盟被建立或瓦解。在这里最令我们伤脑筋的问题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国内经济发展的前景就取决于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这一问题。

俄罗斯面临历史的挑战，在这一挑战中，我们只能十分艰难地将“国外的东西”和“国内的东西”区分开。我们应当做到有能力有效地保护自己免受现有的和可能发生的外部威胁，保证安全，包括经济安全和领土的完整性，并以此保证我国每一个公民的生活利益。

但是，我们不能陷入孤立主义的诱惑之中。我们应当在全球化经济的舞台上与其他国家、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展开有效的竞争。俄罗斯是一个开放的国家。

问：按您的理解，什么是具有竞争能力的俄罗斯？

如果讲简单些，这就是能够有效参与全球化过程的俄

罗斯。这里的原则也和人类生活的原则一样：“想成为幸福的人，你就去努力吧！”

具有竞争能力的俄罗斯，这是一个商品在世界上享有声誉和需求的国家；是一个别人想来旅游和工作的国家；是一个投资者愿意进来投资而且没有什么风险的国家；是一个别人愿意听取它的主意、重视它的意见和利益的国家；是一个人们愿意看它的电影，读它的书籍的国家；是一个对世界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进程真正产生影响的国家；是一个将它的象征符号印在背心上，印在不干胶海报、标语、布告、标签、邮票等上面，以及印在其他商品上面，而且人们乐意购买这些商品的国家；是一个很多人不喜欢的国家，因为它聪明、成功、繁荣昌盛。

我故意十分混杂地把一些似乎毫不相同，甚至不能并存的东西列举到一块儿。但我深信，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不能只用经济标准来衡量。经济固然重要，它是很多东西的基础，但甚至一些大公司的竞争能力也不只是取决于经济成分，这一点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尤为正确。

国家可能在经济方面发展顺利，在对外贸易方面取得巨大的成绩，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显著位置，但即使这样，它对世界的发展可能不产生任何影响，或者只产生最小的影响。我想，能够轻松地举出至少3-5个国家，它们在最近25-30年里经济发展迅速，但在其他方面只有非常不起眼的作用。它们在经济方面具有竞争力，这是巨大的成就。在其他方面，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我深信：国家的竞争能力始于意识形态。但只是不要

停留在意识形态上。意识形态动员和鼓励“自己的”社会，给社会提供理性向前发展的方针。意识形态给世界提供新思想，确定时代的精神氛围，决定世界的思想活动，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其他观念和思想的形成。

有人可能会反对我：对于俄罗斯来说，哪怕只在经济方面获得竞争能力，那也是好的。光是这一点，对俄罗斯来说就已经是好事，是成就。而意识形态和一切其余的东西都是奢侈品，是为最富裕的和最顺利的人准备的。一个自己把自己和把自己昔日的盟国引向灾难的国家能够把世界带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只准备同意这些反对意见的第一部分，我经常有机会听到和读到它们。俄罗斯应当成为具有经济竞争能力的国家，这一点毋庸置疑。俄罗斯也应该从这里得到效益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这也是不容争辩的。但后者隐藏着矛盾。20世纪下半叶最有竞争力的国家是那些劳动力价值十分低廉的国家，而且这些劳动力具有所需的专业技能。但低廉的劳动价值也就意味着人民生活的低水平。只要生活水平一提高，劳动就会升值。为了在其他方面获得优势，必须引进竞争机制，如：在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方面、技术方面、文化领域、科学潜能等方面。

实际上，我们眼看着很多国家不仅成为了具有竞争力的国家，而且在这一竞争中取得了胜利，硬把自己塞给了历史和人类（而且没有使用军事力量）。他们不是在特别好的环境下开始的，而多半是相反，从“零标记”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和日本就是这样的国家。“文

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国也是这样的国家。在当时，看着这些国家，甚至都不能想象，几十年后会是个什么样子。

然而，很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像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在不同时期都取得了成功？只是因为那里有廉价的劳动吗？这样的话，还有几十个国家的劳动比它们的更便宜。不，这里有取得民族成功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得到国家政策的巩固。

竞争能力的问题应当从几个层面来看。首先是国家的总体经济气候：法制的气候、稳定的局面、可预见的局面。这种气候不仅能引起全世界对国家的信任，对国家经济的信任，对国家主要经营主体的信任，而且所有本国的公司都能够更有信心地、更加牢固地站稳脚跟。而这些是从事国外管理事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即使是最大的国家公司，如果它随时都有可能遭受背后的袭击，它又怎么能够成为在国外具有竞争力的公司呢？上面所说的都属于各地区、联邦主体的竞争能力。我甚至没有拿地区充当经营单位的情况作例子，它来到进口市场上，分配大量的订单等。我讲另外一种情形，我们拿一个建立在某一经济实力较弱的、靠政府补贴过日子的地区的公司为例。这个公司很好，人也精明能干。但他们要想取得外国合作伙伴的信任，与莫斯科的同类公司相比要难一百倍。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业务上的正派，这也是经济竞争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吸引谁：吸引有名望的生产商、认真的长期投资者、合作伙伴，还是吸引各种各样的冒险主义者、犯罪的和半犯罪的资本？如果经济和保障它的机构

被贿赂收买了，那么当然是吸引后者。在引进形形色色的令人怀疑的公司和个人方面，俄罗斯的经济在 20 世纪 90 年代是非常具有竞争能力的，可国家的损失要用数百亿来计算。

国家应当具有竞争能力。它应当保护，而且想保护自己在国外的公民和法人的利益，为此它应当具有大量所必需的资金和条件。它应当有预见，应当对哪怕是未来 10 - 12 年（一般来说至少 25 - 30 年）的世界政治和经济，国际交流的主要参加者的立场和利益做出预测。而且应当把这样的预测变成社会财富，也许是全世界的财富，就像美国中央情报局或探索与发展公司所做的一样。

我们回到您提出的有关使界限模糊的问题。界限不仅在国际政治问题和国内问题之间消失，而且还在国家的国外环境和国内环境之间消失。而这是，请您同意，这是某种原则上不同的东西。在这种环境下，国家首先应当在自己家里具有竞争能力，在自己居民的眼中应当具有竞争能力。它不再是信息的垄断者。同时管理体制的合法性和国家本身的合法性在人民眼中越来越强地取决于国家在自己领土上的有效性程度和具有竞争能力的程度。如果政权机关没有效率，那么社会也将永远不会有效率。

顺便说一下，这也是与外国人交往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作为个体的公民、外国的投资者，还是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这并不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它自己的公民都不信任它，如果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制的行为能力水平不能使自己的公民感到满意，如果自己的公民大部分对国家实行的

国内方针怀有戒心，那么它将十分艰难地使外国人相信，这样的国家一切正常。

作为整体的社会的竞争能力也非常重要，存在于社会中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的竞争能力也很重要。国家和人民十分关心公民社会是否已经形成，它在解决城市问题、州的问题和整个国家的问题中是怎样表现自己的。当然，在这里可以回忆一下伊万·蒲宁的名言：“我不是让人人都喜欢的十卢布金币。”当代的年轻人，也许会把一个十卢布金币换成一美元。这个短语用来形容国家比用来形容一个人甚至更加真实。但我们千万不要陷入另一个极端：“爱我们这些一无是处的人吧。”如果人们不喜欢他的国家，那就一定会影响国家的竞争能力。

在全球世界的环境里，不仅俄罗斯“走向世界”，进入世界经济、世界政治和文化，以及其他活动领域，而且世界也来到我们这里，每一天都是如此。19世纪或20世纪上半叶我们可以这样想：在外部世界我们想办法去竞争，而在国内，在自己家里，我们自己是主人，在这里我们没有竞争对手。

极简单的任人唯亲的时代早就过去了。竞争的天地是统一的。国产商品，就算是香肠、电视机或汽车，首先应当在国内卖。反之，如果这些商品在国内卖不出去的话，那么就没有必要运到国外去。

我再说一遍：在国内没有竞争能力，也就没有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这对于大家，对于一切产品都一样，而且竞争的压力首先会在我们国内更广泛的领域里得到增强。

我们讲的这一切以民族思想为归宿。这种民族思想早就成为了世界上具有竞争能力的因素，并且不是“之一”，而是最重要的因素。在美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就承认了民族思想的这一品质。被社会承认的和被社会赞同的民族目标是社会动机的主要来源，是那种没有能够用别的什么东西（如物质刺激、监督、行政压力）替代，不可能用别的东西替代的因素。不言而喻，思想、目标不是动机的唯一来源，但是，我认为，它们是主要的来源。要想成为这样的来源，它应当得到社会或最积极的社会阶层和集团的真心诚意的赞同。

未来没有被硬性规定。为了让俄罗斯成为具有竞争能力的国家，我认为，需要智力总动员——研究制定俄罗斯“方案”，在这一方案里大致规定出未来40-50年的发展目标，确定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形式和阶段。当然，这里谈论的不是“当今这一代苏维埃人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口号的新版。但是，没有战略计划，准确些说，没有战略设计，我们就摆脱不了困境。德国、日本、中国正是从这一点开始的。当现在富有生命力的一代不为自己国家公民的现在和将来的保障操心时，就推动不了任何东西向前发展。顺便说一下，共产主义蓝图没有实现，正如后来所弄明白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打算依靠我们自己国家的公民去使全人类得到幸福，让全人类过上幸福生活。没有民族的“利己主义”是行不通的。说实在话，这种“利己主义”，依我看，是一个国家所必需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

问：在当代俄罗斯有没有能够保证俄罗斯的竞争能力的社会集团？

只有我们国家的社会精英（政治的、经济的、科学的、文化的、地区的）才能够表达和实现这一任务。他们也能使俄罗斯变成一个绝对没有竞争能力的国家，能导致俄罗斯解体 and 消失。

我们将不去骗自己，不去骗别人：苏联就是被社会精英上层人物搞垮的。大家都记得很清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发生了一些什么，是怎样发生的。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完全不在于从帝国“逃逸”出去。只是历史的惯性在后来把俄罗斯联邦阻止住了。谁也不能忘记，也忘不了车臣的分裂主义。要知道他们已经有了开始实现的“远东共和国”或“乌拉尔共和国”的方案。

我们将以有些不一样的方式提出问题：现在谁真正需要俄罗斯的竞争能力？为了保证俄罗斯的竞争能力，谁能够做些什么？

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精英的人实际上就是社会的上层。没办法，已经这样形成了。因为革命，社会阶层被弄乱了。处在上面的大部分人对现有的情况感到满意。很少有人去考虑未来。为什么不成立俄罗斯的探索与发展公司这种社会精英的智力弥补物？不，只需要为政治人物做广告宣传的组织和与选民“工作”的政治工艺技术……

谁需要竞争能力？首先是国家的公民，成千上万的公

民需要。因为这是工资，是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是我们子孙的未来的保证。在一个满怀信心沿着经济发展的楼梯前进的国家里，能够更轻松地给孩子们提供教育机会。在这样的国家里，教育、科学和文化将有需求，而且会得到适当的回报。国家的竞争能力能改善公民的社会自我感觉。每个人都愉快地意识到，他生活在一个在世界上能引起尊敬感的国家里。

普通的“公民”比任何精英和集团的利益更关心俄罗斯的未来。他们不得不从战略范畴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他们不能不考虑自己的未来，尤其是要考虑自己的孩子们和孙子们。

20世纪70-90年代的事件和过程似乎把一大部分居民与国家分离开了。越来越多的人不去参加选举或者投票反对所有的人。他们失去了对国家制度的信任，失去了对私有经济成分和银行的信任。在人民中间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普通人现在没有力量，没有权利，什么东西也不取决于他。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人天生就有信仰和希望，天生就追求可信赖的关系。我们回忆一下，我们现在的俄罗斯总统2001年是怎样在信任和希望的基础上担任总统这一职位的。人们在期待，在寻找信号：“值得信赖！”当大家确信，这个信号的确不假的时候，对他做出了回应。在这种信任的渴求里还有另外一面：人应当明白，他自己，而且首先是他本人是自己未来的创造者。这样的理解是很难产生的。在俄罗斯，不仅在我们不远的过去长久而残酷地

迫使人们不去这样做，而且，依我看，还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年轻人和做生意的人，尤其是做小生意的人，已经对自己有了新的感觉。

这种人民的积极性和自尊心的觉醒是一个慢慢起作用的，但却是最重要的因素。当第一批正面的特征开始出现（人们使城市、区具有完善的设备，而且不允许它后退，取得了公平的决策，在选举中没有放过一个有犯罪前科的候选人，还有很多其他事情），沿着他们的轨迹社会积极性就会急剧增长。

我的其他一些希望与祖国的国情紧密相连。遗憾的是，在最近10-15年或更短的时间里真正挣到自己财富的人不是很多。一些资本经常是由一些非法的和非经济的方法创造的。由此也产生了使用这些资本的相应的实践。但逐渐地在俄罗斯出现了真正的生意，而且它逐渐地开始意识到，没有具有竞争能力的国家，它在世界经济，甚至在俄罗斯的地位将永远是“第16位”。这一商业已经不只是渴求竞争能力，而且能够达到它。主要的是，把它从犯罪行为 and 贪污腐败分子的金融压力和政治压力下解放出来。

最后，高度职业化的政治精英和俄罗斯总统需要具有竞争能力的俄罗斯。对于这些人来说，国家是他们自己坐着的那根树枝。这是一根腐朽的树枝，还一根细细的、脆弱的树枝，也就是说，俄罗斯政治家的立场也是这样的。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外国都是如此。

需要爱国主义的、具有行为能力的最高政权（联邦的

和地区的)，祖国的商界和大部分公民的长久的政治和社会的同盟，正如常言所说的——团结。这种同盟有可能只是爱国主义的。这个同盟一旦形成，就将出现一个具有竞争能力的俄罗斯。

而社会精英们……他们必须意识到自己依赖于国家的公民。要知道，精英永远只是一部分，他们不能独立于自己的“基础”之外而存在。是对自己的经济胃口加以自我限制的时候了，是对自己准备使用政治专横加以自我节制的时候了。对俄罗斯来说，这是十分需要的。

问：经常可以听到，俄罗斯具有特殊的命运，她是一个枢纽，是西方和东方的桥梁。您是否觉得，在这些公式的背后是不是隐藏着逃避回答关键问题的企图：是融入全球化秩序，即进入规则经常发生变化的系统，还是与全球化相抗衡？

我承认，我不知道“桥梁”国家。虽然我从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领导人那里听说，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也都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桥梁”。因此，看样子，在文明的“桥梁建设”领域有某种竞争。

让我们尝试想象一下担当类似角色的人：“桥梁”人、联系环节……如果保证这样的联系是他的主要工作，那么这个人要么是别列佐夫斯基那种类型的冒险主义者，要么就是一个机关通信员、一个替人跑腿当差的小男孩，最好

的情况也只是一个邮递员。当然，这也是必需的功能，但我想，俄罗斯能够做更多的事情。而且到目前为止不知道东方和西方在怎么直接进行接触。不管怎样，我还没有机会听到过，日本和美国，或中国和欧洲请俄罗斯做它们之间的联系环节。

然而，如果认真地讲，所有这些关于正处在某种罕见局势的俄罗斯的言论都是把俄罗斯孤立于世界和全球化进程方案的一部分。不一定要使这样的计划保存在三重保护的保险柜里。沉默的相互理解就足够了。这些议论的逻辑是十分简单的。让西方搞自己的全球化，而东方抵抗这种全球化，捍卫自己的“独特性”。而我们俄罗斯占领世界的“中间”位置……这个英国人是怎样写的？是心脏地带？“世界的中心！”我们将受到地缘政治投机的鼓励，将从两方面获取最优秀的东西。总的说来，会得出以色列的那种东正教—伊斯兰教的居留区，而且是自治居留区。我希望，这些思想在我们这里将停留在政治光谱的边缘部分。

“桥梁”的思想是回避真正的问题，回避问题的准确界定，回避研究和贯彻执行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但我认为，问题根本不在于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做出选择。据他们说，让我们最后来决定，我们到哪个农村去，我们就会朝那里走去。

问题更深刻一些：俄罗斯不“属于”西方。加入“北约”就等于在一个“熊窝”里有两头具有可以相互抗衡的核潜能的熊，而在其余的方面是很不相同的。“二熊

不同窝”，这在俄罗斯是人人皆知的道理。我们去消灭自己的核潜能或把它降低至英国和法国的水平，可俄罗斯需要这样做吗？与美国的核潜能联合成一个完整的机构，美国人准备这样做吗？我们自己会同意这样做吗？而且北约保证自己成员国的边境不受侵犯。美国和欧洲用什么方式能保证俄罗斯和中国的边境，俄罗斯与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边境不受侵犯？

参加欧盟……如果接纳我们到那里，那么我们的空间，我们领土上的资本消耗率，我们的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会怎样影响欧洲的经济形势和社会形势？就在前不久由于要经过立陶宛去加里宁格勒——一共才 300 公里，却产生多少麻烦！而这里实际上与独联体国家的边境、与中国的边境是开放的。俄罗斯与欧洲暂时只谈建立统一经济空间的事宜不是偶然的，而且只谈草案，对这个草案需要长时间地和深入地开展讨论。

但是，如果俄罗斯加入北约或欧盟是艰难的任务，并且暂时还不太现实，难道我们加入与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东方的国家的某种经济的或文明的同盟，任务就会不怎么复杂吗？再说，我们虽然是在讨论加入西方的同盟和机构，不但如此，我们还在发展和他们的伙伴关系，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就有各方面合作的经验，同时依靠一系列复杂的合同和协议，这些合同和协议涉及从军事到旅游的所有领域。与“东方”国家合作的强度、规章和意义都不能与所有这一切相比。

我并不反对与东方进行最紧密的联系。尤其是，我过

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俄罗斯政策的东向政策和西向政策不应当对立。它们能够，并且为了俄罗斯的利益应当相互补充。但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对我来说主要的是，要有具体实际内容的关系，是它们与俄罗斯发展的联系。

与全球化做抗衡也就是与世界秩序进行斗争。不能与历史做斗争，不能与世界发展的进程做斗争，这一发展进程的所有机制的规律我们都不知道，都不明白。我们已经与资本主义进行过斗争，结果表明，未来的非此即彼的选择对它来说还没有成熟，无论在实践的层面上，还是在理论上，或是在人们的素养、习惯和文明举止方面都没有成熟。现在很清楚，这种必择其一的选择将区别于20世纪初或中期的观念，其区别的程度大概和当今世界区别于19世纪幻想家的预测一样，有可能还要更强烈一些。

依我看，原始的前提是不正确的——“参与全球化，还是不参与”。俄罗斯已经早就在那儿了。问题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们将有意识地像对待客观现实一样对待全球化，我们将致力于自己确定自己在全球化中的坐标、利益和目的，而且努力去达到它们，还是与那部分社会和政治方面消极怠惰的俄罗斯人一样，指望贵族，同时总是唠叨抱怨，对什么都不满意？我本人认为，我们的习惯、政治文明和一般文化将被我们带进对待全球化进程的态度上，从而构成对俄罗斯在与全球化联系中的最大威胁。

我们应当自己决定自己的地位和立场。我们应清楚地，而且尽可能诚实地说明，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在真正

地追求什么。并根据自己的志向得出相应的结论。我们必须利用全球化，为了国家稳定地向前发展，俄罗斯必须参与全球化。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俄罗斯在参与这一具体的过程、具体的现象，这非常好。不过，我们必须想一想，我们是否需要这种参与。如果它是违背俄罗斯的利益，那么就要努力去改变俄罗斯参与的条件和形式，或者退出它，但不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

某些力量的中心，还是那个美国，致力于控制全球化的进程。现在全球化似乎在一个网络中进行。这张网是由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文明“内容”的子系统构成的。这些子系统具有自治权，彼此之间具有横向联系，而且不很牢固，因此全球化的方向、形式和结果问题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俄罗斯的历史任务不仅仅是在于参与全球化进程，而在于对全球化进程产生影响。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跳到汽车的踏板上，而在于必须挤进控制台，对前进的方向施加影响。顺便说一下，如果有人认为，坐在最近的山冈上也能产生影响，那他就错了。只有身处内部才能够对全球化进程产生影响，而不是在这一过程之外的什么地方。从这一意义上讲，没有，也不可能，比如说，是否必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性问题。在这里，问题只是战术性的和技术性的。

重要的也不是是否改变规则，而在于规则会怎样改变。如果按照公认的程序，按照相互协商同意，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如果这种变化及其后果能够合理地预测和计算，那么就让它好好地去改变。也应当如此。如果是按

照某人的意思，急剧地和突然地，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那么就必须与这种专横做斗争。但只是反对专横，而不是反对全球化。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当然，还必须使俄罗斯的声音，在所有这些规则的变化中变得越来越洪亮，而主要是要变得越来越清晰明确。这不仅要求外交官们的积极性，而且要求发挥实业界、舆论界和学者们的积极性。必须善于预见俄罗斯未来的利益和需求，预见到有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必须用法律上准确的、政治协定的语言及时表达自己的目的和利益。必须善于与那些在全球化框架内在利益方面与俄罗斯相近的国家进行接触并协同动作。最后是必须学会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特殊坐标中进行思考和行动。不像在对待加里宁格勒的问题上所做的那样，所有未来的问题从1992年起就清楚了，可过了10年之后才恍然大悟并开始狂热地采取措施。

问：在解决把国家“列入”全球化进程的任务时，看样子，我们应当特别小心地注意自己的一致性，因为除了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价值领域和思想领域的全球化也会不可改变地、不可避免地到来……为了给这一过程产生影响，莫斯科在做什么？

价值观和思想领域的全球化不是“可能到来”，而是早就发生了。在过去某个时候所有的价值观和思想产生

了，并在氏族、部落、乡村的范围里存在下来。只有在那里它们才发生了作用。

随着国家的形成和宗教的出现，规范和价值观就走出了乡村和边区的范围。但进入到新的笼子里，比原来的笼子更宽敞一些的笼子里，但仍然是笼子。对于自己同部族的人来说，对于同一信仰者来说，价值观和规范，政治思想和文化内涵都是相同的。这可是非常长久和艰难的过程！

世界宗教推出了自己的价值观和关于规范的理念。这减轻了各国之间价值观和规范的一致，但也在不同信仰的人和民族之间建立起了至今有时还难以克服的障碍。

全球化是这一螺旋线的下一圈。总的来说，它的使命是导致出现全人类统一的价值观和思想。这不是说，所有其他的东西就会消失或应当消失。其他东西当然会保留下来，就如同在每一个村庄、每一座城市至今仍然有自己的规则和风俗一样。但在它们的上空也出现了全人类（所有的国家、主要的信仰和教会、所有的或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承认和赞同的规章和价值观的网络。完全意义上的“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在这一术语中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好的或不道德的东西。如果它引起不愉快的联想，那么就让我们说 *всечеловеческий*（全人类的），而不说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ий*（人类共同的）。没有这样的价值观，世界就有可能走进人人作对的状态，就会很可怕地想到，这种敌视态度会以什么结束。国际恐怖主义已经向我们表明和证明，否定和推翻全人类共同的规范会导致什么样的

后果。

另一个问题是：全球的价值观和思想将怎样形成？如果是在各种文化和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和磨合的过程中形成，那么就谢天谢地。如果有人企图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把这些观念冒称全人类的，那么它们仍然是强加于人的，而不是共同的。也就是说，在危机到来时新的全球世界就会开始崩溃，很多地方性“村庄”的规则和价值观将会起作用，这就有可能产生最悲惨的后果。当苏联解体时，在它的不同地方一些古老的规则和价值就是这样复苏的。

存在有不同的规则，有法律的规则和宗教的规则。它们有可能吻合，有可能有区别，有可能相互矛盾。但有一点把它们联合在一起：这样的规则告诉一个人，建议他，要求他，他应当怎样表现自己。“应当”就是说，他的确有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表现自己。不一定与规则相违背，但与规章有区别，与信仰、道德、意识形态、法律的要求有区别。

当某一社会集团、一部分居民得到不仅把自己的规则强加于别人，而且甚至把自己的规则冒称为万能的规则的可能性时，关于规则和价值观的观念就开始“模糊”起来。当一个普通的、正常的14-15岁女孩在一个低级趣味的杂志或年轻人的报纸上读到对流行歌星的采访时，她似乎在承认，在14岁时已经感受到了一切。这样的女孩开始感到自己落后于时代，感觉自己是一个不完全符合要求的人。她急于弥补“教育的空白”，顺便与女朋友分享自己的怀疑和成就。14岁前“明星”就尝试了一切，或

除了他或她之外，谁也不清楚。但对道德规范的模糊化开始了。这个例子虽然是个别的、典型的，但对我们讨论的主题来说，很能说明问题。

为了预防类似的过程，我作为市长能够在莫斯科做些什么和想在莫斯科做些什么？但在尊敬自己的城市里和国家里发生同样的事情。大众传媒中明晰的礼仪规章；没有任何间接的、隐藏的或者十分清晰的毒品广告；没有任何淫秽作品在公开地合法出售。就像在所有文明的国家里一样，在俄罗斯应该有有关于性犯罪的法律。必须把对儿童淫秽作品的需求认定为犯罪，把生产和传播色情鉴定为严重犯罪的专门条款写进刑事法典。目前，只有在我国和泰国没有这样的法律条款。色情内容的产品，应当只能在严格限定的地区和一定年龄范围内允许销售。啤酒和各类白酒，照样只能在取得许可证的机构或家庭饮用，而且必须有一定的年龄限制。无论如何不能在地铁和街上饮用。但没有必要走极端，不要从实际上什么都允许做过渡到全面地禁止，这样做也是有害的。这样的禁止实际上也实施不起来，会成为犯罪分子和贪污腐败分子捞取好处的地方。正常的、经过检验的措施是众所周知的，它们在欧洲、美国、日本、中国……到处都在使用。我们没有必要再去发明自行车了。

问题不在于，所谓的社会精英原来没有能力给社会、给青年人提出生活的准则。社会精英本身在我们这里至今还没有。暂时甚至还没有确定未来俄罗斯的精英进行生活、发挥作用和得到再生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文化基础。那

些在最近 12 年实际上在履行俄罗斯社会精英职能的人们随身带来了规章、伦理和道德规范。当然不是他们中的所有人，但是很多人。

认为在“黑色”经济世界、“黑色”政治世界、半公开或全公开犯罪的世界里没有规章、伦理、道德标准是不对的，这些东西在它们那里也有，只是它们的规章和道德与正常的社会不相容。既然规章的侵蚀程度已经很严重，那么就对民族安全产生了威胁。如果一个拒绝贿赂，拒绝诡计的人看上去是特例独行的话，那么社会已经在对反社会规章的不尽职观察中走进十分危险的境地。对俄罗斯的最大威胁就隐藏在此。

我们如此害怕在全球化面前失去的而且暂时还没有形成的一致性根本就不是由选择“与西方和与全球化”一致，还是“反对与这两者的一致”来决定的。这一选择的本身是从国家最积极的公民自我视为同一那里派生的。它取决于那些事实上被作为整体的社会最上层和最积极的那部分人士所接受和分享的规章和价值观。实际上我们信奉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价值观，信奉人、社会和国家彼此负责的价值观，信奉民主和市场的价值观，这些我们都能在西方和东方找到志同道合者的认可。我们把贪污腐败、不尊重法律、不守法制和肆意妄为当作规章来接受，我们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包括西方在内，也都能找到志同道合者。

问：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现在占有什么位置，在未来 10 年又将占有什么位置？我们是否会成为后工业化世界的原

料附属品，或者去追求在后工业化世界中自己的位置？现在和未来对我们、对国家的发展和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将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如果国家依靠石油和天然气管道过日子，与此同时稍微做些木材和武器出口的买卖，那我们不是原料的附属品，又是什么呢？不必一连几十年的猜测“我们会成为什么，还是不会成为什么”，而要准确地表达我们的战略任务：结束国家能源和原料资源原产地的地位。

这不是说，必须停止出售这些资源。只是需要使作为国家外贸收入来源的原料出口和能源出口，其他自然物资的出口从联邦预算中的第一位移至哪怕是第三位至第五位。

要知道，如果整个预算取决于世界石油、天然气、金刚石的价格，那么国家的发展，它的速度、内容、方向，甚至俄罗斯将发展还是不发展，所有这些原则上都可以从外部控制。不是对这一发展产生影响，不是妨碍，甚至不是简单地帮助它，而就是控制！是意识到这一点和做出结论的时候了。

俄罗斯的人口占地球总人口的 2.5%，但我们在世界总产值中只占大约 1.7% 的份额。也就是说，比俄罗斯人口在地球总人口中的比例要低得多。美国的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 4.5%，却提供 20% 的世界生产总值。也就是说，简言之，一个中等水平的俄罗斯人的生产（当然还有消费）正好比一个美国人的生产与消费少 7 倍。科学上的

差距，尤其是创新方面的差距，即在把思想和发明转换成产品和工艺过程中的差距，从根本上讲成了荒唐无比的事情。

当然也有其他一些过程在进行。俄罗斯的资本被投入到最大的跨国公司，投入到世界的不同地区。在国内市场的投资明显出现危机的时候，资本的输出并不一定是坏事。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不能够取消全球化的逻辑。俄罗斯的资本，包括国家公司的资本参与了在世界不同地区，直至阿拉伯半岛的原料开发和加工的项目实施。俄罗斯的资本渗透到不同国家，其中包括发达国家的经济中。我们只拿一个俄罗斯公司收购美国加油站网络为例，拿俄法共同研发和生产歼击机等事实为例。俄罗斯资本的扩张将继续。也有回应的过程，外国资本的扩张，准确些说，非俄罗斯的资本进入俄罗斯。我们在莫斯科感觉到了这件事情所起的良好作用。2002年投入俄罗斯首都的外国资本总额达到80亿美元。根据今年的初步统计可望达到120~130亿美元。莫斯科和整个俄罗斯对这种双边的资本扩张非常感兴趣。

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时刻记住两个问题。第一，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外国该把资本投入到什么领域。您说得对，有风险，投资会进入采掘领域、原始加工和原料运输领域，而这些领域从根本上讲是死胡同，原因很简单，从历史前景来看，任何原料来源都会耗尽的。也许，这里谈的是要把俄罗斯的资本投向非原料领域（不管是在俄罗斯，还是在外国），投入科学，高科技领域，等等。第二，

任何投资（外国的和俄罗斯的）都有社会效益问题。罗曼·阿布拉莫维奇购买了英国的“切尔西”足球队，尽管我喜欢足球，但“切尔西”足球队不是高科技。当然，楚科奇的省长使用自己的钱，这是他的事情。但这些钱已经离开了俄罗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资本为俄罗斯社会服务，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和我们国家的共同进步。

局势是十分严峻的。我们现有的这种脱节被缩短了几十年，同时指望偶然事件，指望市场的良好影响是不行的。今天的俄罗斯还很薄弱，而在自由市场上弱者是被强者吃掉的。市场的规律就是这样，你不能去违背这些规律。此外，人口学家预言，到2050年俄罗斯的人口将从现在的1.46亿减少到1.14亿。谁将去克服这一脱节？我深信，没有国家的长期战略，而且是包括俄罗斯发展的所有方面的战略：人口和经济、文化和科学、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在国家振兴和巩固它在世界的地位这一事业上实现质的突破是不可能的。必须现实地和诚实地看待事情。指望西方迟早进入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将要垮台，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的地位将得到巩固，知道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最好是去赢彩票，机会将更多，也不会那么危险和缺乏道德。

我相信，如果俄罗斯出现振兴国家和发展经济的长期战略，那么到本世纪中叶缩小差距的规模是现实的。不是消除差距，而是缩小差距，而且是大幅度地缩小。必须摆脱过多的和毫无理由的胆怯，这种胆怯在我们这里与教条主义稀奇古怪地结合在一起。

最近10年来我们总是在道歉，总是在给我们提出的框架和条件下调整自己。我们有以另外一种方式提出问题的道德权力和根据。我们有权对世界说：“我们在没有严重的国内，尤其是国际冲突的情况下成功地解除了20世纪最危险的一枚定时炸弹。我们为这一共同的胜利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因此我们有权从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那里期待和要求对待俄罗斯的特殊态度。我们有权指望对这一历史功绩做出适当的评价，指望能理解我们的困难、特点和我们发展的无条件性。”

这种立场与最后通牒毫无共同之处。如果您愿意的话，这是对俄罗斯联邦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直接的和诚实的描述，是我们对待全球化问题的立场的直接和诚实的描述。但是只有当俄罗斯最终得到现实的长期发展战略时，才有可能占据政治立场。否则就有可能感到难为情。人们会这样回答我们：“是的，我们理解你们的处境，准备支持你们的计划和创举。你们具体想要我们做什么？”而我们不知道。在苏联存在的后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不严肃，也很难为情。

问：如果仍然要求表述狭义的对外政策的方针，您认为是怎样的？

首先和主要的是，我要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一点：培养

出俄罗斯民族发展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完全不应当与最近15年我们所接受的价值观（民主、市场、自由主义思想和公民社会的思想）相对立。这一切对于俄罗斯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和必需的。但这些思想我们只是从国外引进，而必须走得更远一些，把它们与俄罗斯的未来融合在一块，有可能不只是与它的未来融合。我们的一致性暂时主要建立在否定之上。我们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完全的自由主义者；我们想保全我们的、与西方有着不十分明显的区别；我们反对国际恐怖主义……这一切本身是对的，也很好，但还不够。为了顺利地前进必须形成许多个“赞成”。这样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在社会上、在党派里、在国家中。

第二，俄罗斯的发展应该成为主要准则。正是发展的目标和具体的任务告诉我们或向我们提出，俄罗斯应该在什么地方出现，应该与谁发生联系。需要从对外政策给国家的振兴和复苏做出贡献的立场出发，科学地研究制定俄罗斯对外政策有效性的准则。发展是俄罗斯的战略目标，也是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战略目标。只有那种实实在在推动这些目标实现的对外政策才是有益的和正当的。

应当摆脱在国际事物中按照“或者——或者”的原则思考问题的习惯。相反，独联体的巩固、与欧盟的接近、有充足理由的发展经济关系、在所有有可能产生结果的方面进行合作。与西方建立伙伴关系，发展合作，与其他国家和其他大陆建立伙伴关系。与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而且能够准确地、无懈可击地表达有可能出现的分歧及其

原因，使用一切可能的政治手段解决这些分歧。

必须开始认真清点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或者已经遇到，或者在最近一些年即将碰到的那些国际问题和世界性问题。核武器是否有前途，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否有前途，如果有，那将是什么样的，由此得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应当做些什么？我们应当借助什么样的技术手段与国际恐怖主义和毒品犯罪做斗争？怎样衡量这场斗争的效率？这些问题的清单可以继续下去。

最后一点，必须改变对待俄罗斯在将来有可能面临的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必择其一的准则。我们是怎样按照传统习惯于衡量这种必择其一的选择的？主要通过“带零位数的游戏”进行的：对潜在敌人不好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就是好东西，反之亦然。但世界变得比以前复杂得多了。同一个国家经常在一些问题是俄罗斯的伙伴，在另一些问题是论敌。怎样和这样的国家发展关系，把它归为哪一范畴——是朋友，还是非朋友？

答案是非传统的。对于俄罗斯和她的对外政策来说，所有那些把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策略扩展至未来的东西都是好的。如果国家、经济和对外政策的“自由级别”的数量增加，也就是说，取得了成绩。如果减少了，就必须分析原因。如果它几十年原地踏步，这就是停滞不前，在这期间有多少很好的合同和协定我们没有签订。

现在我们在经济领域、国家建设、国内生活、法制或对外政策方面所做的一切是在为俄罗斯的未来奠定基础，超前好几十年。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不是小事，不

是临时结构，有人说，好吧，以后再重建，现在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性，我们暂时紧张一点，以后就会轻松一些。没有这样的事！这是最严肃认真的事情。在不好的基础上建成不了什么有用的东西。你们去问问任何工地主任。

10 莫斯科的定位

问：莫斯科现在被国内和国外很多人，看成是陷入苟且度日的危机的国家里的小岛，这个岛的特征是稳定、顺利和文明的生活方式。莫斯科保持着，甚至在加强其在科学和教育方面的领先地位。莫斯科依然是世界上高知识水平的首都之一。您感觉到莫斯科被融入全球经济吗？莫斯科在全球经济中地位如何？它能影响什么？丧失了什么？

我经常能感到莫斯科被纳入全球经济，被纳入的程度有时大有时小。但我认为，现在不适合谈丧失的东西。过去，莫斯科从来没有远离欧洲生活，即使在它不是首都的200年内也如此，而欧洲当时就是全世界。

从另一个角度说，莫斯科——我指的是城市，不是苏联或俄罗斯——从未以独立的身份进入全球经济，也从未对全球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在苏联时期，莫斯科没有也不

可能有独立性。一切都要通过党政机关按照计划集中的方式来进行。当我回想起所有的莫斯科人曾经都被发动到蔬菜基地里劳动，我就希望这样的事情永远都不要重演。

如今，莫斯科还是没有独立进入全球经济，只是作为俄罗斯的一部分，通过联邦和恪守法律来融入全球经济。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悖论：“融入”经常被感觉到，而且感觉一年比一年强烈，但是莫斯科参与全球经济的独立性却没有。是的，最近40年来我们生活在全球环境下。但生活在全球环境里是一回事，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并有所影响是另一回事。

莫斯科不是稳定的小岛。最近12年，莫斯科是果断的、目标明确的、非布尔什维克式的改革的登陆场。这些改革早就开始见效。正是这些改革和执行改革的决心保证了我们拥有被误认为是稳定的东西。如果要说是稳定，必须说是有活力的稳定，是发展的稳定。莫斯科有资金实现社会计划、建造住宅、修缮基础设施，因为资金是自己挣来的，因为市政府不害怕和市民建立全新的、开放的和民主的关系。

流传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莫斯科在财政上的一帆风顺得益于在土地和房地产上的有效工作。其实，土地和房地产的收益只占到财政收入的15%。在莫斯科，土地和房地产是发展的潜在力量，而不是财政收入的来源。

回忆一下，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因为莫斯科学者的劳动硕果累累，大量的资金流入了首都——有的用来发工资，有的用来发展相应的基础设施。科研机构和学校得

到扩大，买进了设备，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盖了住宅。在莫斯科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努力下进行着大规模的创新项目，涵盖核能、核工业、导弹航空领域和所有我们现在统称为高科技的领域。

我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科学对国家来说变得形同陌路。出现了这样的怪事：坐上副总理或者部长宝座的“实验室主任们”总是不明白（或者忘记了），干吗需要这些研究所、科学院。他们眼里看到的只是可以被私有化的房产和可以卖给外国人的技术。但是，我们都很清楚，没有科学，俄罗斯在世界上将会无足轻重。当时，莫斯科市政府不止一次被指责建立了完善的科技公司，这些公司是从研究所派生出来的，靠前苏联的知识半成品获得收益。说实话，我们只是从资金上帮助了研究所，为了不让它们解散。我们只是拯救了它们。纽约、慕尼黑、东京和旧金山都向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张开了怀抱，但他们仍然留在了莫斯科。

年复一年，莫斯科市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加大对科研的支持：通过提供贷款、下订单、收取象征性的土地和房产租金。我们很清楚，首都不仅有政权和金融业，这里还集中了知识分子，他们能把生活变得更好。当联邦政府不把科研院所的生死放在心上时，我们就越俎代庖履行职责。

我举两个和医学成就有关的例子。1994年，我们承担了国家肿瘤学的研究任务，结果研究出了独特的抗癌治疗方法。在我们的帮助下，创造了新的运输方式，臭氧加工水系统正在得到应用，正在实施大规模的“粮食冷冻”

计划。

有人会说，我过于强调市政府的作用，因为富有的莫斯科市政府有义务做这些。这种说法对，也不对。不对的原因是，我们支持的很多项目应该是归联邦政府管的。对的原因是，我们总是把首都的功能看得很宽广。我们知道，没有科学，莫斯科和俄罗斯就不是真正的莫斯科和俄罗斯。

在当今的形势下，不应该仅仅支持科学。要让科学得到发展和繁荣，并且转化成生产力，必须找到并且实施能解决社会问题、还能把莫斯科和整个俄罗斯推向前的项目。

作为世界主要城市之一的莫斯科当然是俄罗斯全球化的前沿阵地。我的意思不是指全球化像第五纵队一样穿过莫斯科进入俄罗斯。我的意思是，莫斯科是俄罗斯实现全球化的渠道之一，通过这个渠道在俄罗斯和全球经济之间进行思想、商品、服务、金融和影响的交流。莫斯科不是唯一的渠道，但无疑是最重要的。

当然，莫斯科在实现连接中不是垄断者。但是，莫斯科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这里有俄罗斯主要大公司的总部，这里有很多重要的交往机会。

有人抱怨说，莫斯科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大公司和银行，因此生活无忧。但是，首都并不能命令某一个公司在这里注册。当然，在法律允许时，可以阻碍公司注册。要想指挥别人成为莫斯科人，这不可能。

莫斯科的土地、房子和生活成本都不便宜，为什么有

那么多公司向往这里呢？因为实践证明，这些公司不和联邦机构打好交道就寸步难行。不可能让他们每天都从西伯利亚、远东、梁赞跑来莫斯科办事。光打电话也解决不了问题。生意掌握在国家手里。所以，他们不得不把总部放在莫斯科。

历史把莫斯科造就成了俄罗斯的中心。早在12世纪中叶，莫斯科就开始作为中心存在，并以此中心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俄罗斯的中心曾经短暂地迁移到圣彼得堡，后来又回到了莫斯科，此后几乎一个世纪都固定在此。莫斯科总是俄罗斯的中心。

遗憾的是，这些年，苏联的中央制机构在得到恢复，所有的决定必须要通过莫斯科发出。我认为，陈旧的管理逻辑的复苏正在无意识地进行。

这样是用肤浅幼稚的观点来确保对全国的控制的逻辑。这就赋予了政治、经济和俄罗斯参与全球化以残酷、不灵活的形式。这种管理逻辑破坏了很多地区经济创新的动机和主动性。地区不再思考怎样自己解决问题，而是开始想着怎样从联邦预算中获得更多。这一切就像前苏联时期一样。联邦中心从这种状态中看到了政治力量和影响力的来源。这不是纳入全球化进程的市场经济结构，而是拜占庭式的管理结构。

在俄罗斯内部——包括国家的欧洲部分、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应该出现新的全球化中心，就像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大国一样。在国家的所有经济区域，全球化中心基地不仅存在，而且在发展。我指的不仅是存在大型

的工业、科学和文化中心，还有俄罗斯的 40 所大学在培养世界经济、国际关系和法律方面的专家。这些人去地方公司和政府工作。这是一个全新的形势：俄罗斯不仅了解外面的世界，还和它一起工作，因为有了了解地方问题和国际问题的专家。要知道，苏联时期只有几所大学允许培养国际问题专家，而且他们都只能在中央机构工作。

如果代表俄罗斯的 10 到 20 个，甚至 50 个大城市能更迅速地融入全球化，那么莫斯科就赢了。因为城市和环境、首都和国家之间的脱节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这种脱节滋生了不健康的情绪和嫉妒心理，促使寻找莫斯科从未具备的、不可能具备的作用。

因此，我没有讲失去的，而是讲没有得到的东西，或者说暂时没有得到的。

问：您认为，后工业化给莫斯科带来了什么社会后果？对市政府的社会政策有什么新的要求？

作为管理者，我不太明白“后工业化”这个词的意思。在什么之后呢？难道我们已经不生活在工业世界里了吗？已经不享受工业服务和产品了吗？在苏联时期，我们尝试过按照未来社会的规则生活，这样的生活会在后工业化的幌子下重演吗？

在莫斯科，我看到三大组互相联系的问题。包括工业化的遗产和城市财富，城市白领的需求、利益和立场。没

有上大学的和根本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问题。

莫斯科是俄罗斯最古老的工业中心之一。这在很久以前就是了，当时克里姆林地区铸造枪炮和钟铃。我们为莫斯科的工业和它为国家经济所做的贡献感到骄傲。但时过境迁，国家和世界的形势都变了。如今，莫斯科工业在很多方面都老化了。没有过去那样对大企业的需求。城市的人口和土地都饱和了。现代莫斯科的3/4都是在卫国战争后建的。整整3/4！过去处在城市边缘和郊区的大工厂现在成了市中心。

我想给城市面临的这个大问题另一个表达方法：如何进行莫斯科的再工业化。我们不打算放弃工业。在发展和改造工业时，我们要以环境保护和避免技术灾难的系统的可靠性为出发点。这也是社会稳定的因素。

应当承认，很多年前，早在苏联时期，就开始把危险的、污染严重的和城市不需要的企业关闭或者迁出莫斯科，这使首都受益匪浅。我们及时地做了一些工作，思考了一些问题，并获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我们还在寻找继续这项工作的途径和能力。如果过去城市是围绕工厂和工业区发展的，那么现在是把工业从发达城市迁走的时候了。这不是因为包括莫斯科在内的现代城市开始为自己那些熏得发黑的遗产感到羞耻，而是因为大规模的生产，即使是无污染的，也和城市互相妨碍，两者在技术上不能对接。

大型的工业企业需要大片的土地，而大片土地在城市里不仅昂贵，甚至根本没有。大企业需要道路把生产需要

的原料运进来，同时把产品运出去，这样的交通对城市也是阻碍。在大企业旁边生活不舒服，有时甚至不可能，因此需要增加公共交通负荷。不错，大企业缴纳很多税金，但还要考虑考虑，政府同时也要增加支出。

我不是大企业的反对者，甚至正好相反。有不干重活的休闲型城市，城里只有官僚和服务业。也有勤劳干活的首都，莫斯科就属于这样的首都，它不会背叛自己的历史和天性。莫斯科的大部分企业是在最初几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建立的，大概在20世纪30年代，甚至更早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企业和城市在基础设施上的联系已经陈旧了，需要大修。这不仅是技术和经济问题，首先是社会问题。因为这牵涉到数百万莫斯科人的命运、安全和福利。

工业化给莫斯科遗留了很多领养老金的人，这些人把一切都献给了国家。他们如今身体羸弱，靠着微薄的退休金度日。这给城市的社会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避免大量失业，帮助那些在莫斯科这样昂贵的城市艰苦生活的退休人员，帮助他们免遭欺骗，给他们提供最起码的医疗服务（我们给的比最低限度要多，但比起他们应得的还是太少了）。

退休人员问题应该是全俄罗斯共同的问题。游戏规则正在改变：出现了养老金基金，医疗卫生和支付房租等都和以前不一样了，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秩序也变了，一切都变了。对数百万的莫斯科人来说，这一切在他们快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发生，他们已经无力改善自己的生活，年

龄、健康和教育水平都不允许这样。但是对年轻人来说，前面还有大好的生活，他们能够适应变化。老年人做不到。这个问题同样也会发生在下一代身上。这是莫斯科最主要的社会问题。

退休人员问题还和城市外来人员的问题息息相关。在这两个问题的交汇处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保存莫斯科作为开放的俄罗斯城市的文化一致性问题。

现在谈第二个社会问题：白领问题。白领包括教育、文化和科学界的工作人员和所有靠自己的职业和劳动保证俄罗斯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人。莫斯科有很多这样的白领，最近15年，他们的地位发生了巨变，收入也严重两极分化。白领比其他范畴的人群更求全责备。

问题不仅仅是莫斯科的，而是全俄罗斯的——保持白领阶层和社会的联系。白领阶层也分成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群。一种是“新白领”，上到经理，下至程序员。这些人新的社会环境中如鱼得水，收入不菲，欢迎全球化。城市对他们来说只是安身之所。也许明天他们就会搬到新加坡、多戈或者格陵兰，悄无声息地走人。他们在其他城市也会像在莫斯科这样生活，不关心城市的事务。但是莫斯科需要这些有创造力、有经验、有精力和高教育水平的人才。他们不仅自己有所收获，还是社会建设性进程的催化剂。莫斯科应该努力吸引并且留住他们。

还有完全不同的一类白领，他们的收入和地位在最近15年骤然下降。这些人从事教育、卫生、文化和科学等城市和国家需要的行业。城市的社会政策面临这样的任务：

扶持这些人，给他们创造条件发展事业，克服他们与社会事务、社会问题、政权和国家之间的疏远。因为他们也是社会情绪和进程的催化剂。教师和医生的作用很伟大。只有历史上的悲惨丑恶现象才会把这类人推到社会边缘。我相信，不总是这样。

例如，为何我们的选举经常显得不成体统？为何在选举和其他政治斗争中出现一些连10年级学生都能看穿的论调和伎俩？是否是因为我刚才提到的两类人群对政治活动唯恐避之不及，远离政治活动和选举？城市和国家从知识分子阶层的自我放逐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呢？我根据经验判断，这些人渴望积极参与，但他们只响应有意义的、诚恳的呼吁。

第三个社会问题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上大学和甚至没想过上大学的年轻人。因为没有专长和经验，他们不容易找到工作。小伙子可以去参军，所以很多人根本不想找工作，反正很快就能穿上制服。结果是很多人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却不知道如何支配。

这个问题分四个层面：儿童的健康、学习、工作和生活前景，或者生活目标。

莫斯科在最近几年承担了儿童的健康问题，还负责组织儿童休息。组织儿童休息不仅包括人们熟知的保健夏令营、提供膳宿的学校、卫生所、假期、运动小组。儿童的休息应该和增长知识协调一致，通过兴趣小组和参观游览了解城市的历史和自然，认识祖国的其他地区。

因此，城市的作用不仅限于在假期为夏令营提供资

助。城市还应该完善供儿童休息的基础设施，并吸引儿童。城市还可以协调儿童休息娱乐的各种形式，收集相关信息并且保证市民最大限度地了解信息。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保护儿童的健康不仅是要促进好的尝试，还要摧毁跟有组织犯罪牵连的不良社会组织。谁都知道，首都都有毒品和酒精生意网络。把这些网络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使它们远离未成年人是城市最主要的任务。

教育问题：在所谓的教育改革上已经花了很多力气。我之所以说所谓的改革，因为很多迹象显示，这不是改革，而是革命。

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清除教育基础设施私有化道路上的障碍。我记得，三年前，当我在国家委员会上要求总统和地方领导注意一项关于教育法的修正案时，教育改革家们马上忙乱起来。这项修正案允许把大学从国家机构变成国家组织。要知道，国家机构不允许私有化，国家组织可以被拍卖，然后被私有化。今天的大学是在自主经营受限制的国家机构，明天就是国家组织，后天就成了股份公司。高校是最后一块没有被私有化的肥肉，是大城市中心的昂贵地段。在这些游戏背后是具体的利益之争。

如果要谈发展教育的根本任务，那么我们要弄清楚，我们究竟想通过改革把中学和大学变成什么样？要回答这个问题，要先弄明白另一个问题：我们在创造什么样的俄罗斯，我们想在5年、10年、20年后看到什么样的俄罗斯？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还是更强大的国家？社会和经济类型决定教育的类型和今天所有在校学生的前景。

中国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改革决定国家的未来，不管它成功与否。我们现在在惯性的作用下前进。在挥霍祖先给我们留下的资源之前，应该好好想一想，我们会得到什么结果。

作为两个学生的父亲和五个孩子的爷爷，我的立场如下：

首先，我们应该恢复义务的中等普及教育。按照现行宪法，基本的普及教育是义务的。这句话不明确，意思可以改变。昨天是八年义务教育，明天是七年，然后财政部又说，只有够五年用的钱。虽然宪法允许，但是即使从经济角度看，教育孩子比把孩子关到教养所便宜得多。谁在办学上省钱，谁就得在监狱上多花钱。

第二，我们应该停止盲目模仿。如果美国、中国或泰国的教育中有我们的教育缺少的东西，那么这个事实不应当拿来当成借口。我们很长时间实行的都是10年制教育。几年前，10年制悄悄变成了11年制。现在又觉得，11年制短了，让我们实行12年制吧。从帝国时期开始，我们的铁轨就是宽的，但全世界都是窄的，难道我们要把铁轨变窄吗？与其搞这些试验，还不如看一看将来，我们很快就面临大规模的裁减师资问题，因为孩子变少了。在莫斯科的学校里，一般有一到两个一年级班级，一个班20人。为什么不把每个班的人数削减到15人以下呢？这样的话，我们就能保留教师人数，同时还能提高教学质量。这事怎么没人提呢？

第三，我们应当以此为出发点：教育的内容比管理的

方便重要得多。为什么要取消几个世纪形成的考试制度，包括在校考试和入学考试？这个制度能让学生明白学科的含义。学生听老师讲课，阅读课本，记住以后要自己独立写作文或者口头阐述某个主题，也就是要让考官相信自己明白这个主题。现在有人建议把我们的中学教育转向训练学生应试、给复杂的问题猜一个简单的答案。这是国家部门里的聪明人玩的游戏。

最后一点。想一想这个矛盾：为什么我们的退休人员从国家拿退休金，而学校里吃什么早餐却取决于地方的财政状况。联邦政府年年都在削减地方的税收来源，使收入集中化。为什么中央政府不管全国所有学校的早餐呢？我听说，在某些地区，家长自己出钱解决孩子的吃饭问题。我感到好奇的是，尊敬的联邦政府官员，想让自己的孩子在同龄人饥饿的目光下喝酸奶吗？抑或他们根本不明白，这种情况会造成什么后果？

当然，首都当局没有能力为联邦政府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在能力范围内的事情我们做了，并且还会做下去。在资助教育项目时，我们把投资和城市未来的需求联系起来。莫斯科是俄罗斯最市场化的城市，也是最有计划的城市。我们知道未来的需求。例如，未来需要多少医生、老师，市政机构将需要什么人才？我们在实践中订购培养这些人才。在“城市订购”框架内接受教育的年轻人知道自己会有工作。

年轻人还有一个问题：生活前景问题。如果一个人看不到未来生活得到改善的可能性，如果他明白，自己从父

母那里继承的收入水平、住房、生活质量、社会地位都会一成不变，那么他就没有受教育的动力。教育这样的人很难，有时甚至没有意义。于是，参加非官方的组织和运动，迷上毒品和酒精就替代了他的未来。这是青年犯罪团伙、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

这些不仅是莫斯科面临的问题，也是所有大城市和整个俄罗斯的问题。

问：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其他城市的居民和很多莫斯科人都把莫斯科看成富足的城市。很多人的需求比首都市场和服务可以提供的要简单得多。去年，莫斯科销售的宝马汽车数量在世界上排第二位。看起来，莫斯科正在形成这样的消费社会，这个消费社会曾经遭到党的宣传工作者和前苏联作家的批判。而且，莫斯科的传统也和这个消费社会的规则格格不入。请问，这种引人注目的奢侈是否让您感到不快？很少人知道，您个人的需求是很简朴的。您怎么看待这一切？

我是否感到不快，这不重要。当然，我经常感到不快。但是，不能把自己的需求当成标准强加给别人，也不能把自己的情绪当成是城市经济政策和决定的基础。

我觉得，莫斯科并没有引人注目的奢侈，只有引人注目的贫穷和来自独联体各国的穷人。还有无知的招摇，一些并不是很富裕的人想要炫耀自己并不是很正当的财富。

这种现象在莫斯科早就有了。

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方面，即市场方面。莫斯科刚刚开始形成不同的商业区域。拿任何一个西欧国家和首都为例。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罗马和马德里的居民都很清楚，自己该去城市的哪个区域、哪条街道、哪家商店购买适合自己身份和收入的商品。他也知道自己不会去哪里买东西：或者因为没有足够的银子，或者因为自己不够体面。在西欧国家，这样的现象至少已经形成了200年了。

我们的商店既卖标准价格的啤酒和面包，又卖昂贵的舶来品。但是，采取行政手段不仅没有意义，而且有害。商人自己会明白，什么样的客户群能给生意带来利润。但是，莫斯科的商业和服务业会逐步细分为不同的商业区域。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为什么奋斗，日后就会遭遇到什么。我们曾经放弃了社会争论的其他问题，而关注苏联的商店里缺少香肠这个话题。于是，我们开始对消费社会和市场进行私有化。民主和自由理想并不是谁都迫切需要的，现在也是如此。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也是最近三年里的事。大家迫切需要市场，认为市场能带来充足，它真的带来了。

市场是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按照扇形原则分布。需求最开始从市场最富有的阶层开始，然后逐步过渡到普通阶层。莫斯科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面向高收入阶层。如果没有对房车和奢侈品的需求，没有人会把这些东西运到莫斯科来。因此，这不是市政府的政

策，而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

莫斯科哪来的这种需求，大家都明白。俄罗斯有一半的富人住在莫斯科，另一半经常光顾这里。因此莫斯科有很多昂贵的商品、服务和住宅。和整个俄罗斯相比，莫斯科的中产阶级比例比较高，中产阶级是一群高收入者。只需看一看，莫斯科数十个大商业中心里每天有多少人，看一看新年和节日前的景象。

这会让那些数着铜板过日子的人感到不快吗？可能会。也有人对此熟视无睹。问题不在这里。根本没有所谓的“充足”。“充足”是具体的，应该惠及所有消费人群。如果在一个柜台上同时放着卖给退休人员 and 百万富翁的商品，这不是“充足”，而是“贫乏”，对百万富翁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他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买自己需要的东西。百万富翁在买普通人觉得离谱的昂贵商品，旁边就站着这样的普通人，他会觉得不舒服，别人也会如此。结果就产生了社会紧张，有钱人就不在莫斯科购物了。这会给城市的收入和就业带来损失。

“充足”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到符合他的收入和地位的商店购物，并且能够有很大的选择范围。市场上不仅要争夺百万富翁，中产阶级，而且还有穷人。但在莫斯科这样的竞争很少，最近两三年才开始形成这样的市场。西方公司几年前来到莫斯科，有了中产阶级。俄罗斯的中产阶级比例只有2%~3%，莫斯科的比例稍微高点。但是，数着铜板过日子的人还为数众多。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的市场——我指的不是集市，而

是经济范畴的市场——习惯了获取高额利润。利润高达百分之几十，甚至几百。这样的利润率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没有。一定程度上的原因是腐败。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是：我们将发展市场吗？如果利润率下降，就会增加货物流通量来弥补损失，这样最终利润不一定会减少，可能会增加。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努力。如果只是把价格抬高等待有钱的买主，这就表明市场不发达。

确实要形成消费社会。我们应该有消费社会。我们转向资本主义的意义就是在得到自由和民主的同时形成消费社会。

好像很多人开始遗忘，20世纪90年代初期，莫斯科什么都买不到，盐、火柴、黄油都从商店里消失了。其实那时实行了票证供应制，就像在战争时期和战后实行的那样。莫斯科处在饥饿边缘。给莫斯科提供充足的商品和服务过去是，现在也还是市政府的任务。任何一个没有成见的人都会说：“市政府在认真地完成这个任务。”在这个方面，莫斯科目前和伦敦、巴黎、纽约和东京做得没什么两样。

莫斯科要走出这样的死胡同只能通过融入全球市场经济，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样，莫斯科才不会死亡，才能向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敞开怀抱。

如果我们将不会有消费社会，那么不明白俄罗斯为何在近百年里第四次接受挑战。“消费社会”在西方社会的概念是指整个社会在消费，而不是处在社会顶层的2%或3%或5%的人，15%也不行。要形成消费社会，莫斯科和

整个俄罗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莫斯科没有消费社会，我认为只有艰难度日的社会和炫耀摆阔的社会。

莫斯科市政府的任务是帮助在城市里形成文明消费的社会，加速这个进程。为此，必须帮助市场尽快并且高质量地转向中低收入阶层。降低市场精英领域的比率，不能像共产党人建议的那样把剥削者的财产没收，而是要通过发展其他市场领域，即面向莫斯科大众的领域。

完成这个任务的主要条件是要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要推行一定的制度，让个人能够在具体时期承受比他的实际能力高的消费，可以通过发放贷款、租赁、抵押贷款。没有人会反对实行这些制度。但这些制度只有当莫斯科和整个俄罗斯稳定发展时才有可能实施。

要发展面向大众的市场，同时也要克服一些矛盾。莫斯科多年来一直努力关闭旧货市场，并在原址上建造文明的市场和商业中心。一些莫斯科市民抱怨说，以前旧货市场很便宜，现在盖了宫殿，可是里面的东西贵得吓人。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首先，这是一个城市的文化问题。文化不仅体现在集市的垃圾和其他外观上，虽然这也很重要。但首先要从每个莫斯科人的尊重自我、互相尊重并且尊重城市的角度看。一个人在干净的小店里，从正规的柜台上买东西，还是在肮脏的人行道上、从卡车上购物，他的感受会截然不同。这决定了他对自己尊重还是不尊重。如果他在购物时没有尊重自己，那么他在工作或在家里也不可能有这种感觉。

文明的形式也带来了其他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变化。商店取代了集市，商店里有现金部门，这就意味着，城市可以收更多税。这些税金会返还给莫斯科人，用来修路、盖房子等。同时，要从事灰色交易就难了，也就是行贿和受贿的可能性变小了。这是对腐败的打击。我们把犯罪的土壤缩小了，因为黑色税金的土壤滋生了犯罪。

我们远离了苏联的共产主义。我希望是永远地离开了。是的，当时煽动之辞在我们心里留下了痕迹。虽然社会主义时期平等其实根本不存在，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之间的不平等和差异对我们来说是新鲜事物。如果说平等，那么只能是人人生而平等，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还有人际关系的文化问题。现在我们还没有形成消费社会，没有真正的富足，就不可能有消费文化。我们会走出转型期，走出艰难时期。希望我们现在遇到的丑陋的东西都会消失。

我不想看到，转型期被拖延，有支付能力的市场和消费社会没有形成，您刚才讲到的负面的东西就会适应生存下来，我非常不想看到这样。

问：莫斯科是俄罗斯的信息交流中心，是俄罗斯和世界联系的中心。在信息社会中，信息等因素的作用在不断增加。您怎么看待“虚拟莫斯科”“电子莫斯科”这些首都的形象？

我们生活在信息技术世纪。没有信息技术，现代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从政府工作到休闲娱乐，都会不可想象。这些技术对我来说不是秘密，我每天都在工作中和它们打交道。

我认为，只有年轻人才能掌握这些技术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当然，年轻人掌握起来很容易。但是，我看到有年纪比我大很多的老年人通过付出努力后灵活使用信息技术。也看到有很多人，我年纪大了，干不了这个了。这完全取决于个人。

在您的问题中显示了您对正在发生的变化的陈旧观点。您说，莫斯科是中心，是俄罗斯交流空间以及和世界交往的中心。有人可能会想象，很多电缆交叉汇集到一个点上。这是我们从中央集权制度继承的思想，认为一切都在中心汇合，一切都从中心发散出去，包括香肠在内。人民的智慧发现了这一点。还记得一个笑话吗？问：那个绿色的、长长的、散发着香肠味的东西是什么。答：是从莫斯科开往郊区的电气火车。正是这样的制度导致了苏联的毁灭，因为没有能力把一切都中央集中化，再把一切都分配出去。但是，后来开始出现离心趋势，社会和国家开始分成碎块，直到分成各部分、各自自然经济单位，还有在自家院子里种菜，在阳台上养羊、养鸡的家庭。

现在的莫斯科成不了俄罗斯和世界联系的唯一中心。因为在新时代，和世界的联系不再中心化。拿一些现在非常普及的东西为例：全球电话网络可以从俄罗斯的任何一角落联系到国内外的任何地方；卫星电视可以让我们看

到任何一种语言的电视节目；因特网可以让您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看到任何一份报纸的最新一期。这就是有很多中心和枢纽的新世界，每个人只要需要就可以和任何一个中心连上。

因此，在我的概念里，莫斯科不是中心，是必须在各方面，包括交流方面，都必须向前走的城市。您提到的“电子莫斯科”对首都和国家都很重要。这个计划包含了建设和发展公民社会的强大潜力。因为，这个计划保证在市民和城市之间保持联系，使市民参与并影响城市生活进程成为可能。

网络联系使人的距离更近，使社会更团结。可以通过因特网和朋友联系，那么可不可以不通过官僚机构直接和市政联系呢？可以，只要我们成功实现“莫斯科人电子护照”项目。这个项目可以帮助自动解决很多问题，包括发工资、取工资、买食品和药品。还能免费或花很少的钱从遍布在图书馆、火车站和超市的终端上连接到城市网络。从这些终端上，就像从家里的电脑上一样可以接收到任何信息。这个塑料卡片是进入网络的通行证，它还有很多功能。如果有这张卡片和手机，只要你按求助信号按钮，网络就能知道求助信号从谁发出，你在什么位置，并且对救助队或警察发出相应命令。

当然，莫斯科市政府中没有人想入非非。这个电子系统里集中了很多个人信息。这使我们承担了很大责任。禁止未经允许接触这些信息，也研究出了相应的严格程序。

“电子莫斯科”将把城市管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城市管理者可以自动或半自动地控制城市，并且实时地了解城市总的状况。还可以指望这个系统成功调节城市交通，减少堵车。莫斯科现在交通问题很严重，交通很大部分是由联系需求引起的，比如要坐车去商店、图书馆、机关等。

最重要的是，在一分钟内通过网络实现连接可以使我们的城市更完整、更统一。

作为管理者，信息技术很讨我喜欢。有了这个技术，我就能随时掌握大量法律与统计信息和图表。图表能够马上把城市里正在发生的事显示出来，工作效率就得到了提高。把大家都关心的信息和文件放到市政府的网站上既能节省时间，又防止了腐败。

当然，这个项目目前还在初级阶段。我们需要时间、资金，主要是需要人。需要那些既懂技术，又了解市政府正在解决的问题的人才。我们目前还感受不到这种人才是绰绰有余的。需要信息系统有很高的技术可靠性。需要人们有知识和支付能力，才能使用电脑并且连上因特网和需要的机构联络。

我们正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正在培养管理人才。我们一定要发展“电子莫斯科”项目；这不是奢侈品，而是工作最必需的手段和条件。

问：经常有人说，俄罗斯只是新的全球经济的原料附属品。莫斯科显然不同意这种说法。莫斯科能够而且发挥其

他作用，把俄罗斯带进未来经济。您觉得怎样完成这个任务？

这不是一个城市的任务。虽然莫斯科正在为完成这个任务做出贡献，但是这种规模的任务只能靠整个国家解决。当然，像登山运动员说的那样，莫斯科和俄罗斯在结伴而行。领导权应该属于联邦中心。莫斯科对此也很有兴趣。

莫斯科客观上在对俄罗斯经济发挥促进作用。莫斯科和全国很多地区都有经济合同和条约，很多莫斯科公司都在全国设有分公司。地方早就有莫斯科的生意和资本。

虽然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出人意料地出现了这样糟糕的事实：小城市在大城市的阴影之下，逐渐衰弱。莫斯科州有74个城市，其中有15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万。很多人认为，莫斯科州欣欣向荣。但是，学者早就注意到，坐落在大城市周围的小城市不景气和荒凉的迹象尤其明显。这种现象不是莫斯科地区特有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车里雅宾斯克州、列宁格勒州、下诺夫哥罗德州、彼尔姆州、罗斯托夫州、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鞑靼共和国都是如此。大城市吸引劳动力，年轻人奔向这里，资本流向这里。目前还不清楚，这是俄罗斯现代情况的特征还是全球经济普遍的后果。苏联时期，人们发明了一个词组，叫“没有前景的村子”。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没有前景的城市和地区”。

类似的情形是反常的。我相信，不可能存在没有前景

的城市和地区。那个养育了很多代人，拥有自己的历史和纪念碑的地方是有价值的。土地荒芜等于俄罗斯的灭亡。不能只用市场尺度衡量这个问题。不可以随便一下子提高电力税和燃料价格。必须明白，一个月后，成百个公共汽车线路就会停掉，城市和乡村就会和“大地”割裂开来。我明白，政府拿丘拜斯没有一点办法，丘拜斯更强硬。但是政府，甚至丘拜斯都不是永恒的。他们离开我们以后，我们还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市场经济只是国家运转的发动机。如果发动机拖不动了，最好停下来，修一修发动机。

应该看到问题长期的一面。土地荒芜在苏联时期就开始了。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原因。类似的情形也在其他很多国家发生。在这些幅员辽阔的国家，大量的土地荒无人烟，没有得到开垦。在现代社会，人们都离别故土，涌向城市。原因很清楚：城市在各方面能给予的更多。

应该考虑大城市和各地区的联系：不光是莫斯科和莫斯科州、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州的联系，还有莫斯科和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联系。应该巩固它们之间的联系，使国家更团结。这不仅是莫斯科的任务，更是联邦的中心任务。

作为俄罗斯的一部分，莫斯科不能离开国家单独存在。因为我们的外向性质，莫斯科完全可以通过税收、联邦政策、财政、汇率政策感受到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

最近10年形成的浮动汇率政策首先对能源和原料出口商有利，同时也阻碍了加工业和建设业的发展。莫斯科

的房子现在大约每平方米 500 美金，而莫斯科人的平均月收入是 200 - 300 金。算一下，他们要积攒多少钱才能买一套最小的公寓。这样的收入水平能提供多少按揭？专家计算出，在莫斯科，月收入不低于 5 万卢布，或者至少 1500 美元的人才能得到按揭贷款。这样的人有，但对于莫斯科的工业和建筑业来说，这样的人太少了。

如果只满足有钱人的需求，一定会在首都以及首都和俄罗斯其他地区的关系中造成深刻的、有潜在危险的社会和经济扭曲。

从这个角度看，有必要仔细审视圣彼得堡这座名望和财富之城的历史，这里曾经聚集了俄罗斯的政治和社会精英。要看看，20 世纪初的圣彼得堡对俄罗斯的命运扮演了什么角色。是的，它曾经是面向欧洲的窗口，而且很称职地发挥了窗口作用。但不是透过这扇窗从内向外看，而是反过来了。

我有时想，如果 20 世纪初俄罗斯的首都不是彼得堡，而是莫斯科，还会发生革命吗？当时的都城彼得堡虽然在靠近欧洲的西部，但却是在边远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和国家失去联系。首都的精英们首先和欧洲联系，然后才轮到俄罗斯的腹地。彼得堡在生活水平和质量以及日常习俗上都和国家相去甚远。缺乏历史根源和联系也把彼得堡和国家割裂开来。这座为了对抗传统的国家中心城市而建的城市在外观上也和其他城市大相径庭。

我并不是责备彼得堡。如果国家在精神和经济上的内在整体性破碎了，它的不稳定就不可避免。今天，新的裂

痕正在出现。

我认为，国家负责采掘的经济部门和其他部门，包括加工、社会服务、建设和农业部门之间产生了深刻的矛盾。由于自己的作用和地位，莫斯科正处在这个矛盾的中心。

为了国家的发展，应该走向莫斯科和俄罗斯、中心和地区的融合，协调各个经济部门的利益。

问：我们每天都能看到莫斯科的变化，每天都有事情在发生，在建设或在增加。但是，这些看得到的变化后边隐藏着看不到的、更重要的进程。现在莫斯科有哪些这样的进程在进行当中？

这样的进程时间都很长，很慢，所以不太容易注意到。没有人把它们藏起来，只是需要专家来揭示和解读它们。

像任何一个大都市一样，莫斯科吸引了人口和资源，并努力和郊区融合。在德国，特别是日本，开车开几百公里都发现不了城市和居民区的界限，我们与此还相距甚远。但是，莫斯科现在有 1000 万人口。如果算上从外地来莫斯科工作的人，首都的人口占了全国人口的 10%。如果加上莫斯科州，特别是莫斯科近郊的人口，那么 15-20 年后，全国 20%~30% 的人口都集中在莫斯科，可能还会更多。在我国疆土辽阔和人口密度很低的情况下，这是否

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国家的很大一部分人口集中在首都或者两三个大城市，我觉得这种现象不正常。这对幅员辽阔的俄罗斯意味着领土的主要部分都被抛弃了。不是没有被开垦，开垦是指人们从传统的生活区域慢慢迁移到新的区域。我们的情况正好与此相反。数十年来，人们抛弃农村，迁移到城市，包括莫斯科。这样的情况在欧洲、美国和日本都发生过。但俄罗斯的程度在哪里？只有2%的人口从事农业的美国模式能被我们接受吗？而且美国有远远超过2%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之外。难道人类要像蚂蚁那样在很小的空间内聚居的生活方式吗？

第二，必须考虑首都经济中维持城市和组成城市两部分的关系。维持城市的活动是为了保存和再造城市的基础设施、居住环境，为了维持市民的生活。城市越大，维持的花费就越高，而且不是直线上升。如果城市的人口增加了两倍，维持生活条件的花费就会增加四倍。这里的花费是城市组成活动中得到的。城市的经营活功不可能是天然的。必须制造在城市以外也有需求的产品。城市的收入要足以满足维持生活的花费。如果维持城市的工作做得不够，那么城市的发展就可能受到影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要提高城市环境的生产力。联邦政府每年从莫斯科财政收入里抽取越来越多的钱，这不仅会影响城市发展的前景，还会剥夺人们积极参加经营活动的积极性。当年把苏联带进死胡同的机制就会死灰复燃。

第三，莫斯科的土地价格在上涨，这是必然的。所有

大城市都如此。莫斯科中心的土地价格比郊区的高，郊区又比国家的平均水平高。这种价格等级制度加剧了残酷的社会等级制度，使社会更加等级森严。从长远来看，它为不同城市之间社会鸿沟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这种差距不仅在俄罗斯有，世界各地都有。如果价格继续上涨，结果可能会造成大城市经济和金融崩溃，失去经济活力和生存能力。价格会高得使正常的经营活动失去意义，然后再缩小规模。从另一个角度看，价格的剧跌可能会造成经济危机：紧随土地价格下跌的就是不动产贬值，城市收入减少。极端的情况不太可能，但是确实需要好好分析土地价格无限制上涨对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对城市土地的资本化要谨慎对待。在美国，不动产（包括土地和建筑）的资本化在规模上超出工业资本化四倍。这是发展的基础和源泉。

虽然我讲资本化，但我并不是鼓吹把土地私有。遗憾的是，我们自由的私有化者在这方面试图走在世界前面。在大城市里土地私有不是规则，而是特例。资本化只要有长期租用的权力就足够了。但是我们的土地法要求不动产的所有人买不动产下面的土地。这很荒唐。10年、30年、50年后，如果形势和需求不一样了，城市怎么处理这些地方呢？难道要出资上亿元来修路或者建造公园吗？

第四，在城市发展中要考虑到城市的性质和特征。莫斯科不是一下子建成的，而是经历了几个世纪一部分一部分地建成的。现在，城市的历史和生活中开始了一个特别的时期，这个时期要持续20~30年。这个时期的特征是：

数十年来，甚至100~150年来积累的问题将向我们发出挑战。举一个例子：我们结束了贫民区的拆除工作。贫民区是大规模建设的第一个十年的产物。当然，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房子寿命更长，但是它们的期限也要到了。70年代盖房子的规模不能和此前相提并论。我们将不得不拆除比贫民窟更多的房屋。城市哪有闲钱迁移安置一百万家庭？这就意味着，或者找到新的省钱的机制进行城市翻新，或者莫斯科的大片区域就会变得荒凉破败，这种现象在很多富有的大城市也能看到，包括纽约。

这是个客观的问题。它的实质在于，当城市最初的结构形成时，人们不知道用系统的方法对待城市的发展和管理。现在，我们转向城市管理系统模式的时机成熟了。这个转变不容易。转变时期的长短取决于城市经济，我们的实践能力、基础设施自然老化和更新的过程。

现在，预计城市将在15~20年内建设大约7000万平方米住房。这很多，同时也很少。应该找到新的方法，让莫斯科每年平均建造和改造1000万到1500万平方米。房子的寿命应该符合世界趋势——80年，要保证在80年内无需迁移住户就能修缮和翻新。我们需要保存不少住房，起码是总数的1%。在西方国家，通常通过建造流动住房解决这个问题。对我们变形的经济来说，这个方法更加迫切。每平方米住房的价钱应该在月平均工资水平上，将来是工资的一半。

第五，首都都有总的发展计划。我们在按照这个很棒的计划生活和工作。但是这个计划主要是关于建筑、交通和

空间规划的。我觉得必须把这个总的计划和社会发展计划（或概念）连接起来，和对莫斯科生活的基本方面的系统分析和预测连接起来。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样的计划不仅仅是由建筑师来制定的。

城市的面积在扩大，但是扩大应该有限度。限度可以由经济目标、技术条件和城市建设规划限定，最终是由法律决定的。我们感到必须制定城市发展的理念。长时间以来，城市的发展表现在综合数字指标上：新建住宅、企业、道路、地铁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数量。这是正确的。但是生活早就证明了：“更多不代表更好。”发展要以质量为前提。质量体现在保护自然和环境。这还不够。在苏联时期有一个理念是建造未来共产主义的示范城市。在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这个理念的具体操作有差异，但是理念保存了下来。现在讲这个理念很可笑。但是，国家和首都都需要自己的发展理念。也许，所有的首都需要。

可以随波逐流。随波逐流的结果很可能会像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大城市的经历：市中心很漂亮，但发展不均衡（比现代莫斯科大1.5-3倍）。这些城市的郊区问题很严重，社会形势很复杂，市政府的问题和任务很艰巨。

莫斯科需要至少针对20年的社会政治理念。需要超前城市和国家至少10年的经济形势和财政任务。需要莫斯科和莫斯科州的协调发展概念（我不是想染指莫斯科州长的权力）。

关于总的发展计划。我提到的莫斯科至2020年的总

发展计划已经被市政府通过了，但两年都没有得到联邦政府批准。根据城市建设法，我们不应该在那里批准什么。这个规则起源于1993年春通过的首都法。我很理解联邦部门里那些喜欢往后拖，不喜欢放手的人。我更理解站在他们背后的所谓的寡头。

我只是不明白，他们哪来的这种自信？

城市不能停滞不前。如果它的发展人为地停滞了，我们无法预料对它自身和对国家的后果。的确，俄罗斯形成的管理体制不要求管理者对人民负经济责任。但是，我们还是在负责地努力工作。

第六，莫斯科和任何世界大城市一样，面临越来越多的安全问题。是继续混乱、继续不负责任、纵容犯法还是严格控制。这种控制将按照什么模式发展：是按照权威等级制这样由上向下的模式，还是网络式的，可以有反馈和民主参与的模式。第二种模式更有效，但是在设置上比较复杂，而且需要公民经常性的积极参与。第一种不够有效，有时根本没有功效，虽然它在心理上更习惯一些，更符合俄罗斯的经历和历史。但它可能会导致退回到中央机构的不负责任和扼杀地方首创性，或者地方极权主义。

第七，交通问题，莫斯科饱受交通问题困扰。城市的辐射环形规划增加了中心区域的交通负担。在市中心开车很不舒服，因为不得不绕路，否则就会以乌龟的速度向前开或者在原地不动。第三条环路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萨多沃伊环路的负担，但是产生了新的交通需求。地铁跟不上新城区的发展，迫切需要第二条地铁环线。因为联邦政府的

新措施，莫斯科最近3-4年，每年损失200-300亿卢布。交通能保障所有机构的正常工作，包括政府部门。这是城市的安全，是它的血液循环系统。也许，我们能通过把一部分交通负担转到信息通道上来缓解交通问题。简单地说，不是要移动东西，而是发出东西的信号。我们计划再建造一个城市中心。我们需要新的延伸区域。

莫斯科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最大的交通联系枢纽。需要制定莫斯科地区交通发展的综合计划。联邦政府必须要把莫斯科和莫斯科地区的交通问题当作全俄罗斯的，而不是一个普通城市内部的问题来对待。

第八，历史形成了莫斯科的辐射结构，这种结构有很多问题。这个结构是历史上俄罗斯结构规划和行政上的类比物。我们的国体千百年来的主要特征就是等级制度，严格的中央化，是一个在权力、社会、经济、文化、甚至交通上的金字塔。有很长时间，所有道路都穿过莫斯科。网状结构的想法是在看城市版图上清楚显示的地带时产生的：这些地带包括布里瓦尔诺伊环路内的地带，布里瓦尔诺伊环路和萨多沃伊环路之间的地带、萨多沃伊环路和第三环路之间的地带以及第三环路和第四条环路之间的地带，第四条环路后面就是卫星城。也许，本书的读者想说出自己的想法，那么，市长和作者都会对此很感激。

1 莫斯科面临的一系列难题

问：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的领导人比其他地区的领导人更多地批评联邦政府当局和俄罗斯政府。尤里·米哈伊洛维奇，作为莫斯科市的领导人，您认为是什么妨碍了莫斯科市按照您认为最佳的速度和方向发展？

莫斯科市不“应该”按照卢日科夫怎么想就怎么发展，莫斯科只是应该发展。因为一个城市如果不发展，它就会开始衰败。发展基本上是各种生命的存在方式。然而社会生命更为特别。生物生命的发展和演化经过了成百万年的时间，经历过无数漫长的世纪。但是社会生命只经历了若干个世纪，至今也只有几千年。第一批细胞 65 亿年前就在地球上出现了。现代人的出现只是在近两万年以前。欧洲文明自古希腊算起，大约有 2500 年。我们今天用“后工业化时代”、“信息时代”等一些令人费解的词

汇所称呼的整个世界只是在最近的 30~40 年内才出现的。

今后会怎么样？世界会停止发展吗？当然不会。到 2020~2030 年世界将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莫斯科作为特大城市和一个巨大国家的首都，现在应该考虑这些问题。

因此，发展并不只是某一个人的愿望，甚至也不只是所有莫斯科人的愿望。发展是保持生命力所必需的，也是最主要的条件。首都的发展同时也是国家进步的因素，是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虽然不是唯一的因素，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人们通常通过首都来评价一个国家的状况、它的发展前景和机会。就像与人相识首先是看他的衣着一样，认识一个国家首先是看这个国家的首都。这里有一条特殊的规律：如果首都的事情办得很好，人们通常会说：“莫斯科可不是整个俄罗斯”，就像“巴黎还不是整个法国”一样。这句话当然对。但是，如果首都一旦在某些方面没有做好，人们就会将首都的状况与整个国家的状况混为一谈。这种情况通常并没有错误。没有什么比莫斯科的破败：街道肮脏、商店空荡、庭院内一片废墟、街心花园和公园满目荒凉更有说服力，说明苏联最后几年国家和体制的危机。莫斯科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座精神上空虚的，给自己钉上了十字架的城市。很难相信，一个连首都都是这样的国家，会能有力量改革自己，能够实现复兴。

继续回答您的问题。非常希望，实际上也非常需要，使一个城市按照最佳轨迹发展。这里“最佳”、“轨迹”两个词同等重要。

最佳标准不等于卢日科夫的意见，而应该是市民和城市的利益，俄罗斯的利益。“最佳”并不意味着“最合适”。这里指的是，发展目标及其途径选择所遵循的原则是：要使目标尽可能快速、完整地实现，同时实现的费用最低。目标应该由莫斯科人提出。莫斯科人包括所有在莫斯科生活和工作的人，无论是中年人还是青年人、退休和在职人员、富裕的人和不太富裕的人、职员和老板，以及各类经商人员。市长应该努力，尽量使莫斯科市发展的障碍更少。

“轨迹”的意思是指，无论是城市的发展还是这种发展的最佳程度都应该可以测量，并且不能仅凭当时的情况评价。苏联时期，莫斯科市的发展目标是变成未来共产主义的一座样板城市。但是对于今天的居民来说，只能是煎熬度日和被动适应。在当前的过渡条件下，没有稳定的游戏规则，许多人思考的只是今天的范畴，使用瞬间的评价。但是一个城市的发展目标，短期内是不可能达到的。只可能是为窟窿打补丁。城市和国家的领导人有责任看到不远的将来。就像一个好的司机在路上既能看到前方，也不忘记通过后视镜看车后的景象。

当然，对莫斯科来说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有自己的意见。而且我从来也不难为情表达我的意见。但是我不将我的意见强加给任何人，在做决定之前，总是极力倾听受冒犯者的意见，使用专家的评估。

这是我作为市长坚定不移的立场。不能、也不允许强加给城市任何东西。任何强加的尝试都会立即而且很长时

间完全勾销掉最佳发展的盘算和希望。从定义上说，“强加的”就不是“最佳的”，如果必须强加，那么说明人们需要的是别的东西。一旦确信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那么就要为自己的立场而斗争；让人信服，证明、宣传鼓动——是的，需要怎么努力就该怎样努力。

现在来回答您所提问题的另一部分。为什么经济实力较强地区的领导人，包括我在内，比实力较弱地区的领导人更多地批评联邦政权机构？我想，部分原因在于我们不想昧着良心说话，我们自己也做不到这一点。实力较强的地区为联邦预算、整个国家经济和生活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国家可以信赖地依靠这些地区。这些地区不仅能够自己解决自身的大量问题，而且还能帮助别的地区。

当前，莫斯科市在俄罗斯处于什么地位？这里集中了全国总人口的6%，就业总人口的8%，整个俄罗斯9%的固定资产，全国33%的科研人员。2001年莫斯科就贡献了全国1/6的国内生产总值，而1994年仅仅只有10%。按照人均计算，莫斯科的地区生产总值比整个俄罗斯高出两倍。从主要的宏观经济指标来看，莫斯科不仅仅是俄罗斯最大的一座城市，同时也是俄罗斯最大的一个联邦主体。

如果某人给家里带来了一份不错的工资，他有权关心这笔钱花在哪些方面和是怎样花费的。他对此既需要有道德权，也要有理性——否则他不挣这么多钱，同时还需要有责任感——否则他可以把钱不带回家。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如果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不去质问联邦政府，那么

在国内还有谁可以问他什么?! 仅仅只有总统。这不是我臆想出来的：世界上坚固的联邦都是建立在经济实力较强、并且能够制衡联邦政权的地区基础之上。请看看美国各州或者德国各地方所起的作用。

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之所以强，首先是因为解决了那些经济、社会生活和法律上的问题，不发达地区至今还在这些问题上举步维艰。这些问题在莫斯科特别明显。这并不是说，别的地区问题少或者问题不那么严重。别的地区的问题是另一种性质。错误解决或者拖延解决那里的问题所导致的后果也是另一种性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可能会扩散。莫斯科已经没有了、也不会有大量的闲置土地，未开发的大自然也没有了。这里人与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的关系同样是另外一种性质。

由于不理解或者处于利益考虑，实力较强地区的意见和他们公开声明的立场常常被描述成对联邦政府的批评。特别是莫斯科市的立场更经常这样被表现出来。但是，第一，糟糕的是某些地区及其领导对一些事关自己地区生活的重要问题没有自己的立场，或者害怕说出自己的立场，他们还是遵循一种老的原则：“我有自己的观点，但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我坚信，这种行为方式不但与自己地区的利益相矛盾，而且与整个俄罗斯和俄罗斯国家机构的利益相冲突。

第二，公开表明地区或者莫斯科的立场不一定完全就是对联邦政府的批评。有批评就意味着有人在听。无论是

生气地听还是饶有兴致地听，但是毕竟有人在听。许多地区，包括莫斯科在内，经常被迫高声喊叫，以便使他们的问题、利益和意见引起注意。

地区和联邦政权机构之间还有误解，这就是决策中心与那些通过自身劳动和工作直接创造物质价值和为整体经济以及具体某一地区、某一城市或者市辖区带来收入的人及法人的疏远和距离程度。在这方面，联邦主体比联邦政府距离每一个工作场地的距离更近，这既是一种规律，同时也是垂直权力机构的特点。如果一处的经济、预算出现问题，在联邦一级就可以通过别处对这种状况进行调整。通常是通过实力较强的地区、实力较强的部门、实力较强的纳税人进行调整。这也是自然的，因为从实力较弱的地方能拿什么呢？

对于联邦主体来说，这种机会要小得多。我认为，在谈论钱时现在该是停止害羞的时候了。我们大家——无论是每一个上班的人，还是莫斯科市，挣钱都十分不易。收入的来源有限，今后几年的机会也人所共知，即使是任何革命也无法发生改变。

什么最妨碍莫斯科发展？是对各种资源的无限需求，资源从来就没有需要的那么多。妨碍最大的还有体制实际所提出的游戏规则不可预测性，而且游戏规则经常变动。不仅仅是财政方面——预算和税收的规则，还有法律方面的游戏规则。莫斯科市一直计划、提出和承担一定的义务。随后突然开始抖掉它，况且莫斯科市自身在这方面没有过错。例如莫斯科市的三环路，如果税法没有发生变

动，早就该封闭运行了，这一下子使莫斯科就损失了几百亿卢布的收入。因为与三环路相连的有市内的许多项目和工程。但是要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问题。要记住，莫斯科同时也是国家的首都。

联邦预算在莫斯科市基本建设投资中的比重由1997年的25%已经减少到2000年的4%和2001年的5%。怎么能这样管理一个超过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就人口和经济规模来说相当于一个中等欧洲国家）呢？！怎么能提出发展的任务？！

因此，莫斯科对联邦组织机构特别轻易地试图支配莫斯科市的资源，以及对他们是否在讨论土地、房地产、税收或其他话题的情形特别敏感。最近十年内我们见过大量这方面的例子，这种恶劣行径不是为俄罗斯，而是为一帮流氓坏蛋服务。

加剧缩减对地区的财政投入，这怎么会引起批评呢？！如果不昧着良心说话，有哪一個地区能够赞同这一点呢，特别是当联邦政府这么做并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时？我能理解客观的需要。例如，外部威胁在增加，需要保证国防和国家安全。或者出现重大事故和自然灾害——庄稼歉收、地震、水灾或者技术成因的灾难。或者国家实行全国性的大规模计划，将大大改善经济、社会状况等……

但是，类似的事情一件也没有！相反，有的只是长时间对俄罗斯非常有利的国际油价。集聚了脂肪，增加了国家银行的储备，在偿还外债，成功克服了今年威胁我们的偿债危机，甚至似乎没有费任何力气。那么为什么还要剥

地区的皮，截断地区的发展趋势呢？

我个人对此有两个相互补充的答案。一个是为了让地区及其领导人更加听话，不要在行动和判断上有太多的独立性。要让他们懂得是谁在挣钱养活他们。那么干脆就直接一点，开诚布公地说，让我们回到单一制国家，重新返回到行政命令体制。应该懂得，在经过了上个世纪的那段历史之后，如果我们再次出现言行不一致，那么国家就将彻底瓦解。一个很简单的原因：信任就将荡然无存。首先是对国家、对法律、宪法不会有任何信任。公民、商业，乃至地方政权机关本身都不会有丝毫信任。

我再说多点。近几十年我们的联邦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造的。它的诞生不是因为地区有此要求——大部分地区没有要求过，而且现在也不要求。只是被请求这么做。而且不是因为我们突然友好地领悟了并且懂得：联邦就是好！领悟的内容也是不同的。

我们的联邦制是由于原来的联盟中央无力拽住一切向前走而诞生的，这一切包括：与美国的战略均衡、公用事业、供电、播种、收割等等。正是从那时起，中央由于已经没有实力开始将责任推给地区。但是他们在转交责任的同时却常常“忘记”将权利和资源也转交给地区。俄罗斯作为最大的一个共和国，完全继承了这一问题。

现在，中央将社会问题等其他最难解决的问题的责任从自己身上甩开了。中央将义务推给了地区和地方自治机关，而且不想与他们分享税基，不想现实地计算一下解决这一问题的其他可能性。有时为了假象，通过一些不可能

征缴到的税收来“补偿”损失。同时，顺便将今后出现情况的政治责任从自己身上推到了地区身上。所有这些都与建立真正的联邦关系很少有共同点。

通过这样一些富有成效的措施，中央集聚了力量，并且力图重新恢复对地区的最大统治权力。权力只是为了巩固政权，因为至今还没有明晰的提升、恢复和振兴俄罗斯的计划。而且，这与国家的可控性、与权力的“垂直分工”没有任何共同点。这是对官僚制度的一种姑息，它会径直导致丧失任何可控性，导致专横雪崩式地得以增加。我相信，总统并不想这么做。但是客观上，目前的趋势就是如此。

胃口增大不仅仅瞄准首都的房地产。当然，还有其他各类味美诱人的部门。但是，同样的程序在别的地区也在发生。只是我们在莫斯科对这些情况比对自身的事情听到的和知道的要少。我是经常与一些同行——联邦主体的领导人和城市的市长们有交往。也知道他们的关切和忧虑。

我认为，联邦中央当前对地区的地位和利益的蚕食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政治原因：收回失去的权限，在中央将其扩大，恢复苏联时期存在了几十年的严厉的中央集权式国家；

心理原因：近年来大量进入各不同联邦机关中的许多人都已经习惯了行政管理 and 下命令——而这在经济中奏效甚微，甚至丝毫没有效果；

最多的还是自私自利的小集团的利益：我们国家对个别非正式集团操纵制度在法律面前防守还相当薄弱，这些

集团将商业和官僚的利益叠加在一起。

我非常清楚，在联邦部门机构与地区部门之间的关系上有某种程度的紧张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紧张是由于联邦主体的目标与联邦的目标不相符所引起的，对于联邦主体而言，首先忙于自身的建设和解决本地区居民生活的问题，而对于联邦而言，它的目标应该是解决整个俄罗斯的建设和解决大量的其他任务。

设想一下一个温馨而和睦的家庭。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单个家庭成员利益与整个家庭生活需要之间也存在很多的矛盾。或者例如，有几家合住的一套公用住房，请想一想，在支付电费的形式上有哪些方案，当住房里面居住了各种不同类型——富裕程度、习惯等都不一样的住户时，这里会出现多少现实的、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

在上述这些“家庭式”的问题和难点上存在两种误区和两种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案。这两种误区在普通居民中、和在政治精英中都有所表现。一个误区是分离主义。分离主义者的逻辑很简单：我们什么都有（石油、黄金、天然气、小麦、金刚石、或者假设说飞机），这一切我们都自己用，不够的我们买。这是一种反国家的，归根结底是一种反自然的立场。历史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我们国家只能在统一中才能正常生活，俄罗斯的各地区相互之间谁也离不开谁，甚至是最富裕和最发达的地区。

第二个误区是最大程度上集中或者完全集中。国家应该是统一的，没有内部边界，没有内部差异。所有一切都应该汇聚到中央并且出自中央。这里甚至没有什么

值得争论。

正是这些误区奠定了当前针对地区的短视政策的基础。但还不仅仅只有这些。

所有的寡头不是平白无故地认为丘拜斯是自己的“生父”，是他们寡头经济的大牧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所谓“全民”资产、实际上是国家资产进行的私有化不可能有别的结果，除了瓜分这一实际上在当时并没有主人的资产以外。私有化于是就成就了这种瓜分。而且许多人如此喜欢这种瓜分和重新分配的程序，因为这种程序正合他们的心意，他们准备停留在这种程序中，即使不能永远，那么也希望是很长时间。这种程序持续的时间越长，认为自己不走运并准备参与新的重新分配的人就表现得越多。

也就是资产的外部重新分配程序一直在进行自我复制，进而不断扩大。我强调这一点！随之，所有位于表面上的——企业、基础设施、土地等都被瓜分了，这种进程进一步得到强化，继续前行，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然而，国家的发展不要求重新分配，而需要资本投入、建设和生产。持续的重新分配，与期待这种分配一样，既不能使所有者，也不能使国家超前计划超过一两年的经济活动。在这种平面内发展“战略性”行动计划是不现实的。

这就是当前束缚俄罗斯的问题的关键。国家在随波逐流，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不断得到满足，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改革的战略。当然，莫斯科最早、也最深刻地感受到这种运动的后果，也比别的地区对此反应得更快、更尖锐。我知道，这一定会使许多人不高兴。我也希望聊以自

慰的是，莫斯科的特殊观点最终对俄罗斯是有益的。

问：如果抛开全国性和国际性客观进程所带来的外部限制不算，莫斯科市有哪些重大的问题使您感到特别担忧？在最近的几年内您打算怎样克服这些问题？

使我担忧的问题有难以抑制的生活费用上涨、安全问题、基础设施与住房的老化和陈旧，以及即将开始的住房改革。我担心莫斯科市的环保状况——不仅仅是自然环保，而且还包括社会环保和文化环保。非常担忧莫斯科市的人口趋势。当然，还有莫斯科市的经济发展前景。

2002年莫斯科出口商品和服务为69亿美元，进口138亿美元。一方面，与人口远远多于莫斯科市的全国指标相比，这是一笔很大的数额。当然很好。但是另一方面，从这一标准来看，莫斯科市充当的是纯进口的角色。当然，应该修正的是，莫斯科大部分进口的商品最终不全是供给莫斯科消费，还有俄罗斯联邦的其他地区，甚至还有一些独联体国家。供全国范围内消费的奢侈品也基本上是由莫斯科进口。但是，尽管有这么多借口，对于莫斯科市来说，在实际经济部门中寻找新的位置和作用的任務仍然十分尖锐。

这种寻找不一定就应该在首都内部进行。有时候，莫斯科在其他联邦主体投入相对不多的资金，不但能解决莫斯科市的问题（例如，保证莫斯科市所需要的高质量的食物

品原料)，还可以帮助该地区，在那里创造就业岗位。莫斯科市实行这种经济路线已经多年了，这种路线证明非常有效，我们打算今后继续这么做。

根据2003年上半年的数据，莫斯科市的生活费用在欧洲排第一位，全世界排第二位。我毫不隐瞒地说，莫斯科市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怎么样也不能位居这种前茅。由此事实可以得出几个结论。第一，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市场机制。无论你往哪里看，都是垄断在起作用，垄断部门总是极力为自己的商品和服务规定最高的价格，而且他们力图继续提高这些价格。这是一条通往停滞、而不是发展之路。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引起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市场不是在扩大，而是在不断萎缩，变得越来越狭窄和帮派化。

大部分的居民在随后的10~15年内可能变得不太富裕。莫斯科市的社会分化在加剧。10%的最富裕的莫斯科人的收入在2001年是10%最贫困人口收入的44.9倍。当时全俄罗斯这一指标平均为13.8倍。在西方国家，10~12倍的差距就被视为是警戒线。

我已经同您谈到，莫斯科市迟早要碰到世界上许多大城市在不同时期已经出现过的问题。大量低收入的人口集中在城市减少了赋税的基础，同时，社会支出的需要明显增加。直接的支出有各种补助，间接的支出有教育、卫生、社会服务开支。

社会分化对于我们向往的所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经济结构而言，是一种正常现象。社会分化不可能避

免。对这一点不应该有幻想。应该对此进行准备，但不是以一种驯服地等待着可怕的审判般的宿命论者的精神去准备。世界上许多大城市所积累的经验使我们有能力设想，我们将会碰到哪些问题，使我们及时准备应对和降低这些问题的尖锐性。在他们的措施中，主要的一项是培植中产阶级。或者居民有钱支付在昂贵的大城市里生活的费用；或者绝大部分重要的社会支出由国家负担，并在联邦和地区之间分摊；或者城市开始缓慢但不可阻挡地衰落下去。

关于交通问题，前面我已经谈过一些。我们在莫斯科同时碰到了这一问题的几个环节。历史上就已经形成的城市规划使交通状况变得更加复杂化，需要在近几年内花费巨额资金建设四环线，以及通往莫斯科环形公路以外各区和弗努克沃机场与舍列梅季耶沃机场的“轻轨”线路。根据新的税收分配方法，这些资金已经被收走了，但是什么也没有得到补偿。莫斯科的地铁本身处在极限能力上，它的合理扩大所需要的支出应该与国家一起负担。地面交通总是与市内“堵车”联系在一起。大量的莫斯科人都享受各种优惠，这种优惠的支付机制还没有进行调整。公民们简直就是免费出行，就像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一样。同时，公交企业的支出怎样也无法补偿，而这些费用是相当高的，买票收入只能抵补40%的支出。票价上涨和根据里程收费不可避免，但他们不是灵丹妙药。莫斯科人上班至少要换乘一次车，也就是说，上班和回家他需要至少买四张票。如果单程在路上的平均时间超过一个小时，那么，每一个莫斯科人实际等于穿过整个城市去上班和学习。

我个人看只有一种办法：必须在莫斯科和全国实行长期并持续增加居民收入的方针。1992-1993年和1998年，国家使中产阶级为寡头私有化和寡头资本主义而牺牲。然而，中产阶级不仅仅是公民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最广泛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有了这种需求就能决定，我们的经济和市场将是现代的还是接近野蛮的。刺激中产阶级，对他进行社会和政治支持，保障他经济和法律地位的安全。这不是其“社会保障”方案中的社会主义。如果不能超前发展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现代经济就只会受挫。这正是市场政策，要么长期，或者不排除严重倒退，二者必择其一。为这种政策“松绑”的时间正在飞速到来。莫斯科和一些大城市最先感受到这些问题的临近。

交通问题与基础设施和住房老化密切相关。比如说，莫斯科的不少地方都需要进行大修。这些地方包括：一些封闭的街道，狭窄的马路，交通运行线路和一些小区的重新规划。在大规模的住宅建设方面，莫斯科市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但是，莫斯科市迫切需要更多的住宅。我们还面临着掌握在城市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地区全面更新城市基础设施的技术任务。莫斯科正在建立新的产业化地带。计划将工业企业从市中心和老城区搬迁到专门的区域。所需面积的土地将通过非组织性的市场获得。也可能要将火车站搬迁。

我个人认为，进行大规模住房改革的时机日渐成熟。过去的中心任务是保证莫斯科人的住房面积。现在这一任务没有解除，虽然在市场条件下解决这一问题要困难得

多。大部分居民无钱改善住房条件。在现有的收入水平和贷款费用条件下，无论是通过抵押贷款还是其他形式买房都不可能具有普遍性。与此同时，对莫斯科市在30-35年前建设的住房进行大规模翻新的必要也日渐成熟。降低新住宅建设的速度从各个方面——社会的和经济的——来说都不好。不对老住房进行修理简直不行，这就等同于事故和牺牲。但是，这一切都有赖于资金，特别是在住房归公民个人所有的情况下。

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在莫斯科和整个俄罗斯建立世界上都普遍存在的住房租赁市场。但是这种转变对于我们的许多公民来说可能心理的痛苦甚至比经济上的痛苦更大。特别重要的是必须及早采取各种措施，使这一市场不能以我们90年代所出现的那种野蛮方式建立，使它不至于导致居民新一轮的大规模贫困。

另一个问题：应该将莫斯科市的自然、社会和文化空间连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人周围的环境不仅仅只有自然环境。城市的环境是人工制造的、不自然的。我们的公园、林阴道和街心花园应该成为城市环境不可分割的部分，应该是城市的名片，就像克里姆林宫和红场一样。当然，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保留和翻修公园、街心花园，绿化庭院和街道。但是这不是自然——它与别墅周围的菜园和花坛、窗台上的花或者家里养的小狗、小猫、仓鼠一样，不完全是自然的。这些都是生命，但是早就不是野生的自然。

人类在几千年前就在自己周围营造个人的生存环境。谈回归自然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幻想。如果上千平方公

里都铺上了沥青，上下都有建筑，到处铺满管道，又怎么样回归自然?!我们怎么能在莫斯科繁殖黑熊，栽培美味的牛肝菌?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约500年，但是还没有解决。莫斯科人今后将到哪里去?

必须承认城市的环境，接受它的品质，并在今后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发展。我提出这一点的意思是指，必须要采用系统的方法来发展城市。我们建立了人工制造的世界——需要持续并且有意识地进行再创造。我们懂得，这一世界需要长期维护，精心使用，定期进行大修和改造。

如果某一个莫斯科人在院子里、台阶上和街道上都随便丢弃垃圾，表现出习惯性的不守规矩，不注意努力保持清洁和秩序，这不仅是不好，而且也给周围的人造成不便。这是对花了很大劳动和金钱所建立起来的生存环境的一种破坏。在这种态度下，房屋、设施和设备磨损得更快。这不仅仅是一种额外的支出——莫斯科市每天产生7600吨垃圾，同时也是对城市大气的一种多余排放。需要增加垃圾场的面积……确实，这种不守规矩导致被迫增加许多东西。

没什么可说的，一些贫民或来自彼岸世界的外地人总是这么做。也有一些比较顺心的，从外表上看甚至比较文雅的莫斯科人也经常这么做。怎么能将自己居住的地方弄得污秽不堪呢?!这是某种突变。人生活在人群之中，怎能不考虑别人的利益呢。这种生活方式就其实质来说是一种反社会的，它在那些昨天还是文明的地方上演混乱。您知道，我与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小说中的一个人物——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教授很相似。我也认为：“坍塌是在头脑中开始的……”

对这些应该怎么办？当然，应该从小，从幼儿园和小学开始培养人们集体居住的文明。因为如果几千万的人都像低级生物一样举止，那么，这所城市在生理上是抵挡不住这些的。多少花费都挽救不了，即使是为此能够找到资金。怎么办……让我们来打扫吧。一遍又一遍。因为我们的后面就是莫斯科，我们不能失去她。

可惜的是，不是所有的莫斯科人都感觉和意识到自己是莫斯科人。这种意识的程度也就形成了实际的文明氛围。还记得吗，您曾经问过我，能否成为莫斯科人？我再次回答——能。标准很简单明了。那种关心自己的城市如同每一个正常人关心自己的家一样的人都可以成为莫斯科人。

有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流浪汉。他们若隐若现地在莫斯科出现。这些人是不幸的，许多人都患有严重疾病。苏联式的“治疗”方法已经成为过去。但是，流浪汉作为一种现象，对于莫斯科市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如果每走一步都碰到失去了人的整个风貌的人，那么人们很难尊敬这个城市和居住在这个城市中的人自身。流浪汉是赤贫的稳定“飞地”和反社会生活方式的催化剂。我认为，一个城市或者几个大城市，联邦主体，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应该制订一个社会任务：帮助这些人，使他们回到社会。

最后是人口问题。莫斯科市的人口现在主要是通过外

来人口增加的。市民中间主要是年龄较大的人，直到最近，莫斯科人的死亡率还超过出生率。如果今后外来人口继续大量流入，那么莫斯科市面临的一大任务是对这些外来人制定和实施一项文明地融入莫斯科的计划。这里指的不是进行语言灌输，也不是强制推行俄罗斯化，虽然他们应该懂得莫斯科市的语言。需要帮助这些人很快适应陌生的生存环境，帮助他们接受莫斯科市的标准、规则和要求。这既是人道主义的问题，同时也是维护我们城市文明环境的问题。

莫斯科市的特点在于，如果现在不采取预防措施，那么近几年内我们首都的许多区都可能会变成巨大的“哈雷姆”。社会分化，1950-1970年修建的各区出现的磨损与破旧，莫斯科人按照宗教信仰、民族等因素划分群体——如果这种进程得以发展，就会导致莫斯科解体成若干个社会文化“飞地”，每一个“飞地”都将成为“城中之城”。这种趋势不仅会引起贫困和犯罪——虽然这些都是城市的问题，也是非常难的问题，而且会导致出现非常可怕的反社会文明的策源地——能够将其影响扩大到整个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策源地。应当不惜任何代价避免莫斯科出现这样的策源地。

请不要把前面我所说的理解为我对未来持悲观主义和忧郁的看法。这不是我的性格。您问的既然是问题，那么我就谈问题。我的结论很简单：需要研究和预测。如果今后证实问题即将来临，那么就需要提前做好长时间的，以及目的性很明确的工作。

问：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您领导首都已经十多年了。也许，在莫斯科市政府的政策和市长的决议中，有些地方在今天看来是不正确的，错误的。您今天是否想纠正自己以前决议中的哪些东西，走另外一条路呢？

我不想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原因主要有：

第一，我认为，1991年后我们在莫斯科没有犯过任何原则性的错误。那些今天有证据说“做了蠢事”的情况在莫斯科完全没有。甚至我们最严厉和毫不妥协的批评者也拿不出像样的什么例证。莫斯科一直在生活、工作和建设着。它的问题很多，但是这些问题对于一个大城市和目前国家处于过渡时期来说是自然的。对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以说是由莫斯科市政府的失误所造成的。在最困难的几年中，莫斯科市从来没有断过电，没有停止过供暖和中断过交通。事故、困难和问题都出现过，但是，灾难性的情况我们不能容许发生。

第二，要想使20世纪90年代期间莫斯科市采取的战略决议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和其他后果完全表现出来，经过的时间还太短。这些后果最好是在五年后或更晚开始显现。也许在这些后果中，除了负面的东西外也包含一些正面的东西。生活就是这样构造起来的。但是不能对后者进行猜测。必须对此进行分析并采取措施校正和消除。可能，某些事情逐渐会重新看待。但是，进行猜度或者片面解释，这不是我的性格。

第三，还有一个心理陷阱，管理者绝对不能掉进去。没有权利掉进这一陷阱。在你还没有做出决定之前，你会面临许多选择。一旦做出决定，甚至宣称是最好的、最英明的决定，所有的选择就消失了，只剩下一种你自己所选择的决定。过了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一种叛逆的想法：“要是当初我不这么做，可能情况会更好。”最有意思的是，这种想法一定会出现，不管你已经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和选择。也许，我们的心理就是如此构造的。不能这样进行自我分析。如果有客观的理由需要修正已经做出的决定，应该平静地分析这种理由并相应地采取步骤。而采取步骤，就是要做出新的决定并开始实施。但是，不能只是犹豫不决地说“要是那样做就好了”，这就如同飞行员不能体质不好，司机不能视力不行一样。对于领导人来说，这也是他职业所不能容忍的特征。

如果我看到某一决定做得不成功，不能带来预期的效果，我不会摆出绝对不会错误的姿态。这既不是炫耀功绩，也不是一种有目的性的宣传。管理中有反馈的概念。做出决定，开始实施，看看能否成功，能否符合当初的目标和打算。如果需要，修正或者改变，乃至取消这一决定。这些年来，莫斯科市政府就是这样工作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如果我现在说：“是有这样的问题，本来可以用另外的方式进行解决”，那么读者就有权好奇地问：如果你这么认为，那么为什么不重新做出决定呢？有什么阻碍吗？这种读者可是说对了。

问：领导人的任务不仅仅在于能够回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而且在于预见明天即将出现的问题。未来几年我们将会碰到什么？对于大量莫斯科人和“城市之父”而言，明天将是头疼病吗？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梦想”，我怎么能回答您的问题呢？关于莫斯科市的问题我已经谈了很多，我不想，也没有必要再重复。

我强调另外一点，如果刚刚谈到过，就顺便一带而过。莫斯科市的问题——今天的、已经众所周知和明了，甚至令人厌烦的问题，或者将来的、还不清楚的问题，都不仅仅是莫斯科市、莫斯科政府和市长的问题。当然，从工作职责和良心上说，这些问题是我们的问题。但是，这也是每一个莫斯科人的问题。当然，谁也不指望，市民能担负起落在政府和市政部门的那些职能。从这里领取工资的人，他们应该为此工作。

没有哪一个政府机构会有效，如果它的周围充满了真空的环境。以前有这样一个关于社会主义五个矛盾的笑话：“没有人工作，但计划完成了。计划完成了，却一无建树。虽一无建树，但人人应有尽有。人人应有尽有，但无人满意。无人满意，但人人都说同意。”工作条件没有比“人人都说同意”的时候更差。如果赞同和支持是公正而且发自内心表达出来的，这是最好的，是一种最高奖赏。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担心那种“赞同和支持”的变异，它将冷漠、没有区别、有时是暗藏的不希望掩盖起来。我不是说我自己，我没有这种委屈。我说的是政府与社会之间、市政府与市民之间关系的特征。

说实话，在多数情况下我倾向于公开而明确地表达不同意。这种不同意能靠得住。例如，您如果不同意市长的意见，那么就直接说出来，让我们一起想想，一定会找到共同的解决办法。这是非常正常的程序。如果周围听到的都是赞美和同意，并轮流地唠叨不休，这样就很难工作。这使人想起了苏联的党代会，开会之前在吸烟室里谈论的是一种观点，在会议上又一致表示同意另外一种观点，然后散会，认为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任务解决了。

我们，俄罗斯的公民，今天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全国，有各种机会成为自己生活的真正主人。但是，为此必须着手去干。这很难。有时还充满风险。是的，不能保证一定胜利，一定能赢。没有正确估计，错误和失望不可避免，特别是在当初。是的，坐在习惯的沙发上看电视既容易，也舒服。但是，总有一天别人将会成为我们生活的主人。不知道是谁，但绝对不是我们。

这里谈的甚至不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在莫斯科，这种自我管理仅仅只能在个别住宅合作社、合伙公司，最多在一些小区内能够实现。这种自我管理也应该从公民的日常积极性在最简单的问题上开始。莫斯科城内有多少漆黑的通道，漆黑不仅仅是因为那里的路灯烧坏了、砸碎了或者被偷了，而且还因为没有人愿意打电话给调度员，请他们

将路灯装上。

更简单的，别在自己周围乱倒垃圾。将垃圾送到垃圾桶、垃圾箱——现在街道上已经够多了，送到垃圾管道内。“没有钱给清洁工，这点工资没有人愿意干清洁工”，这只是事情的一小半。主要是楼层和窗台成为了各处烟民和酒鬼的俱乐部。他们每天都在那里集合。剩下的住户，都是一些正常人！……

这就是莫斯科。也许是整个俄罗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一部分居民严重缺乏自我尊重和个人尊严感。当然，不是所有人，但是这种人非常非常多。从这里就引出了大量的其他问题。有较强个人尊严感的人不在大街上扔烟头和糖纸，不是因为害怕被罚款、害怕警察，以及遭路人指责，而是他觉得这么做令他自己不愉快和反感。他觉得这种行为首先是对自己的侮辱。一个有自尊的人，他不能容忍过道和院子不成样子，他不能容忍任何等级职员蛮横粗野，不会对应该向市长办公室、警察局和媒体高喊的事情漠不关心。一个尊重自己的人——不仅仅是他自己，还有任何别人，都将是积极的公民，因为很强的个人尊严感不允许他无所谓和漠不关心。一个与世隔绝的人，只能是一个名义上的公民。

仅凭呼吁不可能纠正这种状况。需要呼吁——不要视而不见；如果不信任警察，就请拨打市长的热线电话。如果你见到有官员、地方政府机关不秉公办事，强索贿赂，那么就请提高嗓门，把记者喊来，引起注意。市长不是万事通，他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主要的是，向市长提

出的任何理由的上诉，我都感到很荣幸，这并不是说昧心话。但是，要知道，这是在新条件下和不确定的将来对“仁慈的沙皇”和公平的贵族的古老的俄罗斯信仰的复苏和巩固。据说，他们会明晰一切，能引导应有的秩序。是他们，而不是我，这是根本和实质，是不想成为公民和不能成为公民的病毒。

我知道，不愿意和没能力——这是对俄罗斯历史给俄罗斯人带来的各种贫困和考验的一种特殊的自我保护形式。克服、铲除这一制度是莫斯科市政府、联邦政府，以及俄罗斯公民的任务，也是头等任务。国家的全部实际政策都应该用来铲除这种制度。

我当然懂得，我想要的东西太多。但是，眼睛虽然害怕，手却在做。莫斯科政府、莫斯科市将认真地这么做。只是在某一个城市——即使它是首都还是区中心——是无法完全解决这一任务的。在国家的所有居民没有成为公民之前也不能解决这一任务。社会需要信心、自尊、稳定以及个人尊严感。

12 我对俄罗斯的生存能力 充满信心

问：在《历史的更新》一书中，您谈到俄罗斯自我消亡的威胁的现实性。书中关于俄罗斯的章节中有很多问号，让人觉得莫斯科市长不再是一个乐观的人。是这样吗？

关于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有两句经典笑话。悲观主义者说：不可能更坏了。乐观主义者说：不，可能更坏。严肃地说来，我更愿意谈现实主义。

一个人可能是乐观主义者或悲观主义者。我认为，政治家应该是现实主义者，有责任看清楚事情的本来面目。但由此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同意“政治——可能的艺术”这种说法。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俄罗斯只剩下一条路——躺在神像下静静地死去。古时人们说，当上帝送

来了考验，他同时也送来了承受考验的力量。

我相信俄罗斯的生命力，相信她有赖以发展和崛起资源和能力，能确保世世代代的子孙过上好日子，能在那些和世界发展进程保持一致的国家中巩固地位。我也相信，俄罗斯的复兴、更好的生活、对国家的尊敬和重视并不会从天而降，要靠顽强的、紧张的、目标明确的工作才能获得。

由此可见，我和悲观主义者或乐观主义者并没有多少共同点。我首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对具体形势的评价是否乐观取决于把它放在宽广的“上下文”里“阅读”：城市的，俄罗斯的，有必要的——全球的。要是我说，俄罗斯现在急需100公里地铁，但在2010年前不可能有，这并不代表悲观。这是对城市能力的现实评价，它能促使我寻求替代品或其他的解决办法。

俄罗斯走下坡路的风险还存在吗？她的经济、社会、不同领域和区域中衰落的因素和趋势有强化的风险存在吗？在各种因素和外来威胁的影响下，国家分裂成松散地区的风险存在吗？这种分裂不一定会和前苏联的解体一样，它可能会以其他更隐蔽、更危险的形式出现。我想，对于这些问题，每个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会给出肯定的回答。

是的，上面提到的这些风险都还存在。不能无视这些风险，不能从国家自我毁灭的风险旁逃开。逃避现实的“鸵鸟”政策只会令风险更大。

为什么这些风险还存在于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因为前

苏联不应该解体吗？因为我们实行的是根本错误的政策？如果确实如此，我们面临的就不仅仅是风险了，而是国家灾难。风险是可能的威胁、危险和失败。只是可能，没有确定性。现在俄罗斯面临的最紧迫的风险的实质，在于国家从前苏联向 21 世纪的俄罗斯的革命性转型中。

革命本身并不能创造什么。它用暴力的方式毁灭旧事物，同时给新事物带来了空间和前提条件。但是，新事物仍然需要建设，只有除了革命者和毁灭者（虽然他们中也有英雄）以外的人才能完成建设，这些人还必须具备创造者的心理。首先要停止革命引发的毁灭进程。现在，俄罗斯面临风险的深层原因就清楚了：毁灭进程没有被及时停止。毁灭进程有惯性和社会基础，继续这种进程可以给一些有头有脸的团体和个人带来切实的利益。要克服这些风险，必须把毁灭的复发彻底抑制住。风险本身和诱发风险的因素不会自动消失。悲观主义者在这场斗争中当不了帮手，也不能指望乐观主义者能推你一把。

应该“悬浮式地”看待对未来和前景的评估、目标和发展道路的选择。根本谈不上拿破仑—布尔什维克式的“先打再看”。缺少批判思想、客观分析和对人民的责任感的乐观主义，只能孕育政治和社会激进主义的最坏范例。在俄罗斯，这样的乐观主义所产生的结果众所周知。

谈论俄罗斯目前和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并不意味着悲观。这是为任何重大的转折和成功解决任何问题做好准备的必要条件。让我们想一下，如何训练飞行员和宇

航天员。他们要在练习台上经历上百次所有能想象到的和超出想象的情况，包括最罕见的和最不可能的情况。是要把他们培养成悲观主义者吗？正好相反。他们可以学会快速有效地做出决定，对可能出现的紧张异常情况时刻做好准备并且不屈不挠。

我们曾经唱过“苏维埃不可摧毁”，一起分享过历史乐观主义的体验。那时，国外有几十本严肃讨论苏联解体的可能性甚至不可避免性的书籍。我们的反应是“你们诽谤吧”。1991年春天，当全世界都在数离苏联解体还剩多少日子，我们却举行了以“您想在什么样的苏联生活”为主题的全民公决。

我仍然是现实主义者。我想看见所有问题和面临的任务的复杂程度，它的潜在规模和可能后果。我想了解这一切不是为了不作为。了解现实的复杂和多变是为了尽可能理智地选择自己的道路，确定目标并朝着这个目标乐观前行。

现实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的区别在哪里？乐观主义者愉快地相信俄罗斯的未来一片光明，相信俄罗斯注定能够达到精神和科学的新高度、经济繁荣和世界的尊重。乐观主义者相信俄罗斯能够在自身找到力量走出危机，恢复并增加自己在各领域的潜力。

太棒了，我也希望这样。可是，乐观主义者只是旁观者。他相信俄罗斯，但俄罗斯需要他什么呢？

这是我不能接受乐观主义者的地方。100年前有这样一种说法：爱国主义是坏蛋最后的避难所。这句话的意义

并不是我们长久以来以为的那样——爱国主义不好，是可耻的。它的意思其实是，当坏蛋无处可去时，当他几乎被揭穿时，他没有别的可做，除了披上爱国分子的外衣。现在，在我们国家，又开始流行把自己装扮成乐观主义者。我不想落入乔装者的阵营中。

现实主义者深知，生活中的一切都要靠劳动获取。我们给自己定的目标越高，实现目标需要的努力、劳动和心灵、头脑及身体的工作就越多。俄罗斯不可能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我们必须辛勤劳动，俄罗斯才能有所收获。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或者做得不好，结果就会和乐观主义者幻想的大相径庭。俄罗斯现在拥有的和我们引以为荣的一切都是祖先的辛勤劳动甚至鲜血换来的。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应该严肃对待并认真准备紧张繁重的工作。

因此，我建议那些把《历史的更新》这本书放在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框架内解读的人，带着对前面所述内容的思考把这本书重读一遍。

俄罗斯有几百万人在最近30年里建造了自己的房屋和别墅。这是最伟大的政治和社会事实。在此之前，只有农民自己盖房子。但在1920-1960年间农民盖房子停止了。一些农民的土地被没收了，还有的进了城，剩下的留在乡间苦熬岁月。这样，出现了两代靠自己的双手盖房子的人。虽然盖的不一定是住宅，只是能够遮风挡雨的屋棚——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凭自己的经验知道怎样给自己建造就算简单朴素甚至寒碜的房子的人，不会给自己的头脑里灌进盲目的乐观主义。他们知道并且明白，这

辈子为什么而生活，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想起了一件趣事。每个人一生中都有老师。我的老师包括曾经担任苏联化学工业部部长和部长委员会副主席的列昂尼德·阿尔卡季耶维奇·科思坦多夫，曾任基本建设部副部长的伊万·扎哈罗维奇。伊万·扎哈罗维奇是一个杰出的建设组织者，一个思路开阔的领导者，对自己的工作了如指掌。他和那个年代的所有人一样，在莫斯科郊外得到了六俄丈的土地用来盖房子。在那之前，我在当木匠的父亲那里学过盖房子，在这方面已经有经验了。我建议伊万·扎哈罗维奇说：“我们自己盖吧。”我做好了设计，算好了需要的木材，就开始动工了。我和伊万·扎哈罗维奇两人利用每周日盖房子，经过两天的努力把房子盖好了。完工后，伊万·扎哈罗维奇对我说，他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也从未想象过自己盖房子有多难。我再重申一下，说这番话的是一个负责工业建设的才能卓越的组织者。

我们（我指的是俄罗斯）进入了社会心理发展的新时期。新时期不需要精神上的“拐杖”和“支柱”，需要指出的是，乐观主义就是拐杖中的一种。它们不仅不需要，反而还会起很大的阻碍作用，就像拐杖妨碍健康的不需要它的人一样。该扔掉拐杖了，该思考思考最令人不快和痛苦的问题并且寻找问题的答案。

我想把这个新的历史时期称作用智力来进行合法化的时期。几千年来，人们习惯把来自统治阶层的一切都看成是自然的、合法的。权力被当成是上帝赐予的，这就够

了。首先开始有人怀疑权力来源于上帝。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产生了代表制民主。现在我们很了解，如何使用选举和社会情绪。

现在，选民表达意志的自由还不足以使政权被看成是完全合法的。如果当局的做法违背常理，那拿选举结果做借口毫无用处。苏联解体并不是因为搞冷战；有没有搞还有争议。解体也不是因为经济混乱；国家曾经有过经济上更困难的时候。解体首先是因为苏联成立的准则和国家的日常生活多少开始违背常理和科学。人不能连续几十年说一套，做另一套。

当我们今天思索俄罗斯的未来，思索怎样使国家繁荣发展，我们一刻也不能漠视目标、道路和目标实现方式的选择。预期的结果要符合我们理智的发展、常识和科学的发展。这就是现实主义。动人心魄的结果在人们眼里可能会是不合理的，这是后果最严重的失败。

还想说一点。真正的政治家不仅应该是现实主义者，还要是梦想家，如果你愿意，还可以是幻想家——透过崩溃和衰败看到崛起和伟大。城市和国家的未来不是现在状态的机械延续。如果是那样的话，衰落就是我们生活和存在的准则。但是，一个大写的人，总是有理想的目标。人类的行为就是超越现在和让不存在的东西变成现实。没有梦想，发展就会止步。

问：您经常谈到和写到投资人类财产的必要性和建设社会国家。原则上，在这方面您不是孤家寡人。关于社会

国家的讨论早就进行了，然而，现实社会却一年年远离这种好的模式。

是的，我们在远离——但远离什么？远离过去在我们中间形成的关于社会国家的概念，我所指的主要是中老年人，他们受到过去在苏联时代生活经验的影响。我们都是从前苏联过来的。虽然“社会国家”这个术语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而且不是出现在俄罗斯，而是在西方国家，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伟大的卫国战争之前，在苏联就宣布了社会国家的原则并准备付诸实施。

老一代人还记得共产主义口号“一切为了人类和人类的福祉”。这样的标语牌在城乡随处可见。然而，这个体制都建立在集中制和集中式分配之上。分配就是分。社会国家被间接地推到国民面前。它成了巨大的社会保障。人们期望，它像预想的那样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结果，社会制度的公平和不公平就表现在分配领域。

苏联执政者支持国民的这种思维方式。顺便说一下，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在莫斯科郊外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看到一块荒谬得令人震惊的牌子，上书：用突击劳动回报党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关心。这不是笑话。如果细想一下，党关心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就是分配，要用突击性的生产劳动来回报。问题在于，党，即国家，和基本生产劳动没有直接关系。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苏维埃体制遭受了更加明显的危机。朴素的生活水平不是体制的原则性缺陷。问题不

在这里。体制没有增强，反而压制人们的动机，剥夺人们关心人首先应该关心的事物的必要性和实际可能性。苏维埃模式把过多的、胜任不了的责任和功能（国家没有能力也不应该经营干洗店、幼儿园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交付给国家，于是人民完全依赖国家。这种模式阻碍人履行公民的职责，向国家提出合法要求，追究国家的责任。既然人们依赖国家，就习惯了被国家养，但是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源满足国民的一切需求，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私人关系。换句话说，苏维埃模式的社会国家客观上鼓励并刺激了走后门、氏族关系、灰色经济和政治在社会上的出现和传播。

任何重蹈覆辙的企图对国家来说都是致命的。我不得不在《历史的更新》一书中，把俄罗斯说成是不坚定的国家。国家的不坚定是由幅员辽阔、物理地质、气候和文化的多样性决定的。所谓公平分配社会财富，肯定会导致俄罗斯和它的国民经济综合体开始分裂。原苏联发生的一切又会重演。回忆一下，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因为莫斯卡里（对莫斯科人的蔑称）吃自己种的油而生气，哈萨克人对自己种粮食养活整个苏联而不满，乌兹别克人不愿意被禁止种粮食，只能为整个国家种植棉花，俄罗斯人也不满：因为国家花力气实现“边远地区”的工业化。

苏联不复存在。我们正在远离原来的一切。不能不远离，因为已经没有那样的国家，那样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体系。我们可以完全忘记国家的社会责任吗？风险很大。有一些非常知名的大人物认为可以，认为应该恢复自然选择

法则。风险和什么对立呢？

风险和俄罗斯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对立。过去在国家遭受战争和外来威胁的时候，可以保证人民的忠诚和爱国心，这样的时期已经不复存在了。国家单纯依靠武力、垄断信息、残酷镇压异端思想、禁止和管制出国和类似的手段来保障自己的统治和政权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手段在现代社会不仅没有效果，而且还会对试图使用它们的人不利。

国家现在只有通过两个途径保证自己的合法性：人们对国家自然的爱和国家自身在解决社会问题时的竞争力。但是请相信，很难爱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很少利益和不少害处的制度。我在此就不举专职独裁制度的例子了。我举另一个例子：人的常识不可能认可它觉得不合理的东西。请相信，如果一个人对国家的爱越强烈、越真挚，他对一切损害国家的东西就越不能忍受。现代世界中，社会国家是有效率的、国家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由此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无论它的体制、意识形态、政治力量是怎样，都不得不成为社会国家，从而能够维持自己的竞争力和不破坏自己在国民心目中的合法性。

有两个极端——实现全俄罗斯的保障不可能，但是完全放弃国家的社会功能会导致重新使用镇压性的管理手段和方式。我们必须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并且实行最适合俄罗斯的政策。现在我试着来阐述一下政策的出发点。

最主要的是，现代国家必须是社会的，否则国家就没有权利被称为是文明的，它只能在微薄的名望中苟存，不

能在世界上变成有竞争力的、举足轻重的国家。我们能说出一个放弃了社会国家的功能而能在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中有一席之地国家吗？即使毒品组织也会坚持在种植毒品的地方履行最起码的社会服务。

国家应该为自己确定社会行为最主要的目标和方向。起码应该照顾那些没有国家的帮助就无法生活的人。如果在大街上有在垃圾箱里翻找东西的老人，这不仅对他，而且对国家来说都是耻辱。

毫无疑问，帮助应该是有针对性的，也应该是有效的。国家现在每月付给每个儿童 50 卢布补贴，这会让所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感到侮辱，并因此厌恶当局者。因为 50 卢布只能买一罐儿童食品，小孩一次就可以吃光。很多家长根本不要这笔补助，因为它是侮辱性的，没有意义的。补助应该起到帮助作用。这就意味着，必须找到资源，使国家支出合理化，消除经济寡头。应该给人们能够用来养活孩子的钱。

是的，又出现了动机上的陷阱。根据西方发达国家和前苏联的经验，有一类人只靠补助，而不是工资生活，而且对不高的生活水平很满意。社会救助体系不应该滋生坐享其成的寄生虫阶层。我认为，这不是不可解决的问题，但还没有听说，有人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应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包括退休金里国家应承担的部分，对在国家工作岗位上失去健康、养育者和财产的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对自然灾害、恐怖袭击和人为灾难的受害者的救助。可能还有其他方面，我现在

讲的是基本原则，不是具体的实施细节。

保护和恢复环境是社会国家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俄罗斯。为什么我把这个功能归在社会功能里面？因为生态是人的生活质量。这种质量不光是窗外美丽洁净的风景、小鸟的歌唱和干净的空气，还是生命的可延续性。这是老人、小孩，特别是新生儿的健康。这是人的能源，关系到人类存在还是缺乏生命力。生态质量是社会的自我感觉，人的自我意识：我是生活在干净的国家、受到很好照料的城市，还是在污水池里？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尤其是当我们在谈论俄罗斯的未来的时候。

最后，必须确定国家社会功能体系，功能的目标是促进社会、经济和国家自身的发展。这包括对所有形式的教育，对所有学生、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帮助，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通过发放奖学金。还有对科学、文化和博物馆事业的支持。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原则很明显。

我常常听到有人说，好像国家没有钱来实现这些功能。钱永远都不会有想要的那么多。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拥有所期望的、必要多的钱。办法只有一个，虽然令人不快，却有效：理智地花费所拥有的一切。在内容、目标和必要性都不清楚、争议颇多的教育改革上已经投入了多少钱了？翻翻报纸，还可以找到多少这样不合适，甚至明显错误、不合理地花钱的例子？

俄罗斯国家会不会成为社会国家？如果会，那么它的效率高低基本取决于社会和公民。需要有持续的、强大的和有水平的压力来促使社会国家的形成。熟练的工作能提

示国家，应该干什么，在哪里干，怎么干，还能要求国家在具体的时期和地点确定优先目标。需要社会有专业的、持续的创新力，能够完成法案的制定、尖锐的诉讼程序和开始新的社会政治辩论。应该建立当局和社会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合作机制。

我们有没有积极的公民和有用的公民社会决定了有没有社会国家。从另一个角度说，除了社会领域，在哪里能取得必要的政治经验？

问：但是，怎样克服停滞不前呢？书里每一章、每一页都在列举无法解决的问题。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您不担心会起到反作用吗？您的现实主义会不会在人的意识里产生不可避免的灾难感觉？

主要是，很多人对变化感兴趣。首先是公民和居民。感兴趣的有靠提供实在的商品和服务，而不是靠金融诈骗生活的经济界人士。感兴趣的还有所有在思考的人，他们明白，今天对个人私利的纵容就是对明天地位的削弱。我认为，我上面提到的这些人的总和构成了国民的大部分。

什么不够？遗憾的是，很多都不够。缺少公民的个人动机。缺少准确的理解，缺少坚定地、目标明确地、有效地行动的能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令人厌烦的工作不会有收获。我们的性格是这样的：闪现了一个好主意，

爆发出热情和能量，表现出雷厉风行——然后热情就冷却了，就不管了。

但主要还是缺乏自我组织。在厨房或者会议上批评政党、政府、寡头，骂人不会带来任何益处。可以成立目标清晰明确的组织，然后开始社会活动。要相信，效果很快就会有。所有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也有人对待停滞不前感兴趣，希望保持“一潭浑水”、无法无纪的状态，希望增加滥用职权、诈骗和犯罪的可能性。当然有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人才怪。这是任何一场革命表面的污点。

不应该认为，灾难，甚至是全民族的灾难，一定会使所有人害怕。高尔基的《海燕》里有这样一句话：“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民间也有这样一种说法：“有人需要战争，有人需要母亲。”有人能从灾难里得到好处，灾难不会使他们害怕，他们自己制造了灾难。灾难总是变化，停止法律的效力，毁坏道德结构。对某些人来说，灾难意味着死亡的时刻，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梦寐以求的时刻。

所有这些人都会抑制自己的欲望和胃口。问题在于，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的很多社会运动，实际上都成了一些沽名钓誉者的跳板。社会组织没有能力避免破坏和毁灭它们的领导层，没有能力动员起来在社会上和在与当局交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没有一个现代政党是被当局压制下去的，它们只是缺乏活动能力，破坏了自己的思想。

眼前有了这令人伤心的经验，诚实的、受过教育的、守法的、专业的人经常说，搞政治有什么意义？反正一切都会被无赖窃取。如果诚实守信的人都等待无赖自动消失，那么就不值得指望有重大的好转和社会“健康”的改善。这不是悲观，而是对形势的现实主义解读。

关于问题。遗憾的是，它们不只是在我的书里，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中。当然，可以不写也不谈这些问题。有人喜欢把头埋在沙子里不出来。但是，据我观察，这种姿态对于绝大部分人都不舒服。如果忽视问题，不把问题搞清楚，就不会取得好的结果，我们的时代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非常厌恶地谈论或思考一些问题，那就不要读我的书，去买侦探小说吧。

曾经有一个英国侦察员，后来成了作家，他叫索梅尔赛特·毛姆。在1917年二月革命前夜，他写了这样一段话：“我的印象是，好像俄罗斯的精雅们都失去了自我保全的本能。精英的表现让人觉得好像他们生命里的一切都牢不可摧，他们的处境永远都不可能恶化。”这番话难道在今天没有现实意义吗？难道只有精英阶层这样吗？难道我们不是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毛病吗？

在民主的条件下出现了一种政治行为类型：只讲让选民高兴的话，讲的话要让选民的耳朵感到悦耳，要让他的心灵感到安慰，让他觉得很愉快。从消费的角度来说，就是只消费美味可口的。要知道，如果只吃糖，早晚会呕吐，健康会完全紊乱。

有两种对待问题的态度。一种是抱着侥幸心理等待问

题自己消失不见，然后才开始思考，应该做些什么，责任在谁身上。另一种态度是及时找到并且分析问题，弄清楚问题的原因，做出诊断，确定必要的解决措施，开始提前行动。我把这两种态度留给读者来选择。

当然，我没有一整套“处方”。重要的是，为俄罗斯寻找战略要公开化，不仅天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而且所有对此感兴趣的人都要参与，俄罗斯发展和巩固的历史战略要被所有人接受，要让战略成为俄罗斯人自己的民族梦想，而不是外部强加的。公开和坦诚很重要，摒弃禁忌、政治礼节、沉默和伪善很重要。

我们的问题不是不可解决的。问题很困难、很复杂，我们还有几十年要继续面临其中一些问题。不应该害怕生活和生活中的问题而使自己和俄罗斯蒙羞。不存在没有问题的生活。如果有人相信奇迹，相信有甜美噪音的海妖，那么明天等待他的将是比他今天试图逃避的问题更加复杂、更加可怕的问题。

问：所有关于选择发展道路的论断难道不只是搅动一下空气吗？也许，我们只是随着潮流向前，问题只是要避免撞到悬崖上？

也许是这样。现在俄罗斯在随着潮流走。我们在很多方面享受历史惯性的成果，惯性是俄罗斯伟大的缔造者们创造的，包括政治家、军事首领、旅行家和学者。还有建

设了伟大和强大国家的俄罗斯人民。

当然，在船只航行时，发生了很多次漏水。正常的反应是把漏的地方堵起来。我们知道怎样堵，也拥有相应的力量和条件。

但是，存在道路选择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并不像您说的“搅动空气”那样简单。

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发展道路吗？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完全肯定的：是的，可以。我们想要，而且将要实现这个选择。

这个论断正确吗？苏联进行了选择，结果却没有任何收获。第三世界国家选择了现代化和发展道路，得到了国际上的帮助，结果它们和最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依然在加大。由此看来，不应该选择吗？可以选择，就是可以宣布要“走在人类前列”、“进入文明国家之列”，但是把这样的宣言变成现实要复杂得多。

责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不管喜欢与否，不管是有意识地、有活力地接受责任，还是逃到一边。如果逃走，责任一定会追上我们。建设公民社会的工作已经开了头。我们已经有了民主、市场、权力分配、政党和自由。如果这些最终都没有实现，只能怪我们自己。

也许，在通往既定目标的道路上应该记住这句老话：上帝，给我力量改变我能改变的东西；给我耐力温顺地接受我无力改变的东西；给我智慧来区分我能改变和不能改变的东西。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智慧，经常是缺乏智慧。

人类在整个19世纪都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中，不完全理解所知道的东西，现在也还这样。和自己的远祖和近祖相比，人类知道得很多。但是和在俄罗斯、在全世界和在我们每个人面前出现的大量任务比起来，人类知道得太少了。我们觉得，我们很浮于表面，很不具体的猜想就是答案，就是知识。更糟糕的是，觉得猜想就是全世界都遵从的法律。于是我们出现了幻觉，完全可以做决定了，所有问题都会乖乖地排着队消失。出现了觉得自己变得万能的幻觉。

其实，我们像哥伦布。我们朝着想象中的印度出发，根本不知道向哪里航行，也不知道终点到底在哪里。但我们还是坚信，我们在朝着所谓的“印度”航行。在旅途中，不撞到暗礁只是最起码的任务。不应该傲慢地看待这个任务——它关乎水手的生命问题。这个任务需要很好的船长和配合默契的全体船员，还要靠运气。最严峻的任务则是要抵达终点。如果哥伦布没有把地球的整个一半搞错，今天的世界会是另一个世界。我不知道，是更好的还是更糟糕的世界，但一定是不同的世界。

我们也像哥伦布一样没有地图，我们的目的地是俄罗斯的未来。通向未来之路的地图要靠我们自己绘制。我们还要经历所有暗礁和浅滩，要穿越暴风雨，要探险，要犯错误，要为错误付出代价。

当然，我们需要方向，也就是整个俄罗斯都追求的梦想。我们遭遇了很多错误的目标，亲身体会到，错误的目标会把我们带进死胡同。我们经历过独裁统治和与世隔

绝。我们还经历过与第三世界结盟对抗西方以及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我们遭遇过这一切，希望不要再被鼓动家和狂热分子的花言巧语引入歧途。

让我们真诚地看一看生活，看看它所有的问题和谜团。我们的生活并不是那么糟糕，它很有意思。

第 2 部

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 100 年以后

同政府就社会政策的一次辩论
2005

未
来
市
长
必
读

我们（存在）只是为了给世界一个重要的教训。该我们做出的训导，也当然不会悄无声息地消失。可又有谁知道，何时我们将重返人世，在我们走完人生时又需要经历多少苦难？

——П. Я. 恰达耶夫
《哲学书札》

○ 1 一个幽灵在俄罗斯徘徊

革命形势的幽灵……

2005年的到来伴随着全国各地的社会抗议。这些抗议的直接理由就是万恶的“福利货币化”。对政府内部自由派这次实验的准备不足和内容浅薄已经是众说纷纭。联邦政府的一些部长也“因病入院”，并有自我悔过的言论。作为补充的财政改革也已经实施。至此，可以说，矛盾已经解决了。

但问题是，如果事情真如通常有着良好意愿的改革者们所期望的那样——只是在于某些“个别的不足”——才可以说矛盾已经解决。最近的“福利货币化”引起抗议的事件明显证明：所发生的事情远不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技术性问题。

民意调查显示了“社会自我感觉”的恶化。2004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在1月份的“福利货币化”危机之前，在近五年期间，说过去的一年对他而言变得更糟的人数超过了说变得更好的人数。近五年人们对近期待望动态指数

下降了18%，75%的民众对现行的经济政策表示不满。

这些调查结果和目前俄罗斯社会中发生革命骚乱的巨大潜力的逐步积累有着直接关系。

但享受福利者的抗议令人震撼地感到经典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革命形势的判断——“社会底层的人已经不能忍受，社会上层的人不想革命”。俄罗斯社会目前的思想水平，以及关于上个世纪革命动荡的许多痛苦记忆，两者严肃的结合有助于摆脱“缺乏理智的和无情的”社会动乱。

但是，历史上有过许多其他类型完全不一样的革命事件。这些事件似乎是从天而降。一般不是在某种社会经济动荡或灾难发生的时候，而是在相对较长的经济增长时期和社会总体稳定的背景下发生的。

这些革命的根源是社会期望得不到满足的爆发性累积。换句话说，当社会处于期望自身破灭的骗局时革命就会发生——哪怕往往是过高的期望，包括对改善生活的期望、对社会公正的期望和对未来的期望。

这是一种很奇特的不合常理的现象——当一切都顺利的背景下，突然出现了死胡同般无路可走的感觉。似乎应该不仅仅幻想更好的生活，而且要构建理由充足的、在未来可以实现的计划。因此形成错误的理解：如果在未来、在社会经济方针中、在发展方向和他们的结构实施中没有根本性的改变，那么突破困境是不可能的。社会所面临的新的任务、新的期待、新的希望都要求有新的政策。

应该说，在对那些“革命意愿”的设想中实际上从来

没有社会破坏和社会暴力的口号。相反，对政权、对进行改革、对修正变味的旧的社会经济政策教条和选择新的发展方向，它们开辟了广阔的“选择余地”。换句话说，对进行“自上而下”的革命开辟了广阔的“选择余地”。

国内目前的局势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样的：社会刚从20世纪90年代的剧烈震荡中摆脱，在最近的几年中获得了政治和社会稳定。目前俄罗斯又面临着一系列十字路口。最近的“福利货币化”危机就是出现原则性分歧的迹象。

政府和享受福利者的抗议卡在了一块石头上——“向左走，向右走”。这一个非常典型的、对我们的世界观而言很容易理解的形象——一个在十字路口犹豫彷徨的、需要做出抉择的勇士形象。

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在什么与什么之间抉择、做出抉择的基本原则是什么——这就是这本书要阐述的内容。

可以说这本书是同联邦政府之间的辩论的继续。我的这些文章从去年开始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主要是讨论目前的社会政治纲领的某些个别问题：财政预算问题、稳定基金管理政策、各社会领域改革问题。

分析政府政策的这些片段逐渐构成了一个总体上的更加广泛的画面。在这个画面中更加清晰地显示出我们同政府在对社会改革的评价、社会经济政策方式上的分歧。

我甚至在某些时刻觉得：辩论涉及对基本过程——资本主义在现代俄罗斯的形成和发展。双方对此有着非常不同的理解。

因此，本书的书名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于1899年写的《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巧合，这并非偶然。

一个世纪之前，1917年“十月革命”的未来领袖以自己独有的激情和毅力证明：按照历史标准，俄罗斯国民经济向资本主义的转轨，不可避免地导致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是社会结构转轨，以及无产阶级的发展和它的阶级斗争。

列宁的这本著作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它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理论意义的精髓，赋予刚刚萌生的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计划。在确认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进步性质的文章中阐述了关于社会革命的不可避免的这样一个冷峻的判断。

类似的情况多有重复发生。但历史的悖论就在于，它并没有给我们任何教训。现在的俄罗斯自由派改革家是完全意义上的合乎逻辑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他们努力按照19世纪末的模式和样子在现代俄罗斯建立（包括论证）纯粹的资本主义，这是新的1917年的道路的最忠实的重现。

20世纪资本主义经历了深刻的内部转型，既包括在经济理论方面，也包括在经济体系发挥职能的实践方面，以及在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中。这个转型最终保证了西方所谓的发达国家的苟延残喘和发展。同时，这个转型能够面对的不是全部，但至少是部分的全球化和后工业化发展的挑战。实际上，今天的俄罗斯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不从19世纪的角度，而是从21世纪的角度出发，来

思考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这一课题的必要性就显的更为突出。

这样的分析客观上终结了货币主义自由改革的纲领，这个纲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这十多年期间存在过。总之，这应该终结。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只是因为，如不终结，已经清晰地闪现在我们前面不远处的革命形势的幽灵完全可能变为现实。

○ 2 国家走向富裕 社会趋于贫困

“苏联模式福利”：使命已经完成

在现代的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走到了原则性的岔路口。自然，最为重要的是在最近10-15年内。

市场经济的基础已经奠定。俄罗斯的经济关系结构在许多方面已经转变为资本主义的性质并且固定下来了。现在，我们站在几乎是最原则性的和最重要的社会改革——教育、医疗、科学、公用设施改革——的门槛上。

不仅是经济结构，而且是社会生活中的整个结构，那些迄今在俄罗斯的许多方面还保留原状的——社会主义的、扎根于苏联时期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证体系——都将改革。这些改革将最终把整个社会转向发展现代的“资本主义轨道”。

这个历史性巨变的重要性再次强调了这一事实：正是“苏联模式福利”——包括福利体系、住房、教育、医疗、

文化和科学——使得俄罗斯在最近的十年走过“资本主义建设”的道路。这对整个社会走向“野蛮资本主义”和经济转向市场阶段是一个缓冲垫。

现在，有人建议要把这些“经济的社会领域”转向市场。此后，自然而然，在市场改革的整个阶段，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拐点”将会过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们已经到了该最终搞清楚这些问题的时候了：在俄国是否构成可以长期发展的市场社会？它将会是什么样的？

虽然，私有生产的市场关系在俄国已经形成，社会结构还在经历着转型期。25年——是一代人更替的时间——在社会学中是社会转型最准确的指标。

这就是说，还有10-15年（如果自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始算起，除去已经过去的15-10年），在俄国还要持续一段同社会领域的根本性转型相关的过渡时期。

由此，社会领域的这个“资本主义化”以什么原则和何种方式进行，取决于要在俄国建立怎样的资本主义。是“垄断寡头制”的还是“人民”的？是“掠夺式”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在19世纪和21世纪会有资本主义吗？这样的“新的俄国社会”会有前途吗？

这就是为什么围绕着社会领域的市场改革的参数、期限、速度的讨论在今天对整个社会变得如此尖锐和重要的原因。

需要马上做出说明，俄国社会领域复兴的必要性是毫无疑问的。“苏联模式福利”实际上已经耗尽了资源。在保证俄国15年的过渡过程中没有流血革命和流血动荡

之后，她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但是，今天住房基本基金的损耗平均为 70% - 80%，并在继续增加。在科学领域平均的教育年限和医疗保障年限是 15 - 20 年。在这些领域，在最好的情况下给社会提供了追赶 20 世纪 80 年代国外发展的可能性，但同今天的任务完全不相符。

这种令人沮丧的判断可能会继续下去。只有一点是明确的——社会领域的确需要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化，需要大量“新鲜的血液”，无论是国家投资还是私人投资。

还有一个，甚至是更为本质的原因，据此我们必须更新社会领域。这就是经济再生产的低质量。首先是人的再生产，“人力资本”的再生产，这是现代经济的主要生产力和关键竞争优势。

不久前，联合国公布的数据表明，按照人力资本的潜在质量，俄国居世界第 50 名。据预测，形势还会持续恶化。

如果审视“人的潜在素质”这个概念的构成，我们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它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居民收入水平、健康状况和平均寿命，以及教育体系的质量。显然，如果在这方面我们不采取系统的和根本性的措施，则俄罗斯面临的不仅仅是居民人口数量的减少，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劳动能力和技能的人口数量的锐减。

例如，今天联邦政府敲响了警钟，是由于如果在地理普查中不采取根本措施，则俄罗斯在最近 10 年中（至少是赢利性质的）石油储备，以及类似的战略自然资源，如

黄金、铂、镍、铜就会耗光。到 2025 年可能天然气也会被耗光。换句话说，我们会失去我们的（一切）——现在原料经济的一切基础。

但是，与这些令人沮丧的数据（实际上是对以原料发展经济模式的批判）相比，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关于国内人口持续下降的数据看起来更为可怕。自 1992 年起，俄罗斯人口具有稳定自然下降的趋势，尽管近年出生率有所增长，但这种下降仍在继续。总之，死亡率大于出生率。在改革期间平均寿命也有本质上的下降。并且，俄罗斯男性平均寿命目前只有 59 岁，也就是说低于退休年龄。这本身就具有灾难性的数据，如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按照社会学家的预测，自 2006 年起俄罗斯将开始劳动人口的锐减。这更加意味深长。其结果是，再过大约 10 年，最为短缺、最为昂贵的资源将不再是石油、天然气，而是最为普通的人力劳动。

利用把退休年龄提高到 60~65 岁，政府周期性地表示解决问题的意愿。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本质普遍不理解，其原因复杂，结局难测。

在此，再列举一个“普通”的数字——目前在俄罗斯 20% 以上的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低于劳动人口的最低保障水平。类似的“劳动着的贫困”是未来发展最为可怕的因素。

大部分类似的“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是医生、教师、科学文化工作者，由此，问题就显得更加可怕。在这些领域，平均工资在最近几年稳定地徘徊在全国的 65% -

75%。这就意味着这些经济部门——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工作人员，聚集知识潜力和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黄金储备”的部门——的收入偏低。换句话说，俄罗斯人力潜力的再生产质量应该得到保障。

似乎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面对这一事实，对联邦政府来说，今天社会改革已经变为一个优先需要解决的任务。可以这样认为，紧随着“福利货币化”，就要开始在卫生保健、科学、教育、住房等领域进行改革。

但有些因素并不支持政府的这些社会改革。缓慢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并不会让位于激进的自由市场试验。问题并不在于改革本身，而在于以什么样的目的来进行。这就出现了固定的一种感觉：“哥们儿，完全不是那回事儿。”

“大转折”之年

我们以“福利货币化”为例。因为，这个改革已经开始并且其结果对任何人来说都已经非常直观明显。我们尝试去理解，具体会发生什么。

并且我有意识地不想在此详细地分析技术细节和这个出色改革的详情。正如目前在社会上积极进行的一些讨论，通常都在讨论之后失去了对主要问题的回答。这次改革的意义何在？其基本原则是什么？如果我们明白了辩论的本质，以“货币化”为例，那么计划中的卫生保健、科学和教育中的改革的逻辑就会立刻明白起来。

因此，我们来讨论一下“货币化”。在开始之前先搞

清楚，在货币主义的这个“幌子”下到底包括哪些完全不同类型的福利，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尽管所有的福利措施都称为“福利”，但这些福利本质上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对老战士和卫国战争英雄的福利，这是非经济类型的福利，在原则上没有任何“面额”的。

对老战士们的福利，不属于经济问题，也不在于计较是否合算，而在于社会的自我意识和记忆的责任。对老战士们的尊崇，原则上不应该重新讨论，这些尊崇在物质上也是无价的。

更何况，这些福利待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有权不排队、免费乘用交通工具、免费获得药品、在疗养院免费休养——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经常性地、随时随地地向社会、向青少年以及向我们的历史提醒：提醒他们在必要时刻必须为了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献身；提醒他们，什么是功勋和荣耀；提醒他们，对国家来说，什么是神圣的，在什么原则上缔造了国家。

正是这样的教育功能使得我们变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在社会中保存了“时间纽带”，这种重要性是无法评价、无法重估的，也是不能取代的。

谈到福利待遇，需要回顾一下，它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出现的。今天我们的改革者很喜欢重复，说什么大部分没有保障的福利是近10年才有的。

这也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论题。很自然，老战士们的福利是战后整个60年期间一直就有的。在苏联时期就有，在新的俄罗斯也有，甚至在最混乱的年代也有。论证他们

不应该享有福利，是何等的数典忘祖和卑鄙无耻啊。

另一方面，的确也有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崩溃、“超高通货膨胀”时期出现的大量的所谓“新的福利”。

最近所讨论的热点——交通福利就属于这个类型。在交通成本上涨了近两倍的情况下，退休人员免费乘用城市公交汽车和电车行驶两站就能到达医院。但即使这样，退休金的数额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够达到最低生活保障的十分之一。顺便说一下，退休金是他们应得的和得到宪法保障的，而不是社会补贴性质的。

还应该补充一点的是，交通福利问题在一些大城市可能会比较突出。在农村，从自己的菜园到医院有可能要步行或者骑自行车，问题虽然也同样严重，但完全是另外一种形式。

顺便说说，现在是评价现行改革的另一个关键点。大家一致决定，既不必重视对享受福利者的要求的任何构成，也不考虑个别区域的保障水平，不考虑最低生活标准。更有甚者，竟要把这些享受福利者划分为“联邦的”和“地区的”。以此在社会上制造“分裂”状况。结果在这些享受福利者那里造成这样一种感觉——在他们之间有等级差别。此后，这种方法自然在改革实践中不自觉地造成了对立和抗议。

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新的福利”政策，仅涉及退休人员和其他一些社会弱势阶层。但危机的严重性还在于有完全劳动能力的人们也居于贫困线以下。

领工资的人的工资同退休人员的退休金的情况也差不

多。一般认为，不仅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现在也是这样。例如，据“全俄生活水平中心”的数据，还是在不久前，在1999年俄罗斯54.2%的工人的工资低于有劳动能力人口的最低水平。

由于其他的原因，1999年的数据是很典型的。可以认为，在这一年中如此之高的劳动者的贫困和1998年的货币贬值有关。但实际上这是保护福利不受轻率的货币化影响的又一例证。

取消福利自然可以在年通货膨胀率降低到5%~7%，或者至少在稳定几年后来讨论。但必须保障居民收入水平一定的增长，这种增长不允许在经济危机的同时出现没有社会保障的贫民，以及有部分劳动能力的贫民。说实在的，1998年就有这样的情况。

今天，这些条件完全没有保障。联合国承认的国际标准的构成是这样的：平均每人每日收入低于4美元属于贫困，低于2美元属于赤贫。根据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米哈伊尔·卢特科维奇的推算，在2003年约占18%的“赤贫”人口的人均收入每月低于2000卢布，而收入在2000到5000卢布的人口（也就是说基本贫困的人口）约占45%。这样，接近贫困和贫困线以下的约占俄罗斯人口的2/3。

即使现在情况有所变化，也不会是根本性的。经济发展部的官方统计数据认为，贫困人口的数量在2004年达到总人口的17.8%，和2003年的20.35%相比有所下降。但是，需要考虑到，这些数据中统计的贫困人口只是那些

收入低于最低标准的，也就是每月低于 2500 卢布的。并且现行法律中所规定的最低生活的标准实际上比 1980 年苏联时期的类似标准还要低。除此之外，最低生活标准和贫困标准在官方统计中，不是根据实际卢布汇率，而是根据平价购买能力——10 卢布兑换 1 美金。这个价格在商店中符合我们周围的实际生活，而不是理论推算。

至于通货膨胀，现在政府已经不坚持控制在计划中的 10% 范围内。今年通货膨胀的计算指标按年度来算是 8.5%。但在 1 月份已经高于 2.5%。年度通货膨胀根据最普遍的预测可能达到 10% - 12%，或许更高。

通货膨胀高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自然垄断税率的增长、原料价格增长，在它们的背后是交通费用、房租费用。去年，在这方面增长超过 20%。

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的“货币化”将会变为什么呢？总体来说，将会变为“空中楼阁”。因为起初用于支持改革的费用将会增加两倍。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其中也仍包括普通的退休者、享受福利者的交通费用、没有保障的搬运工人的实际费用。

那么，这是在为什么而奋斗呢？为群众的抗议和社会的不稳定？如果是为了这个目的，那么，奋斗的成果是非常巨大的。

实际上，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货币化”，交通福利和医药福利的实际内容是什么。这不是给予某些居民的“特惠”，类似的福利的内容是在切实执行国家的职责。

20 世纪 90 年代的危机，货币贬值和预算混乱并不意

意味着保障最低生活和公民体面生活的国家基本社会职能的消亡。“福利”在这种情况下恰恰是国家保障的体现。

现在政府试图将这些福利货币化。这样可行吗？原则上是可以的。但需要准确地理解问题在哪里。免费的交通和免费药品对这些退休者来说，并不是某种“超级服务”，而是生存的基本保障。这种保障可以以“原始”方式，或者是以货币方式。享受福利者或者普通的退休者所获得的最终数额应该绝对地无条件地满足他的需求和保障他的生活水平。

如果可以承受，就用货币化的方式来保障；如果不能承受，甚至不打算珍惜，那么就保留原来的苏联模式的国家保障体系。因为，问题不仅仅是“削减福利”，问题的本质在于实际上国家拒绝社会保障水平，试图甩开自己必须承担的、不可推卸的功能。

至少，现在国家的意图和国家的社会政策是这样的。相对于有150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如果我们的政府更愿意以现代的范畴来思考，自然，那将是另外一回事。

在历史上，福利货币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可以回想到其中一个——公众福利，暂时还没有可以替换的范畴。

在前面，我预先说明过，国家的社会政策、俄罗斯社会的生活结构，迄今在许多方面保留着苏联时期的状况，仍以苏联时期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原则为基础。现在，在我们的意识中，我们不会提出问题，问这种状况是好是

坏。有一个简单的事实，社会保障体系曾经存在过，并且曾按照一定的规律和逻辑运行过。要改革某些内容，你必须首先理解，你到底想要改革什么。也就是说要搞清楚，“苏联模式的福利”原则是什么。

这样，以“公众福利”为例，这些原则看起来很好。住房福利、低公众税率，要知道这不是新的。也不属于“新的福利”范畴。严格地说，在苏联时期公众福利是不算福利的。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年轻的改革家们轻率而“睿智”地宣布公众服务100%付费将是改革的目的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很遗憾，这些“百分比”迄今在我们政府的意识中模糊不清。自2005年1月联邦通过了房租100%交费。相应地，俄罗斯联邦政府和大部分区将被迫实际上提高公众费率。根据联邦统计，自年初，房租在全国平均增长了26.7%。而且，这还不是最高极限。

例如，根据民间咨询研究机构FBK的最新资料显示：目前国内平均房租费用交付为60%。相应地，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今年有望上涨40%~50%。并且，在某些地区，居民的公众开支费用迄今高于平均水平。可能还会产生爆炸性上涨。在某些城市，自年初生活用冷水费用已经上涨了2~2.5倍。

逻辑上漏洞百出的住房改革也正是这样偷偷摸摸地逐步变为现实的。甚至没有人想到公众财产改革的真正目的——必须要考虑到服务的实际要求，促进竞争，提高住房服务质量，实现公众设施现代化和建设高质量的住房。

建设新的、舒适的居民生活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公众服务货币化”可能显得比现有的交通福利和医疗保障要正规一些。但问题的关键是不管多少退休金都无法填饱民用冷水经销商的大口。整体上推行所谓的“经济上有依据的公众费率措施”，而没有相应的收入政策的变化——这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经济盘剥，同时也是对贫困线上挣扎的工薪阶层的压榨，也会对相当部分的“中产阶级”造成压力。必须揭示统计误差的真相，才能使2005-2006年度全国境内的穷人数字不再上升。

这就是向我们推荐的“坚决同苏联的历史决裂”的措施。要搞清楚问题的实质。苏联时期的社会政策有着社会普及原则和“人人有份”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可以说是和“福利货币化”完全对立的哲学。当时，人民为苏维埃国家做得很多，苏维埃国家向人民支付的很少。但与此同时，苏维埃国家又具有人情味地提供便宜的公众服务、廉价交通，并在其他方面给予经济补助和免费服务。

一方面，自然是建立了一定的和足够严格的社会保障水平。没有明显的贫困，有的只是该死的“相信明天会更好的信念”。另一方面，这又造成了赤字，缺乏劳动激情，对国家的依赖。

并且，这种依赖、限制人的自由是国家的目的之一。苏联的社会政策是对社会结构的严格监督。有支持平等社会保障的地方，就没有金钱和其他独立性的等价物的空间。

市场的发展、资本主义在俄罗斯的形成要求完全另外一种社会政策。但这还是社会政策，而不是在虚伪的自由主义的概念的幌子下取消“小国家”。社会政策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的原则。

不能按照这样的原则行事：“在这里原则就行，在那里就不行”、在别处还需要管理等等。不能说，取代资助，而保留低工资。如果取消社会普惠制度和福利制度，那么就应该从实质上改革居民的收入，提高劳动工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

人权货币化

以会计对账的方法斤斤计较地配合社会领域的货币化，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虽然暂时还感觉不到这种情况。削减国家开支恐怕是社会改革的主要目的。换句话说，社会领域，它的质量不是改革的目的。“社会福利”再次变为仅仅是一个工具，成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增加财政利润的工具。

福利改革，只是我们政府在实施更为引人注目和非常恐怖的“人权货币化”之前的“第一遍铃声”。改革还涉及尚在计划中的和部分已经实施的教育改革、卫生保健改革、科学改革、文化改革。这些领域的商业化政策实施提出的问题涉及俄罗斯公民的宪法权利问题和国家的基本法原则问题。

这个政策的明显的例证是已经成为固定术语的“索拉

波夫的五天计划”。堂堂卫生保健和社会发展部长索拉波夫亲口说道，病人在医院里滞留不超过五天就是经济效益！

这事实上是要取消门诊系统，但在预防检测和医疗诊断中又要保证居民的健康，如何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呢？现在有这样一种建议，削减专科医生、普及科医生（社区医生）的工资定额。既削减免费医疗保障的额度，又裁减医院的员工，最终导致除了私人医院人们没有别的出路。但私人医院昂贵的医疗费用，即使在最好的状况下也只能供俄罗斯居民中的 1/10 的人享用。

我们的医疗方面的类似改革是在卫生保健实际上已经付费的背景下进行的。根据调查咨询公司的调查——“俄罗斯开销多少？”，今天，俄罗斯公民在付费医疗服务和药品上的花费是每年 2300 亿卢布。这是所预计的国家在卫生保健开支的三倍多。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指标，上述的居民在自己健康方面的花费占居民必须开支总额的 5%。这些数据完全达到了欧洲的平均水平，而一些数据接近世界上最高的美国的卫生保健水平。

就公民在医疗上的开支而言，俄罗斯高于任何一个有发达的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并且，居民的收入、医疗保险体系、技术保障，可以说远不是最好的。

可以理解，实际上的付费医疗的重担今天再次落在社会的相当部分人身上。首先是居民的“上层”的 10%，对他们来说，即使根据官方统计数据也达到了货币收入的

30%。在相当程度上，压力也落在中产阶级身上，对他们来说，根据生活质量和目前的居民整体的情况，这些花费是相当大的，但还能“挺过去”。在削减国家保障、社会健康和迫使所有公民在付费和免费医疗之间做出选择之后，如何来评价政府深化医疗保健改革的意愿呢？实话说，这样的情况看起来是公开地对国家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发展基础的一种蔑视。

医疗保健，只是社会领域改革走向商业化的一个例证，类似的情况在教育和科学领域中同样明显。

在科学领域就更加荒谬！关于投资发展和高科技的话题是说不完的，即使是最顽固的货币主义者也确信，投资科学领域将会是最有利的投资去向。

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国家远景计划，已经在几十年期间绝对地一贯地在自己的主要优先发展计划中给予基础科学以必要的开支，对实用研究加大财政拨款。很明显，作为一个国家，俄罗斯的命运，在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在许多方面取决于科技发展潜力。基础科学，这不是那些可以部分地投入就可以获得部分结果的部门。在科学领域投入所必需资金的一半，就不能期望有任何有意义的成果。

为什么联邦政府实施那些臭名昭著的122条货币化法规，这实际上是禁止联邦主体向科学（此外，还包括高等教育）投资，很令我费解。其结果是，“自己不想做，也不给别人做”。

联邦政府的建议把创新发展的负担转嫁到商业上，这不仅危险而且幼稚。改革措施的制定者自己非常明白：在

商业中，科学研究的比例勉强超过统计误差，而我们的资本家还得近 20 年才能“积累”相当的资源投资于科学领域。

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原始积累的高利贷资本主义能够要求和使得在苏联时代积累起来的技术潜力货币化。或者，更简单，确定工厂、科研中心的土地和资产用于更有利的商业目的。例如，新的工厂的拥有者创造了创新工人和技术工人。

这就是说，在科技领域的改革应该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国家直接保障的原则（其中自然包括投资）。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不想返回到史前状态，那它就应该支持科技发展，一直到科学的相当部分达到经济的直接要求为止。瞄准一切可能获取利润的新的竞争阻止了“旧的经济”的发展。新的经济，已经从理论论证和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旧模式转向了创新发展的阶段。

我不想再说，所建议的俄罗斯科技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商业化，已经不能解决国内科技部门在所有领域的老化问题，一系列科技学校的消亡和消失、人才外流。很遗憾，只能同意莫斯科国立大学校长，科学院院士维克多·安东诺维奇·萨多夫尼奇的观点，他认为，只要实施“高等教育的两级体系”——本科和硕士两级学位体系，我们就可以开始为国外的实验室“制造”实验员。

这里有一种使用国外经验的极其简单的方法：实施“本科—硕士”这种教育体系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要知道在不同的国家，它们的设置是

不同的。某些专业是4+2学制的，某些是3+2，还有一些是4+1，培养工程师和微生物学家的学制是不同的。

但这还不是全部。学校出现了在“先进经验”的幌子下实施扣减国家免费教育资助的情况。如果实施这种“两级学制”，那么，硕士学位就是以经济效益为目的的。换句话说，免费的高等教育就在不知不觉中被蒸发掉了。

不过，对我们的改革者的货币化思维来说，这还不是论据。行了，请教他们另外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培养技术熟练人员对我们的国民经济将会发生何种影响？”你们想一想，我们用什么办法把他们“摘”下来？他们回答道：“对培养劳力工人3-4年的本科教育已经完全足够了。”

但是，还不是完全明了，为什么这些“劳力工人”的利益对我们比保护国家的基础教育传统和作为未来发展基础的俄罗斯科研学校更重要。俄罗斯现代教育的主要问题在于，这种教育比今天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教育更好。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形成对技术熟练工人的需求。但如果我们按照现在经济发展的水平把教育的水平拉下来，那么我们就用自己的双手毁掉了我们的前景，包括经济本身，还有整个社会。

此外，还可以引用许多专家的观点，这些专家确信，所谓的“日本经济奇迹”的发生根本不是在20世纪60年代，而是比这还早的半个世纪之前，即日本开始实施教育改革之时。并且，它的根本思想正好也在于此，在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度，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受过教育和具有熟练技

术的工人。在100年期间，日本由一个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后工业化强国——这就是这一英明政策的最好见证。

大概40年前就有德国的学者进行了计算，这一计算揭示的实质令人惊讶。依据战后西德复兴的结果，他们指出，在完全摧毁生产潜力，但保留教育体系、学校和研究所人才的情况下，国家复兴的机会比保留了生产潜力，但摧毁了教育体系、学校和研究所人员的情况要好四倍。正是因为如此，在德国制定了借助有效的教育政策和提高劳动工人的素质来实现现代化的纲领。

我们使劲地抽石油，当然，这种方式也可以，劳动工人也足够。但是，未来——首先是知识的社会，是人的社会，那么我们实实在在地需要一个新的“教育的时代”。需要复兴科研、教育和社会科学。

而我们目前实施的政策中提出的任务是削减，甚至是削减教育、卫生保健和科学的国家开支。这都是宏观经济稳定的优先发展逻辑造成的一种形式，目前国家在教育 and 卫生保健方面的开支只有国内生产总值的4%和2.5%，虽然对改革家来说很高。

○ 3 反人民的宏观经济学者的 理论错误

把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转变成“商业计划”，是我们政府中改革派的全部活动。如果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对许多事情不再感到惊讶。

我们的政府一直在改革我们的经济，而不是在改造我们的社会；是在努力实现财政稳定，而不是实现社会稳定；是在削减通货膨胀，而不是在解决社会的分化。人的利益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政策中处于边缘地带，而虚拟的宏观经济却处于社会经济政策的核心位置。

结果导致实际经济和社会领域由于缺乏资金而“浮肿”，没有得到严格的和国家必需的社会经济结构改革的资源和动力。在统一预算的精神中各大区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

并且，如我们上面已经注意到的，尽管有造成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的威胁，有经济社会领域的破坏和退化，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长，但“小政府”的概念仍持续高涨。

财富积累理念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荒谬的加强财政资源的想法。经济领域中出现的超额的“剩余”资金被用于三个方面。

首先，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实际上超过了心理上限 1000 亿卢布。

其次，联邦政府一贯坚持财政赢余的政策。在 2005 年度的财政预算中财政收入比财政支出高出 2780 亿卢布。

第三，最终建立了不少于 5000 亿卢布的稳定基金。根据预测，到 2006 年稳定基金将超过 7000 亿卢布。

如果稳定基金被用于解决国家发展中的社会经济战略硬性问题，为联邦政府的这种财政政策辩护是值得的。但是，这个问题连想都没人想过。积累资金，积蓄家底变成了单纯地为积累而积累。经济中积累了如此巨额的资金却没能解决俄罗斯经济中的任何一个现实问题。甚至连为这个政策辩护的理由——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增长、平稳通货膨胀等——都站不住脚。

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政府还在继续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方向。

稳定基金的捍卫者的标准答复是：稳定基金的战略目的在于，稳定基金是俄罗斯的“安全缓冲垫”。稳定基金着眼于关键时刻——石油价格低于每桶 15 美元或国际局势持续动荡 2-3 年。

唯一的例外是偶尔加快外债偿还。还有，可能是补贴

退休基金的赤字。但储备理念仍是老一套。虽然，稳定基金策划者的战略思想今天是怎么宣扬的：过3~4年“不可动用”的稳定基金部分达到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份额的4.5%。

国内生产总值和稳定基金的“不可动用”的部分的平衡发展显示，稳定基金的发展和国内生产总值的联系掩盖了难以遏制的积累的欲望。这样，2006年前国内生产总值的4.5%就已经接近9500亿卢布。而到2020年，将会达到35000亿的天文数字。这一数字，超过了2005年俄罗斯联邦预算收入的一半。

换句话说，稳定基金在它的创建者和谋划者的理解中，是积累资金和资源以防万一的措施。并且，积累产生了最简单的方式——把“多余”的资金放进罐子里。而这个储蓄罐自身应该发展壮大才是。因此，所有的关于利用稳定基金用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需求的议论都没有意义。

还有一个危险的症状值得引起注意。在稳定基金的思想中直接形成了一个观念——国际能源价格每桶低于15美元，这对俄罗斯的财政来说是灾难性的。而稳定基金的资金应该足够国家支付几年期间所有必需的开销。在这期间，国家似乎只有祈祷石油价格再次上涨。

对稳定基金的这种理解是极其危险的。联邦政府实际上公开宣称，国家的经济构想是随着国际能源价格的起伏而波动，在丰年欢天喜地，在歉年咬牙坚挺。甚至不去考虑学习那个著名的寓言中的青蛙，利用石油天然气经济以

促进有质量的经济增长。

对经济政策目的认识不深，对必须改变稳定基金的收支理念的缺失导致了最终的为了储备目的而储备的理念。

由于“储备”增长同时有若干困惑，稳定基金的捍卫者的人数作为一个奇怪的典型在逐步减少。

去年，稳定基金的资金一直躺在账面上。根据俄罗斯预算委员会的估计，在这期间稳定基金由于通货膨胀的原因造成的损失达到 230 亿卢布（是实际损失，而不是货币损失）。

的确，2004 年 10 月俄罗斯联邦政府似乎最终决定了 14 个经济发达国家的有价证券，可以在其中投入稳定基金的资金以便减少通货膨胀的损失。

但是，这样的做法再次出现问题：大多数专家认为，这种投资并不能保障由于通货膨胀和卢布变坚挺造成的损失，其损失不能和投资的收入相符合。

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俄罗斯联邦政府实际上允许稳定经济的资金从俄罗斯经济的发展中流到其他国家的经济中去。结果导致支持了别国的货币，而不是支持本国的生产者。加强了别国的外汇，而不是俄罗斯的卢布。最终导致在口头上我们反对资本外流，吸引长期投资，而在实际上却利用最优惠的条件将资金向外输送。那还是让它储存起来吧。

私人资金的投资方向在俄罗斯的经济中似乎不仅仅有着经济效果，而且有着很强的心理效果。对于这些外国投资者，俄罗斯联邦政府公开表达对我们经济的信心是投资

环境良好的标志。

对我的这些论点可以这样反驳：“瞧，危机正在来临，危机在向我们展现威力。”但是，问题在于，俄罗斯经济的危机不再仅仅是可以发生的，它早已经成熟而且不可避免了。

假设由于俄罗斯经济中的危机导致了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如果发生类似的危机，任何金融缓冲垫的作用都不能保证俄罗斯的预算稳定。

的确，所积累的资金在第一时间可能帮助国家面对国民完成自己必需的开支职能。但是，在更为持久的危机期间，甚至是经济停滞期间，如此勤勉地积累起来的资金将会被耗光。当然，也不见得稳定基金的资金就足够能够帮助国家脱离危机。

看来，前景暗淡：稳定基金将会被花光，而经济的根本问题仍旧无可避免。亮了底的“储蓄罐”能够发挥的作用就不再是药到病除的良药，而只是止痛药——它自身不能医治好经济，只能使不断加剧的病痛稍稍减弱一些而已。

在这种战略下，经济发展再次和国际石油价格紧密相关。这成为俄罗斯经济的一个“胎记”，直到今天，收入仍要依靠自然资源的出口。

稳定基金还是发展基金

用于某种目的而积累了国家部分收入的“储蓄罐”不

是俄罗斯的成就。俄罗斯稳定基金的思想家甚至喜欢援引国外经验，似乎是按照国外的模式建立了稳定基金。但是，即使国外有这样一个模式，俄罗斯似乎模仿得也不完全一样。

作为子孙后代的发展基金，在这些国家同样众所周知。其名声之所以这么大并不是偶然的。发展基金的名字本身就表明了不仅仅是要稳定，而且要发展，要面向未来。

我们拿挪威的“国家石油基金”为例。实际上，按照所允许的使用方式，它同俄罗斯的基金非常相似。但是，挪威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至少两点同目前在俄罗斯流行的经验有所不同。

首先，在挪威可以明确地规定石油基金的最终用途。在所积累起来的资金基础上，保障现在的高水平的居民国家退休金。这样，在挪威的基金中确立了对老一代进行社会救助的完全确定的思想体系。

其次，挪威石油基金的形成不损害经济实际部门客观要求。挪威基金中的经费，只是在执行预算赢利的情況下积累起来的。把这种原始的、多余的资金集中在国家预算，作为补充收入，只是按照财政年度政府同议会决定，哪一部分用于积累，哪一部分留在经济运行中。这个比例经常根据投资需求而有所变动。

同俄罗斯僵硬的方式相比，在整个年度中，俄罗斯的石油收入不仅高于自动转入储蓄的水平，停滞不流动，而且在通货膨胀中持续贬值。

其他国家形成专门的积累基金的例证同样表明，我们需要学习的其他地方。在科威特超过20年运行着不是一个，而是整整两个石油基金。相对于下一代储备基金存在着一个从财政部统一管理划分出来的独立的投资基金。

同样有两个石油基金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运行。实际上，没有一个被认为同实际的经济部门相结合。但是，下一代基金的资金有专门的委员会管理，投入高产出的财经院校。这些投资近一半的红利直接在本州居民中发放。这就使得全体居民获得了本州资源储备的直接收益，从而避免了过度开采。

在智利并不反对把铜矿基金的部分资金用于经济部门。例如，用于资助汽油的国内价格补贴（参看俄罗斯加油站的汽油价格波动，该价格波动直接反映生产成本并招致交通运输工人的抗议集会）。或者是用于资助公共项目的建设，这些项目不是由小范围的官员挑选的，而是由独立的基金董事会决定的。

看来，该到了我们构建自己的思想和原则，并以此改变现在的“稳定基金”为“俄罗斯未来基金”的时候了。

联邦主义的钟摆

正如众多俄罗斯联邦主体的任何一位领导不能不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财政预算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领域内的状况证明了对联邦政府来说极端危险的一个趋势——集中化。

在2000-2001年开始了取消某些税收的渐进改革，这并不困难。

取消高速公路通行收费，用交通税收来取代，在实施中打击了各大区内的交通设施项目。结果俄罗斯交通领域的财政拨款从200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9%下降到2003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

正如以T·博奥斯为首的国家杜马议员的计算所指出的，由于住房公用设施项目和社会领域的税收被取消，一次就使得各大区失去了4000亿卢布的税收。

在2004年由于取消土地销售税又使得各大区总体税收减少了1400-1500亿卢布。同时，在这几年烟草产品的消费税和增值税完全被集中征收。

结果，按照俄罗斯财政部财政科研所的核算，联邦预算的收入部分在整个俄罗斯联邦预算中从2000年的54%增加到2003年的58.8%。也就是说差不多增加了5%。同时，联邦开支在此期间从47.1%削减到44.9%，也就是说削减了2.2%。在此情况下，收入的比例相对于支出的比例从6.9%提高到13.9%。

这样，破坏预算法案要求在联邦预算和联邦主体预算平均分配实际上有一定道理。除此之外，尽管有联邦交通规模的增长和国家津贴的增长，各大区由自有的资金按照以前保证俄罗斯联邦预算整理后一半以上的开支。

联邦政府的类似政策导致，国家高补贴区域数量的增加。根据俄罗斯联邦预算委员会的资料，国家财政高补贴的大区的数量在2000年到2004年持续增加——从2000年

的 8 个大区增加到 2003 年的 29 个大区，到 2004 年增加到 42 个大区。

在筹备“联邦 2005 年度预算”决算时，已经有 43 个联邦主体从联邦财政基金支持的名单中取消，达不到联邦财政保障 60% 的水平（其中包括 32 个大区这个数据的制定低于 50%）。在此情况下，9 个区的物资保障的预算水平低于 70%，承认完全保障的只有 20 个联邦主体。

结果，从联邦预算基金中向所有新增加的大区调拨，以保持俄联邦主体之间的平衡的资金数额越来越大。考虑到有类似的情况，俄罗斯财政部在 2004 年中期公布的数据就不令人奇怪了。根据该数据，自 2000 年起联邦预算调拨各区的交通领域的资金增加了 2.5 倍。

并且，甚至不考虑联邦交通部门的增长，统计数据记录了其中有预算赤字区域数目的增长。根据俄罗斯联邦预算委员会的数据，在 2001 年有 41 个区有赤字，2002 年增加到 63 个区。根据俄罗斯财政部的关于联邦主体信贷能力的最新数据，在 2004 年 10 月 1 日，76 个联邦主体的财政有赤字。在这种情况下，联邦财政的盈余逐年伴随着稳定基金在增长。

换句话说，税收集中化改善了各区发展独立自主能力的状况，在许多方面保障俄罗斯联邦政府有可能实现联邦预算盈余和稳定基金的超速增长。

对各区经济发展可能性的限制同联邦政府的对各区的选择紧密相关。

令人讨厌的第 122 条法规，以及一系列其他联邦政府

以前的决定使得各区陷入艰难的困境。

首先，这条法规涉及国家功能的执行。它剥夺了我们资助执法机关、高校、科学领域、重建历史和文化遗迹、援助国外同胞的可能性。大区也被取消了自然保护、发展劳动市场的功能。

上述过程，导致削弱和在实际上消除了俄罗斯联邦主义预算的基础。由于在建立的体系中，所说的联邦资金最为必需，或许，并不是所有的大区都失去自然的财政联系。但是，联邦主体同样地在经济关系中削弱。

在税收中央化的条件下，削弱独立发展经济的能力，这导致大区失去了经济发展的动力。由财政政策而产生的依赖别人的心理，这种在国家补贴最多的区域里阻止寻求有自己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

俄罗斯联邦政府的经济运行部门，导致联邦主题越来越转变为它的客体。中央化标准的类似提高在国家政策的实施中，在战略规划中导致国家机制失去活力和效率。

对于类似的不信任的问题，从战略研究所专家的研究中可以援引两个数字就是足以回答。根据专家的评价，在10万俄罗斯居民点中经济增长只集中在其中的14个居民点。专家估计，由于空间结构的不合理，俄罗斯每年因此的损失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5% - 3%。

○ 4 资本主义的演化

对俄罗斯政府的现行社会经济政策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令人忧虑的影响。这个政策不仅仅是不好，而且没有任何现代性。

我们的改革家对市场经济发挥职能的逻辑依旧停留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对 19 世纪资本主义的认识水平上，关于 19 世纪的资本主义，马克思和列宁曾经亲身经历和深入研究。

为了解释为什么是这样，必须回答几个问题。

俄罗斯的现代资本主义是什么？与经济的资本主义体系构建的世界经验相比较，它的特点是什么？

为什么今天资本主义在俄罗斯的发展伴随着社会矛盾和社会失衡？

为什么资本主义体系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活力依旧，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的理论并没有得到证实？

经济的高效率、社会领域的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福利三

者融合在一起，这一任务有无可能？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包含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演化历史之中。

马克思未实现的预言

还有一个原因需要回想这些“经典大师们”，很明显，“布尔乔亚—资本主义者们”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作品比我们好。至少他们能够从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中得出必然的结论和遏止共产主义革命不可避免的噩梦。

简单一点，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迄今为止依然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典范，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逻辑、原则的楷模。

马克思主义是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社会经济体系、阶级斗争和从这个分析中产生的理论革命，是对资本主义体系在自身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的压力下崩溃的不可避免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一直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作用在于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和实现生产的社会化。

但是，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具有天生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根植于剥削和使得“工人阶级像沉默的劳动工具从属于资本”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作为生产方式，必然导致社会

革命和资本主义作为社会结构的崩溃。

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最著名的几句话是这样说的：“随着剥削和垄断转化过程中（即生产的社会化——卢日科夫）所有收益的资本巨头数目的逐渐减少，产生大量的贫困、压制、奴役、堕落、剥削，但同时也产生了工人阶级的造反……”结果“资本垄断成为它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的枷锁。生产要素的集中和社会化劳动达到同资本主义的外壳不相适应的极点时，它就会爆发。敲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剥夺剥夺者”。

说实话，资本主义的历史在一定时期之前最多是实现了的马克思的预言，而后又中断了。

问题不仅仅是在某些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中发现了某些内部的错误。只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想体系，在自身中找到了认识自身的罪恶的力量，在内部找到了演化力量。

“资本主义的外壳”没有破裂，它被改良了。在经济理论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国家政策层面上被改良了。国家，被马克思主义者看做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作为“资产阶级管理事物的委员会”，逐渐地认识到了自己真正的社会功能——创造社会和睦和社会稳定的功能，促进发展社会基础和资本主义原则的功能。

这个过程并不是简单如此，也不是“仅仅如此”。西方主要的工业化国家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了红色的十月革命，度过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还有一件历史事件——法西斯战争——是你死我活的发展，经历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所有恐惧。这种“社会惨剧”的经历逐渐地，一步步地产生了根本性的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唤醒生活并创造了社会发展的新的道路。

资本主义在西方经历了多次改革，因此效能、竞争和其他市场经济的优势能够同发达的、准备良好的社会政策结合起来，能够同建立起扩大消费需求和大众需求结合起来。

在这条道路上的标志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和出现了新的需求和国家经济调整的经济理论。标志性的著作还有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纲领》、已经具有百年历史的所谓的《瑞士社会主义》、路得维希·艾哈德在战后德国的《大众福利政策》。

理论上比较完备和时间上已经付诸实施的“社会国家”概念的结果，是“全面福利国家”——在20世纪所有付诸实施的社会方案中是主要的和最实事求是的。它充满国家的社会责任感思想和社会进步的思想，体现了资本主义演化，逐步地在资本主义的背景中渗入社会主义的原则——平等、公正、社会和睦。

西方国家在20世纪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的预言。在反驳马克思的革命悲剧的时候，他认为，社会进步的逻辑首先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借鉴社会主义的特点。熊彼特写道：“资本主义体系不会由于经济崩溃而灭亡。但是它的成绩本身挖掘了保护它的社会制度，并不可避免地创造了它不能生存和必将让位于社会

主义的条件。”

大多数人的资本主义

可能出现这样一个逻辑性的问题——在评价资本主义社会崩溃不可避免时，到底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的错误是什么？或者，更确切一点，在20世纪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经济体制中什么被修改了。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不再包含具有同社会发展思想的不可调和的分歧？

可以通过单独的研究来对这些问题给予近似的回答。但是，如果坚持这个问题的框架，试图划分出主要的东西，那么回答就是这样的：资本主义的演化（既包括经济理论，也包括经济实践）允许为社会大众服务。并且，资本主义意识到自己的功能并不是以“奇迹”出现的，也不是由于某种“慈善病”，明白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正相反，是在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效能和社会体系进行深层次转化所做的健康和理性的评价中出现的。

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如下论述是众所周知的：“工人作为商品的购买者，对市场是重要的。但资本主义社会有一种作为销售者用最低价格来限制他们的产品——劳动力。”

在解释和发展马克思的这个思想的时候，列宁在自己的著作《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一书中写道：“生产的扩大缺乏相应的需求的扩大、相应的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和有特色的社会结构；首先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次

在于利用民众的技术成果。在资本主义扩张生产的无限欲望和劳动人民的有限的消费之间（由于他们的无产阶级的状况）有着无疑的矛盾。”

说实话，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自己给了资本主义社会一个苟延残喘的“借口”，他曾解释道：“资本主义的国家政策和经济机制演化的主要方向应该在哪里。这个借口，这是发展的方向——在创造大量的消费者，在提高大众的消费需求，从而，在创造社会需求中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而是会趋向发展。”

马克思自己是这样写的：“所有真正的危机最终的原因总是贫穷和大众消费的有限性。”马克思自己所开出的资本主义苟延残喘的方案是清楚的，正如我前面已经讲过的，凯恩斯、罗斯福、艾哈德，主要是大多数资本家和企业家，经常引用亨利·福特的名言“我应该向工人们支付的工资足够他们买自己生产的汽车”并非偶然。

结果，根据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发达社会的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需求经济”。居民的消费成为刺激生产增长、解决就业问题、加快产品和技术的生产和研究的机制。

熊彼特同样表达了“资本主义进步”的规律和逻辑：“这首先是为大众生产的机制，为大众生产。”实际上，根据熊彼特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避免地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

通过提高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大众的生活质量的发展原则被全社会理解和接受，就变为西方国家政策的根

本原则。

“全民福利国家”、“为大多数人的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承认在人的活动领域，市场机制几乎一点不发挥作用。问题首先涉及社会政策。但“福利体制”同样包括卫生保健、教育、科技、住房问题。对这些领域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强制调节。

调节的实质在于实施两个问题，第一，解决贫困问题，通过社会重新分配资源，由国家提供社会服务，以此来缓和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

其次，发挥“人的潜力”——社会的“人力资源”。并且这第二个问题的重要性在向后工业类型的发展中尤为明显。J·贝尔的信息社会的经典理论已经证明，过去的资本主义模式的传统要素是劳动、资本、土地。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这些传统因素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意义。附加值的重要来源、资本的增加和经济发展的来源逐渐变为知识。

以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机制来看，这就意味着，在产品中越多的智力投资，在制造产品时就会越多地使用新技术和科学的设施，就会越有效地生产，所生产的产品的竞争力也就越强。

以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策的观点来看，这就意味着在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方面努力的必要性，以及有目的地在科学、卫生保健和教育方面努力。

在结束这个资本主义的演化历史的题外话之前，需要说一句，我不是在竭力理想化现代的资本主义，美化现代

的西方社会。

首先，“市场自由的手”的限制，毫无疑问，值得实现这个战略的社会这样的花费。由于税收负担的增长和国家的社会责任的增加，这首先减缓了商业的发展。暴露了体制的其他缺陷，例如，社会依赖心理。社会矛盾并没有消失。

尽管经济理论本身还在原地踏步，新凯恩斯主义者继续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有自己与生俱来的经济危机，采用凯恩斯的学说的局限逐渐显露。

在相当程度上，现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批评是正确的。断定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克服内部矛盾，自我实现“社会国家”的模型，由于全球化开始成为可能。资本主义可以把西方社会的“阶级矛盾”引到外面。利用第三世界的廉价和大量的资源，可以把矛盾转化为同“第三世界”的关系中去。

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类似的花费和问题是有理由的和必要的。把这种情况理想化是愚蠢和目光短浅的。但不应该否定最主要的论点——只有转向发展经济的社会基础的道路，只有资本主义向“全面福利的国家”的演化才可以使得现代社会生存下去。

应该说，西方国家学会了相当微妙地处理在政治经济中自由派和社会学派的关系。同时，自由派获得胜利并创造了对发展国家经济潜力的良好环境，但它对社会问题的处理就相对差一点。这些国家的公民在选举中支持社会

派，更关注社会政策，改善这个领域的情况，虽然经常也对经济发展的“自由派的任务”造成损失。结果，在历次的选举中自由派和社会派相互更替的情况多次出现。

最终，这个“更替”体系保障了最主要的——社会和社会经济政策与国家生存条件的适应。相应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政策一方面是从经济危机中引导出来的，另一方面是从社会抗议中引导出来的。

对于俄罗斯，这意味着必须首先转向发展的社会类型，按照它们的表现程度，随后解决其他的问题。否决社会进步的道路，导致关于市场经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概念成为泡影——这正是按照“不管如何，迟早要死”原则在进行的。

人际关系的变革

很遗憾，今天谈论俄罗斯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的发展暂时还不到时候。

我们的政府经常在讨论，在全球经济竞争的条件下，需要国家体现出的品质和能力，这些品质和能力总体上使它成为独特的“国家企业集团”。

按照这种逻辑，国家只需要转变为按照商业法规运行和着眼于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某种“超级公司”。由此，要求国家缩减开支，要求缩减税务负担，甚至是要求缩减国家社会职责——总之，缩减所有非生产性的开支的要求如此普遍。

如此这般的对国家的经济效能的粗浅理解，与在当今世界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正确逻辑背道而驰是非常危险的。正如我们在20世纪资本主义的演化例证中所看到的，这种观点是无知的、有害的。

社会政策——这是社会竞争能力的保证和表现。现代社会不能只是按照经济标准发展自身，甚至是按照会计记账式地计较成本收益。如果在现代社会中发展保障了知识、知识分子和自身塑造的新的机遇，那么，显然，发展的基础，对人自身的投资就会变为投资，变为对俄罗斯人力潜力发展的投资。

“多一点社会性”——是今天俄罗斯主要的口号。

将主要的改革——我们的社会必需的社会领域的现代化列入议事日程。

这项主要的改革在于克服历史上形成的对劳动的评价，在于根本上改变居民的收入政策。在于持续提高劳动工资，保障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最终给社会发出提示，人成为了改革的目标，而不再和石油一样，是普通的经济资源。

国际经验显示，社会需求的激励是加快国家经济发展的有效工具。提高工资和退休金、引入银行信贷的福利条件、延长长期信贷的期限——所有这些都可能成为在整体上保障俄罗斯经济——在不包涵仅仅是开发和出卖国家资源方面——发展的整套方案。

当扩大生产的任务和私有财产的概念转变为扩大销售和开拓需求的任务时，资本主义意识到自己社会内容和内

部变革的必要性——大量的、稳定的需求者的支付能力。

除此之外，只有当基本的居民群体有可能从自己的收入中为自己和孩子支付食品、衣服、住房、医疗和教育时，只有当出现了道德权利和所谓的转化“社会领域”为市场时，上述情况才会发生。

现在，显然很早。证明这一点，举几个例子就可以了。1.7美元每小时——意味着这就是俄罗斯今天的平均工资。这是俄罗斯科学院居民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提供的资料。根据这指标，我们不仅落后于欧洲和美国，还落后于许多国家。根据俄罗斯科学院学者的计算，韩国平均小时工资为7.2美元，在墨西哥是4.5美元，甚至在土耳其是2.6美元。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经济方面的主任，院士德米特里·谢苗诺维奇·里沃夫的数据更加令人吃惊。数据显示，在俄罗斯，把人转化为商品，最终只得到33戈比。在日本、欧洲和美国不少于70-75戈比。的确，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比西方这些国家低很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对劳动的歧视还是很严重的。根据里沃夫院士的这个数据，我们的平均劳动力转化为1美元的工资，要比美国或欧洲多付出3倍。

结果，根据俄罗斯科学院居民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的资料，俄罗斯的贫穷结构实质上与欧洲、其他发达国家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在这些国家，贫穷命中注定首先是那些不适应社会、没有劳动能力的人。而我们的社会结构，贫穷看起来是：40%的穷人是具有劳动能力的，正在工作着的

公民，他们所工作的条件是谈不上经济扩大和社会再生产的。

难道在这些数字中就能揭示俄罗斯经济改革的隐患吗？难道不是在这些数字中隐藏着社会向更高水平的迈进的关键吗？

对相当多的位于高层的改革者来说，这些问题被视为“禁区”。至多，可以认为，原因是由于某种似乎不可避免的迅速高涨的通货膨胀。虽然，例如，根据大多数专家的评价，跟“货币化”相关的额外的社会预算开支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只有0.2%~0.5%。

回避这个问题是相当可怕的。必须认真讨论和仔细分析。何况，如果社会领域的根本性改革成熟，就应采取措由国家预算开支向大部分公民提供住房、医疗、教育。但我们的改革家们就是极力想把这个负担转嫁给公民，而不给他们任何补偿。

由此，上述问题不仅仅是经济性质的，更主要的是政治性质的。关于转换居民收入政策，增加劳动收入的原则性决定——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改革家的震荡”期间是国家必须的和不可避免的开支。

不久前，在国家杜马中向经济发展部部长格列夫格尔曼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最低工资标准会最终达到最低生活标准。他的回答要点是：如果目前的这种GDP的增长势头能够得到延续，那么过不了几年就可以考虑这一问题了。

最低工资标准自2005年1月从600卢布增加到720卢

布，2006年1月1日到1100卢布，可惜，根本情况没有多大变化。因为联邦政府许诺到2008年前经济中的平均工资的比例将提高一倍。所有这些行动基于似乎逐步提高的逻辑，而实际上是目前已经不合时宜的居民收入政策。

我担心，即使过了“许诺的几年”，情况也不见得有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学家认为，全球化会产生“贫困增长”的现象。

这种现象的原理是：保持居民低工资水平可以成为国家在全球竞争中巩固自身地位的手段，只有“低工资”才能成为你的竞争优势。因此大家陷入了这种误区——保障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伴随着居民的贫困状态的延续。

这种情况的唯一出路是由国家实行提高居民收入的全新政策。并且，不仅要提高，而且要大致平等。

我们现在的问题不仅是居民实际收入处于低水平，而且收入差距相当大。社会贫富分化巨大，超过了所有社会学的贫富分化警戒线。根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的统计，现在俄罗斯居民收入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加大。如果2003年社会最富有和最贫困的10%的差距是14.5倍，那么2004年是14.8倍。

没有人怀疑官方的统计数据，根据这一数据，最近几年平均工资名义上增加了4-5倍。而根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最近的提高工资的决定这一数据还要提高84%。

现在的事实是，实际上工资的增加水平低于目前的通货膨胀和公众服务费用和其他项目的增长。例如，根据2004年的统计结果，年通货膨胀率为11.7%，住房费用

上涨了23%，医疗费用和教育费用上涨了13.5%。

更为重要的是，上面提到过的俄罗斯居民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进行了一项调查——“不同居民阶层的人均收入在改革期间的变化”。调查显示，80%的俄罗斯居民更穷，只有20%更富。并且2%的居民的收入增加了10倍。而最穷的20%的居民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生活水平下降了一半。

如果在最近几年这种情况有所变化的话，那么只会变得更为严重。在社会两极分化的背景下，居民收入增长的统计变为令人诅咒的“医院晴雨表”，并且无处不在。

我再援引俄罗斯科学院居民经济问题研究所的研究结果：现在俄罗斯增加1卢布导致上层的收入增加20%，就是说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加3卢布，而收入最底层的居民，只有15戈比。换句话说，逐步变穷的增长在全球化竞争的大背景下又增加了社会弱势群体贫困的增加。

如果我们继续认为，单凭经济的增长自身发展，没有国家的有目的的社会政策也会消除贫困，那么结果就是自相矛盾的。

○ 5 俄国资本主义未来的 九个步骤

正如欧洲和俄罗斯 20 世纪的历史经验所证明：忽视社会问题的解决可能会导致社会动荡，引起各种性质的革命，而这些问题有着一致的共性，就是它们的破坏性。这种破坏可以颠覆国家的经济、政治生活甚至整个社会。

同时，资本主义的演化正如社会生活的理论和实践所证明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包容与融合和用社会政策周密配套地组织经济不仅是可以的，而且对维护社会稳定也是必需的。

尽管资本主义单一的世界经验——肆虐地开采自然资源，在社会领域采取“自然淘汰”的政策在本质上是“殖民”和“买办”的性质，这依旧是俄罗斯资本主义的特点。

俄罗斯政府迄今依旧是按照 19 世纪中期的范畴思考，当时私有者和工人之间的尖锐对立构成社会发展的基础。

由此产生严酷的社会政治，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同时代替了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

俄罗斯目前处境的复杂性恰好也在于此。要同时解决两大问题：一方面，要加速经济现代化，要求宏观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同样需要支撑和扩大社会结构的可能性。

这两个问题之间的矛盾是可以被克服的。我们只是需要转变思路。不要为了改革本身而改革。不是追赶西方，而是在把握世界发展的潮流的轨道中实现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现代化。

为此必须提出有关认真修正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的问题。进行这样的修正必须遵循如下九条方针：

1. 最近10年国家发展的顺利和最终这15年的变化，不仅是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稳定的证明，而且是在现有国界内（也就是说，没有新的领土损失和没有新的“国家损失”）有能力保障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的证明。

具体来说，这是后工业现代化任务的解决。这些任务在苏联时期没有得到解决或不可能解决，于是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革命性的动荡。

如果我们想保存经济发展的潜力，必须找到“新经济”发展中的民族优势。并且在一系列关键的“技术突破区”——正是由于它们（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热核技术），近期世界才得以发展——俄罗斯暂时还拥有一定的优势。

国家所面临的世界恐怖主义的挑战，同样要求在国家

安全领域系统地解决和大量投资。并且，技术安全同样是近期世界范围内发展新经济的关键方向之一。

2. 俄罗斯的未来直接取决于基础设施的超越式发展——交通、能源、住宅、市政、信息、安全和管理基础设施。

除了发展速度外，发展的质量也必须得到保障。而在发展的质量和效能之上也需要它的准确性和适应性——能够恰中目标，而目标在不断变化。

基础设施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内部非膨胀性增长的源泉，而且是建立国家发展和新的空间组织的源泉。

所有这些共同提升了系统的适应性，提升了在必要情况下迅速改变结构和保障自我发展质量的社会能力。

在这个背景下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不在于提高税率。应当看到住房改革中的根本目标，正是大众普及性、住宅的质量。与这个目标紧密相关联的现代化和建立新的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应该优先发展。

由此，我们能否胜任这个任务，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发展战略的其他标志。这样，建设领域——它涉及经济的一系列领域——能够成为有效率的、非能源型增长的“火车头”。居民住房问题的解决是和贫困做斗争的主要手段之一。

福利市场机制的发展保障了居民中的一部分——年轻人，排队轮到次序的人。也使得国家政策侧重的其他一系列问题——家庭问题、人口问题、医疗保障问题、吸毒问

题、保障社会稳定问题和社会团结问题得到解决。

3. 同时，随着俄罗斯“新经济”和社会基础项目建设的发展，必须立即开始在社会再生产领域投资，也就是在教育、卫生医疗和科学领域投资。

在现代社会中，卫生医疗、教育、科技，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令人沮丧的零头。这些领域获得的投资和社会为这些领域的支出不相符合。而这些领域恰恰是社会有效向前迈进的必要前提。

生产力的基础正是人力资源，是社会资本。因此，未来的国际领先地位属于集中力量发展人的生产、人的健康和知识，有质量的生活的国家。

最终，正是这样的社会政策，而不是联邦财政“会计式”精打细算的模式，成为了当今世界宏观经济的主要模式。最终，是想变成为现代世界提供资源的附庸国家还是想以自己的人力资源、创新潜能与世界强国并立，完全取决于我们。

4. 如果我们再次观察俄罗斯经济改革的阶段，特别是在筹划中的社会领域改革，就会非常明显地看到，政府在为发展设置障碍。

政府不是一年，不是两年，而是10年前，就有责任发展社会保障领域，而且应该加强这种能力。这就意味着开始按优先顺序实施提高居民收入的新政策和缩小社会两极分化。

即使是提出和解决把最低劳动工资提高到最低生活标准也是必需的。但这里的最低生活标准，是按照全新标准

制定的——其中应考虑到健康、教育、住房开支和公众费用开支。这样的最低生活标准应该比现行的最低生活标准高出几倍，也就是按照今天俄罗斯的水平人均每月不低于6000卢布。

为了将来的退休者，在发展退休金保障与发展保险和储蓄机制时，类似的方式也是必需的。

提高最低工资和退休金不低于足够体面的最低生活标准，加快享受福利群体的收入增长，将会促进解决社会两极分化程度的降低。

并且，还应该考虑改变税收政策。如果政府提高纳税的硬标准，那么就应该完全解除工资处于最低生活线上的纳税人的纳税义务。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社会政策，应该优先相应地关心那些没有劳动能力且国家关心不足的群体、没有客观条件用自己的劳动生活的群体。

5. 新的收入政策能够保证俄罗斯经济增长到新的水平，现在，就连官方的统计数据也承认，公众服务领域在经济部门中达到60%。这个数据本身就能说明很多问题。一方面，这是“后工业化”在经济中的进展动向。另一方面，是所谓的“荷兰病”的一个迹象，因为荷兰的经济严重依赖原材料出口。第三，这种趋势是中小企业加快发展的迹象，是社会“中产阶级”——社会的稳定性——的环境形成和加强的迹象。

由上述这些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国家的统计数据，再次证明了在2004年经济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公众服务部门的保证。总体上，俄罗斯经济在去年增加了7.1%，但商品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增长了仅仅6.3%，和市场服务领域提供的额度大致相等；在许多方面受限制的中小企业发展增长了8.7%，而决定居民收入的零售额度在去年增长了12%。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在战略规划中国民经济的加快发展原则上是由新的居民收入政策、扩大居民消费的支持能力决定的。

可以理解，现在的趋势是在许多方面都取决于有利的原料对外贸易形势下取得的高收入。但是，从国家发展的长期任务的角度来看，给予经济发展新的支点，压制居民的需求，不仅为经济的增长而工作，也为结构的改革，为扩大内部市场和发展非能源领域的生产而工作。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为此，居民的新的收入政策，提高工资在国民产品中的份额是必要的。

现在，根据《俄罗斯资本主义解剖》一书的作者，斯坦尼斯拉夫·福什科夫教授的看法，我们的劳动工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不到40%，而这一数据在美国达到60%。实际上，因为我们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在建立内部市场的同时，迄今为止，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为1/4的居民工作，而不是在为整个国家服务。

正是居民的新的收入政策，与此相关联的财政预算和税收政策的变化最终应该保证经济再生产的扩大，内部市

这个“漏斗”中也会陷进部分中产阶级。这样，根据独立的社会政策研究所的评价，中产阶级由于新的改革试验可能会被压缩一半——从目前的20%压缩到10%。

非常明显，这样的趋势在社会结构变迁中直接与保障社会稳定和社会和睦的任务相矛盾。

相反，社会团结或许只有在接近一半的“基础阶层”有上升为中产阶级可能性的时候才会有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慢性贫困病”将在社会占据上风。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将是人均收入接近最低生活标准的2.5倍的群体。

为实现这些目标应该实施所有的社会经济改革。考虑到这些任务，现行的政府的社会经济纲领也应该做适当的修正。

8. 寻找发展目的从根本上意味着必须放弃“盈利积累”和稳定基金的思路，转变为建立新的有质量的经济和新的社会政策。需要指出的是，不是因为善于积累而富裕，而是因为会开支而富强。要学会精明地、有目的地开支。

因此，必须在现有的“稳定基金”基础上建立一个“俄国发展基金”。可以学习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普及的实践经验，建立不是一个预算基金，而是两个预算基金。其中一个用于预防危机的预算财政，另一个用于发展目的。

在这种条件下，如果“积累的”稳定基金可以由政府支配的话，则发展基金的优先地位的确定和使用范围应该授予俄罗斯总统下属的专门委员会。

9. 各大区应该承担经济“火车头”的功能。

目前存在这样一种担心，即实行新的社会政策会导致许多大区的财力不支，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但问题的本质不在于以此为理由拒绝实行新的社会政策，而是在于在指出的问题中看到了必须改变预算关系体制的又一个证据。

那些可以被用在各区的资金——借助它们可以更温和、更周到地进行社会改革（福利改革、住房、医疗改革、教育、科学）——被储存在稳定基金中，“呆滞”不动。

返还部分经济资源和下放大区的权限可以创造必需的可能性以实施新的社会经济政策。

更何况，关于保证执行机构的一致，关于各大区首长的选举原则的修改，这些举措的实施提高了国家管理体系的效率。为了所建立的垂直管理体系能够全力发挥效能，必须给予各大区以社会经济领域的全权和职责。

国家的联邦基础得到维护和发展，是国家所面临的一系列战略问题顺利解决的前提。联邦主义是我们在加快经济发展、解决社会现代化、发展公民社会、保障俄罗斯的全球竞争力方面的优势之一。

在本书中所形成的思想和建议只是最基本的一个草稿，是社会经济改革逻辑的原则性变化所必需的草图，还需要分析和认真的计算。

我们明确所不需要的是一个正在消亡的俄罗斯，一个没有科学、没有教育、没有文化、没有医疗保障和没有居


民的俄罗斯。但我们需要一个拥有原料贸易顺差、巨额的预算盈余、庞大的稳定基金的俄罗斯。

列宁在自己的著作《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中写道：“拥有木犁和连枷、水磨和手工织布机的俄罗斯，开始迅速地转变为拥有犁、脱粒机、蒸汽磨和蒸汽织布机的俄罗斯。”

今天的任务在于，拥有石油管道、铝锭和木材运输船只的俄罗斯，变为一个拥有大学、科学实验室、高科技和现代医疗保健设施的俄罗斯，变为一个民有的俄罗斯。

特别鸣谢本书特别策划孙越先生的大力支持



 中社博雅

封面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未来市长必读

ПОСОБИЕ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МЭРА

★ 俄罗斯国家行政学院必读教材

★ 俄罗斯教育部指定国家行政干部必读教材

★ 在世界新的竞争格局下，如何担当一个超级大都市市长的责任？

全书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未来市长必读”，主要探讨在世界新的竞争格局下，如何担当一个超级大都市市长的责任，需要关注并处理哪些问题，以及卢日科夫本人对俄罗斯目前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看法。第二部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100年以后”，旨在探讨社会安定的最高境界，即社会改革的必备条件问题。作者在书中充分结合了当前的俄罗斯及莫斯科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来寻求解决之道，包括俄罗斯的政治体制问题、寡头问题、社会福利问题、户籍管理问题等，对于中国也有相当值得借鉴之处。

ISBN 7-5004-5360-4



9 787500 453604 >

ISBN 7-5004-5360-4

定价：40.00元